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总策划 张余胜

明長城時代的開啓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赵现海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项目执行/施援平　责任编辑/许　景　王曦莹　施援平
封面题字/冯天亮　装帧设计/张友乾

ISBN 978-7-311-04371-1

定价：122.00元（上、下册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明长城时代的开启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赵现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长城时代的开启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 赵现海著. --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6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 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4371-1

Ⅰ. ①明… Ⅱ. ①赵… Ⅲ. ①长城－修建－研究－榆林市－明代 Ⅳ. ①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8604号

策划编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许　景　王曦莹　施援平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明长城时代的开启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赵现海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总 印 张　40.75（插页5）
总 字 数　563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71-1
定　　价　122.00元(上、下册)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淘宝网邮购地址:http://lzup.tao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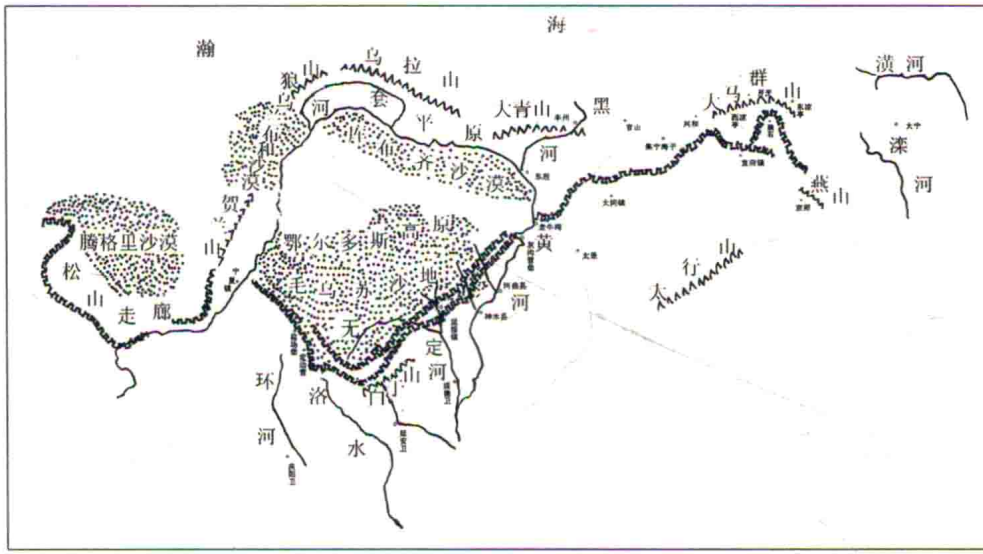

图1　明代阴山边疆地理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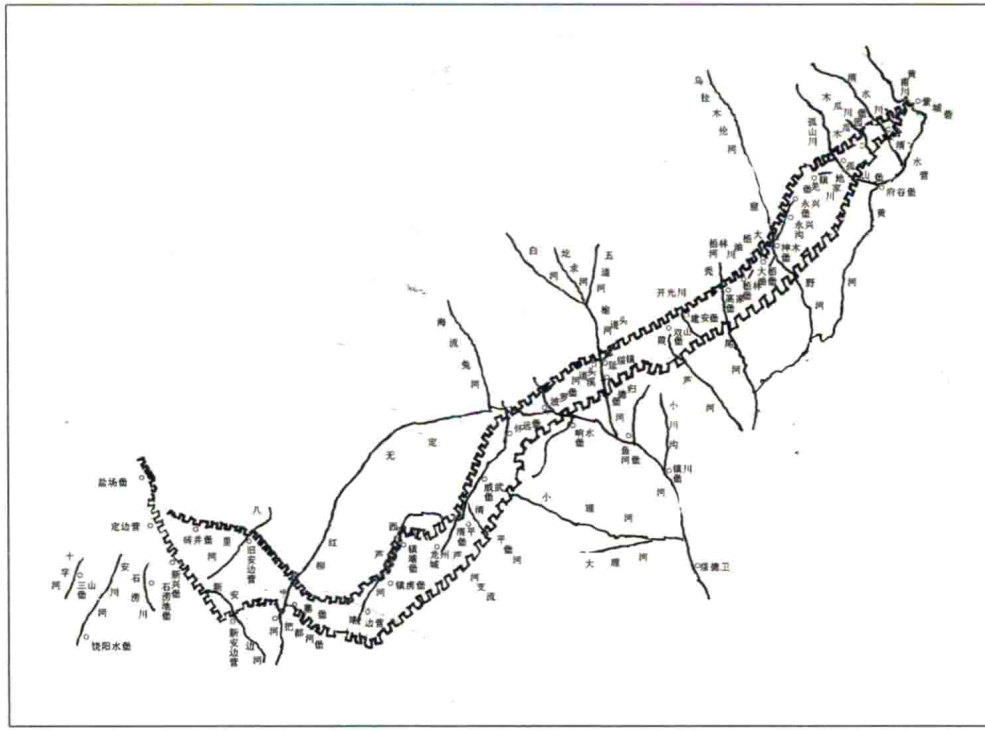

图2　明代榆林明长城立体防御体系示意图

图3　榆林大边走马梁长城，2009年摄

图4　榆林城戴兴寺（正德时期延绥镇总兵官戴钦建），2009年摄

图5　榆林城钟楼（始建于明），2009年摄

图6　榆林城红石峡摩崖石刻，2009年摄

图7　鱼河堡残墙，2009年摄

图8　镇川镇，2009年摄

图9　波罗堡小西门，2009年摄

图10　神木堡九龙山东墙，2010年摄

图11　砖井堡东墙，2010年摄

图12　木瓜园堡全景，2010年摄

图13　旧安边营五里墩，2009年摄

图14　定边大边长城壁画，2010年摄

图15　定边南西道长城墩台，2010年摄

图16　盐场堡北盐场，2009年摄

图17　新安边营，2010年摄

图18　新安边营北墩远景，2010年摄

图19　石涝池堡南墙，2010年摄

图20　石涝池堡北墩，2010年摄

图21　白于山脉，2010年摄

图22　毛乌素沙地，2009年摄

图23　河套，2009年摄

图24　后套，2009年摄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高华

委员（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颋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　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

出版说明

随着20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序

对于现海来说，这两年是个学术丰收的季节。2012 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现在，关于榆林长城的研究又要出版了，这完全是一直以来他刻苦读书、勤于笔耕的结果。

现海的研究，虽然是传统制度史的内容，但他却努力尝试做出突破。因此，在他关于九边军镇的著作之书名，就产生了一个很长的副题——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真不知道出版社的编辑是怎么同意这样的写法的，正标题 9 个字已然不短，再加上 17 个字的副题，怪不得读者不爱读历史书，光是标题就把人吓跑了。

我放个马后炮，该书名不如叫《明九边军镇史——边疆假说下的长城制度研究》，因为“九边军镇”就是“九边长城军镇”，没必要多那两个字；“代”也可以省略；副题中的“中国”没必要，因为本来就讨论的是中国的事；“视野”亦可省，因为“假说”的“视野”本来就不太通；“史”与正题重复，故删。书名从 26 个字减为 18 个字，省了 30%。这说明，文字的锤炼还要多下功夫，赵轶峰兄为其所作《序》的最后也指出了这个问题，求新是必要的，但不要故弄玄虚。

话说回来，现海的问题意识是好的，他的“边疆假说”，即为“边疆本位”，试图与以往的历史取向唱对台戏。尽管他并没有提到美国“新清史”，但似与“新清史”的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假如以边疆为本位，所涉及的内容，就应该是自外而内辐射的视角，甚至是自长城区域向南、向北辐射的视角；从制度史的角度，就主要不是明帝国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设置及其因革损益，而是这套制度（比如卫所制度、边镇制度）确立之后，形成的一套相对稳定的结构，反过来对长城内外的历史（包括制度史）产生的影响。

对该书的评论本不应是这篇序的任务，只是本书可以被视为前书

的续作，也是现海关于长城研究基本取向的延伸，所以，将两书联系起来讨论也是必要的。在前书中，现海提出要将区域社会史的观念引入长城史研究中，既强调了研究长城沿线社会的必要性，又强调了整体史的视角，即重视与长城相关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从而提出了“长城社会史”的概念。他认为，“对长城制度史的研究，是构建长城社会史框架的骨干支柱”。因此，前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个“骨干支柱”先立起来，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则是这个骨干支柱的第一块血肉。

还是需要先讨论一下书名。

何谓“明长城时代的开启”？似乎可以有两重理解：一是说明朝开启了一个“长城时代”；二是说存在一个“明长城时代”，本书专门讨论这个时代的开启。究竟何者为是，现海没有给出解释。如果说是前者，那秦汉怎么算？难道不是秦汉开启了“长城时代”？还是说这个“长城时代”具有特殊的含义，只有到明代才算真正“开启”？如果说是后者，由于本书的讨论以明中叶为核心，那么是否明代的“长城时代”从此开启？但什么时候又是它的高峰或者没落呢？也许隆万时期是“明长城时代的高峰”？

假如现海提出“明长城时代”这个概念是为了凸显这一时期长城所蕴含的独特意义，那我倒是可以认同的。明代的长城地区，在明代之前，经历了辽、金、元的统治，在上述3个政权的疆域当中，这一地区已经不再是中原王朝的边陲，而是他们的核心，是连接中原汉地和北方腹地的地理枢纽。暂时隔过明朝不提，对于清朝也是同样。因此，在近千年来中国北方的整个历史走向中，明朝是很特别的。恰恰长城在明朝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明代的长城也是很特别的。此外，中国的明代又恰与世界的时代变化同步，15世纪不仅有帖木儿帝国的崛起和伊斯兰教的东扩，而且迎来了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这分别给长城的西端和东端涂上了浓墨重彩。在这个意义上说，明代的长城也的确是很特别的。不知道这是否能够解释现海的“长城时代”及其“开启”的用心？

当然这也许依然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

本书书名的副题仍然很长。想建议现海直接改成《榆林明长城修筑的社会史研究》,但又觉不妥。既然作者要用“视野下的”这样的表述,就是说“长城社会史”只是一种“视野”,本身做的研究并非“长城社会史”。从内容来看,本书基本上讨论的是延绥镇防御体系建立的问题,或者说就如书名中所体现的,讨论的是长城的“修筑”,并没有讨论榆林地区的社会。

如果说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则必然要对榆林有所认识,否则我们无法对余子俊设榆林镇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予以评估。此外,如现海书中所论,由于榆林地区与河套地区的关系极为密切,讨论榆林,又必不能脱离对河套地区的讨论。时人曾说,“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议徙镇榆林堡,襟吭既据,内地遂安。边墙东起黄甫川,西至定边营,长亘凡千二百余里。……彼时虏少过河,军士得耕牧套内,益以樵采围猎之利,地方丰庶,称雄镇焉。自虏据套以来,边禁渐严,我军不敢擅入,诸利皆失,而镇城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不通货贿,于是一切芻粮,始仰给腹里矣”。[1] 当地军人如何耕牧,如何樵采、围猎,如何导致“地方丰庶”以及“丰庶”到什么程度,则是长城社会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实际上上述问题涉及的是明代长城沿线地区的开发史。“查得沿边东起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有余里,膏腴之地无虑数万顷。往年西路如安边、靖边等处,皆虏人出入之区,迩来修筑边墙,耕者得以安其业,而岁获之利辄以万石计。”按这种说法,在成化间修筑边墙之后,这一地区大量土地得到开发,也因此出现与其他地区同样的社会问题:“查得该镇屯田之抛荒,其害有四:屯丁之消耗,一也;虏患之频仍,二也;征科之繁苦,三也;豪强之兼并,四也。”[2] 这些过程究竟如何,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时人对榆林卫之设、边墙之修颇有争议,但对其后果,后人往

[1]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32《许恭襄公边镇论·榆林》。

[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59《庞中丞摘稿·清理延绥屯田疏》。

往有积极的评价："成化七年置卫。八年，余子俊广榆林城，增三十六营堡。子俊请尽厘陕中人，有伍籍诡落者，及罪谪南戍子孙不能南风土者，实榆林卫。又择俊子弟教之读书，请建学，立官师，为弟子员。俗多弃地不圃艺，子俊又教之蔬果，开界石外地，兴屯田，岁得粮数万石。自是榆林始为重镇。"[1]这些评述都会引发我们去思考这里的聚落、人口流动、卫学建立和士绅阶层的初现，以及经济开发等多方面的历史结构过程。

现海当然讨论了营堡之设，但大体上是将其置于防御体系的框架中去讨论的，并没有讨论营堡聚落的社会、人群，甚至当时的官员在奏疏中不断提起的士兵如何胼手胝足地修筑边墙，守护烽堠，都没有得到描述和讨论。因此，这些营堡的设立只是朝廷或主事者的大手笔而已，他们与普通人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因此，严格地说，这并不是社会史。

从书前所附图片来看，现海已经有了社会史的意识，缺的只是付诸实践。比如戴兴寺，究竟在榆林社会中扮演过什么角色？红石峡的摩崖究竟有哪些内容？如果在书中无点墨涉及，那照片放在书前又有什么意义呢？仅仅是为了表明曾到此一游吗？为什么讨论榆林的事情，榆林地区的地方志都很少利用呢？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说现海的研究没有价值。相反，他书中的许多的论述，特别是对榆林、延绥一线防御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许多细节。正如书中所说，本书尤其注重自然环境因素与长城攻防之间的关系，几乎每一部分都将前者融入到论题之中。书中对搜套过程中一些著名的武将家族的兴衰所进行的梳理，读来也饶有兴味。最为重要的是，从对榆林明长城的研究入手，现海实际上切入了一个明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史问题，即河套的问题。因此，我毋宁用一个更朴实的书名来概括本书，即《河套问题与明榆林长城》。

在为学生和朋友的大作所写的极其有限的几篇序言中，我大多毫

[1]范景文：《昭代武功编》卷5《成化》。

不客气地直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有夸赞之辞。因为我始终认为，写《序》也是一种学术探讨，既然作者让我有先睹为快的荣幸，我为何不能把我的读后感第一时间告诉作者呢？

我衷心期望我这种可能不通人情的做法能得到现海与读者们的理解。

是为序。

2013 年深秋写于北京寓所

目录

上册

1 导论

——16世纪以来长城形象、研究之嬗变与本书之主旨 / 1

1.1 绪论 / 1

1.2 明清时代长城地位之升降与长城史研究之奠基 / 4

1.3 民国时期长城形象正面化与长城史研究的正式开展 / 10

1.4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城地位的提升与长城史研究的全面展开 / 21

1.5 16世纪前后西方世界长城形象之演变、记述与研究 / 38

1.6 美国社会科学化史学潮流中长城研究及其反动与调适 / 54

1.7 16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
长城记述与研究 / 80
1.8 “长城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的提出与本书之主旨 / 98
2 明前期“东北边疆时代”特征与
河套“弱点”地位 / 118
2.1 绪论 / 118
2.2 “河套”释义及其在中国古代“核心边疆”的
整体性“过渡阶梯”地位 / 119
2.3 近世时期“东北边疆时代”特征与
河套“弱点”地位 / 131
2.4 明初东胜诸卫建废及其
主要保障河东之定位 / 140
2.5 明前期宁夏河套内层防线与
大同、山西协防河套机制 / 150
2.6 明前期陕北拱卫河套与
其“差缓”地位 / 158
2.7 小结 / 165
3 “内政优先边防”政治文化与
明前期撤离“阴山边疆” / 167
3.1 绪论 / 167

3.2 明初“阴山边疆”军事攻防体系 / 167
3.3 “靖难之役”后阴山边疆两翼剪除与蒙古进攻阴山两侧 / 184
3.4 永乐年间鞑靼威逼阴山边疆与兴和卫内徙 / 192
3.5 仁宣时期边疆收缩政策与开平卫内徙 / 204
3.6 小结 / 218
4 宣德中期以后蒙古打通“阴山走廊”与出入河套 / 221
4.1 绪论 / 221
4.2 宣德、正统之际鞑靼打通阴山走廊与明朝边界意识的兴起 / 222
4.3 正统时期兀良哈进入河套线路及其地理特点 / 232
4.4 “土木之变”后瓦剌、鞑靼进入河套与明朝“搜套”行动的展开 / 244
4.5 天顺年间蒙古草原灾荒与鞑靼孛来、阿罗出出入河套周边 / 253
4.6 小结 / 264

下册

5 陕北地形与明中期延绥镇营堡
纵深防御体系的建立 / 267
5.1 绪论 / 267
5.2 天顺二年延绥镇建立与管辖地域 / 267
5.3 陕北地形特征与正统至天顺时期榆林
营堡寨纵深防御体系的初步构建 / 282
5.4 成化时期榆林边墙修筑以前的
营堡增筑与移动 / 319
5.5 明中期河套营堡防御理念由沿河
筑守至河套南缘的内移 / 342
5.6 小结 / 354
6 成化时期鞑靼驻牧河套与
明朝“搜套”攻势防御 / 358
6.1 绪论 / 358
6.2 成化初年毛里孩驻牧河套与
明中期杨氏家族之衰落 / 359
6.3 明中期石氏家族兴亡与
杨信充任“搜套”总兵官 / 372

6.4 成化二年杨信搜剿毛里孩、阿罗出持重无功与军事系统人事变革 / 380
6.5 成化六年朱永搜剿阿罗出部分成功与“搜套”军队文官系统崛起 / 393
6.6 成化七年乩加思兰等部进入河套与“搜套”军队文武系统地位嬗代 / 403
6.7 小结 / 412
7 明中期西北财政危机与移民河套可行性考察 / 415
7.1 绪论 / 415
7.2 西北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匮乏财政状况 / 416
7.3 “搜套”导致西北社会动荡不安与户部反对立场 / 431
7.4 中国古代河套生态环境变迁与成化时期移民河套之不可行 / 445
7.5 小结 / 460
8 西北巡抚系统政治利益与榆林明长城立体防御体系的构建 / 463

8.1 绪论 / 463
8.2 延绥镇巡抚设立、政治利益与成化七年户部系统余子俊任职 / 464
8.3 成化时期西北巡抚反对“搜套”立场与其提出的 3 种边墙方案 / 472
8.4 政治舆论支持边墙方案与余子俊构建榆林边墙前沿防御体系 / 480
8.5 余子俊修筑、迁移营堡与榆林明长城立体防御体系的形成 / 491
8.6 成化中期以后延绥镇城堡增筑与榆林明长城立体防御体系的完善 / 505
8.7 余子俊拓定延绥镇北界与后世“弃地守墙”之误解 / 519
8.8 榆林明长城的示范意义与明中后期“明长城时代”的开启 / 530
8.9 小结 / 542
9 结论 / 547
参考文献 / 566
索引 / 588
后记 / 620

1 导论

——16世纪以来长城形象、研究之嬗变与本书之主旨

1.1 绪论

长城始修于战国时期，而其渊源甚至可追溯至西周，直与华夏文明之形成同步。经秦始皇之改造，长城成为横亘华夏文明、草原文明之间的万里屏障。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长城不断修筑，不仅东西逐渐延展，而且南北纵深也跨越很大，成为横穿中国北方的世界最大的军事工程，与中国历史演变关系极大，对北方地区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面貌影响至深。对长城加以研究，是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与北方社会的重要视角。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但由于长期遭到自然与人为因素，尤其是后者的严重破坏，长城损毁极其严重，目前已岌岌可危，保护长城便是保存、发扬中华文化，保护全人类文化遗产。可见，研究长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迫切的现实意义。

虽然对长城展开现代意义上之学术研究较晚，但由于长城修筑关涉国家与民众之命运，自其修筑之始，便在庙堂、山泽成为公共讨论之对象。从目前所存资料来看，虽然起初官方舆论，即精英士人对长城之记载描述，以及长城起源、修筑与功过之评述在隋唐以前占据了长城叙事谱系之主流，但隋唐以后，则由于社会经济之发展，民间文化之繁盛，民间长城传说逐渐后来居上，甚至对精英文化形成很大冲击与渗透，最终在明清时代成为长城叙事谱系之主流。长城形象在这一长期变化中，逐渐从官方舆论中之正、负皆存，演变为民间所阐释之负面形象。

西方前近代时期虽然与中国接触并不如后来之广泛，但长城形象仍然借助商队、使节、军队之媒介，在上古时期便成为西方公共讨论对象。

不过整体而言，在16世纪以前，虽然长城在国家防御系统中占据了一定位置，借助孟姜女故事所表达的民间抑怨亦不断汇集与壮大，但毕竟长城自秦汉、魏晋之后，其在中原王朝边防体系中地位呈现不断下降之趋势。而至明后期即嘉靖以后，明朝开始在九边军镇防线普遍大修长城，使这一古老建筑工事重新复兴，官方长城图籍之撰绘，民间长城传说之推演，都在这一时期急剧迸发，蔚然大观，成为目前我们所看到长城史料的主要载体。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西欧各国扩展，西方世界也开始向其他地区扩张，在这一世界潮流之中，西方传教士、商队、使节开始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在耳闻目睹长城这一只有《圣经》中巴比伦塔可相比拟的宏伟工事时，用咏叹的笔调，将明长城壮观景象与秦始皇神秘传说融为一体，用书信的方式，传播至欧洲。这一夹杂历史与神话的长城景象在此后200年中，即18世纪以前，成为西方世界的长城固定形象，其余波甚至蔓延至今。东亚世界尤其是朝鲜，也在此时开始记录明长城形象。

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长城开始从撰绘、叙述阶段逐渐步入较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清朝继承了明朝庞大的长城遗产，且由于边疆防线的外扩，长城基本已成为纯粹的历史遗迹，而不再发挥其军事边疆防御功能，遂成为清初以来考据学传统中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朝廷逐渐展开合作，利用西方近代制图学理论，首次对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国疆域展开测绘，这一测绘地图不仅首次较为完整、精确地展示了长城整体面貌，而且还传播至西方，通过与更为准确的长城历史叙述相结合，为西方世界更为准确地展示了长城历史地理图景。东亚世界尤其是朝鲜也在此时开始反思长城功过。总之，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对长城历史的早期研究，为19世纪以后长城成为现代学术规范下的独立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西方（包括日本）对中亚这一世界地理最后一块未知领域的开发热情，长城开始得到系统的考察与研究。受

到西方新式学术体系刺激的中国学术界也开始现代意义上的长城学术研究。对长城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的学术历程开始了。虽然中西方对长城研究的起步几乎是同时的,起点也是基本一致的,最初都是对长城历史、地理进行基本的梳理与考证,但由于中西方学术发展整体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西方长城研究在内容、路径上都已分道扬镳。"同源殊途"的分流研究,加上各自立场存在的差异,导致在许多观点上,中西方都存在不小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有缩小的迹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学术界对长城研究已有一定的梳理。艾冲《近年来长城研究概述》[1]、瓯燕《我国长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景爱《中国长城的研究和现状》[3]。这些综述基本限于国内学者成果内容的引介,忽视方法的总结。美国学者林霭在他那部充满争议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4]一书中,简单梳理了中西方尤其西方自中世纪以来长城形象不断变化之过程,对西方社会的长城形象与学术规则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这部著作虽然很有启发性,不过并未对中国、东方学者的长城研究进行评论,对西方长城研究的总结也只是择要、举例而已,并未系统地考察其研究内容、路径及历史背景。

伴随《长城保护条例》的颁布,"大遗址"保护工程与"长城保护工程"的展开,中国长城保护进入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实质性保护阶段。在这一长城保护的新的历史时期,对世界范围的长城研究成果进行充分梳理与总结,并考察其背后的研究路径与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追根溯源,钩沉国际长城史研究之共同起源与脉络分流,从而为今后长城史研究与保护提供可资操作的理念与方法,便是十分必要而富有意义的。

本书在回溯16世纪以来东西方社会长城形象与研究脉络不断嬗

---

[1]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2]载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载氏著:《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变之基础上，重点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三大学术群体的长城研究，尤其注重研究路径、观念、方法上的创造、变化与发展，并将其与世界历史变化趋势相结合，讨论长城研究流变背后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学科分类背景。在内容选择上，采取了“详前略后”的方式，重点引介在内容、方法，尤其后一层面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以阐明目前长城研究学术脉络之源流变化。在此基础上，本书对三大学术群体长城研究各自优胜、不足处进行初步总结，尝试打破目前世界范围内长城研究所受意识形态、学术立场、学科分类之限制，以明中期榆林长城研究为个案，提出“长城社会史”研究模式，为未来长城史研究提供一种可能。

1.2 明清时代长城地位之升降与长城史研究之奠基

长城因其规模之庞大、角色之重要，关系国家之命运、民生之浮沉，因此自其修筑之始，便受到士人强烈关注。最初之关注形式体现于正史修撰之中。《史记》所载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书：“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便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重点关注长城边防之地位。随着北魏、北齐大修长城造成的社会动荡，民间对长城之抑怨情绪开始大规模蔓延开来，余波蔓延至隋唐，遂与当时将士远征、家人怨怀情绪相结合，而发展出“边塞诗”之高峰，反映出士人对长城之关注开始较多地受到民情舆论影响。唐僧贯休《杞梁妻》“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便是例证之一。这与隋炀帝杨广撰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咏叹长城、开拓边疆之意境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受到开拓疆土时代背景熏染，唐代士人开始讨论长城起源、修筑、功过等诸问题，已开较为严肃地研究长城之源头。宋代史家郑樵在通史名著《通志·乐略》中，也受当时盛行之孟姜女故事影响，已开孟姜女故事考证之端。东汉末年蔡邕《琴操》载《芑梁妻叹》为芑梁殖之妻闻夫死，援琴而歌所作，书中云：“我的哀可以感动皇天，

使城倒堕。”郑樵认为《琴操》所言并无其事，只是收取古人之悲戚以谱曲，君子但取其声而已。

民间日益兴盛的孟姜女故事对国家边防观念似乎并无明显影响。明朝自开国伊始所建立之北疆防线，便有依托前代与新修关墙、堡墩，进行防守之意。永乐之时也在宣府、大同等地修筑墙垣，且已绘制边防地图。[1] 景泰年间，为抵御蒙古进攻，明朝进一步形成在修筑防御工事之前，首先“画图贴说”的工作方法，[2]在处置北边防务时，也以地图作为参照。[3] 成化前后已确立了定期绘制城堡图册的制度。[4] 嘉靖年间，延绥巡抚李如圭表彰湖广沣州（今湖南沣县）孟姜女遗迹时，称“今之边墙即昔之长城也，乃藉此以御匈奴，何尝不善！”长城之坏实源于秦始皇之“私”，不能“公天下之心”，“逞威肆暴，不恤民命，驱数千里之氓以供其役，欲速尽美，作子孙千万世之计”，从而导致“民怨”。[5]

嘉靖时期，随着俺答汗控制了蒙古大部分部落，并对明朝北疆全面施压，明朝开始在九边军镇全面修筑长城。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描绘长城防御体系的长城图籍大量涌现。《九边图志》由兵部职方司主事郑晓撰绘，成书于嘉靖四年（1525）。“凡三十卷，士林争传之。”[6] 虽然此书在当时非常轰动，但后世湮然无闻。这源于《九边图志》撰成后，郑晓并未将其上呈世宗，也未刊刻印刷，只是在官僚群体间流传。郑氏后人在编辑郑晓多种著作时，并未刊刻《九边图志》。这就使该书佚失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9“永乐四年九月辛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校勘本1962年版，第862页；卷61“永乐四年十一月壬午”条，第885－886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00“景泰二年春正月辛丑朔”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校勘本1962年版，第4243页。

〔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76《岳正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80页。

〔4〕〔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19“成化元年秋七月丙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校勘本1962年版，第389页。

〔5〕〔明〕李如圭：《贞节祠记》，〔清〕郭青编注、朱湘泉校注《孟姜山志》卷8《艺文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6〕〔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45《刑部尚书郑端简公晓传》（戚元佐），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875页。

了，只在《端简郑公文集》中尚保留少许文字。[1]

明代最为著名的长城图籍是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撰绘的《九边图论》。许论于嘉靖十三年(1534)四月六日完成《边论》与《九边图说》，嘉靖十六年(1537)上呈于明世宗，次年合刊为《九边图论》。《九边图说》残卷现藏三门峡市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长城全图，可能第一次用地图的形式全面展示了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面貌，受到了当时迫切希望了解九边实情的世宗的高度重视，不仅留于宫中浏览，而且命发各镇摹绘，从而出现了多种摹绘本，现存辽博、历博的《九边图》便是隆庆初年摹绘本。《九边图说》残卷绘制方法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人文传统，以直观实用为目的，采用形象绘法，只是长城示意图。

受到许论《九边图论》的影响，大量长城图籍、长城地图先后问世，比如魏焕《皇明九边考》、霍冀《九边图说》等。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当时此类图籍大概有百种之多，目前存世的也有数十种。此外，以全国为绘制范围，其中包含大量长城内容的图籍，比如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与以某镇、某地为绘制内容的图籍，比如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冯瑗《开原图说》等，更是数量甚多。这些长城图籍多数都是兵部职方司官员主要利用本司所藏公文图册，撰述而成，反映出中国古代地理著作的一大特点：学在官府。在中国古代，由于地图涉及国家机密，故而只有政府官员可以接触地图，并加以利用，撰成图籍。而为了便于并未有专业绘图知识的统治阶层理解，这些图籍绝大多数都是采取形象绘法。正是随着官方长城图籍的撰绘，社会上的一些士人才纷纷开始借鉴其资料，陆续撰绘长城图籍。而士人出于对学术个性的追求，使其绘制方法呈现了更多的科学化取向，比如采用“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的罗洪先的《广舆图》。[2]

入清以后，虽然仍有改撰、摹绘明代长城图籍者，如现藏北京大学

---

[1]〔明〕郑晓：《端简郑公文集》卷7《书胡端敏公行状后》，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郑心材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3页。

[2]关于明代长城图籍、长城地图，详见拙文《明代嘉隆年间长城图籍撰绘考》，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载《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图书馆的《舆图便览》、《舆图要览》。但随着北族入主中原，开拓外边疆，无论是出于民族心理，还是军事考虑，长城都成为被蔑视之对象。也正是在清代，官方、民间长城印象最终合流，长城之负面形象从而成为近代社会以前之普遍常识。但另一方面，明长城所赋予清朝的庞大遗产，却是无法回避的。清朝建立之后，部分明朝遗民出于收复河山之政治考虑，开始关注山川地理、关隘城墙，长城也成为其考察内容之一。比如顾炎武撰《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皆是出于此种考虑，在记载长城设施方面都偏重于明长城。还有一些学者延续了明末关注边疆、抵御外族的经世思想，关注清初的边疆、民族问题。比如梁份撰《秦边纪略》，便对榆林、宁夏、甘肃、洮州等地关、营、堡、寨，以及墙体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军事建筑与附近地形、山川、河流之关系有较为具体、深入的讨论，尤其是对于西边洮州二十四关、"小河套"的实地考察与论述尤为珍贵。

虽然清初学者的长城著述与研究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与经世色彩，但晚明以来学术风气由空疏转向实证仍然在他们身上有着明确的体现，亡国之痛更使他们的长城著述与研究呈现出理性的学术取向。比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以《长城》为题，不仅考察了战国长城修筑过程与起止分布，所持"楚方城为长城"之观点在后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而且开始区分内地长城与北边长城。而尤受后世关注者是他对长城起源之论述。"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亦即认为长城起源于战国经济、交通、作战方式之整体转变。

此外，明朝大修长城促使明清时期形成了孟姜女故事流传之高潮，受到这一时代氛围之影响，顾炎武在郑樵结论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左传》、《檀弓》、《孟子》、《说苑》、《列女传》、《古今注》的记载，指出孟姜女哭长城故事源自《左传》春秋时期杞梁妻却齐公违礼郊吊之事，杞梁妻之哭源自《檀弓》、《孟子》。《说苑》、《列女传》中开始记载杞梁妻哭而"崩城"，但尚非秦长城。杞梁妻故事与秦长城产生关联始于唐

僧贯休之诗。顾炎武之外，当时诸多学者都对孟姜女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康熙年间朱书游历全国，写成《游历记存》（丛书集成初编本）指出诸史并无妇哭崩城事，并提出齐妇如何转变为杞妻的问题。

被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为中国古代“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的《读史方舆纪要》，是顾祖禹借助正史、方志，旁及其他史料与著作，历经30余年撰写而成的。该书后附《舆图要览》4卷，绘制了明九边长城全图。顾氏世家皆通舆地之学，祖上顾大栋尚参与许论《九边图论》之撰绘。[1]《读史方舆纪要》考证了中国古代修筑长城，尤其是关、营、堡、寨之经过及其规模、地理与沿革，是中国古代最为全面地记载长城，尤其是明长城的著作。这种追根溯源、重视当代之特点，与顾祖禹立足考据，同时着眼经世的双重目标密切相关。但在墙体的记载上，《读史方舆纪要》却较少，这与该书重点关注每一地区军事建筑与地理环境之具体关系的立意有关。出于学者的谨慎，顾祖禹对边关、隘口的绘制十分审慎。“九边阨口，盘互纡回；西南洞寨，纷岐错杂，累举难详，烦称未尽。苟非事实可稽、图籍可据者，无庸漫存其名，徒眩耳目为也。”[2]这与他未能实地考察有关，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的一个缺憾。

学者之外，清朝官方编纂地方志是清前中期长城记述的另一方式。清朝入关之后，模仿明朝，编纂《大清一统志》，为此先命各省编纂本省方志。这样，从康熙以至乾隆，上至各省，下至各县，清朝各地普遍编纂了方志，一些学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方志学”于是兴起。清代方志详细地记载了墙体、镇城、关隘、营堡、墩台，相对于学者著作，虽然思想层次有所不及，但由于是地方政府集体行为，记载、考察更为详细，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清初长城的历史面貌，是当前长城研究与保护的重要史料。

乾隆时期，清朝统治已然稳固，明遗民也已凋零，乾嘉学派开始从

---

〔1〕〔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收入《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页。

〔2〕〔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凡例》，第8页。

考据传统出发，对长城起源、修筑、分布、作用、传说进行细致的史地考证，长城史研究也从此进入成规模的研究阶段。在对经典进行反复考证、正本清源的学术氛围中，长城起源年代、起止地点也开始得到不断探索。乾隆时期姚鼐著《左传补注》，认为方城只是山地之名，并非长城之起源，从而辨伪了所谓长城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史料依据。刘锡信著《潞城考古录·通州长城考》（丛书集成初编本）对京郊通惠河南北保存的两段残长城进行了考察，依据文献、墓志所载，指出应是北齐天保中所筑长城。

晚清以降，学者在新史料、新环境的刺激下，开始将目光转向更为辽阔的蒙疆地区，形成"西域南海之学"。[1] 光绪年间，杨守敬与邓永修、饶敦秩在乾嘉考据的基础上，采用较为科学的方法，绘制了《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简称《历代舆地图》，首次全面绘出了长城的位置，对战国长城、秦长城、明长城均有标注，而汉长城、北朝长城、隋长城则未标注，某些地方标注不够确切。

清末为整饬地方事务，清政府曾多次派遣中央官员实地考察。这些官员往往写有考察记、游记一类的著作，对当地长城位置与保存状况有一些简单的记载。比如聂士成考察东三省，撰《东游纪程》（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本），记载了柳条边。屠寄是较早关注金界壕的近代学者，1897 年受清会典馆之命，主持黑龙江舆图测绘，曾考察金界壕。

总之，明清时代由于明长城的大规模修筑与孟姜女传说的普遍流传，形成了前近代时期长城记述、研究的高峰，虽尚无近代意义上之学术著述，但已形成规模性的记述与研究，不仅成为当前长城文献资料的主要载体，而且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来讲，也已开后世长城史研究之端倪，成为后世研究时常追溯，乃至无法避开的问题起源。从此意义上讲，可将明清儒者对长城之记述与考释视作近代长城史研究之前提与奠基。

---

〔1〕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58 - 260 页。

1.3 民国时期长城形象正面化与长城史研究的正式开展

1.3.1 民国前期长城形象的逐渐正面化与历史地理、简牍学视角的引入

清末民初，虽然长城形象之负面性仍处主流，但随着众多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考察西北边疆与长城，国人开始受其触动，已开始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长城观念与文物保护之影响，新旧两种观念之冲突使民国前期长城形象充满了矛盾与迷离。比如鲁迅专门撰写《长城》[1]，认为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尽灭，或者还要保存它。……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与文人不同，出于整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政治家充分觉察到了长城在新时代之文化象征意义与政治整合意义。1918 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高度赞扬了长城是保存中华文明的史上最大工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长城形象逐渐向正面转变，学界也开始利用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对长城展开研究。

最早对长城展开现代意义上研究的学者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张相文。他关于长城的论文《齐鲁旅行记》最早发表在 1910 年《东方杂志》第 7 期，对泰安齐长城的修筑年代进行了考察，指出《管子》所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的说法并不准确，应是后人掺入，并不表明齐长城始修于春秋时期，而应是方志所载战国时期齐湣王防楚北侵所修。1914 年，张相文西北行至贺兰山，撰成《长城考》[2]，纠正国人以长城皆为秦始皇长城的一般误解，指出今之所指秦长城，指出实大多为明边墙。在稍后写成的《中国地理沿革史》[3]一书中，张相文简明地论述了战国、秦朝、明朝修筑长城之历史。张相文之长城研究虽在

---

[1]原刊 1925 年 5 月 15 日《莽园》周刊第 4 期。

[2]载《地学杂志》1914 年第 9 期。

[3]载氏著《南园丛稿》卷 15。

一定程度上仍保留古代学者游记见闻之痕迹，但却是从现代历史地理学视角出发，将文献与地理相对照，考察长城修筑过程、地理分布与建筑形式之学者，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研究长城之源头。张相文还针对当时流传之错误观念，指出分时代研究长城之重要性与必要性，故将之视为中国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下长城史研究之开创者，并不为过。

张相文之后，梁启超在1921年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从史料学的角度，指出国人普遍地将不同时代形成之长城统称为秦长城之误。指出："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理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属问题，欲解此问题，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用版筑，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则现存之城，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亦未可知耳。"虽然此前张相文已明确提出应区别历代长城，但梁启超的论述更为系统，且影响更大，此后中国学者按时段具体研究长城之风气开始兴起。梁启超强调不同时代长城之差异与中断之意识，甚至影响及于1980年代美国学者林霨对于长城的研究。

稍晚于张相文的另一长城史研究开创者是王国维。王国维虽然发表长城论著的时间稍晚于张相文，但却与张的长城研究同步，并开创了长城史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利用简牍研究西北汉晋长城边境军事组织与生活，开创了中国简牍学研究；二是对金界壕的研究。《金界壕考》[1]是第一篇讨论金界壕的论文，考察了金代界壕的修筑过程、地理布局，指出金代最初称界壕为边堡、界壕，皆无墙体，并非长城。这一观点在很长时间内被奉为权威，虽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可以证明金朝在界壕外同样筑墙，相应应视为长城，但仍然有部分学者坚持界壕非长城论。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从新疆古城遗址与

[1]载《燕京学报》1927年第1期。

甘肃敦煌长城带回大量汉文及其他文字汉晋木简。1911 年,罗振玉从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处得到这批木简释文《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与王国维进一步考释,撰成《流沙坠简》,于 1914 年在东京出版。王国维在序中依据《佛国记》、《晋书》、《沙州图经》等史料,考察了汉代河西四郡之设置与长城之修筑,认同沙畹关于西汉太初二年之前,玉门关在今敦煌以东,而非敦煌西北的新说。《流沙坠简》分为图版与考释两部分。罗振玉、王国维在书中不仅考释文字,而且利用古代文献,罗振玉对敦煌汉代长城士兵的生活、疾病、信仰进行了研究,王国维对敦煌汉代长城的走向、障燧布局、屯戍组织、西域史地等进行了考证,还据斯坦因《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绘制敦煌障燧分布图,并将各燧编号及其汉时名称、所出木简列为一表。罗、王二人对行文关系及文书制度,简牍缀合及编联的解析,创获尤多,实现了文献史料与考古发掘的印证与结合。王国维针对当时"疑古"、"信古"两种偏狭的史料观念,提出"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便是典型的例证,总之,《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奠基之作,也是中国学者利用简牍材料研究长城的开端。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考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带回的简牍时,其学生张凤将简牍照片与斯坦因第二次考察简牍图版,亦加以考释,于 1931 年由上海正有书局出版《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二编》,其中收录了部分后来马伯乐书中没有的简牍,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1926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负责考古调查的北京大学黄文弼,最早利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对内蒙古地区遗存长城,包括墙体、壕沟、墩台、兵营进行测量、挖掘,并依据长城修筑方式、周边遗迹与出土文物,判断长城分别形成于哪个时代,并指出长城修筑的材料来源体现了就地取材的特点。这些在他的考察日记《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1]中有细致的记载。瑞方负责考古调查的是贝格曼。

[1]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他在内蒙古居延地区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共发现汉简1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汉简”。贝格曼考察的初步报告见于贝格曼《蒙新考古纪行》，正式报告是瑞典学者索马尔斯特罗姆根据贝格曼的记录于1945年整理出版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

尽管国难当头，中国学术界对西北简牍史料的关注并未降低。1944—1945年，中国再次派遣西北科学考察团，其中历史考古组在甘肃境内进行发掘，参加者有向达、夏鼐、阎文儒3人。他们在汉玉门关和长城遗址附近进行了发掘。夏鼐、阎文儒考察了敦煌小方盘城以东汉长城遗址，发掘汉简40余枚。夏鼐对此加以考释，连同照片发表于《新获之敦煌汉简》[1]一文中。阎文儒于1953年撰写了《河西考古杂记》，介绍了遗址考察与汉简出土情况。

陆续出土的西北汉简大为推动汉代长城的相关研究，诸多学者参与了这一领域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发表并出版了大量论著，除广泛涉及汉代长城戍守与生活外，还重点关注了汉代玉门关、阳关、敦煌长城等对于理解汉代西北边防策略关系重大的问题。其中尤以劳幹的研究最为系统。1943年劳幹在四川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3部，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3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甘肃、内蒙古、新疆等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陆续在长城周边发现数量不等的秦汉简牍，不断推动着国内外学界关于两汉长城基层防御体系与社会生活之多面相的研究，构成了长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1.3.2 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研究与民俗学对长城民间史料的发掘

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奠基人顾颉刚开创了现代意义上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研究，也最早将民俗学引入长城史研究中来。顾颉刚于1924年、1927年，先后撰成《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两文，发表于《歌谣周刊》、《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出于幼时喜爱民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9本，1948年。

间故事的经历，顾颉刚遂得以结合经典文献与民间传说，突破顾炎武、朱书受限于经典文献之不足，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疑古”思路，将孟姜女传说成功地与杞梁妻故事相衔接，得以勾勒其两千余年的变化脉络。

在这两篇文章中，顾颉刚分别从历史系统、地域系统考察了孟姜女故事的时空流变，指出孟姜女哭长城故事随着中国文化中心之变迁，故事核心区域先后为山东、关中、河南、长城、江浙。历代时势与风俗亦不断为该故事增添新的元素，从齐国善哭习俗、两汉天人感应之说、隋唐乐府悲苦之曲，到各地域之独特民俗、传说，都可以在孟姜女故事的不断流变中找到影子。民众的感情与想象是这一故事得以不断扩张、发展的酝酿力，故事自身解释的圆融性也内在地推动着相关情节的发展。因此，这一故事呈现了巨大的多样性，并体现出民众的感情已经战胜了士流的礼教，但后者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孟姜女婚前、婚后的行为在部分版本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最后，顾颉刚将孟姜女故事与中国古史圣王事迹相比照，得出二者同样不断经过后世之“层累地造成”，充斥着神话与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研究这一问题，还有发掘新史料之明确意识，指出孟姜女故事流传两千余年，传遍中国本部，“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的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材料”。顾颉刚再次明确提出了发掘民间史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若将这一意识与1910年代王国维借助新发现之简牍材料，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及1930年代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相联系，可以看出20世纪初期，获得新材料以开拓古史研究新局面已成一代学人追逐之新风气。当国人关注新出土、发现之简牍、经卷时，顾颉刚又另辟蹊径，于民间传说中“重新发现”现成之“新材料”，更具深远意义。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1920年代的学术界影响巨大，虽有少部分学者批评其“小题大做”，但大部分学者，尤其关注民俗学者，将民俗史研究与传统文史研究领域广泛地结合起来，一时间孟姜

女故事研究蔚为热潮，对民俗学之形成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风气与学术立场的巨大转变，孟姜女研究也经历了多次浮沉。新中国成立之初，孟姜女作为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代表得到了进一步研究。1958 年，俗文学专家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不仅较为全面地搜罗了孟姜女故事，而且在序文中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指出孟姜女故事并非源于杞梁妻故事，二者的身份、形象差别很大。之所以会出现二者同流之观点，在于封建统治者、文人故意以封建礼法附会至孟姜女之上，在孟姜女故事流变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反抗统治、遵守礼法两种不同的发展系统。“文革”中，孟姜女一度被作为儒家向法家进攻的代表而受到批判。“文革”后，钟敬文所撰《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谬论》[1]，是纠正“文革”后期政治化史学潮流中的一篇文章，并指出杞梁妻哭长城故事之发展与北齐多次驱民修筑长城有关。日本学者饭仓照平《关于孟姜女》[2]、《孟姜女故事的原型》[3]认为孟姜女故事在唐以前才最终形成，佛教影响下的六朝志怪小说对孟姜女传说有很大影响。1961 年，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4]一书中，否定了顾颉刚之孟姜女故事源于《左传》的观点，认为顾未将这一传说与民间生活联系起来，指出孟姜女故事是萌芽于秦汉之际，形成于隋唐之间，至明清、近代得到大发展的民间创作，与杞梁妻传说无关。

1.3.3 边疆危机背景下历史地理、民族学、考古学、建筑学等视角的长城史研究

民国后期，由于中国不断面临日本之领土侵蚀，甚至亡国灭种之巨大威胁，整个学术界对中国边疆问题都十分关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长城作为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之“内边疆”，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

[1]《民间文学》1979 年 7 月号。

[2]《文学》1958 年 8 月号。

[3]《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 25 号。

[4]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1 年版。

注。这些学者往往利用历史文献，尤其是偏重地理记载之文献，对长城沿革、分布、走向与作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从其学术背景、研究旨趣来看，大体属于历史地理学系统。民国年间长城史研究最为兴盛之三支，除简牍学、民俗学之外，便以历史地理学为著了。此外，其他学科也开始涉及长城领域之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仍然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多学科加入长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地学杂志》1915 年第 3 期载苏辛《明边墙证古》一文，是中国学者关于明长城最早之专题论文。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奠基人，顾颉刚从历史地理角度对长城所展开的研究，虽不如孟姜女哭长城故事之出彩，但数量却更多，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研究长城之基础。在与王钟麒合作，由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1]一书中，顾颉刚首次分段考察了中国古代长城之修筑，指出战国诸国皆修长城以防敌。秦朝统一后，边界长城沿袭旧址，贯成一线，南北之限愈显，民族相嫉愈急。北族迫于地理，为求生存，奋图南下，秦汉以后屡次南侵，与中国历史相始终，长城因此不能必守，只是史上最可痛心之纪念物。顾颉刚是最早对秦长城进行有意识的考察的学者，1937—1938 年，鉴于西北地区已成国防前线，遂前往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札记，对战国、秦朝长城的修筑、分布、起止、作用、史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秦长城》[2]指出秦长城起于临洮，洮水横于西，为长城之外卫，故长城为秦之第二道防线，并非国界。《河、洮间之明边墙》[3]考察了明代防御安多区藏民之边墙，指出当地普遍存在暗门，师法长城而行之简易。

1930 年代，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军民的抗战情绪日益高昂，长城作为历史上抵御侵略之象征，其负面形象逐渐被忽略与淡忘，其形象已基本完全转向正面。如钱穆《国史大纲》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毁内地长城，筑北边长城，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

〔1〕商务印书馆（上海），1923—1924 年。

〔2〕载《益世报·史学》1939 年 3 月 21 日第 7 期。

〔3〕载《益世报·史学》1939 年 3 月 21 日第 7 期《甘青史迹丛谈》。

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这便是对传统观点极大的反正。《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则反映了修筑长城之悲苦情绪已被修筑长城、保家卫国之牺牲精神所代替，长城从而由中国历史之象征转变为抵御外敌之象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对长城之研究也日益增多，专题研究逐渐开展，不仅产生了长城专题著作，而且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

第一部长城史研究专著是王国良所编《中国长城沿革考》[1]。该书首次对战国、秦汉、南北朝、隋、明长城修筑进行了全面研究。关于长城起源，王国良首次质疑了顾炎武之观点，认为战国长城之修筑，多在开阡陌、车变骑之前，长城修筑背景是战国时开始吞并战争，各国为自固而修长城。在判断齐、楚长城修筑年代时，王国良改变了之前依据单一文献，孤立判断的做法，将长城之起源置于宏观之历史背景中去。关于长城之作用，王国良认为长城是世界上最大的防守工程，是为防御北方胡族之南侵所筑。北方胡族“南下寇边，来无时、去无所，穷追无所获，屯守又多费，应付极为困难！所以历代对于北胡，多抱保守主义”。这一论述确为不易之论，后世之论述长城修筑根源，鲜有超越这一立论者。但在长城范围之判断上，王国良受到当时流行观念之影响，认为汉边塞、明边墙低薄易就，并非长城，只是补长城之不足。第二部长城著作是寿鹏飞所撰《历代长城考》[2]，全书篇幅较小，约 13000 余字，书末附历代长城图一幅。该书对历代长城修筑年代、位置、沿革进行了考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提出《诗经》所载朔方城是长城修筑之始，金界壕也是长城，秦长城东起乐浪郡遂城县。这些观念都对后世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专著之外，民国年间还发表了多篇长城史专题论文，较早的一篇论文应是徐琚清的《北边长城考》，发表在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1929 年第 1 卷第 1 期。这一时期关于长城研究的论文集中发表于

[1]商务印书馆（上海）1931 年版。

[2]载氏著《得天庐存稿》之二，1941 年。

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历史地理刊物《禹贡》之上。《禹贡》1936 年第 1 期载张鸿翔《长城关堡录》一文对张家口等地长城的保存情况进行了论述。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1]考察了明代修筑边墙的过程，指出明边墙限隔华夷，弃地于敌，终不能守，边墙之功甚小。潘承彬《明代之辽东边墙》[2]指出边墙构造因地形之不同，有劈山墙、石墙、山险墙、土墙、柞木墙、木板墙、砖墙、石垛墙等 8 种。张维华师从顾颉刚等人，1931 年加入禹贡学会，自 1937 年起，先后在《禹贡》发表《齐长城》[3]、《魏长城》[4]、《赵长城》[5]3 篇长城论文，还在其他刊物上发表 3 篇长城论文《明辽东边墙沿革考》[6]、《楚方城考》[7]、《汉边塞考略》[8]。这些论文在对文献进行详细梳理与对前人研究进行细致辩驳的基础上，分别对战国齐、魏、赵、楚长城与汉边塞修筑时间、修筑过程、起至地点、分布走向与防御作用进行了全面考察，是论证翔实、结论可靠的成果。后世对战国长城的研究，基本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及其他手段，加以修正与补充的。关于长城起源，张维华接受了顾炎武的观点，认为战国骑兵替代车战，战争范围扩大，春秋时期因河为防、沿山置障已不敷于用，于是修筑长城。关于长城范围，张维华在《汉边塞考略》中指出，战国至秦所置边防之城类呼长城。汉世所筑以防匈奴者，虽间有长城之名，然多称“塞”或“障”。历代所筑防边之城，或曰长城，或名障塞，或曰边墙，而清人称柳边。名虽不同，其意则一。这便对当时长城限于墙体的流行观点提出了很大冲击，大为扩充了长城的内涵，并深深影响了后世对于长城范围的界定。

作为当时长城的主要遗存，明长城吸引了更多的关注。李旭在

---

[1]载《禹贡》(半月刊)1936 年第 5 卷第 1 期。

[2]载《禹贡》(半月刊)1936 年，第 6 卷第 3、4 合期。

[3]载《禹贡》(半月刊)1937 年第 7 卷第 1、2、3 合期。

[4]载《禹贡》(半月刊)1937 年第 7 卷第 6、7 合期。

[5]载《禹贡》(半月刊)1937 年第 7 卷第 8、9 合期，该文后还附有《中山长城》之简要考证。

[6]载《史学年报》1934 年第 2 卷第 1 期。

[7]载《齐大季刊》1935 年第 6 期。

[8]载《齐鲁学报》1941 年第 1 期。

《明末辽东的军事》[1]中指出辽东所筑堡栅以少数的军队，尽可制御多数的寇敌。明朝最终被女真灭亡，是由于军队本身的问题，与长城并无关涉。李有力《历代兴筑长城之始末》[2]则全面论述了战国、秦朝、北齐、隋朝、明朝修筑长城之经过，并对长城作用予以肯定。杨淑英《明代蓟昌边墙之建置》[3]、一厂《明代边墙沿革考略》[4]、孙祖绳《明代之宽奠六堡与辽东边患》[5]都对明代边墙修筑与作用进行了论述。

最早对清代传教士测绘长城进行研究的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翁文灏。他于1930年撰成《清初测绘地图考》[6]一文，对始于康熙四十七年的长城测绘工作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指出此次测绘由白晋(Bouvet)、雷孝思(Rigis)、杜德美(Tartoux)、费隐(Fridolli)4人于次年共同完成。王庸早年受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国文史地部，师从柳诒徵、竺可祯，深受当时师生热衷经世、研习古史地理的影响，加入“地学研究会”。后负笈北上，任职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得以遍阅馆藏舆图，遂鉴于国土沦丧之危局，重点关注明朝之疆域沿革。《明代舆图汇考》[7]所讨论者为明代全国性舆地图籍，《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8]则专门调查现存或题名仍存之明代北方边防图籍撰述、沿革与版本流传，分为九边总图说、边镇合志、各边镇别志、各路关卫区分记、边务杂著等类。另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边防图籍之著作《中国边防图籍录》于1939年由邓衍林撰成，只是由于战争的缘故，直到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该书较为详备地著录了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边防图籍名录。

专题论文之外，1930—1940年代产生的多部边疆著述，如顾颉刚、

---

[1]载《史地半月刊》1936年第1卷第2期。

[2]载《长城季刊》1936年第2卷第2期。

[3]载《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7月31日。

[4]载《国民杂志》1941年第1卷第9、10期。

[5]载国立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编:《东北集刊》,1942年第3期。

[6]载《地学杂志》第3期。

[7]载《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936年第3卷第1、2期。

[8]载《国风半月刊》1933年第2卷第9期。

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2]、华企云的《西北边疆》,也多专设"长城"之篇幅,以彰显长城防御作用。《中国疆域沿革史》第9章《嬴秦统一后之疆域》单列《长城》一节,并对明长城进行专门论述。史念海在其重版本前言中指出:"目录中特设《明代长城和九边》、《清代后期失地》等章节,亦有所指。"[3]该书关于明边墙因"秦皇筑长城而万世诟之",故而讳称长城,而称"边墙"的观点影响深远。但另一重要观点却在很长时间内几乎被完全遗忘。清人为掩盖明长城横贯辽东之事实,故在绘制明长城时,将其东端终点绘于山海关。后人遂深受影响。该书对这一流行说法进行了批驳,但却一直流传不广,直到1980年代辽宁丹东虎山长城之发现,学术界才开始正式纠正这一影响久远的错误观点。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4]指出清朝将东北划为禁区,设立柳条边,禁止出入,将山海关作为关卡,掩盖了明长城止于鸭绿江之事实,清代史籍遂以柳条边替代长城,以山海关为长城东端终点,造成后世以山海关为明长城东端终点之误解。

在历史地理学的长城研究之外,其他学科也开始涉及长城研究领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最早从建筑学角度,对长城展开考察。1934年3月3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建筑史》讲义指出秦、汉、明长城修筑方式、所用材料呈现了很大的变化。盛襄子《湖南苗瑶问题考述》[5]是最早以民族为主体讨论长城问题的论文,也是最早关注南方长城的一篇文章。1941年,李文信最早利用考古学方法,确定了建平县北部黑水村土城和老哈河两岸的"老边"是燕秦长城。1943年,他又与佟柱臣一起最早开始了对燕长城的考察,从考古学上证实了其后来为秦、汉所沿用的事实。1947年,李文信又首次考察金界壕,并撰成《金临璜路界壕边堡址》[6]一文,从考古学角度,首次研究金长城

[1]商务印书馆(长沙)1938年版。

[2]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版。

[3]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版。

[4]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5]载《新亚细亚》1935年第10卷第5期。

[6]载氏著《辽海引年集》,和记印书馆1947年排印本。

之开端，首次揭示了金长城存在形式。佟柱臣《赤峰附近新发现之汉前土城址与古长城》[1]则对赤峰出土之汉长城遗物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分析。

总之，民国时期国人受到西方长城观念与国内政治整合之影响，对长城之印象由负面逐渐转向正面，当时学人借助新发现之史料，从历史地理、简牍学、民俗学三种视角，开始对长城进行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上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长城研究的新局面。1930 年代以后，伴随着边疆危机的加剧，诸多长城史主题著作、论文陆续产生，标志着长城史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其他学科如民族学、建筑学与考古学也陆续加入到长城史研究中来，虽然成果尚少，但毕竟也促使中国长城史研究从开始之初，便呈现出多元化、多面相之格局，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城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4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城地位的提升与长城史研究的全面展开

1.4.1 建国初期长城地位的提升与长城研究的延续、变化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 20 世纪以来战乱不断的局面，为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国内环境。早期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继承了马克思对长城闭关锁国象征的判断。1923 年，瞿秋白在《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1 号中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新政权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没有证据表明其受到马克思对长城多所讥讽的外来影响，共产党人接受了国内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抗战以来长城不断提升之正面形象，并出于凝聚民族精神之需要，在新时代将长城从御敌之象征进一步升华至中国之象征。这从国歌、国徽、钞币等一系列国家标志性载体皆广泛采

[1]载沈阳博物馆编辑委员会：《沈阳博物馆专刊：历史与考古》第 1 辑，中国文化服务社东北区社 1946 年版。

用长城形象便可看出。不仅如此，毛泽东发表的多篇长城诗词，尤其“不到长城非好汉”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了长城的知名度与关注度。长城地位达至空前之程度，而且由于获得官方之认可，其劳役民力之负面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目前仍普遍流传，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基本形象已属正面却是从此无法撼动之事实。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建国初期长城史研究一方面延续了民国时期固有脉络，如张维华于1963年撰成《秦昭王时之长城》、《燕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3篇，将其与先前所撰论文汇为《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一书，延续了张氏长城研究的一贯特色，通过对文献的细致梳理，对古长城的建筑年代、分布走向进行了缜密的史地考证。张筱衡于1936年曾考察魏河西长城，1946年撰成《梁惠王西河长城考》，1958年正式发表于《人文杂志》第6期，也是一篇纯粹的史地考据，解决了魏国固阳今地的重大悬案，纠正了前人的失误。

另一方面，受到新政权意识形态与学术规范之洗礼，尤其受到长城地位提升之影响，对长城地位与作用充分肯定成为学界普遍之态度，如向达《西征小记》[1]将西汉河西长城提升至保障中西文化两千年交流之历史地位。“海通以前二千年来，中国与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之交光互影，几无不取道于此。”学界对长城起源之讨论，也显得更为激进，诸多代表性学者皆将长城起源定位于春秋，这与民国时期基本持战国观点有不小区别，如杨宽《战国史》[2]认为春秋时代楚修方城、齐筑矩防，皆为长城；陈登原《长城》[3]从古文献的角度，认为春秋赵简子时可能已修长城。

建国初期长城史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长城实地考察与考古。随着国内秩序的逐渐安定与长城被纳入文物保护范围，国内学者对长城之考古调查也开始较为普遍地展开。李文信对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等省燕、秦、汉长城的分布、走向及构造特点进行了系统考察，撰写了

〔1〕载《国学季刊》1950年第7卷第1期。

〔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载《国史旧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1]。东北地区学者对金界壕展开了多次考察。黑龙江省博物馆孙秀仁、于志耿发表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2]一文,确定了金界壕东端起点。1959—1960 年代,李逸友、张郁对内蒙古地区秦汉长城、城堡走向、规模、现状、周边地理状况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3]。1970 年代,呼伦贝尔、哲里木盟也组织学者展开考察,此次考察成果参见庞志国《金东北路、临璜路吉林省段界壕边堡调查》。罗哲文于 1940 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承梁思成、刘敦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长城调查与保护中,延续了长城建筑史路径。1964 年撰成《临洮秦长城、敦煌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查简记》[4],考察了临洮长城坡秦长城、敦煌玉门关汉长城、酒泉嘉峪关的规模、形制、材料、方法与布局。在《万里长城——山海关、居庸关和八达岭、嘉峪关》[5]中,罗哲文对中国古代长城所用材料进行了概括。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研究与社会建设相结合之时代风气中,长城地区沙化史因缘际会,成为研究新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北草原地带的大规模农业推广加剧了西北地区的沙化,为应对这一局面,国家制定了"西北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侯仁之作为其中一员,多次参加西北科考活动,在此基础上,陆续撰写了《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6]、《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7]、《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8]、《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9]、《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三迁"是谣传》[10]、《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

[1]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第 1 期。
[2]载《考古》1961 年第 5 期。
[3]参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4]载《文物》1964 年第 6 期。
[5]载《文物》1977 年第 8 期。
[6]载《科学通报》1964 年第 3 期。
[7]载《治沙研究》1965 年第 7 号。
[8]载《考古》1973 年第 2 期。
[9]载《文物》1973 年第 11 期。
[10]载《文物》1976 年第 2 期。

窥》[1]、《敦煌县南湖绿洲沙漠化蠡测——河西走廊祁连山北麓绿洲的个案调查之一》[2]等论文，以西北地区残存长城、关隘、城堡、烽燧为地标，指出历史上长城附近应为人类频繁活动的地区，目前却成为沙漠化之地，反映出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沙漠化的事实。侯仁之的这一研究不仅开创了我国西北地区沙漠化研究的新局面，被称为“沙漠历史地理学”，而且其利用长城作为沙漠化参考依据的方式也为后来的学者所继承。随侯仁之一同考察西北的王北辰对西北长城产生了关注。1965 年，他只身前往西北考察长城，撰写了《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一文，发表于《中国沙漠》1983 年第 4 期。这是一篇将长城史研究从长城本身引向长城地区的重要论文，不仅延续了侯仁之长城地区沙化史研究之思路，讨论了明代长城积沙之生态现象，而且首次关注长城地区的经济现象，考察了清代长城以北的“伙盘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王北辰以秦上郡长城为个案，进一步将长城地区的生态、经济研究提升至理论层面，指出长城是民族分布、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分界线。本书姑且称之为“长城界限论”。

虽然长城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官方认可，成为国家标志之一，但新中国意识形态内部之矛盾性与复杂性，却导致长城与其他文物一样，地位并不如其表面之稳固。长城一方面是新时代中国之象征，另一方面却是封建文化之代表。在 1958—1960 年激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长城被有组织地、集中地、成规模地大量拆除，最初拆除者为城堡、墩台、墙体之包砖，后来夯土亦被不断挖掘[3]。激进意识继续蔓延之后果便是 1963—1966 年的“四清”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之前未被注意之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与长城有关之文化载体，比如书籍、地图、契约、碑刻、信仰、传说等，被作为“封建文化残余”，被大量焚毁、捣碎，甚至禁止传播。“文革”之爆发，使长城在 10 年时间内，面临着进一步全面之冲击。一系列社会运动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大体

[1]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载《中国沙漠》1981 年第 1 卷第 1 期。

[3]包砖、夯土皆作为建筑材料，用于修建房屋、仓库、水渠、公路等公共与个人设施。

保持完好之明长城支离破碎、伤痕累累，不仅其建筑永远丧失其原有完整、雄伟之面貌，而且其历史文化内涵也由于诸多载体之消失，而永远无法接近与揭示。至于长城史之研究，除个别考古与考察之外，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正常学术脉络几乎完全中断。

1.4.2 长城地位的恢复与历史地理学视角下长城史研究的深入、扩展及长城生态史的产生

“文革”的结束，标志着建国初期社会运动阶段的终结，整个国家、社会秩序重新步入正轨，长城也从“封建文化残余”再次恢复至国家保护文物之地位。但长城已然断壁残垣，触目惊心。有鉴于此，1984 年，由《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 6 家机构共同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邓小平亲笔题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保护、维修长城之热潮。1987 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长城地位。长城之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逐渐展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学者开始较多地展开具体时代、领域之考察，其成绩主要体现在史地考证的深入、研究路径的开辟与研究内容的扩展 3 个层面。在这其中，历史地理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文革”之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地理学者借鉴考古调查方式，对长城展开普遍的田野考察，从而使长城史地考证在传统学术脉络基础上，愈加发扬光大，成为国内长城史研究中最具传统、最为集中、最为精深之研究领域。这方面成果甚多，难以一一论述，试以高阙方位考证为个案，揭示长城史地考证逐步深入之历程。

高阙位于赵武灵王长城西端，对其位置之揭示，关涉赵、秦两条长城走向之判断。但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罕见，关于高阙位置，一直纷扰不清。近代结合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察，较早探索高阙方位者是民国学者张鼎彝。张鼎彝于 1921 年编成《绥乘》[1]一书，指出高阙应位于“正当古黄河北流折东处”[2]的狼山口。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依据

[1]上海泰东图书局 1921 年版。

[2]《绥乘》卷 7《要隘考》，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汉书·地理志》记载，认为高阙位于绥远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黄河北流之东岸。张维华《赵长城考》[1]结合史籍记载与田野考察，尤其依据《水经注》之记载，指出高阙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临河县北百余里，为狼山之隘口，南带乌拉河。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2]、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3]、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大体都接受了张氏结论。以上研究尚是在文献梳理，尤其是《水经注》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4]是较早借助考古手段揭示内蒙古长城分布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高阙位于今狼山中部石兰计山口。实际是利用考古手段，验证了张维华以来关于高阙之普遍结论，即高阙位于狼山。

但对这一定论，后来学者却在此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地形、疆域等角度出发，加以否定，虽然具体位置稍有差别，但皆位于大青山。参见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5]、夏子言《古高阙地望及赵北长城西部走向》[6]、鲍桐《高阙地望新探》[7]、严宾《高阙考辨》[8]、何清谷《高阙地望考》[9]、李逸友《高阙考辨》[10]。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11]在大青山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阴山高阙”、“阳山高阙”的说法。

正是随着长城史地考证之深入，诸多关涉长城走向、分布之重要地点位置逐渐钩沉呈现，从而为完整反映长城面貌的地图绘制提供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为重要的长城地图绘制成果是谭其骧主编

---

〔1〕载《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8、9合期。

〔2〕地图出版社（上海）1955年版。

〔3〕载《治沙研究》1965年11月第7号。

〔4〕载《文物》1977年第5期。

〔5〕载《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6〕载《赵国历史文化论丛》1987年。

〔7〕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

〔8〕载《历史地理》1982年第2辑。

〔9〕载《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10〕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第1、2期合刊。

〔11〕载《文史》2005年第3辑。

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该图集于1950年代便开始组织绘制，于1982年陆续出版。该地图集以杨守敬等《历代舆地图》为基础，结合文献史料与考古成果改绘而成。长城之绘制亦吸收了1980年代以前之研究成果，除中山长城之外，其他时代之长城皆被标注出来，其中尤以战国长城最为详细。

史念海对西北地理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其中也包括长城之分布与周边社会，从而在延续历史地理学史地考证传统基础之上，得以扩展研究思路与内容。《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1]、《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2]、《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3]是史念海在多次长城考察之后，专门、系统、深入地论述西北地区战国、秦朝长城位置、分布与走向的3篇论文，弥补了前人缺乏实地考察的不足，对文献记载之错讹、遗漏、模糊处予以清理，从而复原了魏国、秦国、秦朝长城基本面貌，其中对魏西长城上郡位置、秦国"堑洛"长城形式之研究皆属独创。《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4]则首次从军事地理的角度，从整体上分析了西北历代长城修筑、分布及其与军事地理之关系，指出长城建筑形式多样，不仅包括夯土、砖石之墙体，还包括起源很早的壕沟。长城还利用山脉、河流及其他一些措施，以加强防守，形式多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史念海尚未将北宋陕北堡寨纳入长城范畴，但却指出宋代陕北堡寨扼守长城岭，作用与长城相仿佛。这一观点也为其独创。

与侯仁之等人长城地区沙化史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史念海发表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与原的变迁》[5]、《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6]两篇论文，也以秦、明长城作为地理坐标，对西北黄土高原侵蚀地貌、黄河中游侧蚀现象之形成进行了研究。史念海还关注长城周边森林之采

[1]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

[2]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3]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3期。

[5]载氏著《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6]载氏著《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伐，比如《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史念海对长城地区生态现象的研究，与当时接续长城地区沙化史研究的毛乌素沙地研究一起构成了长城生态史早期研究的主要内容。赵永复《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1]以明榆林长城为地标，对毛乌素沙地的自然形成、人为形成两种说法进行了分析，指出毛乌素沙地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因素，那种认为毛乌素沙地是唐宋1000年来人造沙漠的说法缺乏历史依据。不过由唐至明，毛乌素沙地沙化现象逐渐严重，这也反映出在自然条件之外，也不能忽视人为因素的影响。对于赵永复研究思路与观点，后来研究者聚讼不断，这使毛乌素沙地成为我国古代沙漠化研究最为集中的地区。此外，景爱《秦长城与腾格里沙漠》[2]以贺兰山赤木口长城被流沙掩埋为证，指出腾格里沙漠在明以后移动最为剧烈。当前长城生态史研究集中于森林采伐问题，如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3]、孔繁德《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破坏与长城位置的移动》[4]、邱仲麟《国防在线：明代长城沿边的森林砍伐与人工造林》[5]、蔡嘉麟《明代的山林生态——北边防区护林与伐木失衡的历史考察》[6]等。王子今《秦汉长城的生态史探微》[7]则首次提出“长城的生态史”概念，指出秦汉长城修筑之初，便考虑到利用生态环境，增强防御功能；在气候、土壤条件较适宜情况下，迁移农业人口，在长城周边发展农耕业。

1.4.3 经济史、文化史视角下长城史研究“过渡论”理论的提出与实践

针对王北辰所倡之“长城界限论”，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8]、《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9]指出长城一

---

[1]载《历史地理》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

[3]载《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

[4]载《中国北方资源开发与环境研究》，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5]载《明代研究》2005年第8期。

[6]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2006年。

[7]载《中国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长城文化出版公司（香港）2002年版。

[8]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载《唐史论丛》第2辑，三秦出版社1981年版。

直都并非农牧分界线，而是农业与半农半牧之分界线，细化了长城周边经济方式之研究。著名农学家王毓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1]则更早对长城地区经济方式进行了整体考察，虽也未明确以建构理论为旨归，但其系统之研究已可视为国内“长城过渡论”之源头。王毓瑚早年留学德国，对西方经济理论十分熟谙，因此在考察我国历史上农耕区扩展历史过程时，借鉴了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长城过渡地带”理论，以长城为地理坐标，系统论述了在长城由农牧分界线转变为农牧过渡带之过程中，汉族农耕业所发挥之历史作用，指出先秦、秦汉依托长城向北推广耕种区，长城基本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北魏、北齐长城以北有胡化汉人，也有汉化胡人，放牧与耕种并存，形成过渡地带。可见当时长城内外之矛盾并不是种族之冲突，而是游牧区与农耕区之对立，长城虽仍有保障农区之意义，但已非游牧区与农耕区之分界线。契丹、女真、西夏种植业非常发达，长城再也不是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明朝从山海关至开原之边墙，大体将种植业较发展之地区圈入，仍具古代长城之界限意义。不同的是，边墙主要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设计的，因而也不能就被认作牧区和农区的分界线。至今为止，关于长城地区经济演变趋势之研究，在广度、深度上，尚未有超过这篇论文者。

姚大中《北西中国》[2]则考察了长城从界限演变至国防线之历程，指出先秦、秦朝长城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利用空间的设定，长城最初是胡、汉之间的国境线，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汉朝修筑西长城，维护西域交通安全，并配备亭障，使长城成为进取政策之工具。北魏长城才全然成为防御性质的工事。此后历代相沿至明，修筑了一道大幅向南移动，且无须与国境线合一，而全出乎“防胡”要求的消极与被动性国防线长城。长城工事南移，自有其合理性，这在于可以缩短补给、运输路线，充分发挥防御作用。这也是长城性格转为守势或防御

[1]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三民书局（台北）1981年版。

时，长城线必须南移之原因。

与长城界限论、过渡论着眼于经济方式不同，余同元《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1]进一步开阔视野，将长城在经济领域之界限、过渡意义进一步引申至民族、社会与文化层面，提出了“长城文化带”概念，指出长城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防线，也是汉族、北方民族的融合线；既是农牧经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农业、游牧文化的汇聚线。不同时期长城之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长城文化带之兴起，也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明代长城文化带涵盖九边地区，是周秦以降长城地带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总结，是长城文化带的最后定型，经历了从消费型长城文化带演变为交换型长城文化带的过程。在《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2]中，余同元进一步指出交换型长城文化带呈现了由大市至小市、由官市至民市的变革，促进了农牧经济共生关系的新发展，带来了农牧文化二元一体格局，并最终导致中国“内边疆”的消失，反映出经济力量特别是市场功能在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在长城过渡论影响之下，学界对长城地区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具体考察。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3]考察了秦汉时期北边道在长城防御、进攻中之军事作用与经济功能。韩光辉、李新峰《北京地区明长城沿线聚落的形成与发展》[4]对明清易代之后明代长城内侧军事聚落演变为普通居民点，承担了经济开发职能的转变进行了研究。而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是受王北辰影响，逐步深入之陕北“伙盘地”及城镇研究。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5]指出明代榆林营堡之间形成了市场交易区，并沿狭长边墙地带南北扩张，形成了市场网络体系，推动了陕北区域开发、商业市镇之成长。王晗《清代陕

〔1〕载《烟台大学学报》1990 年第 3 期。

〔2〕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3〕载《历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

〔4〕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5〕载《民族研究》2003 年第 6 期。

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渐次扩展》[1]指出伙盘地是陕北边民迫于生计进行的一种不太稳定的移民垦殖活动，其自发性与不确定性在长城外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的制约下，呈现了不断变动的特点。

1.4.4 考古学、建筑学、民族学视角下长城史理论构建与研究实践

考古学、建筑学、民族学对长城之研究也逐渐增多与深入。考古学利用专业手段对长城进行调查、测量、发掘，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彭曦撰《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2]一书，对战国秦长城分布与现状，以及秦汉时期之利用加以全面揭示，纠正了自南宋《华夷图》以来诸历史地图关于此一长城位置与走向的误断。在此基础上，考古学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开始构建长城研究体系。一些理论概念虽与长城本身之研究无关，但却牵涉长城形成之历史背景，成为长城起源问题的直接证据。比如郑绍宗《有关河北长城区域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3]、韩嘉谷《长城地带青铜短剑的考古学文化和族属》[4]、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5]、冯恩学《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长城地带对贝加尔地区的文化影响》[6]、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一个论纲）》[7]、韩建业《先秦时期长城沿线陶器遗存的北界线及相关问题》[8]、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以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9]中所运用之“长城区域”、“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带”、“长城沿线”等概念，皆概括了长城形成之前或长城形成最初阶段之民族分布、经济方式、文化现象与历史走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韩嘉谷《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

---

[1]载《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载《考古》1962年第12期。

[4]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1991》，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载《燕京学报》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载《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9]载《边疆考古研究》2004年第2辑。

北方早期石城带》[1]指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长城沿线分布有若干石城带，功能之一是抵御北方民族南侵，可视为长城之“原型”。在另一篇论文《论前长城文化带及其形成》[2]中，指出“前长城文化带”历史表明，古代长城地带诸族无论是塞外还是塞内，农业还是牧业，都源于共同的原始文化区系。彭曦倡导从“文化区系关系”审视长城历史，指出长城形成的根源在于农业、游牧社会两大文化区系的冲突与融合。田广金、史培军《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3]借鉴自然科学视角，指出历史上长城南迁不仅说明了游牧文化地区变迁过程，也反映了这一地带向干旱化发展的总特征。

1982年，罗哲文出版了专著《长城》[4]，从建筑学角度，指出战国长城前身是彼此相望之烽火台，或连续不断之城堡，后来以城墙相连，成为长城。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由依地形排列的防御小城，以为屯兵警哨之所的列城发展而来。列城之间有的依险为屏，有的以城墙相连。列城是长城的重要形式，秦汉时期仍然在大量使用。汉武帝发展、改进了长城的布局，建筑了许多亭障、列城，烽遂相连，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有机地构成一个防御工程体系，从而使长城不再是一条孤立的线，而是防御网体系。明朝是长城修筑技术最高的时代，在长城内外修筑大量堡城、烟墩。作为《中国北方堡寨聚落研究及其保护利用策划》课题之成果，张玉坤及其门下10多位学人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调研相结合，考察了东起辽东，西至榆林之明长城堡寨聚落，不仅论述了堡寨建置沿革，而且十分注重堡寨与周边地形之关系，指出明长城堡寨聚落在地形利用上，呈现了层次化防御特点，即实行“城套城”之设计，不仅节约了修筑成本，而且造成“微地形优势”，充分体现了古代城址选择之风水观念。依照地形不同，可将堡寨分为4类：居高山上、扼守山谷；谷中盆地、水路并重；背山面水、道中下寨；沙漠荒原、城墙相互。在堡寨

[1]载《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

[2]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

[4]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内部设计上，大多按照中国古代方形城制模式，有计划建造，布局与设施几近小型城市。

与其他学科长城史研究不同，民族学长城史研究很早便建立在与国外学者的对话，乃至争辩的基础之上。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中国边疆研究，最初的起源，无论是史料，还是视野，都起源于20世纪前后中亚多次的考古发掘。此外，受到地缘政治观念影响，西方中国边疆研究中，若隐若现地显示出政治利益的背景。因此之故，西方学者对长城的研究，往往在“内亚”（Inner Asia）视野之下，将长城视为分隔中国内地与边疆的象征，并将长城以内称为“中国本部”。民国时期学者也受这一理论影响，但后来察觉到其背后的政治与学术危险性，于是开始构建本土的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时代之中国学者更为强调历史上的民族、边疆格局与当前民族、边疆格局的一致性，在进行民族问题研究时，具有预设的学术立场。在长城史研究中亦是如此。董耀会《对长城研究中民族问题的认识》[1]从理论上概括了长城史研究中民族问题的基本预设，即在长城研究中应承认政权分立、民族矛盾之存在，但这种分立与战争是在中华民族、中国疆土整体框架下发生的。因此，虽然关于长城与民族之关系，国内学者具有不同说法，但总体而言，基本是坚持长城并非民族隔绝之工程的基本立场。如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2]对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中国的长城》[3]中所持长城是农业平原与游牧草原的精细分界线，是中国历史上稳定北方的边界之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中国长城的修筑完全是出于军事斗争需要，位置不断变化，行政机构设置也不受长城约束，长城也未阻碍内外商业交流。曹大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评长城的历史作用》[4]指出长城是宏观上巩固边防、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劫掠、拱卫中原的战略防线，

〔1〕载《长城学刊》1991年第1期。

〔2〕载《文物》1977年第5期。

〔3〕载苏联《历史问题》1971年1月号。

〔4〕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并非就是位列最前沿的边境线，更非国界线。金应熙《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汇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1]则首次提出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线，而且是南北人民突破限制，展开贸易与交流的经济、文化会聚线，长城此两种作用同时存在，哪种占主导地位由具体政治形势所决定。台湾学者曾祥泽《万里长城的历史作用与价值》[2]强调长城有效地克服了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守住了北温带，避免了如罗马帝国那样被野蛮民族灭亡的历史。

在部分中国学者看来，长城不仅不是民族融合之阻隔，相反是中国民族融合、历史发展之推动力。李凤山在《长城——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纽带》[3]、《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4]、《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5]中，指出长城地带广阔，不能以界限衡量，提出"长城带"概念，即以长城为中介，形成了南北各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带。长城位于农业、畜牧业两大经济文化腹心的南北交汇处，处于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交流之中心地位，是古代中国稳定和统一势力的中心，是中华民族多元统一实体形成的最早中心，对中华民族的每一步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陈江《秦汉长城的建筑与汉民族的形成》[6]指出长城之修筑为汉民族之形成提供了共同地域，是汉民族形成之标志。李鸿宾《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从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的角度观察》[7]指出长城地区地理的复杂导致生活形态的多变，乃至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局面。张振兴《浅析湘西苗疆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明清时期苗疆边墙兴废为例》[8]认为明清苗疆边墙之修筑，是湘西多元一体文化形成之过程。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持与主流立场不同之看法。邢义田《从古代天

---

[1]载《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2]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学刊》1991年第2期。

[4]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5]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6]载《东南文化》1995年第1期。

[7]载《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1]指出秦汉迫于匈奴压力，将长城以北划于“皇帝之土”以外，但天下观并未改变，长城对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观念来说是一道羞辱的表记，“王者无外”等观念仍鼓舞了历代皇帝向外扩张的野心。白音查干在《长城与汉匈关系》中[2]指出长城阻碍了中原与草原之经济交流，加深了汉匈隔阂。

1.4.5 长城观念的演变与长城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

伴随着史地考证之深入、研究路径之开拓，学界对长城内涵之理解也逐步变化、扩展，建立在较为宽广视野基础之上的长城研究理论体系也开始逐步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张维华在其晚年编成之《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仍坚持认为长城并非一条城墙，而是古人因地制宜，或筑长城，或仅设烽燧、斥堠、堡垒等。从当时防御工事整体上看，皆互相联系，简称之为长城，亦无不可。在具体研究中，为论述当地防御形势，亦有必要一体论述。他的这一观点被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也成为长城观念的主流认识，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长城防御系统的内部组成。

彭曦《十年来考察与研究长城的主要发现与思考》[3]认为长城包含城墙、烽燧、障塞3种系统。孔令铜《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4]指出长城以口设关，形成点线结合、互为依傍的筑城体系。董耀会《长城学的概念、特征及分类》[5]指出长城是由关隘、城堡、墙体、烽燧等子系统组合而成的防御整体。曹大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评长城的历史作用》指出长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军事重镇、关城、隘口有机地联结起来，并于沿线设立障、堡、敌台、烽墩，互为犄角，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范中义《明代长城与边防战略》[6]指出明长城并非消极防御，而是包括烽墩、哨所、品坑、壕堑、城墙、敌台、站台、关

[1]载《燕京学报》2002年新13期。

[2]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3]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5]载《中国长城学会通讯》1991年第3期。

[6]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隘、营堡在内的防御体系。一些学者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证实了以上结论。陈述彭、布和敖斯尔、李胜强《从太空看长城》[1],黎风、顾巍、曹灿霞《宁夏长城航空遥感调查研究》[2]都利用太空遥感手段,指出长城是由堡城、边墙、墩台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点、线、面具有内在联系的纵深防御体系。

因此,目前除少数学者仍然坚持长城是夯土、砖石结构的线性墙体之外,大多数学者已就长城是一项纵深防御体系达成了共识,这从反映主流观点之辞典解释便可看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罗哲文在"长城"条下注:"长城由各种城、关、隘口、敌台、烟墩(即烽火台)、堡子、城墙等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长城百科全书》[3]进一步扩充了长城的内涵,长城"由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关堡,以及各种战斗设施、生活设施、报警烽堠、道路网络等组成。是一条以城墙为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纵深梯次相贯,点线结合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

至于存在广泛争议的金界壕,也已基本被视作长城。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4]指出金长城有新旧、内外之别,有多重线路,工程之浩大、设施之完备,超越前朝。由于金长城以墙垣为主,辅以壕沟,更宜防守,其中部分设计理念被明长城所沿袭。冯恩学《金代长城的战争观》[5]指出金代长城分为单线和网状两种,相比于单线长城,网状长城变单层阻断为多层阻断。在综合金界壕研究普遍性结论之后,李孝聪在《长城百科全书》"金长城"条下注:"金代在北方边界地带兴筑的长城、边堡和壕堑等军事防御工程的总称。"

关于楚方城是否为长城,学界仍存争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6]指出楚统名桐柏、大别诸山曰方城,并非长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楚长

---

[1]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4]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 年 Z2 期。

[5]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6]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城研究影响很大。但有学者指出楚方城始修于楚文王二年冬，是最早修筑之长城。[1] 关于长城之起源，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罗哲文《长城》主张“列城”说。景爱《中国长城史》认为长城起源于分散的城邑。张维华《齐长城》已提出齐因河堤而筑长城，杨宽《战国史》明确主张长城源自堤防。吴礽骧《河西汉塞》[2] 主张长城起源于先秦时期国界之“封略”，在当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此外，长城史料问题也开始得到关注。伴随长城的不断修筑，相关图籍被不断撰绘。唐晓峰《宋代地图上的长城》[3] 指出宋代《华夷图》已用垛口为标志绘制长城，长城以内地名甚详，以外则甚简略，这反映出宋人重华夏、轻外夷，以长城作为象征性分界的特殊观念。宋人绘制长城，反映了宋人面对长城已非边境之现实，通过在地图上绘制长城，达至理念不败之时代心理。拙文《明代嘉隆年间长城图籍撰绘考》[4]、《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5] 首次提出“长城图籍”、“长城地图”概念，考察了以往很少受到关注的明代长城图籍，开创了长城史研究的新领域——长城图籍史，扩展了长城史研究的史料基础。

总之，当前长城研究已从不分时代之笼统叙述，演变为不同时代之具体考察；已从长城墙体本身，扩展至城堡、墩台，乃至周边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现象。伴随于此，不同学科之视角、方法逐渐引入，虽然尚各自为战，缺乏联系与综合，但研究范围与视野已大为扩展。可见长城史研究虽历经曲折，但伴随长城地位之提高与学术整体之进步，仍取得重要进步。在此基础之上，以长城为研究对象之宏观理论体系开始得以构建，这便是“长城学”。罗哲文、董耀会《关于长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6] 指出长城学通过对文献史料、考古材料的整理及对遗址、遗

---

〔1〕贺金峰：《“方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修筑的长城》，载《开封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2〕载《文物》1990 年第 12 期。

〔3〕载《地图》2002 年第 5 期。

〔4〕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5〕载《史学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6〕载《文物春秋》1990 年第 1 期。

迹的考察研究、辩证分析和归纳综合，使研究成果反映出长城历史之综合性。董耀会对该文进一步修改，于1992年发表于《山海关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指出长城学是对长城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是各学科有关长城部分的复合体，并建立在广泛利用许多有关部门学科的研究成果之上。1991年董耀会还发表了《长城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1]，倡导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长城在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在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社会稳定、变迁所形成之影响。彭曦《十年来考察与研究长城的主要发现与思考》认为长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两个层次，即长城及其所反映的中华文化。长城学应是多学科的综合，应吸收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工程技术、军事学、语言学、人文地理及审美文化学等学科与系统论、耗散结构等理论，以考古学作为基础学科。

1.5 16世纪前后西方世界长城形象之演变、记述与研究

虽然中国长城形象自其修筑之时，便开始经由商人、使节、军队之媒介，传播至中亚乃至欧洲，但西方社会对于长城系统介绍与初步讨论，却是始于基督教向世界传播之过程。西方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不仅开始将长城形象越来越清晰、完整、准确地传递给西方社会，而且还将西方科学手段运用于长城考察与测绘，从而推动了中国长城地图史的发展。继传教士而来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使团虽然对长城只是浮光掠影之“掠过”，但却从国际战略、军事技术之视野加以审视，其所传播之长城形象直接成为近代西方世界长城形象直接来源。20世纪前后西方探险家的中亚探险则为西方长城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资料，推动了20世纪初期西方长城史研究迅速发展。西方长城形象虽来自于中国，但由于立场、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之影响，在长城记述、研究中融入了西

[1]载氏著：《瓦合集——长城研究文论》，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方历史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并反过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近代中国对长城的认知，构成了我们当前关于长城认识体系的重要部分。

1.5.1 16世纪以前西方世界的长城形象

长城修筑之后，不仅在中国屡屡见诸书简，而且在遥远的欧洲，通过商人、使节，甚至军人，中国长城形象也很早便为其所知。只不过这种印象较为零碎而肤浅，目前所见西方关于中国长城的最早记载可能始于公元4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在《事业》一书中说，"在地图描写中，则已述及长城。"[1]《事业》载："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地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郭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2]西亚、东欧因距中国较近，应很早便对长城有所了解。生于巴格达，到过中国沿海的马苏弟于955年撰成《税制考》一书，已明确记载长城。"大地的最东方，乃中国和新罗国的边界，直到戈(Gog)和麦戈(Magog)的长城。"[3]1896年，卡拉·德·沃将该书加以翻译，称："该段里德戈和麦戈长城，乃中国的万里长城。"[4]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交通的走廊，为欧亚世界的广泛交流提供了条件。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马可·波罗行纪》成为13世纪中外交流的最著名的例子。但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行纪》是其亲历还是摭拾西域商人之旧闻，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怀疑者提出的最大证据是马可·波罗竟然对中国的万里长城视若无睹。但也有辩护者称长城当时已甚颓败，并不雄伟，马可·波罗不加记载也属正常。但从目前所见长城遗迹来看，这一辩解显得无力。马可·波罗曾由哈密至肃州、甘州，以后至太原、平阳，这些地区皆有长城贯穿，目前在哈密以东至河西走廊尚可见汉长城高大沧桑之烽燧与突出连绵之墙体，在沙漠、平川上十分显眼。

---

〔1〕方豪：《中国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85页。

〔2〕〔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页。

〔3〕马苏弟：《税制考》，第43页。

〔4〕载〔英〕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收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页。

若马可·波罗确曾亲历,估计会给他带来相当的心理震撼,记载的可能性要大于不记载的可能性。虽然《行纪》记载了肃州、太原、平阳等地"环以墙垣之城村"、"环墙之乡村",[1]所指应为府州之城及地方堡寨,也是长城之一部分,不过最明显的连续墙体还是未见记载。无论如何,西方世界并未通过《马可·波罗行纪》获得长城的形象。

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继帖木儿之后,平定叛乱,派遣使者赴明朝。火者·盖耶速丁(Hafiz Abru,? —1430)根据使团日记,撰写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载了明初河西走廊的烽火传递制度。[2] 不过这一关于明初长城之信息,在目前所见资料中,并未有传至西欧的记载。近代西欧广泛熟知长城是在明后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

1.5.2 16—17 世纪西方世界的长城形象与早期研究

明后期至清前期,西欧各国与天主教会向中国大量派遣传教士,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最初踏上中国土地的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此后意大利、法国等传教士也先后进入中国,他们成为近代欧洲最早记载长城的群体。

葡萄牙人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是在传统上被认为第一位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他于 1522 年底(明嘉靖年间)到达广东,写出《一位先生向沙勿略神父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1548)》[3],指出中国与鞑靼交界之地,筑有坚固城墙,长度相当于一月或更长之路程。城墙依山而建,山顶以尖镐劈开,形成墙状,山谷之墙基非常结实。士兵驻守于城墙上之堡垒之中,城墙上还有许多监视哨,但鞑靼军队还是曾经进入过城墙。葡萄牙军官、商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于 1549—1553 年在福建经商,《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4]是他自 1551 年开始写

---

[1]〔意〕马可·波罗著,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火者·盖耶速丁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收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18 页。

[3]〔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艾思娅评介:《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澳门文化司署 1998 年版。

[4]载〔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艾思娅评介:《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作的关于中国之笔记，但只记载了中国与鞑靼由山脉隔开，“山上有一些关卡，关卡两边都有军事力量和守卫部队。”16 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曾到达中国南部，撰成《中国志》（Tractado），并于 1569 年出版。该书指出中国筑有一道长 100 里格或更长的，中间被山脉隔断因此并不连续的长城，把他们和其他人分开来，防止鞑靼入侵。[1] 这些著述关于长城之记载既非常简略，又欠缺准确，这与他们的活动范围始终限于南方，对于长城只是耳闻，而未目睹有关。这些著述反映的长城依山而建、利用地形之特征是 16 世纪明代社会的普遍认识，这一认识也相应成为西方人笔下长城的主要特征之一。长城是为防御鞑靼而建的观点也成为 18—19 世纪西方人对长城功能的普遍认识，在 20 世纪初期才遭到地缘政治学视角之挑战。

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于 1575 年访问福建后，出版《记大明的中国事情》（Relacion），指出中国北部有一道方石筑成的雄伟边墙，有差不多 700 里格长，7 寻高，底部 6 寻宽，顶部 3 寻，据说全盖上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工程之一。根据史书记载，这道边墙由秦始皇为对付鞑靼人修筑，他把全体百姓编成 3 人一组，先从每地区每 3 人中征召 1 人，再从每 5 人中征 2 人。因这些人来自远方，又是到不同地方去，筑城时大批死亡。城墙外还有城镇作为边哨，并且派遣总督、大将驻守。边墙外土地是在赶走鞑靼人后取得的，并非明朝领土，只是归属于它。[2] 该书关于长城由全国 1/3 民夫，在严厉监视下修筑而成的记载，既吸收了中国孟姜女故事传说，又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东方专制文明的一般认识，从而成为此后 300 年间长城史修筑的普遍观点，被广为传抄。

与以上仅到过中国南部的西方人相比，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曾被押送至北京，流放至甘肃，因此得以目睹长城，1614 年出版的《游记》对长城之记载便非常详细。该书指出大约在 528 年，中国

---

〔1〕载〔葡〕C. R. 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2〕〔西〕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载〔葡〕C. R. 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修筑城墙，长315里格，封闭边界，以防御鞑靼。共动用75万人，其1/3由百姓提供，1/3由僧侣与安南各岛提供，1/3由国王及亲王贵族与察院、按察使等官方提供。平托还曾亲自丈量过长城，一般来说城高6哥，墙身部分宽40拃；但4哥以下的墙基像由充填凹地的夯土建成，外面覆以灰泥混凝土，几乎比墙身宽一倍，如此坚固，1000门炮也不能轰开。长城没有建堡垒，但建有双层哨楼，底部为黑木柱，中国人称之为caubesi，即“铁木”。每根木柱都粗似酒桶，而且非常高，哨楼坐落在上面，似乎比坐落在石头和石灰上面更坚固。人们称此为长安城墙，意思是“坚固的防御”。这一城墙以同样的方式沿着绵延起伏的山脉修建，如碰到陡峭的山巅，便用镐把山巅劈开，形成天然石壁，这样，比起只是城墙本身，这一工事显得更加坚不可摧。长城只有5个出入口，均由河流所造成，每一出口皆有驻军7000人，其中步兵6000人，骑兵1000人，军饷开支巨大。驻军大部分为外族人，如蒙古人、占婆人、波斯的霍拉桑人与杰齐拉人，以及居住在内陆各王国的臣民，因为中国人的确不善战，除了缺乏实战经验外，他们好战心不强，还缺少一些武器，特别是缺少火器。城墙全线还设有320个哨所，每处500人，共计16万人，再加上差役、衙役、按察使与察院的卫兵以及管理维持的其他人员，常年人数高达20万人。对于这些人，国王只需提供粮食，无需支付饷银，因为他们所有的人或大部分是被流放发配来此的。

平托关于长城之记载，一方面源于实地考察，因此较诸其他道听途说之著述，更为准确，他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长城”这一名称的西方人，并且指出这一称呼源于中国人的称谓，这显示出16世纪明代社会“长城”之称谓是十分普遍的，明人并无避讳“长城”之说。但平托对长城同样充满了神话般的叙述，比如将东南亚、西亚种族与长城防御部队联系起来，这一显然违背事实的论述其实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地图与世界认知。平托将近代西方民主议政形式附会明代政治体制，显示出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误解。虽然拉达、平托在中国的活动足迹大为不同，但在记载劳工来源上却呈现了惊人的相似，且皆指出资料源于一本中国人撰述的史籍，这反映出在明代中国，这部史籍十分流行，成为

明人、西人了解长城历史之主要途径。

塞巴斯蒂昂·曼里克则指出,这部史籍其实是一部记载历代建筑的书籍。葡萄牙人塞巴斯蒂昂·曼里克供职于奥古斯丁修道院,于1628年被派往东方传教,到过澳门,于1649年在罗马完成《东印度传教路线》。该书指出,中国由一堵极大的自然形成与人工建筑的大墙环绕,中国一本介绍建筑的书籍记载大墙由古代一位国王为防止鞑靼人入侵而建造。国王在南京城召集御前会议,征得各市与居民点或镇代表的同意,由后者拨出1万皮科白银,提供23万劳工,其中包括3万官员与经过考核的工匠。27年后,一堵长322里格的高墙封闭了中国和鞑靼两个帝国之间的全部世界,其中80里格是人工造的墙,弥补了大自然的不足,遇到河谷与山之缺口,将山削平,用山石填埋,再在上边建造大墙。为了大墙平直好看,山头被削成一样高,上边做成方块石状,外面敷以人造油灰和灰泥,看着如同一道墙。先后有65万人参加修筑,分别由各居民点,教会与海南诸岛,皇帝与王子们,位高权重的老爷如都察院、都堂、海道及法官和总督提供。大墙建造得极为坚固,中国人称它为"长城",意思是"坚不可摧的要塞"。大墙有5个入口,都由河流冲刷而成。每个入口有两个城堡,一个是"大秦"的,另一个是鞑靼大可汗的。他们每一方在各自领地的尽头也都有城堡。上述中国历史书指出,这些城堡中每一座都有7000人驻守,另外还有6000名步兵和1000匹马,士兵中大部分是东方其他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民,例如莫卧儿人、呼罗珊人、波斯人、昌巴人和与中国交界的其他省份的人民。沿着如此长的大墙有320座驻军兵营,每个兵营有500名士兵,即共有16万名士兵,这还不包括会计、出纳、警官、司法官员和管理这一带人民和工程所需按察使和都察院的法官的陪同人员、卫兵和侍从。[1] 塞巴斯蒂昂·曼里克除了重复平托已经论述过的内容,进一步把包括东欧在内的更多的种族与长城防御联系起来。

[1]澳门《文化杂志》社编,范伟信译:《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4页。

明代在华西方传教士，以利玛窦传教最为成功。这位长期居住北京的传教士，也记下了他对长城的印象，指出长城位于北纬42°，连接山脉，是中国防御鞑靼入侵，并与之分界的工程，是一道攻不破的防线。[1] 在传教士传递的长城信息基础上，西方人开始对长城展开初步的绘制与研究。据目前所见，欧洲人绘制的第一幅标有长城的地图是1561年维尔荷（B. Velho）绘制的亚洲海图，该图用一座城墙置于中国与鞑靼之间。1584年出版的奥特吕斯（Ortelius）的地图册中，地图学家巴布达（Barbuda）也在两座山脉间画有长城，并注明它有400里格（1600英里）长，是中国用来抵御鞑靼人入侵的要塞。

欧洲史书中首次介绍长城的是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João de Barros，1496—1570）的《每十年史》（Terceira decade）。1533年，若昂·德·巴洛斯被任命为几内亚及印度事务府总监，该机构是在外官员回国后述职之地，巴洛斯借此搜集了大量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史料，于1552年出版《每十年史》。该书记载中国在“43°至45°间矗立着一道城墙，西起嘉峪关，沿山脉而行，东至东海海角，长度在200里格以上，是一大奇观。城墙并未连成一体，而是利用了陡峭山脉，只是在关隘处筑有城墙。城墙是为防范鞑靼人或蛋家人之入侵。[2] 值得注意的是，《每十年史》首次明确地记载了明长城的东西起止，但其估算的长度却是大有问题的，这反映出巴洛斯依据来源不同的长城记载，得出互相矛盾的结论。

与巴洛斯相似的是，德国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也从未到过中国，他关于中国的知识完全来源于在华耶稣会士卜弥格、白乃心、曾德昭、卫匡国提供给他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图说》一书，并专辟《中国的长城》一节，指出长城环绕4个省，甚至整个帝国，长度超过300德国里格，中

---

〔1〕〔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收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

〔2〕澳门《文化杂志》社编，范伟信译：《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61－62页。

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比整个亚洲还长。长城起始于中国海，在黄河岸边金村的山旁结束。除了在北部北京省和西安城以陡峭的山代替外，长城未曾中断过。长城建成拱形圆屋顶，仿佛是在桥上。长城每隔固定距离便有一高塔，有塔门。长城附近有城堡和要塞，驻扎不少于100万的兵力。长城由秦始皇修筑，开始于公元前215年，10人抽3，历时5年完成。长城非常坚固，其中不能插入一根钉子，否则修筑者会被处死。为把长城筑进海中，许多装载铁块的船只被沉入海中作为奠基。长城一直保存到现在，没有任何损毁和破坏。[1]《中国图说》再次明确"长城"之称谓，并吸收了此前多种书籍关于长城之描述，是传教士著作中关于长城描述较为全面的一部。

不过以上著作影响并不大，使16世纪较多的欧洲人知道长城的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所著并于1585年刊行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1585年首版于罗马，广泛吸收了此前西方人，尤其克路士、拉达、巴洛斯关于中国之论述。该书第一部分第9章《该国的奇异建筑和长500里格的长城即围墙》指出中国43°和45°之间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及城墙，西起嘉峪关，向东延伸超过200里格。城墙是由秦始皇为防御鞑靼而修筑，用城墙封锁了整个鞑靼边境。城墙中有400(或420)里格由天然岩石构成，其他则是用人工将巨大的石块筑成底7呎宽，高7呎的墙。为完成这一工程，在全国内3丁抽1、5丁抽2，很多人因筑城而死。中国史书将城墙作为中国得以存在两千多年的原因。[2]

1.5.3 清代传教士对长城的测量与考察

清前期西方传教士已通过种种途径，在清朝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对中华帝国之了解，已逐渐深入，这其中便包括长城。明代西方传教士限于条件，对长城之了解多限于道听途说，或简单之考察；长期居于北方之清前期传教士，则利用各种机会，对长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考

---

[1]〔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著，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谟译：《中国图说》，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379页。

[2]〔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收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7－368页。

察与测量。1682 年,耶稣会士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随康熙帝抵御沙俄之进攻,据此写成《鞑靼旅行记》,对所经之东北长城进行了考述。[1] 1687 年,受法皇路易十四的派遣,法国人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来到中国,作为与俄国在雅克萨战争后谈判的译员,4 次赴中俄边境,多次往返长城,成为所有传教士中对长城了解最多、最全面者,写成《对大鞑靼的历史考查概述》,指出长城虽然是世界上最惊人与非凡的工程之一,但以往西方人误以为所有长城都与北京地段一样,其实山西以东长城由砖石修筑,以西由泥土筑成。[2] 张诚对长城的论述是在多次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确凿结论,已经接近于专业的学术讨论。

清代西方传教士与长城最密切之关联便是采取西方制图学方法,以长城作为坐标,绘制了全国疆域图《皇舆全览图》。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张诚利用译员身份,乘机向康熙帝进呈亚洲地图,意在指明朝廷对当时东北地理知识认识的不足。康熙帝遂令欧人大规模测绘全国地图。法国人 J. B. 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记事》[3] 指出为便于测定北方各省界限与毗邻地点纬度,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先从长城测起。从康熙四十七年至次年,教士绘成长 1 丈 2 尺的总图,举凡长城各门(共 300 余处)、各堡以及附近城寨、河谷、水流,均行绘入。1709 年 5 月,雷孝思、杜德美、费隐诸人又开始测绘清廷的发祥地满洲。他们先从辽东入手,东南至朝鲜边境图们江,东北至松花江之鱼皮鞑子区域。1711 年测绘工作全面展开,雷孝思、麦大成(Cardoso)到山东,杜德美、费隐、潘如(Bonjour)出长城至哈密,测绘喀尔喀蒙古和陕西、山西。在山东完成测绘工作的麦大成等人,后来也参加了对山西、陕西的测绘。他们最终于 1718 年(康熙五十七年)完成《皇舆全览图》。《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为精确的地图,奠定

[1]薛虹译,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4 页。

[2]〔法〕张诚撰,陈增辉译,许崇信校:《对大鞑靼的历史考查概述》,载《清代西人见闻录》,第 121 - 122 页。

[3]载《历史地理》第 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了中国地图用三角测量的基础。随着疆域的拓展，乾隆年间的《西域图志》，由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西班牙传教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 Esphina）完成。《皇舆全览图》实现了欧洲尚未开展的大规模实地测绘与地图绘制，不仅为此后中国地图的绘制描绘了蓝图，而且也为欧洲的地图学理论提供了实践机会。法国的唐维尔依照费隐寄去的《皇舆全览图》，绘制了各种中国地图。在此基础上，1735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出版了《中华帝国及中国鞑靼之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的记述》，即《中华帝国全志》，从而使长城形象普遍为西方人所知。

1.5.4 17—18 世纪欧洲使团眼中的长城形象及其负面化

最早访问清代中国的使团来自俄罗斯，这与两国在 17 世纪的疆土问题上存在纠纷有关。1675 年，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 Spataru Milescu）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据此经历撰成《中国漫记》一书。该书指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中国地图以长城为界，绘出支那（Kitai）或契丹（Hatai）、希那（Hina）或希马（Hatai）两个帝国的做法是一种误解，中国长城以北，没有帝国与城市。长城以内是密集的城市与人口，长城以外是蒙古人、博格达人。长城是外人进入中国的关口，但蒙古人、喀尔木克人可以通过小关口通商、进入，黄河也在长城上撕开了几个口子，称为“塞”。[1] 在该书第 17 章《中国长城，何时由何人兴建，起始和终止地点》中，米列斯库专门讨论了长城的修筑与分布，指出长城是由秦始皇为一劳永逸地防止博格达人、蒙古人入侵，于公元前 215 年开始修筑，从全国征集民夫，10 人抽 3 人，历时 5 年修筑完成的。民工如此众多，以至运送砖石泥灰无需再爬到山巅，用手相互传递即可。因为是在多处地段同时兴建，故而工程进展神速，整个长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以完成。长城修筑极其严格，用石灰黏结石缝，要坚硬到以至铁钎也无法插入，否则便处以极刑。长城的结构是：以巨石

〔1〕〔罗马尼亚〕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国漫记》，收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8－24 页。

奠基，上面砌以城砖，用石灰接缝。有的段落则全以石块砌成，石块高5寻，宽近2寻，墙头布满垛口。长城东起辽东地区的海湾，离阿穆尔河不远，鸭绿江即流入此海湾。在起始处，秦始皇沉没了许多船铁矿石，以为墙基。所以，长城实际上起始于大海，并由此开始跨越4个大省，直达兰州。中国人把长城叫作“万里长城”，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长城实长约1500多俄里，中国人之所以称之为“万里长城”，是喻其巍峨宏大。长城走向随地势而变，除山势过于陡峭的喜峰口地区，以及黄河流经之处外，长城一直连续，并未间断。如果长城古时便为人知晓，那么它将会与世界七大奇迹并驾齐驱。长城至今保存完好，只有个别地方曾坍塌过，但一旦哪里发生坍塌，中国人会马上派工匠修复。

1693—1695年，由荷兰人伊德斯率领的俄国使团访华，德国商人布兰特（Adam Brandt）是其成员之一，写下了《1693—1695年俄罗斯使团访问中国的沿途见闻》，记载长城在鞑靼语言中叫Zabancrim，是全世界闻名的建筑。长城有300德国里格长，如果拉成直线，可能有400里格；有4个orya高；宽度亦是如此，可容七八匹马并行。长城多半筑于山顶，每1/4里便有塔（烽火台），以驽防御敌人。[1]

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前近代时期中西之间最为著名的一次对话。1792—1794年，英王乔治三世以向清乾隆帝祝寿为命，派遣由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专家在内的百余人使团访华。作为马戛尔尼的副手，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爵士在回国后，于1797年出版了访华见闻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很快被译为多种语言，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该书指出长城在保护中华文明、抵御游牧民族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在古代世界军事建筑史上具有代表性与突出地位，显示了中国政府具有大规模动员与组织社会的能力，既是中国隔绝鞑靼之边界，也是阻止内地反政府者出外之界限。而在史实判断上，英国使团较以往之西方人也更为准确，比如

---

〔1〕载〔德〕G. G. 莱布尼茨著，〔法〕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收入《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指出长城最初修筑于战国时期。总之,英国使团对长城的评价是十分正面的,将长城界定为文化先进的种族抵御其他种族之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工程。[1]

经过西人不断介绍、研究,长城逐渐以其年代之久远、工程之巨大、作用之伟大而为西方世界普遍所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象征,是西人中国知识体系中最重要一环。但步入18世纪以后,随着中国逐渐衰落、西方逐渐壮大,尤其是军人充斥的官方使团替代文化传播之传教士,成为东西方信息传递之主要纽带后,西方对中国之评价逐渐由正面转向负面,西方世界长城形象也相应经历了逐渐负面化之转变。英国人笛福(1660—1731)在1719年完成的《鲁滨孙历险记》中,认为长城尽管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但大而无当,因为它连乌合之众的鞑靼兵都挡不住。[2] 在1756年出版的关于世界历史、文化之通史《风俗论》中,伏尔泰对长城尚基本持正面态度。"公元前137年修筑的、把中国同鞑靼人隔开并用以防御鞑靼人的长城……就其用途及规模来说,这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3]但在其晚年编撰的《哲学辞典》中,伏尔泰开始对东方文明展开更多的批判。"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在1774年完成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著作中指出,中国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不可改变的"东方性"。中华帝国的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依百顺,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工程或艺术,如万里长城。但这无法阻挡这个民族的衰落,因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

无论是正面夸赞还是负面贬低,20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对长城之

---

[1][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315-331页。

[2][英]丹尼尔·笛福著,黄杲炘译:《鲁滨孙历险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397页。

[3][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北京)2009年版,第244页。

关注，基本是将其视为中国历史、文化之象征，是一种笼统的、概念式的认知，对长城历史进行具体研究的著作较为少见。整个学术界也基本如此。比如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文学家卡夫卡根据世所流传之长城印象，写出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之作品《中国长城建造时》，以第一人称的口气，以跨时空的方式，将长城塑造成最大的一个“物化”，通过长城构建出一个遥不可及，但又无处不在的、牢牢地控制着一切的领袖意志，以及一群不断尝试激情、出路却又总在重复旧路的大众。

伴随西方世界对中国了解逐渐深入，长城形象在其知识视野中，也愈加清晰而准确。尤其鸦片战争后，欧洲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从1841年至1846年展开环中国考察。古伯察在沿途撰写而成《鞑靼西藏旅行记》，自承在15个以上的不同地点穿越长城，多次描写了作为农民、牧民，农业、牧业两种不同世界界限之“长城”或“万里长城”。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订正了马戛尔尼使团以北京周边砖石长城作为全部长城之代表，指出：“我们所遇到的往往不是在北京附近存在的那种筑成堞垛的双层城墙，而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泥石砌体，有时又只不过是一堵普通的土墙。我们甚至还发现这道著名的长城被简化成了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完全是用几块碎石堆砌而成。”不过关于长城起止，古伯察仍然延续了清代的主流观点，“万里长城从甘肃的最西端一直延伸到东海”[1]。在西方世界将长城从“神话想象”转变至“历史研究”的著作是《东域纪程录丛》。1866年，英国退役军官亨利·裕尔在意大利完成了《东域纪程录丛》一书，该书被誉为几乎囊括了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对于长城之研究，也较以往所有著述都更为准确，指出秦始皇为抗击匈奴，在公元前214年建造长城，并将北方诸国建造的长城连接起来。西汉公元前102—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后，长城进一步向西越过沙漠推展。晋武帝欲于塔里木河流域重造中国的影响，从而

〔1〕〔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

于肃州以外建造长城，辅以瞭望亭，与旧长城相连。[1] 揆诸史实，裕尔之研究实属专业历史学研究成果，不过当时西方的长城研究由于史料匮乏之关系，只能到此为止。西方长城史研究格局的形成与扩展，始于20世纪前后中亚探险热潮与社会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新史料、新理论的巨大刺激。

1.5.5 20世纪前后西方探险家的长城考察与长城形象的正面化

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激发着西方人探索未知世界的巨大兴趣。19世纪后期，中亚成为世界地理的最后一块拼图——“地理上最后的空白”，从而吸引了来自俄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国探险家的接踵而至。西方探险家虽然身份各异、目的不同，或出于纯粹的探险目的，或为掠夺文物，或肩负着侦察中国西北军事、政治情报的职责，但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探险家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古国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尤以尼雅、楼兰、罗布泊的发现最为著名。敦煌文书的发掘更是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敦煌学。总之，西方探险家的考古发掘，为20世纪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西方探险家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还对西北长城进行了考察，而敦煌长城文书的发现更是直接推动了以研究汉晋长城以军事防御与生活为内容的长城简牍学的形成。西方探险家发现的这一文书史料，以及从中亚审视中国边疆与历史的传统，都刺激了20世纪西方学者在“内亚”研究视野下，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利用考古与文书资料，考察中国长城起源，构建长城理论解释的一系列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学家在考察、研究长城时，对长城所作正面之描述与赞颂，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18—19世纪西方世界长城形象的负面化，世界西方长城主流形象从而自此以正面为主。

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俄人是最早关注、考察我国西北地区之探险

[1]〔英〕裕尔撰，〔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40页。

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共进行了4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数次穿越长城。[1] 20世纪前后，俄国上校、皇家地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曾目睹长城。[2] 马达汉是20世纪俄国考察中国之最著名人物，对于甘肃长城，马达汉一方面肯定了长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防御作用，另一方面认为长城已经失去了军事意义。[3] 1877—1880年，匈牙利贵族贝拉·伊斯特万(Bela Szechenyi)率领考察团前去中国考察，曾考察长城，其成员之一罗慈·拉约什(Lajos Loczy)据此于1886年撰成《论中华帝国自然状况及其省县》，1902年又撰成《中华天国史》，已开始关注长城修建之问题[4]。地理学家乔尔诺基·叶诺(Jenö Cholnoky)到过长城之南口、古北口、山海关，指出长城之步步西展，就是中国与匈奴势力强弱之契机，匈奴势力因此一蹶不振，不得不向欧洲逃窜，摇撼罗马帝国。罗兰大学中文系教授艾之迪(Ildikó Ecsedy)则认为长城起不到多大的防御作用，仪式性与象征性意义更大。

20世纪前后，西欧探险队掀起对我国西北考察之热潮。1893—1894年，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曾在青海途经石砌墩，[5]可能是烽火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杜特雷依探险队是最早发现青海长城的外国考察队。至迟于1899年，西欧探险家已考察长城，该年法国外交官伯宁(M. C. E. Bonin)对敦煌烽火台与墙壁遗址进行了考察。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曾至陕西、山西、河北、东北等地考察，并拍摄大量长城照片，收录于1915年在巴黎出版的《华北考古记》(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 septentrionale)。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20世纪最

---

〔1〕刘存宽：《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中央亚细亚考察"及其评价》，载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收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8页。

〔2〕〔俄〕科兹洛夫著，陈贵星译：《死城之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3〕〔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致读者》(穿越亚洲——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61、362页。

〔4〕Lajos Loczy. *A Mennyei Birodalomwak története*(《中华天国史》), Budapest, 1902, pp. 115－116.

〔5〕杨镰：《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遭际考实》，载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收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79页。

负盛名的探险家，但对长城这一举世闻名之建筑似乎缺乏热情。他的著作中记载肃州长城墩台皆刻有名称，[1]但却并未专门考察长城。

以发现敦煌文书闻名于世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06—1908年考察了甘肃长城，尤其是敦煌长城。归国后发表了关于此次考察的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与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2] 斯坦因重点考察了敦煌境内两汉烽火台及其周边遗址、环境，指出汉武帝修筑长城改变了秦始皇时长城防御游牧民族的功能，成为汉朝大规模进攻西域的工具，是汉族、游牧民族之间的界限。在长城修筑中，两汉王朝充分考虑到利用当地的地形条件，并采用先进的修筑工艺。通过将两汉修筑长城得以保障政权，而罗马帝国则被西进的匈奴灭亡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长城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通过对烽火台及其周边遗址的发掘，斯坦因发现了大量长城军士作战工具、生活设施与工具。除了少量记有中亚文字的绢、纸外，其他大量的汉文木简展示了两汉时期长城地区长城防御与生活途径。此外，斯坦因还以长城周边所发现之大量中国丝绸、中亚古物，以及周边宗教设施深染中亚风格之特征，指出两汉时代中国与中亚交流频繁而密切。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到达中亚，考察了敦煌至额济纳流域之汉长城，并著《亚洲腹地考古记》。此次考察所获汉简，亦由沙畹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考释，并于1953年出版，书名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斯坦因对长城史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大量长城原始文书，填补了汉晋长城基层防御体系史料的空白，在世界范围内直接推动与刺激了长城研究的开展，使长城研究成为20世纪汉学研究热点之一。

最早考察长城全程的西方学者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盖洛于1903年首次来到中国，考察了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国各地，1909年出版了《中国长城》，对长城起源、修筑、目的、作用及意义首次进行了全方面探讨，并发现了青

---

[1]〔瑞典〕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本书所利用的《沙埋契丹废墟记》，新译名为《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巫新华、伏霄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海长城。在长城起源问题上,他与顾炎武以及近代中国学者观点一致,认为长城源于井田制废弃,车战被骑兵取代。考虑到盖洛著作出版仅比张相文稍晚,他从何处得知清代以来关于长城起源之观点很值得关注。盖洛很早便指出长城是两种文明之分界线,限制内外民众之出入,也是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帝国之标志。[1] 总之,盖洛在系统考察长城基础之上,参考各种研究长城之中西方著作,对长城起源、修筑、目的、作用及意义首次进行了全方面探讨,是西方学者关于长城之第一部专著;他提出的长城隔绝文明、时代之观点,姑且可视之为"长城界限论",是20世纪以前西方世界关于长城之普遍观念,但却很快受到社会科学化史学潮流之批评。盖洛之后,1917年,英国外交官台克满(Eric Teichman)也途经青海、甘肃、宁夏、大同长城,并在其考察记《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中有所记述,且指出青海长城之修筑是出于抵御蒙古族、藏族入侵之目的。[2]

1.6 美国社会科学化史学潮流中的长城研究及其反动与调适

虽然西方从古希腊时便开始关注中国,不过对中国开始系统地研究则始于16世纪传教士东来中国,近距离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之后。随着学者队伍的逐渐壮大、研究门类的逐渐扩展,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领域——"汉学"(Sinology)。汉学兴起于16世纪末期,最初以传教士为主体,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搜集、翻译大量文献典籍,并借鉴乾嘉考据传统,从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具体、细致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崛起的西方文明对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了兴趣。部分西方学者在传教士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西方传统考证史学之传统,对中国语

[1]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沈弘、恽文捷译:《中国长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2] [英]台克满(Eric Teichman)著,史红帅译:《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53、166页。

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展开广泛的讨论。19 世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汉学开始在欧洲普遍形成。但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程度与学术整体水平的影响，20 世纪以前的西方汉学研究基本以中国文献研究与古典研究为主要内容，从业者多以知识广博自诩，但缺乏深入的专题考察。20 世纪初年，借助西方探险家在中国之考古发现，特别是斯坦因发现敦煌文书之契机，西方汉学，尤其法国汉学开始较为深入地讨论中国古代文字、地理、边疆、民族、宗教等重要问题，他们尤其关注中国周边地域及中国与域外关系之历史，不仅研究内容大为扩展，而且研究路径也已引领世界之风潮。斯坦因、沙畹、马伯乐、盖洛借助考古发掘与实地考察之发现，开始对长城史进行专题、深入之讨论，开创了简牍学之传统，引领了世界范围内长城史研究之主脉。

20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以研究与解决这一问题为目的的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并向传统人学学科渗透，促使 20 世纪中期形成了所谓“社会科学化”的国际学术潮流，社会科学开始广泛地渗透到人文传统学科的研究中来，从而在法国逐渐形成年鉴学派，在英国形成新社会史学派，在美国形成社会科学史学派，逐渐取代西方传统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传统。虽然这一进程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阻断，但最终在二战，尤其是 1960 年代以后，开始蓬勃发展，成为西方史学研究之主流。西方传统汉学研究也受到这一时代潮流冲击，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积极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内容也相应扩展至中国问题的各个层面，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研究重点开始越来越多地向现代中国研究倾斜，从而与传统汉学研究呈现了巨大的不同，因此又被改称为“中国学”(China Studies)。在“中国学”研究中，美国学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基础与雄厚的学术实力，扮演了最为积极的角色。具体至长城史研究领域，推动西方长城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是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

1.6.1 欧文·拉铁摩尔与西方“社会科学化”长城史研究的开端

美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化”长城史研究的开端,开创了西方长城史研究的新局面。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华盛顿,次年随父来华。1927年,他途经中亚返回意大利,将沿途见闻汇撰成《荒漠路至土耳其斯坦》(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9—1936年,拉铁摩尔接受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等机构资助,返华考察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拉铁摩尔是20世纪前期美国历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他倡导利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东亚,尤其中国问题,在1933年成为美国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并在30年代担任会刊《太平洋事务》的主编。该学会是美国情报机关下属研究机构,旨在通过整合不同学科学者之力量,加强太平洋国家关系研究。1934年,他利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出版了奠定他在中国边疆史研究地位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拉铁摩尔受美国政府的派遣,充当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但却与蒋关系不睦,他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对蒋援助,与苏联进行合作,因此之故,在战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冲击。1962年,拉铁摩尔在英国利兹大学创建了汉学系。1972年返美,当选为蒙古学会会长。拉铁摩尔一生用多种语言,撰述了大量关于中国边疆、长城的论著,是西方中国边疆、长城研究的旗帜性与代表性人物。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在20世纪前期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的影响下,吸收美国边疆学派创始人弗雷得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 1861—1932)“边疆假说”理论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陆心说”(大陆腹地说)理论,通过时空移位,首次将之系统运用于中国北方边疆研究,提出了“长城边疆”、“边疆形态”(“游牧人王朝”、“边境王朝”)等概念,全面讨论了长城边疆之起源、形成与作用,最早构建了关于长城研

究的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长城边疆理论”，深刻影响了西方，乃至国际长城史研究。[1]

“长城边疆”概念直接借鉴了特纳“边疆假说”理论。1893 年 7 月，特纳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了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认为一部美国史便是一部西部移民史，美国重要的思想、制度都是在西部边疆开拓中逐渐形成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撰写了《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等重要著作，不断论证“边疆假说”，获得众多学者的支持，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边疆学派”。作为“边疆假说”的一个核心理念，特纳认为美国历史上，只有纵深不断变化的边疆，而没有如欧洲那样成熟而固定的边境。拉铁摩尔首次将“边疆假说”运用至中国长城边疆的研究中来，针对 17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直到盖洛一直倡导的“长城界限论”，提出了“长城边疆理论”，指出研究长城边疆，首先应区分“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概念之不同。长城修筑之本意虽是在中国与蛮夷之间区分出一条界限，禁止内外人出入，长城也代表了汉族社会发展之最大限度，但长城走向之不断变化、中国历史过程之起伏、汉族对贸易之追求皆使固定之地理、政治意义上的线状边界拉伸为纵深的立体边疆，线状边界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因此，如果说 20 世纪以前西方对于长城的定位是“隔绝”，那么自拉铁摩尔的研究产生以后，便转变为“过渡”。

在“长城边疆”地域范围的界定上，拉铁摩尔的研究吸收了麦金德“陆心说”理论。20 世纪初，为应对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俄国对英国世界统治秩序造成的威胁，牛津大学地理系教授麦金德在 1904 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发表了地缘政治学领域里程碑式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将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区”（陆心地带）、内新月形地区、外新月形地区。枢纽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内新月形地区是围绕

[1]〔美〕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枢纽地区的环形地带,其他地带为外新月形地区。古代世界的基本面貌便是枢纽地区的游牧民族不断向西、向南进军,占领内新月形地带的历史。陆心说发表之后,对地缘政治学甚至国际政治秩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拉铁摩尔也深受这一理论之影响。这从他的一些论著名称便可看出,如《亚洲的枢轴:新疆及中国和俄国的亚洲腹地边疆》(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拉铁摩尔打破了以往长城研究以国家疆域作为划分标准的惯例,在亚洲大陆整体视野之下,将长城内外广阔地带共同界定为长城边疆。拉铁摩尔笔下的长城边疆包括了中国本部(即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山西、河北等"内边疆"地带)、蒙古、满洲、新疆、西藏等被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视作"内亚"(Inner Asia)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地域,并延伸及于西伯利亚森林、中亚戈壁与青藏高原。虽然西藏未修筑长城,但青藏高原山脉走向与长城相呼应,被拉铁摩尔视作长城边疆之延伸。简而言之,拉铁摩尔所要讨论的长城边疆,是将整个西北中国包含进来的广阔地带。

长城边疆起源是拉铁摩尔重点讨论的问题。与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长城主要是防御来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流行观点不同,拉铁摩尔受到"边疆假说"中边疆的形成根源于内部不断向外扩张观点之影响,指出中国人的向外扩张塑造了长城边疆,即长城边疆之形成根源于汉族发展而非蛮族入侵。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不同族群之间社会差异很小,但后来不同种族由于进化方向、途径、速度不同,造成族群分布地域之重新整合,以至最终形成长城边疆。汉族经济最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形式大体相同,是一种包括农业在内的混合经济。不过后来以灌溉技术为核心特征的真正的中国式的农业建立起来,使汉族农业得到保障,促进亩产提高、财富增加、人口增长,社会相应随之变化,最终促使中国形成了新社会,从而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开始分化。随着新社会逐渐向四周扩张,灌溉区逐渐扩大,隶属于此之族群成为汉族。仍然采用混合经济之旧社会面对这一冲击,产生了两种方向相反之分化,一种融入新社会,成为新社会中之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概念并非来自于种族的角度,而只因为这一族群改奉中国文化的时间较晚;另一

种是抵抗新社会，坚持原来的生活方式的前汉族或落后的汉族退却到还没有受到中国压迫，并可以支撑旧式混合经济的地区即草原边缘地带去，这部分族群被汉族称为“戎狄”或“蛮族”，成为了非汉族。随着蛮族认识到混合经济也并不足以支持他们与汉族的对抗，于是在北方更多辽阔的草原地带发展起单一的游牧经济，建立起草原社会，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对立与分隔由此而形成。随着部分蛮族退入草原深处，汉族也尾随进入草原的边缘地带，与仍然停留在草原边缘的部分蛮族构成了农业地带、游牧地带之间的草原边缘地带或草原过渡社会，里面靠近汉族的族群会自然地倾向于中国，倾向于农业，有密集的部落，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精耕经济规范的影响，虽然比中国差一些；在外部靠近草原的族群则自然脱离中国而倾向于草原，脱离农业而倾向于游牧，他们人口比较分散，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干旱草原的粗放经济的规范影响，却不是那种典型的干旱草原经济。说到底，这是一个过渡社会，是长城边疆的最初形态，也为后来长城修建提供了基础。

那么，中国修筑长城的原因是什么呢？即在这种族群分化、分隔格局中，长城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拉铁摩尔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与他对长城边疆起源的解释是一致的，即长城修筑之起因也是由于中国内部情势的发展，而不是草原对中国的压迫。战国秦、赵、燕长城之修筑是为界定它们所占据的南部汉族土地，而不是着眼于控制草原。在秦汉修筑长城之时，也无修筑长城之必要，长城也不是唯一或最好的阻止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办法。长城之所以获得持续修筑，在于汉族为防止游牧民族将居于边缘地带之汉族吸引至草原地区，从而使其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少数民族。长城之修筑，也促进了草原地带种族的聚合，使长城以外依存汉族的小部落不复存在，分散转为统一，最后出现由头曼－冒顿整合起来的草原帝国，从而形成了农业、游牧地带的对立。如果说20世纪之前的西方长城史研究将长城作用定位于“军事防御”，那么拉铁摩尔以后的长城研究，则将长城作用定位于“种族外拓”，两种解释体系不仅在长城是外向还是内向之问题存在截然分歧，而且出发点也已完全不同，前者是单纯地从军事角度着眼，后者则从更为广大

的族群移动角度思考。

由于长城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边界线，也不能完全隔绝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最终成为具有纵深的长城边疆。当农业、游牧社会关系紧张时，长城边疆的汉人、部落便会被各自社会吸纳，这一边缘地带便会缩小，但不会消失。当农业、游牧社会关系长期稳定时，这一地域又会扩大。总之，长城边疆社会永远会聚集着数量不等的来自农业、游牧地带的人群。不过作为农业、草原的中间、边缘地带，长城边疆并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建立在粗耕或农牧混合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而是立足于中国的精耕经济及草原的游牧经济之间。在不同的时期，在沿边疆的不同地点，边缘部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边缘部落只是这样一种社会：部分基于草原资源，部分基于中国资源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的而非经济上的颇不稳定的媾和社会。它们自身并不是不同于中国及草原的独立社会形态。这是长城边疆社会缺乏独立性、稳定性的一面，也是其弱点所在。

但同时长城边疆社会又有其推动历史发展之强大的一面，拉铁摩尔将这一状况概括为“边疆形态”，这是拉铁摩尔创造的另一核心概念。特纳“边疆假说”理论中，与“边疆”理论同等重要的另一理论是“地域”理论，特纳强调不同地域之间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构成了美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受到特纳这一理论的影响，拉铁摩尔也强调长城边疆在农业、游牧地带冲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长城边疆社会虽有不稳定的一面，但处于长城边疆的族群，包括农民、部落、有特殊利益的商人、移民、有野心的职业政客和军人以及其他在边界外寻找机会的人，却具有不同于南、北两大社会的利益取向，因此对两大社会都具有很强的离心力，逐渐凝聚成边疆利益的联合体。当农业、游牧地带发生战争时，站在两个社会之间的边疆低级首领，敢于冒险，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于是凭借对于农业、游牧地带都非常熟悉的优势，从而建立统一中国内地与草原地带的边疆形态。“边疆形态”又称“边境王朝”、“游牧人王朝”，指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

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商、周政权皆兴起于边缘，是边疆形态前兆，不过真正的边疆形态形成在周朝末年才显著起来。这类边境征服者力量的基础是边境还是草原，或是中国，完全取决于边境的深浅和当时混合人口的数量，取决于真正中国与真正草原之间的均势状态。由此起源而兴起的王朝的最后形式，以及它与边境保持联系的程度，是部分脱离边境而伸入草原或中国，还是伸入这两方面，都要由若干条件来决定。比如唐朝兴起于中国边缘，虽然借助游牧民族势力建立政权，但仍然将朝代中心留于农业地带。蒙古兴起于草原边缘，建立蒙古帝国后，政治中心仍留在草原地带。无论由哪方势力建立之政权，最终都建立了统一长城内外的大帝国。也就是说，长城边疆形态最终成为中国融合、统一、扩张、进步之主要推动力。长城地带从而由20世纪以前学者所主张的中国地理、历史的“边缘”而走向“中心”。这种强调内亚地区在推进历史发展之中心地位的观点，与陆心说强调欧亚大陆中部是世界历史之枢纽的观点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拉铁摩尔最先借用起源于美国历史语境的边疆理论，并借鉴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对中国长城边疆展开全面分析，通过围绕“长城边疆”、“边疆形态”等新创核心概念，最早构建起一套长城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长城边疆理论”。长城边疆理论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借鉴社会科学理论，首次全面、系统讨论了长城与周边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种族等多方面关系，构建起立体性、兼容性之长城解释体系，完全改变了西方，乃至国际长城史研究之固有格局，是美国中国学研究之代表性成果，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研究之重要成果。而其所提出与倡导之长城边疆、边疆形态之核心概念也对后世中国长城研究、边疆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拉铁摩尔能获得如此显著之成绩，还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从而得以及时吸收、借鉴中国学者关于民族、边疆研究之最先成果有关，也与他对中国长城，尤其对东北部长城的细致考察有关。

此后，拉铁摩尔又陆续发表多部长城史研究论著，进一步丰富、细化了他的长城边疆理论，从而在西方，尤其美国长城史研究领域引起了

巨大反响。有支持拉铁摩尔之观点者，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197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便指出长城是农人、牧人在北方过渡地带诸多复杂关系的一个成分。[1] 但也有对此持批评意见者，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1948年出版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中一方面肯定了拉铁摩尔的"边疆形态"理论，并借此对清朝统治中国之原因展开进一步分析，但同时坚持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遏制游牧民族的入侵。[2]

在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上，与拉铁摩尔齐名之另一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并未对中国长城展开具体研究，但他提出的"征服王朝"以及"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却深深影响了国际学术界，尤其西方学者对长城的研究。魏特夫在"冷战"时期扮演了西方"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的先锋人物，创作了《东方专制主义——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思考与当时的冷战思维相结合，形成了他代表性的观点，即历史上东方地区属于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出于兴修大型水利工程需要，政权将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与管理体系高度集中起来，并相应造成政治权力之集中，从而形成"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还经常兴起其他大型工程，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其中"中国万里长城的定期重建，说明治水经济和政府指挥的大规模劳动始终有效"。但该书只是笼统地叙述了战国、秦朝、隋朝修筑了长城，[3]而未有具体、深入讨论，故而长城是东方专制主义加强社会控制的工具的宏论虽惊为神来之笔，但却由于与中国古代"惜民力"之主流政治思想与施政事实完全不相符合，而没有丝毫的参考价值。魏特夫对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过度强调，使他对长城完全丧失了学术性的判断，从而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西方世界关于长城是中国专制、停滞的象征的流行看法，长城只是他拿来论证东方专制主义而随

---

〔1〕〔法〕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讯余译：《中国社会史》，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101页。

〔2〕〔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马清槐校：《美国与中国》，第4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9年版，第61－78页。

〔3〕〔美〕卡尔·A.魏特夫著，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邹如山校订：《东方专制主义——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意摆放的一枚棋子。

1.6.2 林霨与后现代主义学术潮流中的西方长城史研究

二次大战之后,伴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逐渐复苏与发展,受到战争阻断之新史学潮流再次复兴并蓬勃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已基本取代传统史学。在这一学术潮流中,美国社会科学化历史学研究伴随着美国之经济、政治在全球范围的渗透,也在相当程度上扮演了战后新史学引领者角色。作为社会科学化历史学研究分支之一,长城边疆理论也获得了西方长城史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成为西方世界中国长城研究的主流解释体系与学术范式。长城边疆理论范式基本可以概括为在古代亚洲大陆地缘政治背景下,将长城置于地理、经济、族群、军事、政治等因素不断互动之背景中,认为长城是以一条漫长的军事工程为代表的广阔过渡地带,这一地带成为中国,乃至欧亚历史变化重要推动力量。长城边疆研究范式曾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普遍流行,但却在八九十年代遭到一定挑战,而后经过若干调适,目前仍是长城史研究之主流范式。

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灾难性打击开始使西方社会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问题,战后西方经济快速恢复后的再度低迷与社会失范使西方社会面临着"文明终结"的疑问。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理性之普世价值观念开始遭到质疑,之前在与理性主义较量中落败,一度沉寂之经验主义再次复苏,并与各种质疑声音相结合,共同构成了19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普遍流行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文明体系中科学、理性、自由、民主、文明、人性等基本价值观念,及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的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基本规范与逻辑结构展开挑战、加以解构,虽最终并未消解现代学术体系,但已使其问题意识、研究方式呈现较大转变。在这一风潮中,历史学也未能幸免,社会科学化历史学研究相应遭遇了质疑与解构。与社会科学化历史学研究主张利用社会科学方法,构建整体、系统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不同,后现代主义者从根本上便怀疑这种思路的合理性,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具有不同之历史脉络,历史本身充满了歧异、矛

盾、断裂与未知，社会科学化历史学研究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之复杂历史，用产生于西方近代经验之社会科学加以分析与建构，表面看来构建了宏伟、系统之解释体系，获得了对于世界历史之整体认识，其实只是将其他地区历史简单化，纳入到西方历史框架中去的结果，所谓的解释体系其实只是一系列现代观念堆砌出的“理论乌托邦”，不但无助于说明世界历史之真正面貌，反而遮蔽了历史本身之多样性与复杂性，距离历史真实愈来愈远。

长城边疆理论范式虽曾首次提出国际长城史研究之主流解释体系，整合、引领了国际长城史研究潮流，在长城史研究中扮演过至关重要、不可替代角色，但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其理论本身并非无懈可击，甚至存在不少危险，乃至“反历史”之倾向。长城边疆理论存在两种致命疑问。

一种疑问是长城边疆理论范式借助的两种思想来源——“边疆假说”与“陆心说”，虽然是借助自然、社会科学方法构建起的具有一定普世价值与广泛适用性之有效理论，但毕竟与其他理论一样，都产生于西方之历史经验与话语系统，能否照搬于东方异域呢？揆诸事实，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与美国边疆的区分还是非常不够的。比如作为长城边疆理论的前提预设，长城边疆的形成是汉族种族外拓之结果，虽然在早期人类社会考古发掘中，可以找到足以验证的根据，但当中国进入帝制时代之后，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形态与政治文化影响，长城仍然是汉族进取之产物吗？如果不是，而且通过后世历史事实之考察，这种可能性远大于是的可能性，那么拉铁摩尔的研究结论只能被限定于上古时期，即秦汉以前，尤其先秦时期。那么，长城边疆理论便是一种由于缺乏时间限定，因此可能导致错位、扭曲历史，演变为理论自身的自我演绎，其实是一种“反历史”的解释体系。这一研究倾向并不限于拉铁摩尔本人，也是西方世界长城研究之普遍问题。这反映出西方世界在审视长城时，多从域外视野出发，将长城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之象征，将不同时代之长城视为整体、均质之象征物，从而忽视了长城自身发展脉络。

长城边疆理论隐藏的另一疑问是无论是“边疆假说”，还是“陆心

说”,都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此两种理论为地理环境决定论之产物。虽然拉铁摩尔如20世纪以后诸多涉及这一问题的学者们一样,在审观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时,采取了似乎中庸之立场,但很显然,长城边疆理论作为这两种理论之延伸与发展,无法克服与改变二者更为强调地理环境作用之预设。拉铁摩尔虽然一再强调长城边疆面貌之形成是地理环境与人类实践互动之产物,但却也一直坚持长城边疆之长期存在根源于亚洲大陆南北在地理、经济上的二元对立,仍以地理环境作为长城边疆形成之最为重要的因素。拉铁摩尔的这一理论立场,既与以上两种理论有关,也与几乎所有努力建构历史解释体系的理论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稳定、视野更为开阔、更便于理论建构的地理因素之诱惑。由于地理空间之恒定性,往往比历史时间更容易受到努力建构适用长期时空的历史理论家们的青睐。但问题是,这一倾向是否会有意、无意地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呢?尤为致命的是,这种倾向对于解释长时段之历史缓慢变化具有很强的效力,但对于解释中时段、短时段的王朝更代或历史事件却显得贫乏无力,从而使历史研究最终陷入只见地理不见历史,只见族群不见个体之局面,不仅导致历史学丧失了其自身悠久而有特色的叙事传统,变得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枯燥而乏味,丧失了自身学科的独立性与学术特点,而且恐怕由于研究视角存在偏差,而对历史事实存在不小的误读。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这方面便存在不小的问题,比如他通篇都在致力于构建长城边疆理论,注重对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与族群分布等共时性稳定因素之考察,但对于长城修筑过程、形式变化、文化理念等一系列更加变动不居,但同样与长城内涵密切相关之历时性不稳定因素却相对忽视,导致他的研究更加接近于一种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而非历史学的考察。后来继承长城边疆理论研究范式的学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长城边疆理论正是由于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之一。利用后现代主义视角,对长城边疆理论展开

集中批评的著作中以林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最为著名。在林霨的笔下,数百年来西方世界眼中的长城、西方学者的长城研究,甚至只是一个想象的神话,他的任务便是将长城历史从历史编纂学神话中分离出来。由于他的批评过于尖锐,导致在西方长城史,甚至整个历史学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林霨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从根本上颠覆了"长城"这一称谓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很少出现"长城"一词,目前英语"Great Wall"对应的中国古代建筑,包括了城墙、垣、塞、障、城,而甚少指代长城;相反,中国古人称之为"长城"者,并非专指汉人之城墙,还包括游牧民族之城墙。不仅如此,明朝人甚至讳称"长城",只名之"边墙"。因此,"Great Wall"更应对应"城墙",而非"长城"。与"长城"相比,"万里长城"一词与"Great Wall"内涵更为对等,但"万里长城"作为英语的对等词,其广泛使用应该只是一个现代现象。事实上,中国"城墙"修筑包括了秦朝、两汉、北齐、隋朝、明朝等多个阶段,由于年久失修,明以前之"城墙"很早便已消失,目前"城墙"大多是明朝修筑的。因此西方长城史研究者一再指出的秦长城,其实只是明长城,并不能以明长城作为中国长城,尤其秦长城之普遍代表。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各朝修筑之"城墙"并没有循着唯一路径,而是存在一系列"城墙",它们根据不同防御需要而修筑。因此,只能分别考察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地段、不同战略层面的"城墙",而不能将之连接起来,构成一条独一无二之"长城",一体考察。

对于长城边疆理论范式倡导的长城修筑原因之"汉族扩张论",林霨不仅表达了相反观点,认为中国修筑长城是为防御游牧民族之攻击,并进一步颠覆了"汉族扩张论"的基础,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对外政策,从而在根本上解构了社会科学化历史研究强调系统性之逻辑基础。他认为"城墙"之修筑具有较大偶然性,并非汉族一贯之

[1]Arthur Waldron(林霨),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政策，其背后也并不一定具有某种文化内涵，即使文化本身也并未经久不变、一以贯之。中国古代政权在处理游牧民族问题上，随着形势变化，不断变换外交方式，或者通过武力，分隔、征服游牧民族；或者通过外交方式，利用经济等手段与其和平相处；或者采取修筑城墙之方式。但事实证明这些方案都非完全令人满意，武力手段既耗费财力又有风险；外交方式带来屈辱并且代价昂贵；修筑城墙耗费钱财、无大效用，并且由于将部分种族、领土隔绝于外，与中国文化之普遍价值观念存在冲突。不同朝代对外政策之选择，有时是出于理性，有时则决定于内部政治与权力斗争。以修筑城墙为例，西汉是在对匈奴和亲、战争都无法奏效之前提下，才不得已而修筑长城，并且为与秦修长城之覆辙划清界限，汉儒制造出“边界城墙”是补天险之不足，以限华夷之工程。这样“城墙”又被赋予政治、文化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北魏、北齐大修“边界城墙”，但至唐代便由于统治者自身具有游牧民族血统，强调四海一家之大同思想，并利用轻骑兵控制草原，从而将修筑“城墙”作为示弱标志，而不加修筑。辽、金两朝修筑之“边界城墙”在蒙古帝国建立后，也相应失去了用处。总之，中国古代“城墙”之修筑，是多种对外观念不断互动之产物，与当时历史情势密切相关，自然也不反映中国文化某种稳定之指向。而尤其能体现这一结论的是明朝对外政策之变化、“城墙”修筑之过程与问题最后之解决方式。

总之，长城并非文化之产物，而是政治之产物；不是一种文化一以贯之结果，而是多种政治观念竞争结果。长城之神话虽然根源于中国，但却离不开西方的推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形象的勾勒激发了西方对遥远东方大国的想象，而长城成为这一想象的主要载体与对象。这在18世纪末期非常突出，此后虽然遭到一定质疑，但终于止不住上升势头。在中国，清朝灭亡以后，中国需要新的文化象征，虽然长城压迫、专制的负面形象仍然存在，但孙中山将其最早定位为进步象征。此后，长城成为中国人民族身份与自豪之象征。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冲击了长城形象，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复兴之后，长城已成为爱国主义崇拜的中心。尽管关于长城的思想仍然充满混乱，这也反映了现代

中国人思想意识深处的混乱，但不管长城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长城仍然作为多种象征，激发着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想象。

综上所述，林霨在对拉铁摩尔以来西方长城史研究之主流解释体系——长城边疆理论范式解构的基础上，从中国政治结构内部，引申出一套新的长城起源解释模式，完全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框架与固有观念，揭示了长城修筑过程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变动性，纠正了以往那种过于强调地理空间，而相对忽视历史变化；过于强调文化象征，而忽视政治运作的不足，描绘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历史图景，得出了更为接近历史细节的结论。但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关于“长城”、“万里长城”之概念。

概念是社会科学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环节，正是通过某个核心概念之造出，得以将一系列表面看来并无关联之现象归结于一起，使其成为相互联系、稳定存在的解释体系。通过不同概念之勾连，社会科学将更多的现象交织起来，成为更为复杂的理论体系。正鉴于此，从剖析概念出发，复原概念原义，剔除其上被赋予概念的各种附加内容，便成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既有理论体系最为锋利之工具。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林霨从长城边疆理论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环节“长城”、“万里长城”概念之解构入手，完全否定了其研究的固有基础，使长城边疆理论被“釜底抽薪”，遭到了颠覆性的冲击。但从当前看来，后现代主义当时这一做法虽然极具杀伤力，但却由于过于极端，伤及自身，难于被广泛接受。

林霨对“长城”、“万里长城”概念的解构存在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古代并未长期、普遍地以“长城”、“万里长城”称谓当前我们称之为“长城”、“万里长城”的建筑，但“长城”称谓在西汉时期已甚为流行，以至于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之书信也以“长城”为疆界。虽然中国古人称谓仍在使用之军事工程时，为准确、具体起见，多进行仔细地分类，这才有墙、沟、城、营、堡、寨、墩、台等多种不同称谓，有时为语词驯雅起见，也不断地变化说法，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长城”是所有这些称谓中内涵最为广泛者，也是古人在笼统称谓所有这些工事时的一种泛称。林

霭所称明代讳称“长城”，名之“边墙”，并不符合史实，明代史籍中“长城”之名大量出现，“边墙”却只包括墙体。而清代中国已出现“万里长城”之称谓，这一称谓后来被使团传至西方，才有了“Great Wall”的英译，而非西人之发明。而且至迟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作为边防象征之“万里长城”用法。刘宋檀道济被宋文帝诛杀时，愤曰：“乃复坏汝万里长城”。[1] 两宋以后，以万里长城为喻之现象逐渐增多，且有直接称秦筑万里长城者。如欧阳修称：“于是，遣将军蒙恬筑万里长城，以防胡人。”[2]弘治十四年(1501)，吏部右侍郎王鏊奏请于北边长城军镇设立节制诸镇、统一事权之文官总制，“命出则出，命止则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绥有急，大同不得不赴。号令严肃，声势增重，隐然有万里长城之势矣。”[3]实有以明中期北边长城军镇事权统一，故将之视为军事一体，甚至建筑一体之万里长城的意味。清朝官方亦继承了明代“万里长城”之称谓，如《钦定盛京通志》，便指出皇太极时，“诸臣群下倍感万里长城守岂易，何处无可入之地”。[4] 虽然目前所见官方史料所载“万里长城”之称谓，正如林霭所称，并不普遍，但这并不能作为这一称谓在中国古代较少使用或者并不流行之证据，这在于长城在每一时期官方文献中，出于准确化的需要，多被具体化为某种形式建筑，而较少笼统、模糊地称为“万里长城”。其实比拟性质之“万里长城”之经常出现，已可说明“万里长城”之称谓实已普遍流行，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与文化象征。

不仅如此，“万里长城”至迟在明清时期便已普遍流行，尚可借助朝鲜燕行使之记载加以印证。明万历十九年(1591)，柳梦寅《朝天录》便有二诗咏秦长城，称之“万里长城”，其中一云：“谁知万里长城起，剩

---

〔1〕〔北齐〕魏收：《魏书》卷97《岛夷刘裕》，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137页。

〔2〕〔宋〕欧阳修撰，〔明〕欧阳钺辑：《欧阳修撰集》卷1《奏议上·上皇帝万言书》，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343页。

〔3〕〔明〕李东阳等：《明孝宗实录》卷170“弘治十四年正月丙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校勘本，第3093页。

〔4〕〔清〕阿桂、刘谨之等奉敕撰：《钦定盛京通志》卷17《进山海关》，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325-326页。

作千秋后代功。"[1]万历三十二年(1604)《朝天日录》亦称秦长城为"万里长城"。[2] 万历三十八年(1610)《朝天录》记:"万里长城自北跨角山,粉堞横空,隐映于云雾间,盘折而来,东入于大洋中。"[3]万历四十五年(1617)李尚吉《朝天日记》载:"向角山上几半,东登万里长城。""往望海寺危楼,正在万里长城尽头。"[4]晚明至清代,朝鲜使节朝贡路径山海关时,便多记载了祭祀孟姜女之贞女庙旁之对联。万历四十二年(1614)金中清《朝天录》记:"庙门左扉书'秦王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扉曰:'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为贞'云。"[5]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鲜使团书状官韩祉《燕行日录》记:"庙柱左右有题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惟贞。'乃文天祥笔迹云。"[6]乾隆时期亦多有记载。[7] 文天祥兵败被俘送大都(今北京),一直系于监牢,应无机会赴山海关书写此联,故此联应为明中后期人。

---

[1]〔朝鲜〕柳梦寅:《朝天录·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事秦始皇二首》,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2]〔朝鲜〕佚名:《朝天日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3页。

[3]〔朝鲜〕佚名:《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4]〔朝鲜〕李尚吉:《朝天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232页。

[5]〔朝鲜〕金中清:《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6]〔朝鲜〕韩祉:《燕行日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9页。

[7]乾隆二十五年(1760),朝鲜使团副使礼曹判书徐命臣称:"祠内左右悬牌,左刻: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刻: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犹贞。书以文文书所知,未知果然否?"参见〔朝鲜〕徐命臣:《庚辰燕行录》,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乾隆三十年(1765),朝鲜使团书状官子弟洪大容有《燕记》,亦记载了这一对联,只是字句稍有差异。"柱联一对,传是文丞相笔,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不死也,千年片石留贞。"参见〔朝鲜〕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3页。

步入清代，燕行录已普遍称山海关秦长城为“万里长城”。[1] 明清时期“长城”称谓则更为流行。[2]

---

〔1〕《梅窓先生朝天录》记：“万里城头第一关”。〔朝鲜〕郑士信：《梅窓先生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6页。康熙十六年孙万雄《燕行日录》称山海关附近“万里长城萦绕山脊矣”。〔朝鲜〕孙万雄：《燕行日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康熙二十五年（1760）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记：“夕到山海关，层峰叠障，簇簇巉巉，若万马奔驰状。层城粉堞，罗络横亘于山之腰脊，真天府金汤也，世称此乃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朝鲜〕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康熙六十年，李正臣《燕行录》载：“而所谓望海楼，即万里长城楠边城尽处也。”〔朝鲜〕李正臣：《燕行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263页。雍正七年（1729）金舜协《燕行录》记：“所谓角山寺，在医巫闾山角，而秦皇所筑万里长城城傍也。”〔朝鲜〕金舜协：《燕行录》卷1，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乾隆四十五年，随使团赴京之朴趾源撰《热河日记》，更发出感慨“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的感慨。〔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3《将台记》，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值得注意的是，燕行录中多有记载山海关为“万里城”者，这可能源于燕行使既以秦长城为万里长城，而山海关居秦长城东端，亦是燕行使目睹最为雄伟之秦城，故将之视为万里长城之代表，径名为“万里城”。孙万雄《燕行日录》记：“姜仲日者，朝鲜人被虏者也，来言曰：‘吴三桂前守山海关时，开万里之城门引入。……’”“夕到山海万里城，尽处延入海中，城头起楼，是为望海亭。”孙万雄《燕行日录》，第318页、320页。康熙三十二年申厚命《燕行日记》载：“仍请偕登望海亭，余亦同往。亭在万里城头，临海尽处。”〔朝鲜〕申厚命：《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康熙三十二年柳命天《燕行日记》载：“范郎往役于秦皇，筑万里城之时。”〔朝鲜〕柳命天：《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康熙三十三年朴权《西征别曲》载：“山海关万里城”。〔朝鲜〕朴汉：《西征别曲》，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康熙五十一年闵镇远《燕行录》记：“山海关此即秦皇所筑万里城云。”〔朝鲜〕闵镇远：《燕行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嘉庆九年（1804）《蓟山纪程》则进一步有所谓秦修“万里城”之说法。〔朝鲜〕佚名：《蓟山纪程·万里城》，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成以性《乙酉燕行日记》不仅也记载了“万里城”之说法，而且对金界壕有进一步记述。“到土城，台堡之设一如前所过土城，自彼至此数百余里，而未知南北尽于何处，盖两城之内皆是蒙古地方，而城外则汉界，俗所谓关外万里城者，疑即此也。行未五里，有一古城，认是当初置巨镇，以镇土城。”〔朝鲜〕成以性：《乙酉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66页。山海关之所以有此称，可能在于其秦万里长城东端之地理位置与朝鲜视野中秦万里长城最要之关隘之文化定位。柳梦寅《朝天录》所载便可反映此点。该书有诗称：“秦城万里尽，禹贡九州穷”，“长城山海尽，中国项喉间”。柳梦寅《朝天录·山海关六首》，第89页。

〔2〕万历五年（1577），金诚一《朝天日记》载：“（山海关）城起海滨，直跨山顶，自山顶北循塞，隐隐如白虹，横截半天，乃秦长城尾尽处也。”〔朝鲜〕金诚一：《朝天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4页。万历二十五年李尚毅《辛亥朝天录》亦载：“长城雪色起临洮，天作重关气象豪。”〔朝鲜〕李尚毅：《辛亥朝天录·次韵》，载《燕行录全编》

注释〔2〕转下页

与秦长城的“长城”、“万里长城”称谓在燕行录中普遍存在不同，朝鲜对明长城之称谓，如同中国本土，尤其明朝史籍对于明长城的立场一样，亦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区别到笼统而言之过程，具体名称与明人且存在一定差别。较早记载辽东镇、蓟州镇长城者为崔溥《锦南漂海录》。明朝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奉差于外，遇暴风袭击，一行人由济州岛漂流至杭州，受到中国官民之热情款待，由杭州护送至鸭绿江。归国后，崔溥将这一经历写成《锦南漂海录》，真实地反映了弘治初年中国之社会面貌，在朝鲜不断重版，在日本也有版本问世，在15世纪以后的东亚世界影响很大。在该书中，崔溥如明人一样，鉴于长城

接上页注释〔2〕

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页。李睟光《朝天录》有“次长城古韵”诗。〔朝鲜〕李睟光：《朝天录·次长城古韵》，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页。万历二十六年李恒福《朝天录》有“次海月长城韵”诗。〔朝鲜〕李恒福：《朝天录·次海月长城韵》，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2页。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廷龟《戊戌朝天录》有“次长城韵”诗。〔朝鲜〕李廷龟：《戊戌朝天录·次长城韵》，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3页。万历二十九年赵翊《朝天录》有“长城”诗。〔朝鲜〕赵翊：《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万历二十九年李安讷《朝天录》有“长城篇”诗。〔朝鲜〕李安讷：《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万历三十年李民宬《万历壬寅朝天录》记“长城跨其（山海关）腹”。〔朝鲜〕李民宬：《万历壬寅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并轡行十余里到海岸，长城尽处。”〔朝鲜〕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页。康熙二年（1737）李俣《朗善君癸卯燕京录》记山海关“九门在长城之外”，“长城屈曲，横亘山腰”。〔朝鲜〕李俣：《朗善君癸卯燕京诗》，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377页。康熙七年朴世堂《西溪燕录》载：“未至山海关数十里，望见长城，起海岸，跨山包岭，逶迤而北，粉堞如云，绵亘无际，实天下壮观也。”〔朝鲜〕朴世堂：《西溪燕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康熙十七年金海一《燕行录》记：“长城城上有孤庵，绝顶平临大海南。”〔朝鲜〕金海一：《燕行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洪大容《燕记》称：“长城跨北岳大脉，由居庸古，东北驰千里，耸峙于角山，大断为平地，南二十里，至于望海亭。”〔朝鲜〕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第393页。徐命臣《庚辰燕行录》亦称秦修“长城”。〔朝鲜〕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第294页。《热河日记》载：“长城险要之地，莫如古北口”，“今中夜独立于万里长城之下，月落河鸣，风凄鳞飞”。〔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24《山庄杂记·夜出古北口记》，第288－289页。

设施仍在发挥边防功能，故对其明确细分，不过与明人称谓在措辞上稍有不同。比如对于明称之为“边墙”的墙体，崔溥则有其他称呼。在辽阳城，“过高墩铺至新关门，有长土城，而南关门正当其中，即成化年间新筑也。[1] 即称边墙为“长土城”。又如“山海关以东，又筑长墙、置堡，以防野人。”[2]即称边墙为“长墙”。此外又有“长垣”称呼。[3] 燕行使笔下的“长城”，最早则普遍地指秦长城。如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官员苏世让接近山海关时，便目睹了当地长城之雄伟。“北望长城，横截山腰，随高低起伏，宛然若白龙蜿蜒之状。”[4]如果这里长城尚不确定所指为秦或明长城，那么三年之后的另一燕行史料便可确认为秦长城。嘉靖十六年(1537)，丁焕《朝天录》如同崔溥一样，亦将明边墙称作“长墙”，却将秦长城称作“长城”。“自开州卫(明无开州卫，从其沿途前后地名推测，当为海州卫)之东北筑长墙、濬深壕，五里而筑墩台，十里而设堡戍，西南抵河上，转北而经广宁之北，接于秦长城之东，以御不虞也。”[5]《万历壬寅朝天录》亦载：“(辽东)又筑边墙，以延长城，迤东而来，北过长静、长宁、长安、长胜、长勇等堡。”[6]可见，丁焕、李民宬皆认为辽东边墙系在西连山海关秦长城基础上延展而成。“明长墙”与“秦长城”之相对出现，亦可确认直到此时，东亚世界尚具有从名称上区别秦、明长城之意向。燕行使这一观念可能受到了中国本土以秦长城为故迹因此笼统称之“长城”，而明长城仍发挥边防功

---

〔1〕〔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2〕〔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第200页。

〔3〕〔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第192页。

〔4〕〔朝鲜〕苏世让：《阳谷赴京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

〔5〕〔朝鲜〕丁焕：《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页。万历二年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亦作此称。〔朝鲜〕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6〕〔朝鲜〕李民宬：《万历壬寅朝天录》，第210页。

能，故多具体指称的影响。与“长墙”[1]称谓相似的是，燕行使对墩台的称呼与明朝亦有所不同，多惯称“烟台”。[2] 如万历二年赵宪《朝天日记》载：“过九连城，自是山头丘上，烟台列立”。[3]

不过既然明长城在中国本土亦多有称“长城”者，燕行使遂亦逐渐接受了这一称呼。比如许震童《朝天录》便记载了山海关墩台守卒戍守制度，其中即有“长城”之称谓。[4] 黄汝一《银槎录》亦载“长城三里一烟台”。[5] 至清代，明长城既也已沦为故迹，清人亦多笼统而称“长城”，燕行使在清人影响之下，遂亦逐渐普遍地以“长城”、“万里长城”

---

〔1〕万历二十三年闵仁伯《朝天录》、李尚毅《辛亥朝天录》、万历四十二年以后郑弘翼《燕行录》、万历四十七年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记》、清初李渲《燕途纪行》皆作此称。〔朝鲜〕闵仁伯：《朝天录·辽东》，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朝鲜〕李尚毅：《辛亥朝天录·长墙》，第329页。〔朝鲜〕郑弘翼：《燕行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朝鲜〕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记》，第303页。〔朝鲜〕李渲：《燕途纪行》，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1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朝天日录》又记载辽东有“内外长墙”，即两道边墙，以及经常遭到河流侵蚀之现象。“内外长墙之间，原有海子，夏潦时节，则胡中之水由海子奔放齧墙，墙缺溃入，自沙岭至广宁之东，浑成一海。”〔朝鲜〕佚名：《朝天日录·夏行厄潦》，第421页。

〔2〕如嘉靖时期权橓《朝天录》、隆庆六年许震童《朝天录》、万历二年《荷谷先生朝天记》、万历二十三年闵仁伯《朝天录》、李恒福《朝天日乘》、赵翊《皇华日记》、万历三十二年《朝天日录》、《梨川相公使行日记》、崇祯二年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皆作是称。〔朝鲜〕权橓：《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页。〔朝鲜〕许震童：《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4页。〔朝鲜〕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第143、145、147页。〔朝鲜〕闵仁伯：《朝天录·上》，第231页。〔朝鲜〕李恒福：《朝天日乘》，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页。〔朝鲜〕赵翊：《皇华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朝鲜〕佚名：《朝天日录》，第369页。〔朝鲜〕佚名：《梨川相公使行日记》，第302页。〔朝鲜〕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页。

〔3〕〔朝鲜〕赵宪：《朝天日记·上》，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页。不过亦有受明影响，称其墩台者。比如洪大容《燕记》便记：“自沈阳每五里，有烽台及汛堠，墩台可数丈，上为短女墙，台下列烽筩，如大瓮者五，汛堠如我国旌门制，上加短簏。”〔朝鲜〕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第392页。

〔4〕“望海亭之南筑烟台，高可数仞，悬桥以登。守亭者能上，我国人皆未能上。戍卒十余人来见，赠以扇子，问以守城之条。答曰：‘大概长城二十余堞作一弓家，家有守人五名，皆率旗帜，每一名一【八牙月】，给粮一石，赏银七钱，【八牙月】小则减二钱半，以是足为衣食云。”〔朝鲜〕许震童：《朝天录》，第514页。

〔5〕〔朝鲜〕黄汝一：《银槎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而名明长城。这一历史衍变一方面反映出长城作为客观实在，对其的称谓即主观指代确实经历逐渐变化与合流之过程，从此意义而言，后现代主义对于“长城”的概念回溯、解构，有助于揭示出客观实在与主观指代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性与非对称性；另一方面，却不能进一步反过来以主观指代的变化作为否认客观实在一直存在的证据，否则便会陷入“反客为主”的不可解困境与虚无主义。古人对于事物之称谓既并非现代概念之严格界定，后世研究者自亦不必过于执着。比如晚清之时，山海关周围之人尚有称秦、明长城皆为“边墙”者。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輶轩续录》记载时人称山海关“蒙恬所筑谓之老边墙，中山所筑谓之新边墙”。[1] 但并不妨碍时人心目中明确地烙印着一条由东至西的万里长城。

顺治二年(1645)，成以性《乙酉燕行日记》甚至讹称辽河流域金界壕为“蒙古长城”。“夕宿上城，而外城之高不过一大堤，而延袤横亘，不知其几百里也。五里、十里台堡相望，流传蒙古长城，似是夷夏之交，而城以限其界者也。”[2] 古伯察也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自承“万里长城”的称谓源自中国人。“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筑成由秦始皇帝于公元前244年建成的万里长城那样宏伟的工程。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3] 可见“万里长城”之称谓并非源自西方传教士之翻译，而是中国本土便早已存在。这一称谓后来被使团传至西方，才有了“Great Wall”的英译，而非西人之发明。正是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延续了历史脉络，普遍地以“长城”、“万里长城”称谓以上军事建筑，符合秦汉以来历史事实与语言传承，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因此，林霨对“长城”、“万里长城”词源之追溯，虽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长城称谓之多样性与复杂性，使长城建筑形式多样性得以强调，但并不能以之极端地否定“长城”、“万里长城”称谓之合理性。

---

〔1〕〔朝鲜〕姜时永：《輶轩续录》卷1，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

〔2〕〔朝鲜〕成以性：《乙酉燕行日记》，第65－66页。

〔3〕〔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第286页。

同样，林霨以历代长城位置不一、走向屡变，作为不能将之连接起来，进而不能称之为“长城”、“万里长城”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一方面，林霨强调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应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形成之长城加以区分，避免将其简单地捏成一体笼统地论述；但另一方面，以之否认长城之存在的做法却走向了谬误。因为中国古代长城本来便非一条固定之走向，即使在先秦时期也是如此，至明代更是发展出多层次、多走向之多重防御体系，但这恰恰说明了长城是一种立体防御体系，而不是线性防御体系，却不能说明“长城”、“万里长城”称谓的不适合。总之，林霨欲从根本上颠覆“长城”、“万里长城”之话语体系，既不符合人们沿用成习之惯例，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出版以后，在中国长城、边疆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争论。部分从现实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仍坚持中国对外政策整体来讲是理性的，对林霨描绘的明代宫廷政策、游牧民族刻板模式，以及军事中庸政策作为明朝边疆政策的解释表示质疑。但反对现实主义的学者，如布鲁斯·麦斯奇诺（Bruce Bueno de Mesquita）则对林霨之研究表示支持，认为这一视角更能反映出世界秩序运作的真实原因。但无论支持还是反对，1990 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关于长城之研究，已无法绕开林霨之研究。比如 2006 年，朱丽亚·洛弗尔（Julia Lovell）在《长城》一书中，一方面沿着林霨的思路，指出“长城”一词最早出现于 1738 年，孙中山将西方所称“墙体”误读为“长城”；另一方面重归长城具有侵略性与帝国主义，而不是消极或防御性这一西方传统观点。

对于学界之批评，林霨在《中国长城：20 年后一位作者的反馈》[1]中，坚持认为拉铁摩尔、李约瑟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强调长城不断修筑，成为中国亘古不变、连续存在之建筑的观点，无法立足，指出其实只有

---

[1]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n Author's Reflections after Twenty Years（《中国长城：20 年后一位作者的反馈》）, *Chinese Walls in Time and Space: A Multidiciplinary Perspective*,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到了明中期，更大规模的石筑墙体，以及塔楼、雉堞被筑造，是这些建筑，而不是更早的防御工事，确定了中国“长城”的习以为常的概念。如果目前只有明朝之前的防御工事存在，那么便没有这样一个古代的和含义明确的“长城”笼罩于中国历史。明朝没有事先规划万里长城的宏伟蓝图，当时也未出现“万里长城”称谓，并且因为当时长城仍然象征了王朝对外国敌人的软弱，迫使普通民众修筑长城是一种被人蔑视的行为，因此，虽然存在军事意义上的墙体，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流行的长城形象在中国大部分历史中确实存在，甚至明前期也没有什么地方提到有长城。长城作为神话、传说存在时，只会误导历史学家。中国历史与文学提供了长城神话的主根，但长城在文人、学者的笔下，始终是含糊、负面的帝制象征。但西方从马可·波罗开始，到以后的传教士成为长城神话的第二推动力，首先将长城的形象转变为中国文明古老、连续的更为积极的象征。“长城”被赋予“伟大”之含义。20 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孙中山、毛泽东将这一思想融入中国民族认同的烙印中。但当中国从文化共同体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后，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并不合适，因为长城不是世界性的，只代表了中国的保守主义、种族主义、政治静止，甚至民族主义。这会使中国受到损害、充满误解，甚至遮蔽中国文明中其他更多的优点。

1.6.3 当前多视角下的西方长城史研究

长城边疆理论范式遭到后现代主义冲击后，面临克服自身问题、积极调适之学术转向。而人类学以其揭示文明多元之学术取向与注重个案研究之学术路径，是历史学从宏大叙事向细节描写之范式转型中可以借助之学术视角。21 世纪前后西方世界长城史研究，便呈现了人类学渗透趋势。

利用人类学对中国经济进行区域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是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但由于资料所限，他仅将长城以内分为八大经济区域，对长城之外经济模式却未展开具体讨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高贝贝

(*Piper Rae Gaubatz*)所著《长城之外:中国边疆的城镇结构及其转变》[1]则弥补了这一缺陷,该书指出长城地带的城乡发展模式是城镇先于农村,城镇重于农村,城镇更多地受到商业而不是农业的支撑。城镇显示自身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功能。由于军士们或多或少都要从事生产自给,军镇向民镇的转化,是普遍现象,许多军镇在转化开始以前便已多少具有了民镇功能。[2]

除人类学之外,当前西方世界长城史研究也积极吸取其他学科视角,以研究长城的细节,揭示其多种面相。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所著《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讨论了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中国北部边疆社会的变化过程。全书共分4部分,第一部分从考古学视角出发,指出早期北部边疆社会并不存在明确的国界线,游牧力量不断扩张,并出现游牧文化,与华夏王朝在经济、技术与文化层面交流不断。第二部分从政治史视角出发,依据大量考古史料,指出战国长城的建立是华夏国家采取了中原诸侯国间发展起来的防御技术,向迥异于周族世界的外族地域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的表现。长城修筑于华夏国家组建骑兵,向外土地扩张,驱逐、消灭游牧民族之后,是对外族领地进行军事侵略或占领的一种工具。长城与生态线并不重合,保护的不是农业地区,而是非农业地区。长城用途极为广泛,既可以畜马、驯马,又可以用来储备军队和劳动力。长城沿线的堡垒是作警戒用的,用来控制这些外族地区和外族人,并保护那些"驯服的"居民不受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从而保护道路交通,保障华夏国家对北方地区的商贸利益,并最终以修建长城的方法将这些地区据为己有。这一行为与整个春秋时期实行的对外政策的一般倾向相一致。第三部分从军事史角度,考察了匈奴帝国形成的原因与过程。该书指出秦朝在建立后,向北方民族征伐与进攻河套,并不是战略的转变,而是对北方殖民化和军事

---

[1]Piper Rae Gaubatz, *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长城之外:中国边疆的城镇结构及其转变》),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载《读书》1998年第4期。

化的继续。修建长城对匈奴部落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匈奴社会形成严格等级制度与强大凝聚力的催化剂，最终形成汉、匈对峙的边疆形态。第四部分，从历史文本的角度，以《史记》为例，讨论了华夏民族书写边疆的方式。从研究思路与学术观点来看，狄宇宙在长城边疆理论范式基础之上，在扬弃了林霨的长城防御论，积极引入人类学视角之后，使长城研究显得更为丰富与细腻，这也是当前西方世界长城史研究之主流。

总之，西方世界很早便形成长城之公共形象，并具有不少之记述与研究，长城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之象征。明清传教士、商人将明长城宏伟印象与秦始皇伟大功绩相结合，构建了长城古已有之，此后不断修筑，在历史上一直扮演了抵御鞑靼人之重要角色的“神话”，但明清时期，尤其清代，部分传教士、使团已开始准确地测绘、记述长城之地理与历史，向西方世界逐渐传递真实之长城形象。伴随中国形象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地位之沉浮，长城也经历了由正面至负面之变化过程，但20世纪前后随着西方探险家对于长城的考察与赞颂，长城形象正面色彩更多一些，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国对长城之评价，与中国国内时势相结合，共同促进了长城在中国形象的提升与崛起。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西方世界开始利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长城，并构建了长城边疆理论范式，在国际学术界首次构建了长城解释体系，促进了国际学术界长城史研究的独立与扩展，在国际长城史研究中，扮演了引领风潮之角色。在1980年代，长城边疆理论范式开始受到后现代主义挑战，经过调适之后，借鉴了人类学等学科视角，开始对长城展开更为丰富与细腻之多视角考察。虽然西方对长城之记述与研究已有数百年，但由于西方缺乏对中国历史之了解，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之缘故，长城在西方世界眼中，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中国历史、政治封闭、停滞之象征。如美国学者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著《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追求》认为长城是中国战略文化经久不衰的象征。长城是中国保卫先

进农业文明的军事工程，也是一个软弱的象征。[1] 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chwartz)所著《中国长城》也认为“墙”作为一种建筑要素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万里长城是墙这一观念最初，也是最为突出的体现，它将人类区分为“我们”和“他们”，将世界划定为“里面”和“外面”。[2]

1.7 16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长城记述与研究

东亚世界，尤其朝鲜、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前近代东亚国际朝贡秩序之下，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朝鲜、日本使节往来中国之时，常会记述沿途见闻，其中长城便是其关注对象之一。也就是说，长城形象很早便成为东亚学者记述与研究对象之一。

在16世纪西方宗教向全世界传播潮流中，日本也受到同样冲击，并逐渐接受了基督教。1582年，由日本4名年轻贵族组成的使节团，作为日本耶稣会士的代表，前往欧洲，尔后返回日本。沿途所记由澳门学院孟三德神父撰成《日本天正派遣罗马教廷使节团行记》，于1590年在澳门出版。该书记载长城是一道奇怪的、令人赞叹的城墙，中华民族靠它镇压与击退鞑靼人入侵其领土的行为。城墙沿陕西、山西与北京边境，有300里格长。长城修筑时可能有意利用山体，抵御敌人，并绕过河道、保护通道。[3]

步入近代之后，日本面临西方列强之威胁，开始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国力逐渐强盛，在民族自保基础之上，甚至开始向外扩张领土，出于对中国北部领土之觊觎，日本也加入到20世纪前后中亚探险考察潮

---

[1]〔美〕安德鲁·内森、〔美〕罗伯特·罗斯著，柯雄、贾宗谊、张胜平译：《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追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2]Daniel Schwartz, *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中国长城》),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2001.

[3]〔葡〕孟三德著，陈用仪译：《日本天正派遣罗马教廷使节团行记》，载澳门《文化杂志》社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151页。

流。为与俄国争夺中亚，1906 年，日军参谋本部委派少佐军官日野强由甘肃进入新疆，侦察中国西北地区军事、政治情报。日野强虽然此前对中国西北历史地理并无认识，但他仍然十分详细地记录了西北地理、经济、社会状况，汇集成《伊犁纪行》一书。[1] 该书对沿途长城有所关注，指出秦长城自岷山向北至兰州一线已归于毁灭，仅残留遗址。同时他还指出各地长城修筑方式之不同，北京、兰州长城为内外浮现式构筑，直隶、山西长城为南北纵向，彼此相连。对于长城保存之现状，日野强记述长城未得到任何修葺，日益荒废，反映了中国人有创造之能而无修理之能，这一讥讽反映了正在崛起的日本对中国之普遍歧视心理。由于历史知识有限，日野强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中国长城东起山海关的流行说法。

稍晚于日野强，日本的年轻释子橘瑞超在 1908 年完成了他历时 5 年的 3 次中亚考察之行。橘瑞超是日本受佛教界支持的大谷探险队最年轻的成员，该探险队以调查佛教东渐史迹为目的，于 20 世纪初年在中亚展开考察。橘瑞超追随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足迹，著成《中亚探险》一书，[2] 该书简略记述了玉门关遗址保存情况及其周边地理，但对长城未有更多关注。

无论是出于与中华文化枝叶相连、密切相关之体认，还是在民族崛起之背景下，超越中国，扮演东亚文明主导角色的考虑，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前期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整体、深入讨论，形成了所谓的“满蒙回藏鲜之学”。[3] 稻叶岩吉《秦长城东端考》[4] 依据杜佑《通典》所载，认为秦长城西起黄海道遂安境，延向大同江上游，跨越清川江，向西北延伸，环绕鸭绿江与大同江上游，走向开原东北地。顾颉刚指出这篇论文过于发挥杜佑之记载，脱离了原来的史料。伊东忠太原《中国建筑史》指出秦始皇补缀、连续燕、赵长城而成万里长城，并令蒙恬北筑

---

〔1〕〔日〕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黑龙江出版社 2006 年版。

〔2〕柳洪亮译：《橘瑞超西行记》，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该书收录了《中亚探险》，以及研究橘瑞超的论文。

〔3〕《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 231 - 253 页。

〔4〕载《史学杂志》第 12 编第 2 号。

长城以防匈奴。此后魏晋、隋朝、明朝陆续修补，秦长城所筑部分已不知在于何处。从临洮至辽东之长城，并非一直连续，而是在主要道路与国境线上，设置关门，于门之左右筑城壁。修筑材料与方式随地不同，或用石，或用土，或用砖，其规模、材料、构造并非一定。[1] 对长城之"神话"倾向是世界性的。醍醐钦治称长城长 6700 公里，令人对先人伟业不禁赞叹，长城也是从月球上可以看到之唯一建筑。[2] 松本隆晴《试论余子俊修筑的万里长城》[3]考察了余子俊修筑边墙之经过与作用。川越泰博《明代长城群像》[4]讨论了明代长城多方面的内涵与作用。阪仓笃秀《长城中国史》[5]讨论了中国古代，尤其明朝长城修筑过程，对戚继光对长城的改良与空心敌台的发明及相关战术进行了重点论述。

对长城汉简的研究是日本长城研究的重要内容。20 世纪 50 年代京都大学森鹿三教授便致力于汉简的研究，举办了居延汉简研究班，培养了许多人才。代表作是同朋舍 1975 年出版的《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第二位代表人物是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代表作是 1990 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简》与 1995 年由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居延汉简索引》。赤井清美《汉简》[6]凡 11 卷，则将日本的简牍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度。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京都大学永田英正教授 1989 年由同朋舍出版了《居延汉简的研究》。最近一部关于长城汉简研究的论文集是富谷至编《边境出土木简的研究》[7]。

在古代东亚国际朝贡秩序下，朝鲜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辽东镇、蓟州镇庞大的长城防御体系给明清时代不断往来中国之人尤其使节即

---

[1]〔日〕伊东忠太原著，陈清泉译补：《中国建筑史》，中国文化史丛书第 2 辑，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2]〔日〕醍醐钦治著，曲凯等译：《丝绸之路——我所走过的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3]载《大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 年第 1 期。

[4]汲古书社（东京）2004 年版。

[5]讲谈社（东京）2004 年版。

[6]东京堂 1977 年版。

[7]同朋书店（京都）2003 年版。

燕行使、朝天使皆形成了强烈冲击与深刻影响，燕行录既以沿途见闻为记述内容，二镇长城分布格局遂成其重点记载对象，甚至及于其他时代长城之遗存情况。蓟州镇西止山海关，再往西便属京畿防区，长城设施不如以东之蓟州镇、辽东镇完善而雄伟，因此对于山海关以西，崔溥《锦南漂海录》仅记："山海关以内，十里置烟台以备烽火"，而对山海关以东，则概述了蓟州镇、辽东镇长城分布与走向。[1] 黄汝一《银槎录》亦记载了长城空间分布格局与防守制度。"长城三里一烟台，一台十名军；五里一小铺，十里一大铺，三十里一大寨。贼来则烟军交臂瞭望，铺卒各把弓家，中朝防戍之法，亦云周且宏矣。我国边防蕞尔斗城，亦不能把守，毕竟无一名军卒，城可哀也已。"[2] 赵宪《朝天日记》专列《烟台》一目，记述其地形、格局与戍守制度，"辽南烟台，多在山上，上无人家，设于间者，仅见一二。自辽以西，五里一台，相望不绝。台上构屋，台下又设小城。城中例令五子率家以守之，丁给月俸银二钱。边墙烟台之军，则加给冬衣。其养兵之劳，守边之策，可谓至矣。"[3] 丁焕《朝天录》尚记述了长墙之边界功能与民间自发修筑民堡现象。"民居散落，距长墙远不过三十里，近或十余里。长墙之外，乃獠羯之居，世为边患。……民村危恐，不能私立门户，五六家或十余家共围一墙，筑候（应为堠）墩其中，早阖晏开，以相保焉。"[4]《朝天录》专辟《烟台式》一节，不仅记载了辽东镇墩台空间分布格局，"台自辽东以西有之，辽东至牛家庄则五里设一台，牛家庄至中前所则五里设二台"，对墩台内部

---

〔1〕"过关后，又间五里置小墩立标以记里。自辽东过头官、甜水、通远堡、斜里、开州、汤站等站，至鸭绿江，又三百有余里。山海关以东，又筑长墙、置堡，以防野人。驿递皆有城，与防御所一般。又不设府州县，置卫所，虽若驿递之官，皆以军职填之。臣又传闻自三叉河又有一路，过海州卫西木城，绣岸城、莺拿河屯、牢房林子屯、独塔里屯、林江河屯、蒲芦葫屯，至鸭绿江，仅二百余里，亦是中大路。路左有旧城基，废为安市里，谚传拒唐兵处。大明洪武间，又筑长墙以御胡，头接秦长城，迤东而来。三叉河以西，不可详也。以东则北过长静、长宁、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等堡。又东过平洛泊堡，至沈阳城，又北过蒲河、懿路县、凡河、铁岭卫、腰站等城，至开原城。又过东抚顺所城，南至东州、马跟单、清河、盐场、霾阳、十岔口等堡，至鸭绿江。凡数千里余里，回抱定辽左二十五卫。"参见〔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第200－201页。

〔2〕〔朝鲜〕黄汝一：《银槎录》，第20页。

〔3〕〔朝鲜〕赵宪：《朝天日记》，第266页。

〔4〕〔朝鲜〕丁焕：《朝天录》，第405页。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结构、戍守制度与士兵来源进行了详细记载，是所有燕行录记载最详者，而且将之与蓟州镇墩台相比较，“关中亦有台，而无城楼及垛，但筑土墩建台，而台皆空心，戚定还为蓟州镇守时所筑，而今废耳。”[1]万历三十八年(1610)，《朝天录》不仅记载了山海关内外墩台分布格局，而且指出辽东镇修筑广宁卫边墙时，于墙外挖掘壕沟，积雨而成水潭，路人只得于墙上行走之事。[2] 同行之郑士信《梅窓先生朝天录》亦记山海关外墩台布局与功能，“(首山)岭下路右始见烟台，自此至山海关必五里每设烟台一二处，相望为式，在在一样云云。烟台者瞭望，虏来舜息，出烟气通报，兼筑高堞，使行旅仓卒得避凶锋抢掠者也，其制置创真奇哉！”“沿路设烟台，视虏地之远近而踈密，其制或五里一悬之，或两悬之，或三悬之，以备不虞。”以及使团在墙上行走之事。“贡马经由长墙之路，一马蹉足，堕落即死云。”[3]同行之苏光震《朝天日录》记载辽东镇边墙外“其地窪下，故每夏雨节，则胡中之水奔齧长墙，墙缺而入。自沙岭十里铺至广宁制胜铺一百七八十里之间，浑成一海。高处则往往微露，窪处则可以运船，且与虏接境，远者或八九十里，或三四十里，近者则或十五六里”。[4]

但较为完备的制度却在具体实行之时，却由于明后期军队战斗力之下降，而无法达成应有之效果。赵宪《朝天日记》载：“而例遇小贼，辄伏城头，不敢发一矢，以致恣意虏掠，坐看系缚鱼肉而已。”[5]《万历壬寅朝天录》又记边墙之外又有栅栏，但与蒙古展开互市之后却被拆

---

〔1〕〔朝鲜〕佚名：《朝天录·烟台式》，第428－429页。

〔2〕“自(东昌)铺西三四里，外至广宁东城外，连筑长墙，一以备西戎之冲突，一以备潦节之往来。其制以土筑之，高十余尺，上可行车马。而墙外有海子，淫雨则水自胡中来者，奔放于其内，远近微茫，汇为陂泽，最为行路之厄。行人由墙上行，或乘槽船达于广宁。船无什物，用长绳短梢循墙台进云。”“自首山铺抵关外，列置内外烟台。防歇处则五里一置，防紧处则五里二三置，以为瞭望之所，亦以为仓卒入保之地。其制方圆或异，以土以砖，所筑亦异。高十余丈，虚其中，缘绳梯上下，其外筑小城子以围之。关内则自万里城抵皇都，沿城列置，罗绎不绝矣。”参见〔朝鲜〕佚名：《朝天录》，第185、188页。

〔3〕〔朝鲜〕郑士信：《梅窓先生朝天录》，第447、454页。

〔4〕〔朝鲜〕苏光震：《朝天日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5〕〔朝鲜〕赵宪：《朝天日记》，第266页。

毁。“旧设栅子于长墙外，以备虏骑之突至，令通路者避入烟台，在在皆然。自许关市，虏结幕于墙外，往来杂处，无复防禁云。”[1]明蒙互市所带来的北疆和平局面与万历三大征对明朝财政的巨大消耗，使九边长城设施逐渐呈现荒废局面，不过部分地段得到了修复。《万历壬寅朝天录》便记载了广宁中后所当时的状况。“初十日，到中后所。来时所过城堡，见楼橹为半颓圮，烟墩瞭守之处亦极萧条，今皆修缮一新。闻何察院有风力，诸将畏戢，闻其巡饬，一齐修筑云。”[2]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时期不仅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而且这一军事设施与防御模式在包括女真、朝鲜在内的东北亚世界内部也普遍流行。在向朝鲜政权奏报出使汇报时，赵宪进一步对沿途见闻加以总结，以《城基之固》为专题，不仅全面总结了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指出晚明北疆长城防御体系之构建有借鉴南方海疆长城防御体系之历史脉络；而且将朝鲜长城与明长城加以对比，从而指出朝鲜在抵御女真方面所存在之重大隐患，建议仿照明长城，修筑更为坚固之长城。这一记载不仅揭示出明朝海陆边疆内部存在军事模式之交流与互动，而且反映出明长城对东北亚世界其他地区长城之修筑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相应亦进一步体现出明代长城防御体系是在不同地理空间下不断

[1]〔朝鲜〕李民宬：《万历壬寅朝天录》，第196页。
[2]〔朝鲜〕李民宬：《万历壬寅朝天录》，第208页。

实践、模塑中而形成的具有相当边防效力、一直动态发展的军事模式。[1] 而万历二十四年(1596)进入建州地区之申忠一则记载了女真部族亦属城居,“奴酋除辽东地方近处,其余北、东、南三四日程内,各部落酋长聚居于城中”,同样亦修建了大量的城堡,防御形式与明朝存在相似之处。“奴酋自其家距大吉号里一日程,北向如许路,一日程各设一堡;西向辽东路,一日程设十堡,将则以酋长之在城中者定递,军则以各堡附近部落调送,十日相递云。”并设置墩台以传递消息。“烟台报变时,不用烟台,只击木梆,以邻台相准为限,相准辄走避匿,恐被贼害也云。”墩台守军则轮流更换。“烟台军人并家口二户,入接满一年。相递粮饷则计其人数,每朔奴酋备送云。”[2] 万历四十六年(1618),姜弘立率朝鲜军队与明军合围努尔哈赤,李民寏便在其中。明、朝兵败后,李民寏被俘,天启三年(1623)回朝鲜著《建州闻见录》,亦记载女真部族城居,并设置墩台。“凡路傍瞭望处,皆设烽燧,相去七八里,举烟

---

[1]“臣窃见辽阳以西至于山海一路,距胡地最近,故既于极边接城(秦万里城)为长墙,有壕子,五里各置一烟台,台下有小方城(如三盆河等墙,绝之地,冬月冰冻,则恐胡人由此入寇。凿冰为墙,以水沃之,彼不敢入来云。又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又于长墙之内十五里许(近处相距才十里,远处或至三十里),以其土筑长堤,以防胡兵之直进(此则杨太师兆之所筑也)。烟台、方城,俱如极边,而台上有屋城之四隅,各有陴屋,向路出门,门上亦有陴屋,俱覆以瓦城。外凿壕子,壕子外筑墙,墙外深坎数重,坎外或列植榆柳,虽胡兵众驱而势不得奔突也。城中例令五军丁率家以守之,丁给月俸银(二两五钱),各垦城旁空地,以为产业,有警则沿海居民群聚以守之。十五里置一小铺,三十五里置一大铺,城子渐广,而人居者渐众(如牛家庄既有九军,而冬月益戍以十军)。器械完缮,而守备周密,凡城颓之处,则官拨银两以修之。中原犯罪者多所徙居,而山海关门有兵部主事一人,以朝夕掌其开闭,监其出入,虽极恋乡土者,罔有逃还之计,各于定配之地,人怀死守之志,是以关外一线之路,连绵不绝,以达于辽。关内则虽无烟台之城,而十五里铺、三十里铺则无处无之,州县、城池无不牢壮,虽有劲敌,人恃以无惧。皇朝所以设险守国者,两界之地虽有长城,而马可超升;虽有烟台,而人不能居(台上不惟无城,而一无草屋一间)。风号雪虐之际,则薄衣戍卒多有冻死之虞,不待贼来而反走也必矣,孰肯以死守之哉?且州镇之城龃龉尤甚,如有胡寇,则无非一呼而可登者。”但由于朝鲜财政有限,“今若欲遵中朝之制,设城置台,而一用民力,则城基未完而民已不守矣”,赵宪建议上自王室,下自官民,皆捐资筑城。参见〔朝鲜〕赵宪:《东还封事》,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348页。

[2]〔朝鲜〕申忠一:《申中一建州见闻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火以相传报云”。[1]

在普遍记述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同时，燕行使还对长城关键节点进行了重点论述。在这其中，尤以位置扼要、气势雄伟之山海关吸引了最多的关注。除上文所述将山海关视作“万里城”的赞叹之外，燕行使还对山海关历史、修筑与地位进行了不断地讨论。作为较早的一部记述域外之著作，《锦南漂海录》并未重点记述某一关键长城节点，比如对于山海关，该书仅有简单记述。[2] 甚至不及徐达修筑山海关及其附近边墙之事。《荷谷先生朝天记》、《梅窓先生朝天记》、万历四十二年(1614)金中清《朝天录》则记载了山海关尽头，也是秦长城入海处之望海亭形势。[3] 赵宪《朝天日记》开始记载徐达修筑山海关，连接秦长城之事。[4] 在明清战争中，山海关一跃而成为保障北京最重要之关隘，地位大为提升。而吴三桂开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改变了中国整体历史进程，使山海关成为明清易代过程中最令人瞩目之地。这一历史进程大为提升了山海关地理空间的知名度，相应成为清代燕行使重点考察之地。朴世堂《西溪燕录》简要概括了山海关之地势。“关在平地，北倚角山，南临渤海。山海之交，其间仅十余里，殆天设险，以卫中国。”[5]洪大容《燕记》记载了山海关之宏大规模。“长城之内，别筑关城，曰山海关，即天下第一关也，徐达所创也。关城周八里，门四，池广二丈，西城周六里，东城周三里，南城周三里，北东周一里余。连环五

---

〔1〕〔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2〕“有孤山临海滨城，北有角山屹立，山海关当其中。北负山，南带海，相距十余里，间为夷夏要险之地。秦将蒙恬说筑长城，跨出于角山之腹，迤逶为卫之东城，以达于海。”参见〔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第191页。

〔3〕〔朝鲜〕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第148页。〔朝鲜〕郑士信：《梅窓先生朝天记》，第456-457页。〔朝鲜〕金中清：《朝天录》，第39页。

〔4〕〔朝鲜〕赵宪：《朝天日记·上》，第271页。

〔5〕〔朝鲜〕朴世堂：《西溪燕录》，第167页。

座，或称五花城，雄富可埒沈阳。”[1] 乾隆四十一年（1776），李坤《燕行记事》对山海关地势、遗存描写尤详。[2] 朴趾源《热河日记》则对山海关、将台专题论述，并发出了如下感慨。“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不见山海关，不识中国之制度；不见关外将台，不识将帅之威尊矣。”[3]

在对山海关的记述中，山海关附近附会孟姜女故事之贞女祠、望夫石、望乡石成为来自异域，却尊奉正统之朝鲜官员重点关注的对象，成为抒发儒家民本思想、批评劳役民力的文化象征。《锦南漂海录》仅简单记述望乡、望夫二台。“关外有望乡台、望夫台，谚传望夫台即秦筑长城时，孟姜女寻夫之处。”[4] 此后朝鲜燕行使却在对望夫石记述的基础上，重点增加了对塑立孟姜女像之贞女祠，以及孟姜女诗词、传说的叙述，记载内容愈来愈丰富。比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黄汝一《银槎录》便增加了孟姜女滴血认骨等情节。[5] 万历三十八年《朝天录》记僧人言孟姜女故事及长篇诗赋。[6] 万历三十八年《梅窓先生朝天录》、金中清《朝天录》皆记明人立碑于贞女祠。[7] 李尚吉《朝天日记》进一步指出贞女祠是山海关主事张栋所立。[8] 反映出孟姜女故事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衍变之时代脉络，以及对于整个东亚世界皆产生了明显冲击与影响，从而成为整个东亚文明愈来愈重要的共同历史记忆。相

---

〔1〕〔朝鲜〕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第393页。《燕行录》、徐浩修《燕行纪》也记述了山海关之宏大规模。〔朝鲜〕佚名：《燕行录·山海关》，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2页；〔朝鲜〕徐浩修：《燕行纪》，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471页。徐有闻《戊午燕录》则描绘了山海关之气势雄壮。〔朝鲜〕徐有闻：《戊午燕录》，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3页。

〔2〕〔朝鲜〕李坤：《燕行记事》，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8页，第77－78页。

〔3〕〔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3《将台记》、《山海关记》，第75－76页。

〔4〕〔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第191页。

〔5〕〔朝鲜〕黄汝一：《银槎录》，第19－20页。

〔6〕〔朝鲜〕佚名：《朝天录》，第188－189页。

〔7〕〔朝鲜〕郑士信：《梅窓先生朝天录》，第454页。〔朝鲜〕金中清：《朝天录》，第38页。

〔8〕〔朝鲜〕李尚吉：《朝天日记》，第226页。

应，这一历史轨迹亦印证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结论。[1]

清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虽已基本丧失军事功能，成为单纯历史遗迹，但朝鲜政权由于秉持“事大尊明”思想、感念万历援朝之功，加之以“小中华”自居，秉持“华夷之辨”，虽然在政治上归附清朝，但在文化上却持蔑视心理，在军事上也在“胡无百年之运”观念影响下，一直保持对清朝再次入侵的警惕，从而对明长城防御模式多所关注与借鉴。[2]相应原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设施仍加关注与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记载了镇江以西八百余里城堡分布状况。“明朝则自镇江至边城周流河白旗堡八百余里，之间镇堡连续，荒

---

〔1〕如朴世堂《西溪杂录》仅简单记“过贞女祠，即所谓望夫石者”。〔朝鲜〕朴世堂：《西溪杂录》，第168页。孙万雄《燕行日录》所载则有所详细。“望夫石，山阿巨石，磊磊石巅，刻‘望夫石’三字。其下立祠，设贞女孟姜像，而为悲泣之形，扁以‘湘灵并耀’，三韩朱国梓笔也。”〔朝鲜〕孙万雄：《燕行日录》，第311页。康熙二十一年韩泰东《燕行日录》则开始指出孟姜女本姓许，携二子寻夫。〔朝鲜〕韩泰东：《燕行日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435页。康熙二十五年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则记载清代官员立碑于姜女祠之事。〔朝鲜〕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第52页。此后燕行录围绕孟姜神像、孟姜女故事传说、历代吟咏，所载内容呈现不断填充与丰富之轨迹。如〔朝鲜〕韩祉《燕行日录》，第489页。金舜协《燕行录》记载秦筑长城，征夫60万之数字，以及孟姜跳海，石浮图（望夫石）出之情节。〔朝鲜〕金舜协：《燕行录》卷1，第154、156页。〔朝鲜〕赵春采：《燕行录·八里铺望夫石》，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朝鲜〕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第262页。〔朝鲜〕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第393页。李正臣《燕行录》增记了康熙时期新的对联与碑刻。〔朝鲜〕李正臣：《燕行录》，第291－292页。雍正十年赵最寿《燕行录》记万历年间于贞女祠建碑。〔朝鲜〕赵最寿：《燕行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李德懋对姜女像所载尤为详细。〔朝鲜〕李德懋：《入燕记》，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页。卢以渐《随槎录》则辨析了孟姜女故事源流。〔朝鲜〕卢以渐：《随槎录》，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544页。乾隆四十九年随使团赴京之佚名士人则引述多首唐人吟咏孟姜之诗。〔朝鲜〕佚名：《燕行录·姜女祠》，第26－28页。乾隆五十五年徐浩修《燕行纪》则记载晚明至清代祠内不断重树之碑。〔朝鲜〕徐浩修：《燕行纪》，第472－473页。乾隆五十六年金正中《燕行日记》记载乾隆诸子于姜女祠题咏及旁边寺庙。〔朝鲜〕金正中：《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172页。嘉庆三年，徐有闻《戊午燕录》记载了燕行使有在姜女祠留诗者。〔朝鲜〕徐有闻：《戊午燕录》，第254页。李基宪《燕行日记》则记述了姜女祠里更多之题诗，并记祠旁已出现妈祖神像。〔朝鲜〕李基宪：《燕行日记·上》，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403页。晚出之《燕辕直指》则专辟《姜女庙记》一目，论述尤为详细。〔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2《姜女庙记》，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69页。

〔2〕关于清代朝鲜“事大”与“小中华”思想，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城废堞，至今尚存。自小黑山以后，连设烟台，以砖石筑之，用灰填其罅隙，台之周可四五十步，高可四五丈，其上可容四五十人，而十里、五里相望不绝，连亘五六百里之间。"[1]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李正臣《燕行录》皆记述了辽蓟墩台规制与分布。[2] 洪大容《燕记》以及关外墩台分布情况。"关外数百里，烟台相望，戚将军所筑高七八丈，或圆或方，不过数十步。"[3]徐命臣《庚辰燕行录》对辽东镇城池、烟台原貌之情况，详细记载，并对山海关附近烟台规模、密度有所概括。"自小黑山有烟台，以石作地台，三四层，以砖筑之，周围如环，高十丈余，上有将台、女堞，之内可容百人。如是者三四里一台，六七里一台，连络不绝，至关外而止。"[4]乾隆四十一年(1776)，李坤《燕行记事》不仅详载沿途所经地名及里数，明代长城遗迹成为其重点记述内容，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空间格局亦借此得以展示。[5] 乾隆四十五年(1780)，卢以渐《随槎录》亦记明辽东镇墩台格局。[6] 《蓟山纪程》不仅非常细致地记述了沿途所经城堡现状，而且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地区墩台分布密度。"关外则或十里、五里一台，关内则每五里相望不绝。以砖石夹灰筑之，四周如削，高可十余丈，周可十余围。其制或方或圆，上下用云梯，

---

〔1〕〔朝鲜〕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第52页。

〔2〕"自辽沈以后，路上多烟台。烟台之制，或方或圆，方者一面可三丈余，圆者可围十九把，高五丈以上，以砖夹灰筑之，四围如削，近上三分之二。开前后两门，仅容人，其上下必有云梯矣。台上有一层台，高可半丈，是则将领所坐处也。上下台皆有垛堞。近则五里，远则十里，碁置相望，一台以百人守之，有警则放砲相报。初出于戚继光所创，其意诚非偶然。"参见〔朝鲜〕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烟台形制以甓累筑，而圆长可三四丈，下广上锐，上设堞开砲穴。又凿一大穴于上端，以通人，由梯升降。或二三里一设，或数百步一设，平野高阜，星罗棊布，殆不可计。自过沈以后，至山海关乃止，盖以野中无山，置此以代烽燧，置砲火以伺备胡人者云。"参见〔朝鲜〕李正臣：《燕行录》，第290页。

〔3〕〔朝鲜〕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第392页。

〔4〕〔朝鲜〕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第251页、第257页、第267页。

〔5〕〔朝鲜〕李坤：《燕行记事》，第45－48页、第77－78页。

〔6〕"而相其地形之高低，或十里一台，或五里一台，或十五里一台，取其相望之宜也。台高几十丈，台体几数十围，台中空处可容守直军数十人，而又凿攀登之级于台腹，使之登而报警。台前设五个烟筒，高数三丈，□数围，盖夜警则登台举火，昼警则烧狼粪于烟筒以报者也。"参见〔朝鲜〕卢以渐：《随槎录》，第532－533页。

而垈上有垛堞，穿砲矢穴。每一垈以百人守之，有警则放火砲相报。”[1]咸丰十年(1860)，朴齐寅《燕槎录》记载了山海关至北京墩台分布情况。[2] 在记述辽蓟长城之外，朴趾源还对古北口长城有所记载。[3]

由于清代长城军事作用大体丧失，清朝亦基本不加修缮，比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燕行录》载：“而长城多颓圮处，历路许多城郭举皆崩坏，而一无修改之事。岂欲与明朝相反而然耶？未可知也。”[4]因此清代朝鲜使团笔下关于沿途长城建筑之记载，便保存了近代以前蓟州镇、辽东镇长城遗迹状况。康熙四十年(1701)孟万泽《闲闲堂燕行录》记载宁远城在明清战争半个多世纪后，仍是一片废墟。“今则譙堞毁坏，壕堑湮塞，已无旧时模样。居夷尠少，闾里萧条，如新经乱离者，然亦一伤心处也。”[5]闵镇远《燕行录》亦载宁远城称：“宁远有内外城，周十余里，城堞尽皆颓圮，不为修葺，所见愁惨。”记小黑山故城称：“小黑山有故城遗墟，居民曰：‘皇明全盛时，设置重镇于此，城郭完固，村闾栉比矣。兵火以后，荡为灰烬。’近来人民稍稍入居，仅至数十

---

〔1〕〔朝鲜〕佚名：《蓟山纪程·烟垈》，第128－129页。

〔2〕“自山海关至皇城，沿路每五里筑烟台，台下又筑五堆小台，涂以石灰，画以朱彩，谓之墩台。二里半设铺，筑以泥土，如窟窑。置更夫、巡役、兵丁等几名，冬月守之，夏月废之。铺壁各书某县第几铺，列书吏、更夫、巡役、兵丁等姓名于铺壁。”参见〔朝鲜〕朴齐寅：《燕槎录》，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0页。

〔3〕“行至长城外，缘山为城，参差曲折，其冲处建空心敌台，高可六七丈，广十四五丈。凡冲处或四五十步一台，缓处或二百步一台。每台百总守之，十台千总守之。每一二里间，铃铎相问，一人有警，左右举烽，分传数百里间，皆见应速，而备豫皆戚。”参见〔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8《还燕道中录》，第148页。

〔4〕〔朝鲜〕闵镇远：《燕行录》，第324页。不过该书尚记载清朝在长城以内有小型墩台之修筑。“明朝所筑墩台，至榛子店而止。山海关以内，清人每五里设一小台，以备瞭望，若汉家之列亭障然。”〔朝鲜〕闵镇远：《燕行录》，第327页。韩祉《燕行日录》更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些墩台的规制。“自关内至北京，路边筑起烟台，或五里一座、十里一座，而其制异于明时所筑，以土成台，高四五丈，四隅各十余把。上设房屋，编茅覆之，上下四畔涂以石灰，画以杂兽。中储弓、刀、旗、矛之属，有若待变者。台前每列烟桶四五，其状若覆大瓮，亦以土为之会，涂彩画一样，虚中爇薪，穿项通烟。自关至京，凡五十余处，每台各置甲军三名云。”〔朝鲜〕韩祉：《燕行日录》，第492－493页。对此李正臣《燕行录》亦有记载。“自关内五里置一墩台，傍植数枝旗枪，前设芟舍，以处巡绰军兵，伺察奸宄，十数年来所设置云。”〔朝鲜〕李正臣：《燕行录》，第292页。

〔5〕〔朝鲜〕孟万泽：《闲闲堂燕行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户云。"[1]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燕行日记》亦称:"至松山堡城,皆残夷,独北边一带犹存,而亦太半颓落。"[2]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记宁远卫及其东西长城遗迹,又指出民间尚有拆取长城砖者,这与当代长城破坏颇有相似者。"此地(宁远卫)内外城堞,未知筑于何时,而今皆颓毁,无一完存处。虹门内左右甓石,间间破落。城中人皆取去,筑墙垣造炕壁。沿路所过,自永平府以后,无论州县铺驿,到处皆有城,而一皆任其颓落,不为修筑。山海关以后,墩台或五里十里,处处相望,而今则已成无用之物。"[3]此外又记辽蓟墩台保存状况。"而今来见之,多有毁破者矣。"[4]虽然部分城池、墩台遭到明清战争与后世破坏,但并未经历战火严重摧残的城池直到晚清时期却仍保存较为完整。比如山海关。"地道虽已湮废,而雉堞无一颓圮。且想其当日气势之雄、力量之大,犹足以身作长城,不许一骑入关,可指其作用终非庸人,而中原人力之殚于此。"[5]

不过边墙、壕沟以及部分碑刻,却并未如此幸运。由于前二者具有阻隔功能,不便于满洲骑兵奔驰,清朝遂有拆除、填平者。而碑文却有触犯时忌者,相应亦无法得以完整保留。嘉庆六年(1801),李基宪《燕行日录》便记载了清朝拆毁辽东长城之事。"过土子井、十里岗子始有烟台,皇明防建州时所设,以甓筑之。高可十余丈,广可数十围,或方或圆,而中设将台,制度坚缀。间多破坏,盖清人毁之,而坚不能尽毁云。"[6]以及琢去碑文"奴酋"等字样的举动。[7] 而墩台周边壕沟也逐渐被填平。"旧有团坮之濠,令填夷云。"[8]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

---

[1][朝鲜]闵镇远:《燕行录》,第321页、317页。

[2][朝鲜]金昌业:《燕行日记》卷1,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3][朝鲜]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上》,第171页。

[4][朝鲜]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第174页。

[5][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2《将台记》,第69页。

[6][朝鲜]李基宪:《燕行日记·上》,第397页。

[7][朝鲜]李基宪:《燕行日记·上》,第398页。孟万泽《闲闲堂燕行录》也已记载清朝"建奴二字则皆斫去"之现象。[朝鲜]孟万泽:《闲闲堂燕行录》,第52页。

[8][朝鲜]佚名:《蓟山纪程·烟坮》,第129页。

善《燕辕直指》专辟《烟台记》一目，对明蓟州镇墩台形制及清朝铲毁壕沟加以论述。“自土井子始有烟台，以至于山海关。其他关隘如古北口、紫荆关等处，亦皆有之，盖戚南宫继光所作八百望是也。其制或方或圆，圆者如坚石础，其围可数十把。方者形如蜂桶，每面广可五丈，高皆五六仞。以上砖灰筑成，四围如削，去台顶三分二对。设二门，仅可容人出入，意其升降以梯，而贼至则去两面。有石槽盖，所以疏台上之水也。台上又有一小台，高可半丈，是则将领所坐处也。上下台皆有垛堞，穿砲矢穴。台之相距，近则五里，远或十里，棊置相望。每台以百人守之，有警则放砲相报，使关外列阵，声势联络，贼至则坚守台外。又有围守穿濠之迹，而今皆填夷，盖清人尝攻烟台，士卒多死，故既陷，辄夷之，而以其坚不能尽毁。”[1] 随着战事消弭，长城军事建筑也逐渐呈现民用化趋势。“自闾阳前后，多以台子名村，有二三四五台子之号，间间叠出，台即烟台也。”[2]

在遗迹记述之外，朝鲜使臣尚对长城修筑过程、历史功过有所讨论，已类似于初步研究。如孟万泽便辨别了山海关长城为明长城而非秦长城。“则前日所谓长城，非真秦时所筑也。盖长城距山海关稍远，而东南一峻山，西出校场口，大断为黄土岭数十里，为角山，故山北诸水亦随山而南达于此。当时魏公之设关也，自校场口筑起雉堞，北接长城，西至角山，南入于海，而黄土岭内外皆低陷难守，故又筑九门口于山南，设烟台于北溟山。或云牛背项东麓以备北路。昔闻自成之乱吴三桂引清人击贼，九王穿关而入，八王自关北逾岭而出，攻贼之首尾，其所谓岭口必指此。而今人谓之秦时长城，诚可笑也。”[3] 此后燕行录对于徐达修筑山海关长城亦多有论述。比如徐命臣对山海关长城修筑历史、作用进行了追溯与论述。“山海关自秦始皇筑斯之后，明太祖使徐达更为修筑。海边石尽处，镕铁而填海，以石筑其上，每石相接处凿之，如隐钉形，而灌以铁，计高可五六丈。下石上砖，杂之以石灰，其坚无

〔1〕〔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2《烟台记》，第54－55页。

〔2〕〔朝鲜〕李基宪：《燕行日记·上》，第397页。

〔3〕〔朝鲜〕孟万泽：《闲闲堂燕行录》，第65－66页。

比，飞鸟之外，决难犯越。而明末吴三桂守此城，至于亲毁关门之右边以纳贼，兵其毁处，清人不为修补，而今呀然，可胜痛哉！”[1]不过朝鲜使臣对于长城之考察，并非出于学术考察之目的，因此关于长城之正确知识，也相应并未随着时代演进而必然逐渐深入，比如咸丰五年(1855)徐庆淳《梦经堂日史》便人云亦云地记载角山附近长城为秦长城。“过大石桥，自此望见长城，逶迤横行，建于闾山之腰，如蛇行，如练挂马，渐向角山而东。从者言此是秦时所筑万里长城也。”[2]

明清易代前后，如同中国本土一样，长城也经历了从正面至负面之变化。万历五年(1577)崔岦《丁丑行录》对于秦修长城出于自身实力之不足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功用给予了客观评价。“长城之防北胡熄，秦计有失亦有得。殊不知向无宫中胡，胡亦未必非秦虞。汉女相续嫁单于，此时长城如始成。君不闻有道守在夷，次不闻有将贤于诚。纵使秦皇不筑城，宁教一日息苍生。自家单枉防胡计，功到如今未可轻。”[3]但明朝亡于财竭民穷，以及清朝借山海关而入主中原，则使本来便与中国本土一样，秉持内政优先之儒家政治观念之朝鲜官员对长城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闵镇远《燕行录》：“自小黑山东五里许，始有墩台，周围三十步许，高十丈许，以甓坚筑。四面无门，非云梯难上。每五里置一墩，棋布星罗，云是明末为御胡筑此瞭望贼兵。而每一墩费千金，胡骑未遏而民力先竭，以致败亡云，可为痛哭。”[4]康熙六十一年(1722)俞拓基《燕行录》所持观点则进一步反映出朝鲜官员对长城之批评源于东亚文明“内政优先边防”或“恃德不恃险”之儒家政治传统与观念。“自小黑山始望见医巫闾山，蜿蜒于西北间，连亘数百里，路傍多有烟台，或圮或存，皆明朝备胡时所筑，徒费无限财力，筑此无用小

---

〔1〕〔朝鲜〕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第264－265页。

〔2〕〔朝鲜〕徐庆淳：《梦经堂日史》编二《五花沿笔》，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3〕〔朝鲜〕崔岦：《丁丑行录·长城二首》，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页

〔4〕〔朝鲜〕闵镇远：《燕行录》，第317页。康熙五十二年，韩祉《燕行日录》亦有相似记载。〔朝鲜〕韩祉：《燕行日录》，第474页。

堡。内而用宦嬖用事,外而闔茸充朝,致有甲申之变。痛哉!"[1]雍正十年(1732),赵最寿《燕行录》则表达得更为明确。"盖自沈阳至山海关,五里筑一墩台,台高数十丈,上可容十数人。此乃皇朝御虏之备,而一台之费,损银千两,皇朝财力盖尽于此矣。关外千里,错落相望,而终未捍铁骑之长驱。守国之道,其不系于城堡可见矣。"[2]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学亦认为明长城并非边防之根本。"非不雄矣,而竭天下之财力,作边塞之巨墉,竟何补于开门迎如之时耶?"[3]嘉庆六年(1801)李基宪《燕行日记》也表达了相似观点。"又北接巫闾,东南至海口,总为三百六十里余所,世传戚继光所筑,或称袁崇焕所筑,而当时财力盖尽耗于此,可谓虚筑防胡万里城也。"[4]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燕辕直指》亦认为:"噫!烟台未尝非备边长策,而竟致中国虚耗,流寇乘之,毕竟烟台亦归无用,虽曰天运,而亦其间岂无人谋之不臧?"[5]燕行使对于长城之批评,自然与清朝对长城之立场具有密切关系。康熙前期吴道一《丙寅燕行日录》之记载便清楚地显示出了其中关联。"关东民力殆尽于此,仍致人心怨叛,卒启倾覆之祸。古称固国不在金汤,诚确论也。清人之初入燕京也,议者欲修筑关外城池,九王以为明朝之浚民膏血,大肆力于城池,盖备我也,卒乃见夺于我;我则当休养生灵,何用更烦民力,作此无益之举乎?其议遂寝不行云。"[6]

正如上文所述,清朝入关之后,出于政治原因,将明长城东端截断于山海关。由于有清一代,朝鲜皆不断与之发生疆界纠纷,[7]有超越鸭绿江而西北拓展之意图,对于长城这一明显标志疆界之建筑,自然乐

---

[1][朝鲜]俞拓基:《燕行录》,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页。

[2][朝鲜]赵最寿:《燕行录》,第265-266页。

[3][朝鲜]李在学:《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页。

[4][朝鲜]李基宪:《燕行日记·上》,第397页。

[5][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2《烟台记》,第55页。

[6][朝鲜]吴道一:《丙寅燕行日录》,第52页。

[7]朝鲜甚至很早便有将辽东即我国东北地区视为故土之观念。如崔溥称:"辽东即旧我高句丽之都,为唐高宗所灭,割属中原。五代时,为朝鲜太氏所有。后又为辽金胡元所并。"见[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第197页。

于默认清朝之作法，亦认同东界山海关之说。如康熙七年（1668）朴世堂《使燕录》便称："长城初起处，天下此关头。"[1]徐命臣亦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山海关之"望海亭在万里长城尽处"。[2]上文所引洪大容《燕记》所载亦持相同观点。乾隆五十五年（1790），徐浩修《燕行纪》载："盛京边墙南起凤凰城，北至开原，折而西至山海关，周一千九百五十余里。"并记述了每一段落之起至及其与朝鲜边界对应之格局。[3]《燕辕直指》亦称："自吴王台西行三里至（山海）关，关即长城尽头处也。"[4]《梦经堂日史》亦载："至望海亭，一名澄海楼，即山海之南，长城东地尽头也。"[5]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员亦曾绘制明长城地图，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幅为清康熙时期即朝鲜英祖时代李颐命绘《辽蓟关防图》。尤可玩味的是，该地图绘制于明朝早已灭亡之康熙时期，系在朝鲜"事大尊明"文化思潮下，加之与清朝划界而产生政治争竞，甚至军事防备时代背景下而融汇、综合而成。康熙时期正式开展的两国边界勘定事宜则进一步加剧了朝鲜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不安全感。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相应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根本之地，故而非常重视与朝鲜之边界划定。朝鲜出于传统上的争夺、拓展西北领土，将之作为与北方民族之战略缓冲，也非常重视疆界划定之事。康熙时期，清、朝双方从而围绕鸭绿江、长白山，多次展开边界踏查与界定事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英祖命李颐命绘制边界地图，以作为边界划定、边疆经略之依据，此便为《辽蓟关防图》绘制之缘起。在进呈英祖的《进辽蓟关防图札》中，李颐命直承出于边界纠纷绘制地图之政治目的。"则我国西北边界及豆、鸭两江之外，辽海船路，不合作一图，则彼我接壤处，阙而未备。"为

〔1〕〔朝鲜〕朴世堂：《使燕录·山海关》，载《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2〕〔朝鲜〕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第265页。

〔3〕〔朝鲜〕徐浩修：《燕行纪》，载《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385页。

〔4〕〔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2《山海关记》，第70页。

〔5〕〔朝鲜〕徐庆淳：《梦经堂日史》编二《五花沿笔》，第364页。

清楚地展示这一区域，李颐命将全图分为十幅。“合图则帖小而难写，不得已作十帖联屏。”[1]在绘制地图时，李颐命不仅充分利用了朝鲜官方之资料，而且从清朝私购图籍，从而在边界标注上充分做到了知己知彼。“右《辽蓟关防图》，出于臣使燕时所购得皇朝职方郎仙克谨所著《筹胜必览》之书。臣既承移写以进之命，又取清人所编《盛京志》所载乌喇地方图，及我国前日航海贡路与西北江海边界，合成一图。”在序文中，李颐命明确指出绘制该图，系借鉴明朝沦亡清朝之教训，出于防备自古以来北胡对于华夏、朝鲜之进攻。“臣窃稽唐宋以来，胡夷之乱华者，多起东北。幽燕一方先被割据，皇朝定鼎，盖为控制边防壮固，十倍于秦城，创业雄图，按此图亦可见也。及至晚季，民心积怨于掊克，大患终成于诞邻，向之重关巨防，今已荡然残破。况我邦壤地偏小，而边界阔远，西北边人日与控弦鸣镝之士，隔水相语，沿海要冲，亦无谁何！山东之人，近乃东渔于海西。今虽苟安于目前，真所谓何恃而不恐者也！又况臣往来燕路，伏见清人不修内外城砦，惟于沈阳、宁塔增陴峙财，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运，而常若有首丘营窟之计也。且伏闻徼外诸酋种落日盛，清人岁输金缯几亿万计，又安知阿骨打、铁木真之属，不生于今日？而彼终以宁藩为归，则胜国之两困于女真、蒙古者，事势亦犹是尔，岂可谓无此虑也？”从而告诫朝鲜政权安不忘危，以避免明朝之覆辙。“今臣之进此图者，非敢曰知天下阨塞，将以有为也；亦非欲竭国力而专意边防也，惟愿圣明深察乎边界之难可守、关防之不可恃，而虑患忧难，常若强寇之压境，恭俭节约，以裕民生，使国人知有手足头目之义，追先王未究之志事，戒皇朝末年之覆辙，则国家幸甚！”[2]

正是由于这一宗旨，《辽蓟关防图》耐人寻味地勾勒出明清在辽蓟长城内外对峙之势，从而折射出朝鲜以明朝继承者自居，在明清对峙格局早已成为故事之时，却仍完整地保留明朝军事格局，并将之作为将来抵御清朝或北方民族之军事战线。在绘制方法上，《辽蓟关防图》所采

---

〔1〕〔朝鲜〕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进辽蓟关防图札》，收入《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2〕〔朝鲜〕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辽蓟关防图序》，第167－168页。

取者亦为明朝流行之形象绘法。此后200年间,与中国地图绘制一样,朝鲜地图绘制亦大体在这一脉络之中,这反映出朝鲜地图深受中国之影响,在"计里画方"地图绘制科学传统兴起与西方制图学逐渐传入之后,仍与中国本土一样,长期延续了地图绘制形象化的人文传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在近代前后内部变革与外部冲击联合作用之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却仍固执地延续着传统的内在路径,构成了近代前后东亚文明的主流特征与一般面貌。而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东亚相对封闭而独立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文明系由中国主导之的相对独立、封闭的文明特征有关。

当代韩国学者出于历史与地缘原因,重点关注了地跨中国东北与朝鲜北部的高句丽长城,主要是借助现存吉林集庆的高句丽好太王碑《广开土大王陵碑》,对长城修筑与分布展开论述。如朴真爽《论高句丽栅城遗址原貌》[1]、高句丽研究会编《高句丽山城研究》、朴翼焕《高句丽东北长城与重要山城遗迹》[2],皆结合《广开土大王陵碑》碑文,对高句丽长城、栅城、山城遗迹进行了勘查,对高句丽长城修筑、分布与及其高句丽历史之关系进行了论述。南义铉《明代辽东支配政策》[3]考察了明代辽东边墙修筑过程。

1.8 "长城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的提出与本书之主旨

1.8.1 16世纪以来长城史研究之总结

综上所述,国际长城史研究呈现了同源殊途之变迁。在长城修筑不久之后,长城便以其规模之大、作用之巨,不仅在中国开始陆续得到记述与讨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逐渐成为公共形象,演变为中国之

[1]载《中国境内高句丽遗迹研究》1985年版。

[2]载《东国史学》2001年第35、36合辑。

[3]江原大学出版部2008年版。

象征。16 世纪以后，由于明长城之大规模修筑，中国境内出现了大量关于明长城之记述，长城正面、负面形象并存。来华传教士则将明长城宏伟形象与秦始皇伟大事迹相结合，描绘出中国长城的正面、宏伟形象。但随着传教士对中国长城了解日益增多，尤其清代西方传教士利用西方近代制图学理论与方法，首次全面绘制了长城全图，不仅廓清、加深了中国人对长城之全面认识，深刻影响了此后 300 年来中国人之长城观念与地图绘制，而且进一步传播至西方社会，使中西社会首次对长城之基本面貌形成共识，中国、西方都获得了关于长城更为真实之形象，逐渐驱除了笼罩其上之“神话迷雾”，长城学术研究初步展开。中国学者之长城考索系清代考据传统之一脉，此外还利用地理之便，对长城有所考察，在此基础上，对长城之地理位置、走向分布、意义作用进行一定讨论。西方世界长城记述与讨论最初以传教士为主，18 世纪以后富有学术素养之专业学者开始加入进来。但由于资料限制，西方世界之长城史研究最初研究成果甚少。而在这一时期，东亚各国使节尤其朝鲜燕行使也通过对长城不断之记述与考察，使东亚世界广泛地获知明长城基本形象。

19 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进程逐步加深，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日趋下降，长城也成为中国封闭、停滞之象征。但随着西方汉学逐渐发展，各国学者逐渐加入到长城研究中来，对长城之史实叙述逐渐清楚而准确。中国学者则由于面临边疆危机，将研究视野投向更为边缘之“四裔之学”，对地处内边疆之长城，关注反而降低。东亚世界集体面临着西方文明之冲击，面临着痛苦之文化转折，学术传统面临巨大挑战，长城研究也鲜有成果可言。可见，19 世纪是西方长城研究进入较为严格、规范之现代学术体系时期，也是发展较快，与中国拉近距离时期。但受制于理论、史料之缺失，以及传统史学之整体环境，这一时期西方长城研究成绩仍然有限。总之，在 20 世纪以前，中国、西方世界、东方世界长城研究，受当时社会发展程度与学术整体水平影响，基本仍属传统学术脉络，对长城之关注尚限于文献记述与初步研究之阶段，研究手段仍是传统之文献考据，研究对象也基本集中于长城起源、

修筑与作用等较为基本的层次，从研究内容、视野、方法来看，都呈现了很强之相似性，也就是说，东西方世界对于长城研究之起步基本是一致的、同源的。

20世纪前后，伴随中亚考古探险潮流，长城也成为西方探险家考察内容，长城形象正面色彩借助探险家之描述，得到更多的宣传，长城周边也有可观之原始史料被陆续发掘。西方世界开始借助日益兴起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新发现之原始史料基础之上，从新视角、新史料出发，将长城史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方长城研究从此改变了简单地历史叙述方式，开始从地缘政治出发，将长城与亚洲大陆地理、经济、军事、政治等多种因素相结合，构建起完整、丰富之长城研究范式，其中的代表便是拉铁摩尔开创的长城边疆理论范式。而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上承乾嘉考据学派之长城研究，由张相文、王国维分别从历史地理、简牍史料角度，开创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长城历史研究。无论从研究理念还是所用史料上，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都体现了落后于西方，并向西方学习之特点。张相文所倡导之历史地理传统显然是在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强调实地考察而形成的。罗振玉、王国维敦煌长城汉晋简牍之研究，尤其王国维所提倡之“二重证据法”，则利用了英、法学者考察与诠释之成果，受其资料与理论启发而形成的。顾颉刚孟姜女故事之研究，是在自身经历基础之上，吸收西方史学思想，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思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民俗学之视角而形成的。梁启超对长城概念与历史之辩驳，也受到了西方史源学之影响。梁思成、林徽因之长城建筑史研究更是西方学术脉络在中国的体现。部分开风气之先的精英学者开始自觉、主动地学习、借鉴西方长城研究之新兴潮流，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学术之优长相结合，从而使民国初年长城史研究既以内容翔实著称，又有理论之光彩；20世纪30至40年代大量学者鉴于国难当头，将长城视为中国抵御外敌之象征，开始成规模地研究长城，取得了较大成绩，尤其在史地考证上不仅可与西方抗衡，乃至超过西方，但就整个研究群体而言，仍然在史料上受限于传统文献之窠臼，在方法上延续传统文献

考据之旧套，在视野上仍局限于长城本身，已与西方长城研究拉开较大差距。总之，当20世纪前期西方世界长城史研究从汉学逐渐向中国学转变，研究方式逐渐社会科学化时，中国学者长城史研究仍基本局限于类似于西方之汉学阶段，甚至在研究方法与所用文献等方面都体现了继承乾嘉考据之时代特点，中西长城研究从而呈现“分流”之势。至于东方世界，日本学者在日本夺取中国领土之时代背景下，专注于讨论中国历史上民族与边疆之关系，由西方学者发明之“征服王朝”理论在二战前后，尤其战前日本学术界甚为盛行，影响甚至决定了日本学术界的长城研究的基本观念与立场预设，从而导致日本学术界成为最为强调“长城边界论”的学术群体。

二战之后至1980年代，西方长城边疆理论范式一度兴盛，无论是从研究方法、研究成就还是从对国际长城史研究之推动作用来讲，都是当之无愧之国际长城史研究引领风潮角色。中国学界与东亚世界只能在坚持传统之余，扮演追随与模仿角色。1990年代之后，受到后现代主义挑战之长城边疆理论范式一度遭遇挫折，但在参照后现代主义问题意识与批评立场之后，经过融合与调适，逐步开始范式转型，利用人类学等学科视角，改变了以往过于强调宏观理论建构、忽视长城历史脉络之不足，开始多视角、细致地讨论长城之变化与角色之多样性。这一转型虽然使西方世界长城研究更为接近历史细节，但却导致理论整合、解释功能有所下降；加之西方世界长城研究传统以研究古代长城，即秦汉以前长城，并将之与中国国家起源、对外政策密切相连为优长，对后世长城之研究、文献之利用，长期以来却是西方世界长城研究之弱项，因此经历范式转型之后的西方长城史研究，不再具有之前国际长城史研究之领导地位，国际影响有所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长城成为中国标志形象之一。中国长城史研究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动荡后，于1970年代末期开始恢复，并在传统文化复兴、长城得到维修之时代背景下，一时受到较多关注，研究逐渐走向具体，研究规模逐渐扩大，从数量上而言已成为国际长城史研究主体力量。在国内长城史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历史地理学、考古

学长城研究尚在具体研究之外，开始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扩展长城研究内容，比如“长城界限论”、“长城过渡论”视野下的长城史研究，甚至提出相关理论概念，如“长城带”、“长城文化带”、“长城沿线”，甚至开始构建以长城为主体之学科——“长城学”，与西方世界长城研究之差距，已有所缩小。随着长城在全球范围内“新七大奇迹”中位列首位的评选，国家开展了“大遗址保护”与“长城保护工程”，对长城展开整体测量与绘制工作，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内长城史研究将迎来一个高潮时期。但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长城史研究仍存在相当严重之问题，且不论受到时代浮躁风气之影响，大量长城研究只是低水平简单重复，严谨的学术研究凤毛麟角，即使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到学术断层与学术整体水平影响，中国学者长城研究缺乏传统之积淀与不同学科方法之借鉴，虽然部分长城理论概念开始提出，但基本皆关注于扩展长城研究内容，而不及于研究方法之层面，尚处于不同学科各自为战之状况，跨学科之综合研究至今未能实现。“长城学”之提出虽然意义重大，但当前长城研究水平并不足以支撑以长城为本位之研究，尚须借助其他学科之理论、方法与资料。在这一时期，东亚世界的中国长城、边疆研究由于逐渐摆脱二战前后之时代风气，对中国问题之关注逐渐转移至近代外交关系，因此关于长城之研究逐渐冷淡下来。

1.8.2 “长城社会史”研究模式的内涵

那么，值此长城地位空前提升、长城关注大量增加、长城保护全面开展之时，国际长城史研究、中国长城史研究该走向何处，是当前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西方长城史研究走向理论弱化、史料贫乏之困境；中国长城史研究则一直未能提出可供操作之长城研究方法，大量史料受限于研究视野之局限，而很少或根本未受关注与利用；东亚世界长城研究已由于学术风气之转移，不再是重要命题。可见，当前长城研究与其现实地位、保护需求存在巨大差距。未来长城史研究该如何开展呢？历史研究之进步，不外乎两个层面：理论与史料。虽遭后现代主义之冲击，西方世界对理论构建已有“闻之色变”之忧虑，但在坚持历史学本位基础上，合理地将不同学科的专业视角、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

中相应之问题上，其实是一种专业化需要，而非哗众取宠、装点门面之装饰。尤其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正汲取西方现代学术营养的中国学术而言，构建反映、服务中国现代化的本土学术体系，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

长城边疆理论之所以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根源于这一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化潮流初兴之时，以宏大理论构建，而非以具体历史研究为旨归，在诸多历史细节考索、史料利用上，存在着错位、模糊甚至扭曲之状况，虽然框架宏大，但细节不足，诸多结论并未得到史料之坚实支撑，具有以论代史、简单化的弊病，这也是宏大叙事之普遍缺陷。二战之后，长城边疆理论虽应受到更为强调历史多样性之"区域史"研究脉络之冲击，但西方学者由于受到语言文字、实地考察等客观条件之限制，在开展区域史研究中存在诸多不利因素，西方世界几于固定的长城是中国历史与文化象征之观念尤使西方学者难于轻易克服长城是一个整体、均质象征物之印象，因此往往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材料较少之古代长城（先秦、秦汉长城），将之作为所有时期长城之代表，将其与中国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相结合，宏观论述。因此直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兴起，长城边疆理论范式才开始借鉴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对长城展开具体考察。但仍然受到传统影响，重视研究长城与中国文明起源之关系，以及其他若干具体问题，而并未真正以长城为核心，考察长城与周边社会之整体历史关系。

可见，尽管西方世界借助其学术整体之平台，在20世纪国际长城史研究中扮演引领角色，但长期来看，中国学者在语言、地理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研究本国史微妙之历史文化体悟，以及国家、社会在关注、保护长城所提供的巨大动力，都将使未来长城史研究中心在中国。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当前最为重要的便是借鉴西方各种可资利用之理论与方法，最大限度地采用传世文献、考古成果，并实行田野调查，对长城分时代、分地区研究，深入考察长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之不同历史脉络，充分揭示长城之本来历史面貌，在对长城具体历史进行详尽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解释体系。作为这一目标

的有效途径，区域社会史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

区域社会史反对将历史进行整体、均质之考察，能避免社会科学化史学过分注重理论建构，忽视历史脉络多样性之弊端。区域社会史强调以某一可以自成独立区域之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整体史的视角下，从总体上把握这一区域历史发展之全面图景，弥补人类学视野下长城史研究相对强调社会经济生活，疏于关注国家层面的内在不足，并为引入多种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理论方法提供了空间。如果将区域社会史观念引入长城史研究领域，可以以某一部分墙体辐射之社会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在整体史视野下，考察长城历史与这一区域社会地理、经济、社会、军事、政治、文化等多层面关系，从而将以往长城史研究注重墙体之研究，扩展至壕沟、镇城、营堡、城寨、墩台等所有长城防御设施之整体研究；将以往长城史研究偏重于长城物质文化内涵之研究，引申至包括物质内涵、非物质文化内涵在内，即包括各种设施、宗教场所、民俗传说等的一体考察；最大限度地利用传世文献，包括政书、文集、方志、舆图、家谱、碑刻以及口述传统等，在历史学本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构建起长城全息图景的中层理论。本书姑且将之称为“长城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长城社会史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从研究内容而言，长城研究不再局限于长城本身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之关系，还包括长城周边社会之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长城社会史强调“整体史”研究观念，利用社会史的观念方法审视、研究一切与长城有关之问题。长城社会史既解决了目前西方长城史研究中资料匮乏之困境，也解决了中国长城史研究理论匮乏之困境，将所有可以利用之其他学科理论方法，运用于长城史料之分析、解释与研究中去，从而依托中国历史研究脉络，结合西方学科观念与方法，构建中国本土的长城史理论体系。相信这一可供实际操作之中层理论可以促进西方理论与中国史料之结合，推进未来长城史研究之开展。

1.8.3 本书关注之问题主旨、研究综述与所采用的方法

学界对明长城之研究，除从宏观上论述有明一代长城历史之外，地区性长城研究便多集中于榆林地区，这与学界普遍地将榆林长城视为明长城开端的认识有关。[1] 吴缉华《明代延绥镇的地域及其军事地位——兼论军饷的消耗与长城的修筑》一文，指出洪武时期明朝在绥德设立延绥镇。"土木之变"后，东胜失守，蒙古进入河套，兵部尚书白圭主张"搜套"，既无成效，且粮草供应浩繁。有鉴于此，余子俊修筑边墙，移镇榆林，虽暂时取得了成效，但蒙古时常溃墙而入，"套寇"从而与明朝相始终。[2] 艾冲《余子俊督修边墙的几个问题》、《明代陕西四镇长城》较早讨论了明代榆林长城修筑经过，指出榆林"大边"、"二边"长城皆由余子俊于成化年间修筑。[3] 胡凡《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研究》系统考察了蒙古进入河套经过与影响，指出明朝为应对蒙古威胁，采取了三种措施：搜套、修边与捣巢。[4]《明代中叶在河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考察》则梳理了成化以至嘉靖时期明朝在榆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过程。[5] 袁占钊《陕北长城沿线明代古城堡考》考察了榆林城

---

〔1〕"城墙建于最后一条丘岭之顶，然后群山随着它们伸入其北面的沙漠而逐渐平坦。城墙改变了防御战的性质，从此导致更广泛的筑城建设。其最后结果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长城，它大部分建于16世纪。"〔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7页，《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也持这一观点，参见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p. 108；其他研究者也多持相同观点。"在明代，大修长城之举始于本朝中期。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修成榆林边墙'一千七百七十里'。"参见肖立军：《九边重镇与明之国运——兼析明末大起义首发于陕的原因》，载《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从明朝方面来说，自从'套寇'之患出现以后，明朝内部屡次就复套、搜套、筑墙防守等对策发生争论和分歧。宪宗朝，李贤、白圭力主复套、搜套，但二人均过早去世，明朝曾三遣大将，调兵八万，终于没有任何结果。而王复、叶盛、余子俊深感时无良将，遂倡筑墙防守之说，此议为宪宗采纳，于是开始了明代大规模地修筑边墙活动，一直迄于明末。"参见胡凡：《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197页；杜祐宁：《从屯堡到边墙——明代北边防务研究》，成功大学（台北）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2〕吴缉华：《明代延绥镇的地域及其军事地位——兼论军饷的消耗与长城的修筑》，载氏著《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第291－308页。

〔3〕艾冲：《余子俊督修边墙的几个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6页。

〔4〕胡凡：《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研究》，第101－142页。

〔5〕胡凡：《明代中叶在河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考察》，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堡的建筑时间、基本布局与历史沿革。[1] 张玉坤、李哲《龙翔凤翥——榆林地区明代长城军事堡寨研究》探讨了榆林堡寨的选址、布局，以及堡寨之间，堡寨、长城之间的关系。[2] 宋耀祥《明代延绥镇的防务与长城的修筑》指出围绕榆林长城之修筑，明朝北边防御经历了弹性防御至前沿防御的转变。“堡与墙的区别，在于诸堡所形成的防御体系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堡与堡之间并没有墙加以阻隔，实行弹性防御形式。边墙却通过构筑一条坚固的防御工事，从而将敌拒之门外，是一种前沿防御形式。所以，堡与墙是不同的。所以，认为正统以来，明军修筑营堡，就是修筑边墙开始的观点，恐怕是站不住脚的。[3] 日本学者松本隆晴《试论余子俊修筑的万里长城》考察了榆林明长城修筑原因、过程与作用，指出余子俊为减少边防经费而修长城，长城修筑、营堡挪移之后，榆林边患减少，边墙具有相当的军事效果。[4] 对榆林明长城展开专题、深入论述者是林霖《长城：从历史到神话》，该书用 1/3 的篇幅，论述了明代边防政策转变，尤其关注围绕榆林明长城之修筑形成的宫廷争论，以之作为长城并非文化政策之产物，而是政治斗争之产物的结论。他指出：明朝开国初朱元璋实行了具有元代风格之草原政策，构建起内外两层军事体系，外层建立军事据点，并设置烽火台，以控制、进攻草原，内层实行地区性防御，仍保持一定进攻性。朱棣在进攻草原之同时，又维护草原与内地之交通，并在内地构建由城墙、壕沟、瞭望台与烽火台组成，配备贮存大量水井、食物之辅助性堡垒的完整防御体系。后来明朝军事实力逐渐衰落，但却局限于礼仪，将与蒙古之经济交流完全限定在朝贡体制之中，从而导致与草原关系的紧张。当蒙古人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成为中国政权争论之焦点。由

---

〔1〕袁占钊：《陕北长城沿线明代古城堡考》，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2〕张玉坤、李哲：《龙翔凤翥——榆林地区明代长城军事堡寨研究》，载《华中建筑》2005 年第 1 期。

〔3〕宋耀祥：《明代延绥镇的防务与长城的修筑》，载吕静主编《榆林长城研究》，三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8 页。

〔4〕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的万里长城》，载《大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 年第 1 期。

于皇帝无法做出决断，政府部门效率低下，只能将军事进攻、修筑城墙两种方案交由官僚集团“廷议”裁决，在理性、道德、权力各种因素充斥的政治辩论后，修筑城墙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获得了官僚集团的认可。后来由于明朝一直无法采用任何一种军事战略，最终在蒙古人的威胁面前，敷衍塞责的官员最终转向大面积修筑长城。但最终解决问题的仍是如同元朝那样，采取经济、外交方式，与蒙古地区形成密切之关系。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之无效，根源于中国始终无法将注重实效的设想与对世界理想化的想法结合起来，将道德问题投入到政治争端中去。[1]

从以上研究可见，中日学者榆林明长城研究偏重于修筑原因、过程与作用之史实层面的考察，但欠缺对长城修筑与整个明代历史大背景关联之研究。林霭弥补了这一不足，对榆林明长城修筑背后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分析。但由于他对中国历史上长城的封闭、消极的负面定位，因此并未考察榆林明长城修筑背后的合理性与正面作用，过于强调明朝政治斗争、外交失措在长城修筑中的作用，内容论述又欠缺具体，乃至失实。总之，以往中外学界关于榆林明长城之研究，虽已在史实、背景等层面进行了一定程度讨论，但诸多史实之梳理尚属于较浅层次，大量问题尚未得到关注，研究视角与方法尚有较多欠缺，榆林明长城历史之整体框架与历史脉络尚未得以整体勾勒。本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取“长城社会史”研究模式，以明中期榆林长城修筑为例，讨论社会与学界普遍关注，但一直未有答案之“为什么修长城”、“长城到底有什么用”、“长城有什么弊端与负面作用”这 3 个关涉长城研究根本的基础性问题。而在研究视野上，则将导致榆林明长城修筑的地理空间与历史事件皆包括在内，相应研究地域但不限于榆林地区，而是涉及河套，并远及“阴山边疆”。简言之，便是将榆林长城的修筑作为明前期阴山边疆基本失去后之军事结果。

明朝为什么在榆林修筑长城？明朝由于处于东北边疆时代，鉴于独特建国历程与应对北元之必要，从而在北疆战略布局中，采取“重东

[1]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pp. 91 – 121.

轻西”之政策，西北经营让位于东北经营。长远来看，这一战略格局既反映了中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之趋势，也对应了中唐以来中国种族、军事斗争向东北转移之脉络。无论如何，汉唐重点经营之西北地区在明前期北疆防御中，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弱化”态势。秦汉、隋唐时期作为京师外围防线优先考虑之河套地区，在明前期竟然处于废弃边缘，乃至“空置无人”之窘境。伴随明朝逐渐撤离阴山边疆，明朝北疆这一巨大缺口从而展现在蒙古兵锋之下。正统以后，河套逐渐为在蒙古草原内争中失势之部落潜遁南下提供了出路。此后，多个蒙古部落源源不断地穿越阴山南疆，由东至西迁移，目的地便是河套。沿及成化，鞑靼部落进一步以河套为基地，不断进攻明朝，河套遂成蒙古突破明朝北疆防线之缺口。为弥补这一巨大缺口，明朝先后构建营堡纵深防御体系、发动河套攻势防御，但前者由于陕北河谷纵横，便于蒙古骑兵之驰骋，明军无法有效阻止蒙军，造成西北经济、民众时受威胁；后者由于明军野战能力降低，多次劳师动众、无功而返，反而造成西北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最终，明朝在综合考虑之后，选择在榆林修筑长城。可见，长城并非明朝在榆林地区防御之首选方案，甚至是无奈之举。

那么，长城到底有何优长之处，使其成为明朝抵御河套蒙古之主流方案呢？长城虽然在进攻时无明显作用，但在防御上，其漫长的边墙却能起到“御敌于国门之外”，阻隔长城内外潜通、保护军民经济开展、减少鞑靼进攻的多重作用；其内部利用山脉、河谷等地形构建之镇城、营堡、城寨、墩台所组成之营堡纵深防御体系，又充分发挥了坚壁清野之财富保障功能与野外作战之军事防御功能。相对于其他军事方案，长城防御方案不仅短时期内有效减少了河套蒙古对西北边疆之威胁，缓解了西北地区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而且有利于构建长期、稳定、有效地抵御河套蒙古威胁之延绥镇防御体系。正是由于这一作用，在明中后期明军野战能力逐渐下降之军事背景下，长城防御便成为明代九边军镇主流防御方案，长城从而陆续得以修筑，改变了北部社会与明朝政权的整体进程。

榆林长城在完成最初使命后，长远来看，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在其功用之外，又有何弊端与负面影响呢？明代长城修筑，并不是始于榆林长城，那么，为何榆林长城成为后世北疆防御、长城修筑议论核心问题之一呢？虽然明朝自洪武时期开始，便有长城各种设施之修筑，正统时期更在辽东大规模修筑长城，但由于终明一代，兀良哈只是充作蒙古南下之侧翼，因此辽东长城之筑，并未在朝廷引起太大争议。与之不同，成化时期，由于进入河套的鞑靼突破了整个西北边疆防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明蒙战略态势，从而给明朝朝野形成了巨大的震动。围绕如何解决河套问题，明朝很多部门都加入了多种边防方案的争执与辩论，最终确定了榆林明长城方案，并为九边其他地区不断模仿，成为明中后期长城防御体系的模板。但河套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明朝相对于蒙古之战略劣势亦愈来愈重，相应后世关于榆林长城乃至整个九边长城是否有用，榆林长城在明中后期边防格局演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存在着巨大的争论，榆林长城相应成为后世长城修筑议论最多之焦点话题。因此可以说，虽然榆林长城并非最初修筑之明长城，但却成为明中后期长城修筑与观念之模仿与争论源头。

单纯从东亚秩序而言，明代九边长城防御体系起到了保障中国文化之军事作用，但从当时整个世界秩序而言，在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端地中海催动的“大航海时代”正式开启之时，在阿拉伯文明向中亚、东南亚“伊斯兰教东扩”如火如荼之时，明朝所采取的这种边疆策略不仅标志着中国放弃了主动经略亚洲内陆、恢复中古以前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而且由于长城防御体系所带来的巨大吸附与内耗，也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对东南海洋空间开拓的兴趣与注意力。可见，这一时期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在历史指向上分呈陆疆内向收缩取向与海疆外向开拓取向之截然分途，在海洋贸易支持下迅速崛起之欧洲文明也便呈现迅速赶超中国文明这一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导致欧亚大陆文明体系由东西平衡转向“西风压倒东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以压倒性优势控制整个世界秩序，较为单向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也由此正式开启。参照“大航海时代”、“伊斯兰教东扩”概念，可将明中后期这一在政治、经

济、军事等领域皆深受长城影响与驱动之历史时期，或者说长城成为具有决定意义关键历史事件的这一时期，称作“明长城时代”。无论如何，榆林明长城的修筑从而开创了明中后期的“明长城时代”。

总之，修筑长城并非明朝北疆防御之首选方案，其最终成为明朝北疆主流防御方案，源于明朝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因素。因此，对长城之研究，应置于明朝具体历史背景中，从明朝内在逻辑出发，考察其合理性与弊端。以往社会与学界对长城之评价，往往陷入脱离具体历史背景，泛泛而论之套路，这一做法不仅无助于说明长城历史真相，而且往往陷入汉族王朝、北族政权孰优孰劣之道德、文化窠臼，偏离了历史研究本质。本书便从榆林明长城个案出发，考察榆林明长城历史的内在逻辑。

由于榆林明长城历史牵涉诸多历史问题，以往对长城史地考证或者专题研究之做法，已无法勾勒其整体面相，本书从“整体史”观念出发，在“长城社会史”视野下，利用多学科视角与方法，充分关注与榆林明长城修筑有关之一切因素。在研究范围上，选择以榆林长城及其辐射的河套、陕北，甚至具有关联之阴山边疆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打破以往榆林明长城研究局限于长城墙体之不足，将长城建筑研究对象由墙体扩展至镇城、营堡、城寨、墩台；从“大社会”观念出发，审视围绕榆林明长城修筑、防御之生态、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一切现象；以揭示长城与周边社会、明朝政权互动关系，从而构建围绕榆林明长城所形成的整体历史图景，即榆林明长城在明代历史中的整体角色。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尝试打破学科藩篱，借鉴一切有助于解决问题之视角与方法，以增强研究的专业性与分析力度。在对明前期西北边疆地位进行分析时，引入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理论视角。“地缘政治学”源自古希腊语，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在所著《论国家》（1917）一书中提出，他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地缘政治学关心的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是二者的统一与结合，故又被称作“地理政治学”。不过学术界一般将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

(Friedrich Ratzel,1844—1904)视为地缘政治学的开创者。拉采尔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认为国家如同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因此领土扩张是体现于保持国家生命力的因素之一,国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空间(Raum)与位置(Lage)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契伦继承了这一思想,强调地理区域、自然资源、生态状况、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空间因素在国家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也就是说,国家并非是受地理环境所影响,而是本身便是由地理因素构成的一种空间现象。地缘政治学最初强调地理环境论,历史的本质是由空间环境所决定,虽然民族、文化在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却皆根源于地理环境。后来,民族、文化等主观因素却在地缘政治学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理环境逐渐被加入民族、文化创造的内涵。地缘政治学将空间分为中心与边缘,这在麦金德提出"陆心说"之后,更为流行起来。"心脏地带"(Heartland)与"边缘地带"(Rimland)在20世纪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国际战略与学术研究的核心概念。[1] 本书借鉴"心脏地带"、"边缘地带"概念,并不局限于地缘政治学关于心脏地带、边缘地带之界定,只是利用其研究视角,指出中国古代存在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一直争夺拉锯的"核心边疆",这一地带充当了南北双方之间的"过渡阶梯"作用,影响了中国整体历史进程。伴随北部边疆地缘政治重心的转移,中国古代呈现了上古、中古"西北边疆时代"向近世"东北边疆时代"转变之历史趋势,明朝是东北边疆时代之典型体现,东北边疆是明前期边疆经略之"首要地带",西北边疆则由于明朝、北元、西域三方鼎足而立、各自为战之缘故,而成为经营次序在后、经营力度不足之"差缓地带"。

本书在对明朝北疆边防策略进行分析时,借鉴了西方军事学中"纵深防御"(defense-in-depth)、"攻势防御"(offensive defense)与"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概念,指出洪武时期明朝在前代长城区域分区驻扎,利用多种战术形式,其中包括太行山、长白山关隘防御体系,从

[1]参见[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而在瀚海以南，形成了具有广阔纵深、相机攻守的纵深防御体系。永乐时期，面对再次崛起之蒙古势力，明成祖朱棣在武将能力下降，阵地防御多有失守的情况下，采取了亲自统率、主动出击，消灭蒙古主力的方式，以为明朝北疆防御扫清障碍。这一军事方案属于攻势防御，即以进攻的方式达到防御的目的。洪武时期，明朝已在前代内长城区域小规模修筑部分地段墙垣。永乐时期，在进攻的同时，朱棣进一步在宣府、大同修筑墙垣，与关隘、营堡、墩台、壕沟相结合，构建了“关外”长城防御体系，以保障近边。洪熙、宣德年间，关外长城防御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实现了与火器的大规模结合。在进攻的同时，朱棣将外长城区域军事据点逐步内徙至内长城区域，即“二边”或“腹里”，以加强京师与内地防御，可见朱棣之政策属于攻防结合。由于内长城防御体系属于分散防御，因此明朝开始在二边地带如大同、宣府，大规模修筑营堡，既加强防御，同时在蒙古来袭时坚壁清野，以保障军民财产与生命。营堡防御强调利用地理空间，对蒙军实行分割、包围，并加以歼灭的战略，属于纵深防御。同时，营堡防御强调在防御之同时，积极出击、迎战，又称“弹性防御”、“积极防御”。营堡防御在明前期北疆防御体系中，由于工程较小、兼具攻守，与明初倡导之主动进攻理念有所契合，从而成为主流防御体系。

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肇始于正统年间辽东提督王翱、都指挥佥事毕恭修筑辽东河西长城。河西长城充分利用地形，将营堡、壕沟与墙体充分整合，起到了防御兀良哈、鞑靼之作用。榆林明长城修筑之后，边墙、镇城、营堡、城寨、墩台充分结合，既吸纳了“前沿防御”优长，得边墙阻隔之功，同时挪移城堡，扼守要冲，并且在兵力分布上，一直存在沿墙“摆边”与聚守营堡之争执，榆林守军在整个明中后期，一直保持纵深防御特点。总体来看，榆林明长城防御体系综合了纵深防御与前沿防御，仍属纵深防御，并未丧失境内主动作战之灵活性。

在对明朝撤离阴山边疆过程与榆林防御建设的讨论中，本书借鉴了“大战略”（grand strategic）与“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理论。“大战略”理论最早由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1895—1970）提

出。利德尔·哈特继承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学家克劳德维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的观点，指出“战略”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而“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因此，为贯彻大战略，不仅包括对武装力量的利用，还包括对经济、政治、心理等手段的总体应用，后者更是值得优先考虑的工具。大战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寻求决战，而是要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破坏其稳定性，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从而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使敌人屈服，这便是大战略的核心内容——“间接路线战略”。大战略关心的不仅是战争本身，还包括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军事胜利本身并不等于政治目的的实现。因此，当战争一方并不抱侵略对方之目的时，可以采取最为经济的办法，以达到有限目的战略，保证当前与将来皆可抵御外来的侵略，只要安全威胁解除了，战争目的便达到了，不顾一切地追逐胜利是最为危险的。但这一观念容易反过来导致长期阵地防御思想的产生，从而导致国家全部力量消耗殆尽。事实上节约兵力与求取胜利的最好方法，是在高度机动性前提下的攻守兼备。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的《战争指导》继承了“大战略”理论，指出：“大战略的真正目标应该是一种有利的和平，而并不要求将对方完全歼灭。反之，它却希望能消灭或减轻战争的成因。”[1]

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所强调的“客观”、“科学化”与“结构性”等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以往大战略理论注重国家追求权力与实力的理性主义立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接受新思潮之新现实主义开始兴起，认为人类的行为存在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反复互动而模塑成规范，并不完全按照利益和势力平衡行事，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决策者对待同样之形势，很可能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由于世界上存在多种不同文化脉络，因此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也并不相同，呈现多元

[1]〔英〕富勒著，李磊、尚玉卿译：《战争指导》，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页。

化之特征。[1] 这便促使更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大战略选择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原则与实践》一书中,在大战略框架下明确延展了"道义"的内涵,指出大战略还包括意识形态、生活模式、道义等层面。[2] 美国军事史专家杰克·史奈特则提出"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概念,用于揭示战略决策中集团或者个人所受历史传统、文化体系与价值倾向之影响,即虽然当前看来属于决策过程的非理性主义层面,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却是自然而然的内在逻辑结果。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以观念、文化、身份认定为出发点的建构主义学派,指出战略文化是指在有关威胁和使用武力问题上,国家行为体所特有的长期起作用的一套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习惯,它们主要根植于各个国家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体制。影响最大的战略文化概念是美国学者肯·布斯所称"战略文化指在有关威胁或使用武力问题上,国家的传统、价值、态度、行为模式、习惯、象征、成就,以及适应环境、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3] 为避免战略文化研究出现不着边际的泛论,1990年代以来战略文化研究者努力使战略文化拥有具体内容,从而界定战略文化是一种行为典范(paradigm),为大战略设定优先次序。虽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文化视角,容易形成文化性,而非历史性判断,但在充分考察历史客观性之后,对其背后的时代价值、文化倾向加以审视,有助于揭示虽然无形,但更为深层、更为久远的历史逻辑。

与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家所持观点相似的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始终将战争作为关系政权存亡之大事,与国内政治一同考虑。《左传》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反映出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已十分强调"慎战"思想。作为中国最负盛名之兵书,《孙子兵法》开篇即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明朝在撤离阴山边疆与榆林

---

[1]曾瑞龙:《战略文化与中国战争史研究的前景》,香港中文大学"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

[2][美]约翰·柯林斯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大战略:原则与实践》,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

[3]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军事方案的讨论中，亦充分考虑到国内政治多种因素，体现了与“大战略”观念相契合之决策理念。明前期之所以陆续放弃东胜、兴和、开平，与巩固“靖难”政权、保持财政平衡等内政因素直接相关。明朝在榆林地区最早实行的两种方案：榆林营堡纵深防御与“搜套”攻势防御最终让位于榆林长城立体防御，亦源于明朝保持西北社会安定与河套边防威胁之间的平衡，避免边防问题影响西北内政。长城方案得以通过并普遍开展，根源于长城方案改良了营堡防御遏制蒙军机动性之不足，是当时最能协调、兼顾西北边疆防御与社会稳定的方案，是各种不完善策略中相对最为符合明朝国家最高利益者。以上边防决策皆明确反映出明朝在处理重大边防问题时，皆将之与内政因素一同考虑，从而在整体上保持军事服从、服务于政治之基本立场与原则，以确保整个政权的最大利益，体现了明代边防策略中的理性主义取向。

但另一方面，榆林防御方案之推出与选择，又是明朝不同部门之间政治斗争、权力博弈的结果，体现了明代边防决策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影响。营堡防御基本是明朝开国以来军事传统与北疆地理条件结合之结果，体现了军队系统充分利用地形、灵活作战之战略思想。“搜套”方案是职司国家兵政，以获取重大军事成果作为部门功绩的兵部所强力主张之方案，充分体现了兵部在明代国家政治中职责与利益。而长城方案则充分体现了户部、地方官员利益。户部职司国家财政，“搜套”长期无果之结局，首当其冲者便是面临财政压力之户部。西北巡抚虽肩负边疆安全之责，但同时负有安抚地方之任，故而面对营堡防御与“搜套”方案所带来的西北社会动荡时，首先考虑者便是如何在边疆防御与社会安定中间寻找一个两全方案。因此，户部、西北巡抚是反对“搜套”方案的主体力量，也是主张改良营堡防御，推广长城方案的政治群体。可见，榆林军事方案之推出与选择，与明朝国家利益、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是理性主义与现实政治互动、博弈之结果。

在明代边防决策的整个过程之中，政治文化作为长期沉淀、普遍影响之“集体无意识”，一直影响、支配着明朝各种边防方案出台、竞争与最后结果的整个过程，并在无形中决定了各种边防方案的次序安排与

最后命运。相对于政治行为、制度、观念,政治文化在政治系统中处于更为长久、深层与稳定的政治层面,相应更为准确地代表了基本的政治立场与原则,故而是政治决策中最后的依据与价值参考。或者说,政治文化在政治决策中扮演了最后的推动者角色。从榆林军事方案之推出与选择历程来看,明朝在"搜套"方案冲击了西北社会秩序之时,果断将其中止,替代以长城方案,这一选择背后的逻辑是国内秩序之安定优先于边疆安全之威胁。这一选择表面看来立竿见影,维护了西北社会之安定,但长远来看,长城防御与主动出击孰优孰劣,还有进一步思考之余地。无论如何,明中后期北疆防御策略都大体呈现了相似之逻辑,最终导致明末财政压力与社会动乱。那么,这一逻辑的立场与观念是什么呢?揆之中国古代,《尚书》作为中国最早之史籍,便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语》亦持"先王耀德不观兵"之立场。[1] 孟子亦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2]西汉《淮南子》称:"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3]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招徕突厥,"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乂安,未之有也。'"[4]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亦云:"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止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5]欧阳修亦称:"臣又闻天下之大犹人身,外域者股肱也,中国者

---

[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一·穆王将征犬戎》,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4《公孙丑章句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页。

[3]何宁:《淮南子·兵略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43页、1059页。

[4][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三十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3页。

[5][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5页。

腹心也”，并以秦修长城，却亡于内乱为喻，指出“臣是以知腹心之疾，尤甚于股肱也”。[1] 徽宗政和八年（1117），安抚使安尧臣奏称：“昔人谓国虽大，好战必亡。故圣人务德，不务广土。”[2]“攘外必先安内”、“内政优先边防”一直是中国处理政事之基本原则，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一种久远的政治、军事思想。如果从西方军事学观点来看，便是一种“内政优先边防”的战略文化。明代“内政优先边防”政治文化亦普遍流行。比如弘治时期陕西巡抚张敷华奏：“自古夷狄之患，由中国虚竭之故者此也。然强本治内者，御戎之上策；养民蓄众者，待敌之良图。孟子论胜强之道，惟在行仁政。”[3]

---

〔1〕〔宋〕欧阳修撰，〔明〕欧阳铖辑：《欧阳修撰集》卷1《奏议一·上皇帝万言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343页。

〔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政宣上帙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11页。

〔3〕〔明〕张敷华：《张简肃公奏议》，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影印明乌格钞本，线装书局2010年版，第362页。

2 明前期“东北边疆时代”特征与河套“弱点”地位

2.1 绪论

河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三面环河，南临榆林长城。先秦至元代，这一地区一直被称作“河南地”，即黄河以南之地。“河套”之名产生于明中期以后，源于榆林军队在捐弃河套之后，将榆林以北、黄河以南之地整体审视的立场与角度。相应地，从“河南地”到“河套”的地名变迁，便反映了明朝与前代中原王朝西北边疆格局上的明显差异。秦汉、隋唐中原王朝强盛之时，河套不仅作为屏障关中的防御体系得以重点建构，而且河套两侧缺口也成为汉民族进攻北方草原的出口。但在明中期国力仍较强盛之时，河套却反而成为蒙古突破明朝防线的巨大缺口，明朝也因放弃这一重要地区，导致明中后期西北边疆军事形势之连串变化。那么，明前期河套历史地位之衰落，反映了与前代中原王朝相比，明前期北部边疆格局地缘政治呈现了何种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地理空间与历史背景何种互动关系，都是关涉明代历史走向、历史与地理关系的重要问题。本书在对河套得名缘由及其在明前期北部边疆战略地位加以考察的基础上，尝试对以上问题加以解释，并揭示明朝中期失去河套的内在地缘因素。

2.2 “河套”释义及其在中国古代“核心边疆”的整体性“过渡阶梯”地位

河套古称“河南地”，秦蒙恬驱逐匈奴、移民屯垦，名为“新秦中”。此后两千年来成为汉族王朝、北族政权反复争夺、拉锯之地，其经济方式、行政建置屡有变化，内部地名屡有改易，但“河南地”之名作为泛称，一直延续至元代。明朝占领河套后，不仅未设置行政机构，并且驱逐套人、空置其地，使该地在明前期很少见诸记载，亦无“河套”之名。正统时期，河套地区尚被称为“黄河滩”。“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黄真等奏：‘臣等奉敕追剿黄河滩等处潜住达贼，缘黄河滩西抵宁夏，东包延安，延袤千余里，未可轻动。宜候十月初，会合延绥官军，刻期出境，庶能成功。’从之。”[1]清代地理学家梁份在《秦边纪略》中指出：“河套本中国地，古未有河套之名也。自明筑河套榆林之长城，弃其地于外，而河套以名。”[2]他是以黄河、长城圈围之套形作为“河套”得名原因。这一观念成为清前中期普遍流行之说法。但清末河套概念又呈现忽略长城倾向。咸丰时期，何丙勋在为杨江《河套图考》著序时，仅以黄河“几”字形作为河套得名来源。“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3]这一变化是时人鉴于清末陕蒙边界纠纷，模糊处理之结果。明清易代之后，榆林长城已非战区，陕北民众多跨越长城，越界耕种，形成所谓“伙盘地”。伙盘地沿榆林长城外侧渐次推广，从而造成陕蒙划界纠纷。伊克昭盟主张将长城以外皆划归蒙地，陕西省对此强烈反对。这一争执至清末已颇为严峻。当时供职于陕北之何丙勋对此敏感问题颇为知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13“正统九年二月庚戌”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校勘本，第2285－2286页。

〔2〕〔清〕梁份：《秦边纪略》卷6《河套》，广文书局（台北）1974年版，第453页。

〔3〕〔清〕杨江：《河套图考·序》（何丙勋），收入《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9年版，第425页。

悉，故在界定河套时，隐去长城，以免生嫌隙。民国后期，陕蒙划界既已确定，对历史上河套疆界之讨论无复忌讳，时人对河套之界定，遂再次以长城为界。如伊志称："古无河套之名。自明筑长城，东起黄甫川，西抵宁夏花马池，弃长城以北三面环河之地于外，遂以河套名之。"[1] 张维华亦称："至于其地范围，古时亦无定准，及至明之中叶，于陕北之地，起筑长城，东起黄甫川，西至宁夏，以遏套虏，于是河套与内地之界限，划分始清。"[2]

但河套之名在明筑榆林长城之前便已存在。郝志成、白音查干指出"河套"之名始见于景泰五年（1454）。[3] 检核明代文献，正统时期便已出现"河套"。"备御榆林庄陕西都指挥王永等奏：'累年黄河冻消，将西安等卫发来，备冬官军放回。今闻达贼在河套，逼近府谷等处，恐探知无备，窃来犯边，乞暂留守哨。'从之。"[4] 榆林长城修筑于成化时期，可见河套得名并非源于榆林长城之修筑。但另一方面，河套之得名应确与明朝放弃河套有关。就语言习惯而言，"河南地"之称是以河套最北端的东西流向的黄河段为标志，反映出由先秦至元代的政权在审视这一区域时，是以黄河北段为基准，将河套视作内部的地理准则。但"河套"之称则是以黄河包围河套的整体格局而言，是站在河套以南时才能得出的一种因形状而名的"象形"称谓，这典型地反映了处于河套以南榆林军队的视野与立场。明前期在榆林仅驻扎少量军队，因此河套之屏障，在客观上由隶属山西行都司的东胜诸卫负责。朱棣内徙东胜诸卫后，河套由宁夏、大同、山西以黄河为界，以少量军队内外协防。但宣德末年鞑靼大规模进入阴山以南，在大同以西、甘肃以东频繁进攻时，明朝是否仍令三地常规化巡防河套，实在是未知之数。但无论如何，明前期榆林军队基本仅负责本地，即河套东缘、南缘之防御，而视河套为境外。这一防御格局在正统时期官方化、制度化，其标志便是正

〔1〕伊志：《明代"弃套"始末》，载《禹贡》（半月刊）1935 年第 2 卷第 7 期。

〔2〕张维华：《古代河套与中国之关系》，载《禹贡》（半月刊）1936 年第 6 卷第 5 期。

〔3〕郝志成、白音查干：《论河套地域及其概念的演变》，载《河套文化》2006 年第 11 期。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 28"正统二年三月癸巳"条，第 555 页。

统初年种田界石的奠立。“延绥沿边地方自正统初创筑榆林城等营堡二十有三，于其北二三十里之外筑瞭望墩台，南二三十里之内植军民种田界石。凡虏入寇，必至界石内方有居人，乃肆抢掠。后以守土职官私役官军、招引逃民，于界石外垦田营利，因而召寇。”[1]

关于河套范围，《明宪宗实录》最早记载了东西始至。“河套在陕西黄河之南，自宁夏至山西偏头关凡二千里。”[2]嘉靖年间魏焕辑《皇明九边考》记述了河套南北距离。“河套东西长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长一千余里，左右减半。榆林外套皆汉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3]明末成书之兵书《武备志》在南北距离上与《皇明九边考》有些不同。“河套即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东至偏头，西至宁夏，三面阻河，南邻边，东西几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4]明末地理著作《广志绎》则估算了河套周长与围径。“起宁夏至黄甫川，黄河北绕二千五百里即南，自（黄甫）川至定边亦一千三百里，以围径求之，当得纵横各一千二百里余。”[5]清初顾炎武区分了河套不同区域南北里数，“河套东接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相距二千里，而遥南则限以边墙，北滨黄河。远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二三百里”[6]。由于顾炎武在清代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人关于河套范围之记述，大体皆踵述其说。[7]近人张维华也继承顾炎武之说，从近代地理变迁、行政区划角

---

〔1〕〔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102“成化八年三月庚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校勘本，第1994－1995页。

〔2〕〔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1“成化九年冬十月壬申”条，第2338页。

〔3〕〔明〕魏焕辑：《皇明九边考》卷7《榆林镇·边夷考》，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04－305页。

〔4〕〔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07《镇戍·延绥》，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年间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5〕〔明〕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收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

〔6〕〔清〕顾炎武：《肇域志·陕西九·河套》，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第121－123页。

〔7〕〔清〕谭吉璁：《延绥镇志》（康熙）卷1－3《附记》，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乾隆增补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9页；〔清〕丁锡奎修，〔清〕白翰章纂（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河套》，见《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二十五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台北）1970年版，第288－289页。

度，界定了河套四至范围。“大抵当时河套范围所及，东至山西河曲，西至宁夏，东西二千余里；南自榆林边墙，北抵黄河故道，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十里；总计面积，周回约五千余里。”[1]但在南北里数上，误将“二三百里”讹为“二三十里”。所谓“黄河故道”，则指清道光年间黄河于河套北界河段改“北流”而为“南流”，形成今日河道，张维华于是加以申明。

民国时期河套概念一方面延续了明清时期之界定，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界上，逐渐产生了另一更为流行说法。郝志成、白音查干指出民国时期形成开发河套热潮，开发之处并不限于黄河以内，而是跨越黄河，涉及银川平原、长城以南与河东地区，时人开始泛泛地将黄河、长城内外广阔之地皆纳入河套范围，于是形成“前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后套”（今内蒙古包头）；“东套”（今伊克昭盟）、“西套”（银川平原）之说，[2]河套所辖地域由此扩展甚广，全面积约36万方里。[3]当代河套概念，亦延续此一脉络。《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河套的定义是“黄河在甘、宁、内蒙古、陕、晋5省区境内形成了马蹄形大弯曲，这一大弯曲的北部，亦即白于山（陕北）以北，贺兰山以东，阴山以南，芦芽山（晋西北）以西的地区称为河套。”[4]按此界定，当代河套包括明代

---

〔1〕张维华：《古代河套与中国之关系》，载《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5期。

〔2〕蒙思明：《河套农垦水利开发的沿革》，载《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5期；郝志成、白音查干：《论河套地域及其概念的演变》，载《河套文化》2006年第11期。

〔3〕“河套之地由地理上言之，约可分为四部，其在北者曰后套，南界黄河，北尽狼山，东起乌拉山，西在阿拉善东部，东西长约四百里，其面积约四万方里。杭锦达拉特二旗北境及乌拉特西公旗南境游牧之处，属绥远区域之五原县（县治在兴隆长）。后套之南曰前套，即鄂尔多斯，南起长城东西北，三面距河，面积约二十九万方里。伊克昭明一部七旗，及乌拉特中东两公旗西南境游牧之处，属绥远区域之五原、东胜、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各县（设东胜县治于套内之羊肠堧）。其边境亦有属河曲、榆林、府谷、横山、靖边、平罗等县者，盖东胜、五原未经设治之先，人民诉讼之事，乃投就近官厅审理，故地亦附之。前套之北，后套之东曰三呼湾，亦曰中滩，南界黄河，北界乌拉山，西起西山嘴，东至全巴图，东西长一百二十里，南北广由十里至二十里不等，面积约一千八百方里。乌拉特三公旗公共游牧之处，属五原县。前套之西曰宁夏，东界黄河，西绕贺兰山，南起青铜峡，北至石嘴山，南北长三百里，东西广由三四十里至一百余里不等，面积约二万方里，属甘肃省之宁夏、宁朔、平罗三县。合计全套面积约三十六万方里。”参见潘复：《西北垦殖计划·调查河套报告书》，《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史地文献卷》第10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4〕《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河套、榆林镇、宁夏镇部分地区、山西镇部分地区，已远超明清河套旧域。部分学者尚从自身学科与研究出发，对河套概念又有不同程度发挥。如孙周勇《河套地区史前考古学史初步研究》进一步将河套范围扩展至冀西北。[1] 虽然民国以来河套概念逐渐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伴随经济开发，传统地理、行政观念随之变化与整合，具有现代认识之合理意义，但却不能以之取代古代河套概念，否则便是以今证古，造成理解错位。[2]

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大体三面环山、东面临海，形成“内华夏外夷狄”政治地理格局，华夏、“夷狄”之间的边疆地带，相应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界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大多是将之作为中华文明的附属地带或破坏者。拙著《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为揭示边疆主体地位，倡导“中国边疆假说”（Chinese Frontier Thesis）理论。所谓“中国边疆假说”，主张从边疆看中心、从边疆看历史，强调边疆在中国历史之主体性，即从边疆独特地理环境出发，审视国家政治、中心文明如何与边疆地理不断互动、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具有异质性之经济、社会、文化之边疆区域，并反过来作用于国家政治与中心地带之历史线索。简言之，便是从以往历史研究之“中心本位”转变为“边疆本位”，在并不否认中心文明积聚、示范作用之前提下，充分重视、揭示边疆文化对于中国历史之同等作用，从而纠正以往中国学界惯于从中心看边疆、从中心看历史，将边疆地带作为边缘地带或被动地区，或仅作为附属而论，或片面强调其破坏意义之一般模式。一言以蔽之，便是将边疆研究从附属领域转变为主体领域之一，甚至成为审视中国历史的立场、方法与视角。

---

〔1〕孙周勇：《河套地区史前考古学史初步研究》，载《文博》2002 年第 6 期。

〔2〕胡凡从当代河套概念出发，虽亦得出洪武时期河套便为“空虚之地”的结论，但仍指出东胜、宁夏、延安皆属河套防御体系。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亦从当代河套概念出发，虽对明初东胜、宁夏、陕西、山西之军事经略有颇多考证，得出洪武时期明朝围绕河套精心布置的结论。但事实上，延安、宁夏、东胜虽确有防御河套之责，但由于防御主体皆非河套，相应并不可将之视为为河套而设之防御体系，而只是当作兼顾、援助而已。这些研究并不符合明初河套真实面貌。

或者说，一部中国史，便是一部边疆史。不仅如此，中国北疆对世界史尚具有全局性意义。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内陆政权长期维持了古代世界历史上最为广袤的内陆边疆，在双方的不断互动之下，后者或者南下中原，或者向西迁移，从而改变了欧亚甚至整个世界历史之进程。由于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地理起点，中国北疆从而成为欧亚甚至世界历史之第一推动力。或者说，一部中国边疆史，便是一部世界形成史的开端。

在四裔边疆之中，亚洲内陆即蒙古高原及毗邻森林地区的北方民族，凭借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或为生存所逼，或为抢掠物资，不断南下长城以内，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不断变迁，堪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源地与推动者。相应，地处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之间的群山地带便成为南北双方不断争夺、反复拉锯的重心地带。在中国北部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地带，自东而西大体并列分布着两大山系，“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贺兰山、祁连山脉、昆仑山脉与天山山脉（为省略起见，下文山脉皆径名山）。两大山系横亘于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之间，成为二者阻隔交通、互相攻防之天然屏障。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经略规划虽多有不同，但沿天山、合黎山、龙首山、阴山、贺兰山、太行山、燕山、长白山之内外布置军事防线，却是历代保障内地之一贯举措。秦汉、隋朝、明朝长城防线，更是依托这一“天造山险”所建“以限华夷”军事边界。

不仅如此，这一区域具有过渡性质的气候、生态、经济条件，尤其引起南北双方的关注。阴山等外山系、太行山等内山系将中国北部边疆分割成为三大地理空间，由北至南依次为典型亚洲内陆、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内新月平原地带。由于内外山系先后阻隔太平洋暖湿气流之北进，从而导致三大地理空间形成不同气候特征，即分属于干旱气候、半干旱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受到地形与气候条件的影响，三大地理空间经济方式与政治组织形成亦呈现截然不同之面貌。在典型亚洲内陆干旱气候条件下，北方民族发展出单一游牧经济；在内新月平原地

带温带季风气候下，华夏民族及后来的汉民族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而在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由于地形、气候呈现出非典型性与过渡性之特点，故而虽然具备发展游牧、农业之条件，但又非普遍推广地带。因此之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内陆平原过渡地带便成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过渡并存，汉民族与北方民族争夺拉锯之缓冲地带，也是历代长城分布之地。北方民族南下北方平原之时，不仅人马可以获得给养，而且农业经济亦可补充游牧经济单一匮乏之不足，有利于北方民族在中国北疆建立较为长久之统治；同样，汉民族北上亚洲内陆时，亦可以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有利于获得给养，而且亦可发展骑兵，为与北方民族一决高下提供了战术基础。由此可见，内陆平原过渡地带是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争夺之"核心边疆"，占据了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动，有利于驱逐对方或夺取政权。

从北方民族而言，夺取了核心边疆，下一步便是统治黄河流域，乃至全中国，比如北魏、辽、金、元皆是如此。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比如秦汉、隋唐夺取核心边疆，皆为进取漠北、驱逐匈奴或突厥奠定了基础。反之，失去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被动，被驱回本部或失去政权。从北方民族视角而言，比如"[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产禽兽。汉时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后武帝夺其地，匈奴入寇无所隐蔽，过此未尝不哭"[1]；再如祁连山"其上积雪不消，其下冬暖夏凉，水草大善，故宜于畜牧"，"海河地尽肥饶，祁连宜于畜牧，夷未有不徙家相就，乐得为邻者"。[2]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也指出："构成南山山脉的诸山脉与以主脉祁连山为首峰的祁连山山脉之间形成了美丽的河谷，在此纵谷之间流贯有疏勒河、北大河、甘州河、伏牛河、大通河（浩亹河）、庄浪河等，它们在各自的流域为畜牧提供了适宜的河谷。所谓河谷，即标高3000米以上的高原。其特征是在如此高峻而连绵不断的山岳中间形成了平行的、深邃的纵谷。南山山脉纵谷中众多的溪谷牧

[1]〔明〕岷峨山人：《译语》，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2]〔清〕梁份：《秦边纪略》卷1《西宁卫》，第21－22页。

地在历史上为这一带的民族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1]匈奴被驱逐出祁连山,从而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2]之悲歌,匈奴亦随之由盛转衰,西走中亚。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比如五代、两宋失去核心边疆,从而呈现或受契丹压制,或依附契丹之格局,政权兴亡多与契丹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可见,核心边疆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扩张权力、统一全国的"地理阶梯"与"经济过渡区",或者合称为"过渡阶梯"。在占据这一区域之后,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从而获得了地理优势与经济补充,从而极大地壮大了自身实力。可见,对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而言,"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这一结论也是从地理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整体诠释。

依照南北位置不同,又可将核心边疆分为内外两层,内山系辐射地带可称为"内核心边疆",外山系辐射地带可称为"外核心边疆"。当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分据内外核心边疆之时,各自依靠经济优势与军事优势,大体形成长期对峙、均势格局。但从长远来看,北方民族借助外核心边疆,东西往来寻找中原王朝防御薄弱之地,逐渐控制、占领核心边疆,将其从中原王朝体系中逐渐剥离开来,演变成自由出入、东西奔驰之"核心走廊"。或者进一步说,将汉民族本位的"核心边疆"演变为北方民族本位的"核心走廊"。中原王朝从而在骑兵发展受阻情况下,野战能力与机动性都随之下降,丧失了在长期战争中之主动权。只能通过长期屯驻重兵、分地守御,以资应对。但这又与核心边疆的脆弱生态、竞技条件相冲突,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与内部叛乱,北族政权从而趁势入主、统一中国,如魏晋南朝与明朝时期。可见,核心边疆实为关系中国古代汉民族、北方民族兴衰的根本之地。

由于核心边疆一直处于汉民族、北方民族争夺夹缝之中,这一区域除了北方民族在固定占领太行山之地后,对汉民族形成长期压制之势

---

[1][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2][清]张澍编辑:《西河旧事》,《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年版,第2页。

时，比如魏晋、两宋时期，北方民族建立所谓十六国、北朝与金朝、西夏政权外，其他时期并无政权形态之建立。但核心边疆之农牧经济形态，却对于汉民族农业政权与北方民族内陆政权，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相应当被一方固定占领时，会促使其政权性质之改变，即分别从单一农业、游牧政权，转变成为农牧国家。农牧国家是汉民族、北方民族在力量强大之时，突破各自典型区域与经济方式，向核心边疆渗透，从而建立的兼有农牧经济的农牧政权。由于这类政权规模较大，故称之为"农牧国家"。农牧国家依照统治阶级来源之不同，又可分为两种，即汉族农牧国家与北族农牧国家。汉族农牧国家包括秦汉、隋唐、明朝，以南北平原农业经济为主，在核心边疆与亚洲内陆兼营牧业；北族农牧国家包括匈奴、北魏、突厥、吐蕃、辽朝、金朝、西夏、元朝、清朝，除清朝之外，皆以牧为主，兼营农业，清朝则农牧并重。

农牧国家按照国家疆域、农牧比重之不同，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统一王朝"与"局限国家"。统一王朝是指统一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农牧大体并重、南北大体平等之政权类型，包括唐朝、元朝与清朝，三者又有一定差别。唐朝是胡化汉人所建立之统一王朝，因此一方面大体突破了汉民族在对待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上所持"华夷秩序"之不平等观念，唐太宗便总结了唐帝国与前代中原王朝之不同，"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他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是肇建一统的重要原因，并通过都护府制度实现了对亚洲内陆之直接统治，通过赐姓方式实现对北方民族之感情联系，农业地带与牧业地带疆域大致相当；但另一方面，唐朝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华夷秩序"熏染，并在中唐以后逐渐呈现"南朝化"，即受南方汉族文化影响之特点。[2] 因此唐朝大体是偏向于汉族主体之统一王朝。与之相反，元朝统一中国后，虽部

〔1〕〔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47页。

〔2〕陈寅恪最早提出了"南朝化"观点，参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卷7《财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6页；唐长孺则发展了这一观点，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页。

分接受了汉族政治制度，但对于汉族文明大体采取抵触态度，并在政权、法律诸层面体现出种族分等观念，蒙古与其他北方民族地位从而居于汉族之上，形成“内北国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之格局，[1]因而元朝大体是以北族为主体之统一王朝。清朝崛起于东北草原——森林交界地带，兼营农牧，并有渔猎，从而借助对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之熟谙，不仅成功统治了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而且一方面坚持“满蒙一体”、“满汉一体”之种族平等，另一方面强调种族区分，维持满洲、蒙古之独立性，拒绝汉化，从而实现了对汉族文明、北族文化之全面整合、深层涵化，因此清朝是中国古代实现南北平等、深层涵化之唯一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值得注意的是，元、清皆为北方民族所建立之统一王朝，唐朝虽大体是汉族王朝，但其政权性质却是胡化汉人在北朝政权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南方、进取内陆而已。也就是说，唐朝实际亦在北方政权脉络之中。因此，统一王朝大体是北方民族或胡化汉人借助对于亚洲内陆之熟谙，采取军事征服、婚姻联盟等方式，克服了汉民族经济、政治方式与亚洲内陆之隔膜与不适而形成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亚洲内陆地理环境之独特性。

“中国边疆假说”理论在问题出发点、研究思路、视野方法与最终结论等所有层面，皆体现出根植于中国古代历史之本土特色。中国边疆假说秉持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历史之主体作用，强调围绕其形成的农业民族、游牧民族长期争夺、互动之观念。核心边疆见证了亚洲东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长期对峙，影响了长城南北社会之长期发展，余波所及，甚至及于欧洲社会，实为古代欧亚历史第一推动力与最初发源地。也就是说，中国边疆假说所解决之问题，在时空跨度与历史地位上，远较其他边疆理论广大而重要，相应所采取一系列之分析方法亦大为不同。拉铁摩尔“边疆形态”理论强调居于汉民族、北方民族之间人群——“边疆联合体”之历史主体作用，这也是“边疆形态”理论

---

〔1〕〔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收入《元明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页。明成祖朱棣亦称：“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致灭亡。”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34“永乐十一年十一月癸卯”条，第1642页。

之核心观念。但这一理论却忽略了中国古代政权建立者其实绝大多数并非来自于中间地带,而是分别来自于两边农业地带与亚洲内陆。中国边疆假说与边疆形态理论不同的是,并不强调中间地带的人群主体作用,而是强调核心边疆的地理主体作用,即分别来自于南北社会的人群,在占据核心边疆之后,充分利用了核心边疆的地理、经济条件,从而在战略态势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建立疆域广大的政权。与魏特夫"征服王朝"理论过于强调北方民族对汉民族的优势与压制不同,核心边疆理论认为汉民族、北方民族共同、平等地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二者关系是利用核心边疆,不断互动之过程。这一解释更为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与中国民族体系多元一体格局的演变脉络。

在中国古代核心边疆中,河套是典型之"动态过渡阶梯"。所谓"地利不如人和",[1]"过渡阶梯",是就两方面而言,一是就地理位置而言,河套地接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是中原王朝、北方民族长期攻守的阶梯跳板,即"地理阶梯";二是就经济方式而言,河套呈现了由农业至牧业过渡之特征,是汉民族、北方民族之间的"经济过渡区"。综合二者而定位河套,便系"过渡阶梯"。所谓"动态",是就河套作为过渡阶梯在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之间政治归属的常态流动性而言的。虽然核心边疆地带皆有"过渡阶梯"之共同特征,但河套以外的其他地区,皆呈现了在气候、生态、经济上较为明显的南北分层特点。河套以西之南部地区即宁夏、甘肃地区,经济方式偏于农业;北部地区即内蒙古西部地区,南侧为滕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北侧为草原地带,呈现了较为分明的农牧分层特征。河套以东之南部地区即山西、河北地区,是中原农业兴起的中心地带;北部地区即内蒙古东部地区,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牧业特征。

河套三面环河,具有天然长成的优良草原,若加以改造又可形成可资灌溉的农田粮地,在一定程度上相应地具有突破一般过渡地带的特征,南北地区分层并不明显,比如从历史与当今状况而言,后套即最北

[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4《公孙丑章句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页。

之包头一直是河套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此外，与其他过渡地带山脉纵横、地理破碎、建置复杂的情况相比，河套地理非常完整，是由黄河包围的较为独立的区域与“小世界”，因此更容易受到人为或者说政权行为的影响。故而，在秦汉长城南缘过渡地带中，河套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分层性”，呈现出更多的南北一体的“混合性”特征。这种“混合性”特征便于中原王朝、北族政权进一步将势力深入对方腹地，自然在军事地理层面，具有更为明显的“地理阶梯”特征。张其昀在划分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时，将河套专辟一区，称之“河套区”。他认为河套土地平衍，富于水利，引渠灌溉，五谷丰收，移民实边可省转输之劳，故而是北部边防之根据地、“中国灭胡之本”。[1]

不仅如此，由于毛乌素沙地由北至南，分布于河套的大部分地区，使农田、草原皆呈现间隔、片状状态，从而不仅大大动摇了中原王朝、北族政权长期、固定控制河套地区的经济基础，导致南北双方对河套的统治皆呈现不圆满、不稳定之局面，而且为对方重新夺回此地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此外，河套表面看来呈现很强的封闭性，其实同样存在开放性的特征。河套虽然三面环河，外层又有吕梁山、大青山、乌拉山、贺兰山之阻隔，但每年秋冬时节，黄河结冰之时，千里黄河反成宽阔通途。周围山脉虽为高耸屏障，但不同山脉之间皆有缺口，而这些缺口恰恰成为历代中原王朝北上大漠、北族政权南下河套之交通枢纽。而各处山脉自身也由于地壳运动、雨水冲刷的缘故，长期形成了天然缺口，构成了河套与外界之交通道路。以西侧贺兰山为例。贺兰山位于宁夏、内蒙古之间，北起巴彦敖包，南至毛土坑敖包及青铜峡，山势雄伟、森林茂密。“盘踞数百里，上多青白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2]“贺兰山在城西六十里，峰峦苍翠，崖壁险削，延亘五百余里，边防倚以

[1]张其昀：《中国军事史略》，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台北）1956年版，第168页。

[2]［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52《陕西一·贺兰》，第2471页。

为固。”[1]贺兰山脉地处荒漠与荒漠草原之分界线，亦是西北地区内流区与外流区之分水岭，中间风雨侵蚀形成众多山口，如贺兰口、苏峪口、三关口、拜寺口，成为河套、河陇交通之要道。可见，河套周边地形虽具有明显的静止阻隔功能，但同样亦有动态沟通功能。

总之，就气候、山川、生态、经济等各项地理因素而言，河套既为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提供了皆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又埋下了南北双方皆无法长期、稳定控制的地理隐患。河套在相对保持自身的封闭性、独立性的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与沟通性。可见，将河套完全归于甚至偏向于南北任何一方，皆违反其内在的地理属性。处于南北之间，呈现明显混合性、动态性的过渡阶梯特征，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之间最为完整的核心边疆地带，才是对河套地理的恰当界定。正是这种居于中间地带的特征，使河套成为中国古代南北双方反复争夺、不断拉锯的核心地区。但明前期历史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2.3 近世时期“东北边疆时代”特征与河套“弱点”地位

对于河套这一战略要地，明前中期却采取几乎“空置”的态度。军事防御包括本地防御与周边防御两种，本地防御为根本，周边防御为接应。揆诸河套，明初对河套本地不仅空置其地，而且毫无防御。洪武四年，明军占领河套，但不仅未固定驻守，而且采取迁徙套人、空置其地做法。“（洪武）四年，大将汤和兵攻察罕脑儿，擒猛将虎臣镇军将谢成等降其众，并省入内地，河套遂墟。”[2]“（余）子俊又上疏言陕西有三边，延庆、宁夏、甘肃三边之中，延庆为内地。国初，驱套人出黄河外。至正统中，始渡黄河犯近边。”[3]可见套人流向有两种可能，一为迁入内地，

〔1〕〔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宁夏新志》（嘉靖）卷1《宁夏总镇·山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2〕〔明〕郑汝璧等修，〔明〕刘余泽等纂，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延绥镇志》（万历）卷3《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223页。

〔3〕〔清〕谭吉璁：《延绥镇志》（康熙）卷3－4《名宦志下·明》，第371页。

一为驱赶出套。关于套人种族所属，明代史籍并未明确记载，但从余子俊所上奏疏前后语境，似乎所驱为蒙人。王天顺便持这一观点，认为成吉思汗南下攻灭夏、金，蒙古部众随之星罗棋布地分布于河套。明朝占领河套后，蒙古部落随之北迁，明军亦驱逐或俘虏残留蒙古部众，企图在河套北缘制造无人区，作为蒙古南下之缓冲地带。[1] 尤其考虑到洪武时期，明朝将山西民众大规模迁往河北，甚至山东，而却丝毫未及一河之隔、荒无人烟的河套地区，从而与秦汉、隋唐时期开国之初皆向河套大规模移民屯垦之情况截然不同。那么，明朝对河套如此忽视，原因何在呢？这源于中国古代北部边疆重心的转移。

依照东西位置不同，可将核心边疆分别划为中、东、西 3 部分。其中阴山、太行山居于内外山系中心地带，可称为“中部边疆”；东部大兴安岭、长白山中间之地可称为“东部边疆”；西部贺兰山、祁连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中间之地可称为“西部边疆”。中部边疆作为内外山系之中心地带，尤为汉民族、北方民族争夺之边疆重心。在其南北，也分别是汉民族（华夏民族）、北方民族建立强大政权之所在。在这一地带之南，西周、秦汉、隋唐建都于关中，元、明、清朝建都于北京，辽金政权亦以北京为都城之一。在这一地带之北，匈奴、突厥、回纥、蒙古汗廷皆建立于鄂嫩河、克鲁伦河、土剌河三河发源之地，也即漠北中部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附近；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亦皆崛起于大兴安岭地带。与中部边疆一直居于中国北疆重心之地不同，东部边疆、西部边疆只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争夺之两翼地带，其战略地位伴随北疆地缘政治之变迁而不断变化。大体而言，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经济、政治重心呈现转移之趋势，北方民族崛起之地亦呈现由西至东之趋向；南北政权为争夺资源、消灭对方，争战焦点之地相应呈现由西至东之转变，即在以中部边疆作为边疆重心基础之上，经营重点呈现由西部边疆向东部边疆转移之态势。

中唐以前，最为强大的北方民族匈奴、西羌、突厥、回纥等多崛起于

〔1〕王天顺：《河套史》，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31 页。

阿尔泰山附近，向东进至祁连山、阴山以北地区，逐渐向东部扩展，占领整个蒙古高原，以和林或其东部，即三河发源之地为政治中心。因此北方民族南下汉地、中原王朝北进草原，多从河套两侧，即西侧乌拉山、贺兰山之间缺口之处，东侧大青山、狭义太行山之间缺口之处出入。秦汉、隋唐皆定都关中，亦在关中西北、东北加强防御，即以乌拉山、大青山为核心，在西部贺兰山、东部太行山区域加强攻防建设。秦汉以前，即上古时期，华夏政权、北方民族之北疆经略尤偏重于大青山、祁连山之间的经略；魏晋以至隋唐，即中古时期，中原王朝、北方民族北疆经略偏重于大青山、太行山之间的经略。不仅如此，蒙古草原游牧经济过于单一，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冲击，难以维持较大规模社会组织长期存在，北方民族必须借助与南方汉地、西域绿洲维持经济联系，或者通过战争，或者通过贸易之方式，始能维持生存、雄霸大漠。中唐以前东亚与西亚、欧洲之交通也主要借助陆路，即著名之“丝绸之路”。因此之故，中原王朝若欲消除草原势力的威胁，必须在加强北疆防御之外，切断蒙古草原与西域绿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始能在长期战争中占据上风，并且在东西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之故，中古以前，祁连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中间之地，即西部边疆便在中部边疆经略带动下，亦成为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十分重视之地。如果将大青山西北地带称作“西北边疆”，从边疆角度而言，那么中古以前中国之历史，由西北汉民族、北方民族所主力造成，中古以前中国处于“西北边疆重心时代”，简称“西北边疆时代”。

在西北边疆时代，汉民族、北方民族在边疆开拓、历史推动方面，呈现了前者地位逐渐降低，后者地位逐渐提升，从而展现了秦汉时期前者为主，魏晋时期后者为主，隋唐时期二者涵化之特点。但在近世时期，即五代至明清，经历“安史之乱”之冲击，西北地带在唐朝与突厥、回纥、吐蕃长期作战之后，经济已趋于残破，中原王朝经济、政治中心逐渐呈现向东南转移之趋势，经济中心由关中地区逐渐转移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政治中心也由关中渐次东移至洛阳、开封、临安、南京、北京。而中唐以后突厥、回纥西走之结果便是东胡系北方民族开始崛起于蒙

古东部大兴安岭草原——森林交界地带，逐渐向西迁移，占领整个蒙古高原。亚洲内陆地缘政治之重心，由于南北双方各自政治中心之转移，而相应呈现东移趋势。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争夺之焦点在中部边疆基础之上，又呈现重视大兴安岭、长白山中间地带，即东部边疆之倾向。在这一地缘政治形势下，北方民族南取长城政权，比如金灭辽、元灭金，皆从东北南下，十分注重对辽金崛起之地的经略；同样，中原王朝北上大漠，比如明朝进攻蒙古，亦注重在辽东之地剪除其翼，并进一步控制了外兴安岭以南之地。清朝崛起地便在外兴安岭以南，由这一地域出发，统一了亚洲内陆与南北平原。因此之故，近世时期中原王朝、北族政权皆十分关注长白山、大兴安岭之经营。若将太行山以东划为“东北边疆”，从边疆角度而言，近世中国之历史，由东北汉民族、北方民族所主力造成，北部边疆经略偏重于东北地带，可称之“东北边疆重心时代”，简称“东北边疆时代”。

在东北边疆时代，汉民族虽在文化层面进步明显，但在武力层面却呈现明显落后于北方民族之局面，近世时期历史从而呈现前者文明进程不断为后者打断之历史现象，相应历史主流与主要推动力皆来源于北方民族。可见，经过西北边疆时代之沉淀，在与汉族政权开展多次战争，并借助地理条件掌握一定农业基础、农业文明之基础上，北方民族呈现了逐渐发展，压倒汉民族之历史趋势。不过这一潮流伴随近代时期新月地带农业文明的历史上升与火器进步，压制了游牧民族骑兵冷兵器战术并使其最终瓦解。

“边疆时代”即“西北边疆时代”、“东北边疆时代”之划分，只是为了更简洁地概括中国古代北部边疆经略转变之历史趋势，并不意味着在西北边疆时代，东北边疆便不重要；或者在东北边疆时代，西北边疆便不重要。西北边疆、东北边疆不仅皆包含中部边疆，中部边疆无论是在西北边疆时代，还是在东北边疆时代，皆是南北政权边疆重心之地，而且在西北边疆时代，秦汉、隋唐皆重视东北边疆，甚至及于朝鲜半岛，隋唐甚至为此国力大损；反之，亦不意味着在东北边疆时代，西北边疆便不甚重要，比如北宋鉴于契丹之强大，遂在西北地带开拓生存空间，

与西夏开展百年战争。明朝强调经营东北边疆，导致河套以西经营薄弱，成为15世纪中期以后明、蒙战争焦点之一。同样，北方民族游牧经济方式之特征，除了为夺取中原政权之外，在掠夺物资之时，也有寻找中原王朝防御薄弱地带进入之特点，从而导致在西北边疆时代，东北边疆同样经常发生战争；在东北边疆时代，西北边疆亦是战乱不断，从而在一定时期在局部区域呈现与时代特征相反之现象。因此，两种时代之划分，只是从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争夺之重点、次序，即所谓轻重缓急而言。明人对于地理空间的变化特点，有清楚的论述。"边地邻虏，有极冲、次冲及稍缓名色。惟刘带川云：'万一虏奔突来冲者，既不可入，缓者必为所必攻；至此，则冲变为缓，缓变为冲，无常形，无定用，不宜胶执。'按刘议深得兵家攻坚攻瑕妙诀，贵在变化用之。"[1]在西北边疆时代，西北边疆是双方争夺之"首要地带"与"优先地区"，而东北边疆则是"差缓地带"与"次后地区"；反之在东北边疆时代大体呈现相反之变化。以移民为例，西汉曾徙华北民众至西北。"[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关陇、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2]而明朝却将西北地区大量民众内徙。

即使就中部边疆而言，其在中国古代一直充作边疆重心之同时，其定位与性质亦体现了从西北边疆至东北边疆转移之态势。阴山、太行山南北地势隆起，是北方民族自蒙古高原南下，顺势进入北方平原之缓冲通道。由于河北、关中地势较低，北方民族从而以高屋建瓴之势，西入关中、东进华北。加之山西地区高原、盆地交错分布，宜农宜牧，非常适于北方民族休整，实为北方民族进入汉地优先选择之地。北方民族进入山西地区后，除魏晋特殊时代背景下，北方民族以占领黄河以北地区为旨归之外，当中原王朝较为强大时，北方民族皆非为占领山西，而是为西入东进奠定基础。在中古以前，北方民族经山西进入汉地之后，为经略帝都关中之缘故，偏重于越过黄河，进入陕西，即河套、关中之

[1]〔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12《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78页。

地。在近世时期，则偏重于东进河北，进攻帝都北京。因此，作为西部边疆、东部边疆之连接地带，中部边疆分别顺应西北边疆时代、东北边疆时代潮流，其定位与性质分别呈现与西部边疆、东部边疆相结合之特点。总之，西北边疆时代、东北边疆时代之划分，是主张地理并非固定不变的静态空间，而是应时而变的动态空间，这既是纠正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必要观念，也是历史学注重历时性的基本准则。所谓"地利不如人和"。[1]"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2]，"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3]。"人和""德"皆指人事，即历史变化。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对于地理与政治关系的阐述，早已得出了辩证而深刻的结论。

中古以前，西北长城内外广阔的农业、畜牧业交界地带，为秦汉、隋唐王朝提供充足的军粮与战马，汉民族尚可吸收西北民族之骑术，建都西北、经略内亚（Inner Asia），构建立足于西北广阔大陆之战略格局。在这一时期，河套作为汉民族进取内亚的战略前哨与军事基地，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也是秦汉、隋唐在建国之初，向河套大规模移民屯垦之军事根源。但另一方面，蒙古草原西部先后崛起之匈奴、突厥及其他种族，在气候寒冷时期，先后趁中原王朝衰落之时，屡次经由河套南下。因此，在中古以前西北边疆时代，河套正处于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政治重心之间，相应成为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争夺、拉锯之首要地带、重中之重。

但在"安史之乱"冲击之下，唐朝不得已从西北全面撤退，以应对叛乱之局。伴随寒冷期的再次到来、河套沙漠化进程的加剧，中原王朝、北方民族对于此地之重视程度皆有不同幅度下降，当地遂成介于农耕、草原民族之间的党项人控制地带。这一族群由于处于农田、草原之间，形成了兼营农牧之经济方式，从而适应了河套地理环境，他们利用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争夺东北边疆地带之机，在河套一隅立稳脚跟，从

---

〔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4《公孙丑章句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页。

〔2〕〔汉〕司马迁：《史记》卷65《吴起传第五》，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166页。

〔3〕〔清〕圣祖御制，张廷玉等奉敕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38《古今体诗四十五首·古北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302页。

而在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夹缝之间存在近200年。

但蒙元时代既已占据欧亚大陆肥沃农田与草原，而对于经过西夏农业开发，已经呈现较为严重沙漠化之河套地区，不再具有浓厚兴趣。另一方面，蒙、夏交恶历史与成吉思汗墓地皆成为蒙元冷置河套之重要原因。成吉思汗墓地藏于河套之可能性可能促使蒙元帝国有意遏制河套经济之开发。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未果，卒于六盘山后，便被秘密埋葬。按照蒙古"密葬"习俗，"元朝棺裹，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围。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1]无论相传负责、目睹成吉思汗葬礼之人皆被全部屠杀之事是否属实，蒙古密葬习俗已使成吉思汗墓地所在成为后世无法解开之谜。在对众多成吉思汗墓地所在地的推测中，河套吸引了最多的目光。清代便有成吉思汗葬于河套之记载。"元太祖陵，在河套中间，不封不植，深埋于地下。葬后放马十万匹，使土平草长，了无痕迹，然后掣去之。"[2]当代历史、考古学者依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指出成吉思汗死后，很有可能葬于距离死亡地六盘山较近之河套地区，其地点可能是位于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也可能是附近阿尔寨石窟，《蒙古秘史》、《史集》、《蒙兀儿史记》等所载成吉思汗藏地周围景观与其地形非常吻合。河套地区也长期流传成吉思汗葬于此地之传说。

无论成吉思汗是否葬于河套，成吉思汗陵已使河套成为蒙元祭祀成吉思汗最重要地区。在蒙古人观念中，人死后灵魂会附着于驼毛之上，之后遗体便不再重要，可轻易处理。驼毛与死者衣冠放在一起所形成之衣冠冢，比遗体更为重要，是后人祭祀的对象。成吉思汗陵是成吉思汗衣冠冢所在，据称20世纪50年代打开银棺时，曾发现驼毛，并有棺中尚有遗骨之传说。自窝阔台汗后，蒙元帝国规定每年都在成吉思

[1]〔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收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页。

[2]〔清〕冯一鹏：《塞外杂识》，《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年版，第8页。

汗陵举行祭祀成吉思汗的最高规格典礼——查干苏鲁可祭典。因此之故,河套在蒙古人观念中,是祭祀成吉思汗之圣地。值得注意的是,夹在中书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之间的河套地区,在有元一代,一直归忽必烈系黄金家族管理,属于皇族封地,[1]既不大规模设置机构,[2]也不推广农牧业,人口尤少,[3]种种迹象皆表明蒙元帝国将河套视为祭祀,甚至可能埋葬成吉思汗之圣地,为保持周边宁静,从而由皇族亲自管理,尽可能避免经济、政治建设。可见,无论是由于夏、蒙之际河套人口大量减少、土地沙化缘故,还是成吉思汗祭祀、埋葬圣地原因,河套在蒙元时期皆成为经济、政治建设甚少,甚至被遗忘之角落。这便使河套在数千年喧嚣历史中,陡然进入一段寂静时光,并深刻影响了明前期对待河套之态度。

明朝相应亦处于"东北边疆时代",这一格局从明朝建国伊始便已经确立。明朝、北元分别延续了近世时期长城南北政治重心东移趋势,双方争夺之首要地带与优先地区皆在太行山、长白山,即东北边疆;在东北边疆问题大体解决后,始将目光转向西北边疆。[4] 直到正统时期,明朝对西北边疆多番经营后,其防御力量相对于东北边疆,仍相差

---

[1]梁冰:《鄂尔多斯历史管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达力扎布指出河套是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的封地,参见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周清澍认为元朝于河套设置察罕脑儿,充作驿站与牧场,位于今伊克昭盟乌审旗古城。参见周清澍《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卷》将察罕脑儿站标于红柳河中游,今横山西北套内。《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标察罕城于乌审旗白城子(古城)。但从明实录记载来看,察罕脑儿实处宁夏,并不在河套。参见下文。

[3]周松指出察罕脑儿所辖四千户所有15000人,参见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这一数字相对于数十万公里面积之河套,显得十分渺小,如果考虑到察罕脑儿位于河套南缘,河套仅是其管辖地之一,那么将元代河套视为空旷无人之地,亦不为过。将其与西夏农牧甚为发达之历史相对比,其中巨大中断与反差令人寻味。

[4]参见拙著《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251页。

较大。[1] 嘉靖时期，山西巡抚赵时春通过对比唐、明北疆格局之差异，指出二者北疆战略重心具有明显不同。“杨子（杨守谦）统论西北边，以西城证北境，良是。北之有山，即西之有河，北有山后诸城以护山，即唐张仁愿筑三城于河外以护河，既斥地千里，反省烽堠千八百所之势也；但西去河为遥，而北去山为迩，唐重西而轻北，我重北而轻西耳。”[2] 近世以来，山后为一专有名词，所指为太行山、燕山以后即以北之地，为明时东北边疆之重心地区。河外即黄河以外或以北，所对应地域为大青山、乌拉山、狼山南北地区，为唐代西北边疆之重心地区。可见，赵时春所谓唐重西而轻北，明重北而轻西之结论，实为中国中古向近世变迁之历史过程中，西北边疆时代向东北边疆时代转变之佐证。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鲜使臣李坤表达了明朝重东北之观点。“皇明代元而兴，忧在东北，故太祖首置北平府，而宿重兵。自居庸、山海以至沈阳，关外诸城堡无非洪武初设置而传至。建文北方偏重，已有靖难之举。永乐以后，遂弃南京而移都于燕，尤为专意东北。……天下之力，尽萃于东北，以致南方空虚，流贼猖獗，莫可禁制，而清人拱手以收渔人之功。此奚异于筑城备胡，而反亡于关东盗耶？”[3] 作为西北边疆之一部分，明初河套从中古以前西北边疆时代之经营之首要地带转变为“差缓地带”，明朝甚至在此地采取驱逐“套人”、“空置”其地的做法，使这一北部边疆最为典型的过渡阶梯成为明前期北疆防御体系中最为薄弱的“弱点”之地，典型地体现了近世时期西北边疆之差缓特征。

---

〔1〕“靖远伯王骥奏：比者奉命巡边，自延绥至肃州，东西逶迤六千余里，守备官军舍余不过五万六千余人，猝有侵轶，恐不足用。事下，兵部议甘肃已有四万二千八百人，足以守备。惟宁夏、延安军少，乞遣官于河南都司属卫，并潼关卫拣选精勇者三千人，分为二班，宁夏增一千，延安增五百。上命巡按御史及都司委廉干官，于属卫如数精选，仍委公正有勇略都指挥提督训练，以候调发。”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29“正统十年五月丙子”条，第2566页。

〔2〕〔明〕赵时春撰，杜志强整理：《赵时春文集校笺》卷6《备边杂议考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页。

〔3〕〔朝鲜〕李坤：《闻见杂记》，《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2.4 明初东胜诸卫建废及其主要保障河东之定位

明代史籍与当代研究多将东胜视为河套防御屏障。这一结论虽无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朝虽然在河套东北外核心边疆设置东胜六卫二所,兼顾黄河东西防御,客观上成为河套防御外层地带,但从其地缘政治形势而言,河东地区始为东胜卫所防御重心所在。东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地处黑河流域,生态颇宜农牧。"东行即东胜州,隶西京大同路地面。自发源至汉地,南北涧溪,细流傍贯,莫知纪极。山皆草山、石山,至积石,方林木畅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盖乞儿马出及贵德州必赤里也。"[1]东胜是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通过阴山、南下河套必经之地,历来是中原王朝驻扎重兵、严加防御之重地。战国赵武灵王于此置云中郡,作为北御匈奴、坚守长城之战略重地。唐朝于此设东受降城,是唐代河套内外城障防御体系之核心机构。辽代设置东胜州,此后历代相沿。洪武二年(1369)八月,李文忠携解大同兵围之势,向西进攻,欲取东胜,至莽哥仓,以不见蒙人而还。[2] 洪武三年(1370)二月,"指挥金朝兴取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3]洪武三年十二月,"延安卫指挥李恪、绥德卫指挥朱明等追败故元残兵于燕山只斤,禽获五百余人,又攻阿不剌思寨,获马三百余匹。"[4]洪武四年(1371),北元枢密都连帖木儿归降,明朝于其地置五羁縻千户所。

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诏置失宝赤千户所一、百户所十一;五花城千户所一、百户所五;干鲁忽奴千户所一、百户

---

〔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2《黄河源》,收入《元明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44"洪武二年八月丙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校勘本,第860页;卷160"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条,第2482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三年二月乙酉"条,第972页。

〔4〕〔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丙辰朔"条,第1147页。

所十；燕只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瓮吉剌千户所一、百户所六。以都连帖木儿、刘朵儿只丑的为千户，给三所印，人赐文绮帛一十匹，金绣盘龙衣及文绮绵衣、银椀、靴袜有差。复遣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赍燕只、瓮吉剌千户所印二，往东胜州，命伯颜帖木儿、答海马里、卜兰歹也里、沙朵列图、阔阔歹为千户。赐文绮帛，十二匹、银椀一。官属卜颜帖木儿等四十三人赐文绮帛人八匹，特赐都连帖木儿之父阔阔帖木儿银椀一丈、绮帛十匹。[1]

这里只记载设置蒙古羁縻千、百户所，而未及设东胜卫之事。但《明史》却增入设卫之事。“东胜卫，洪武四年正月，州废，置卫。……西距行都司五百里。领千户所五：失宝赤千户所、五花城千户所、干鲁忽奴千户所、燕只千户所、瓮吉剌千户所，俱洪武四年正月置。”[2]伊志据此指出洪武四年正月废州置卫，并置失宝赤、五花城、干鲁忽努、燕只、瓮吉剌五千户所。[3] 周松据此认为明朝在洪武四年正月建立东胜卫，洪武五年七月迁至大同。[4] 但关于东胜卫之设置，《明太祖实录》仅有一条记载，即“升东胜卫指挥佥事程暹为巩昌卫指挥使”[5]，此后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再设东胜卫之前，一直湮没无闻。吴缉华据此指出洪武四年，明朝并未建置东胜卫。[6] 达力扎布亦指出洪武四年未设东胜卫，岭北之役后，明朝已失去东胜之地，洪熙元年(1425)军士范济所言东胜卫实指五千户所之地。[7] 后世史料虽有不少关于东胜建卫之记载，但多有错讹，并不可靠。清官方所修《钦定续文献通考》亦载：“元东胜州，隶大同路，洪武四年改卫，省丰州及净州路入焉。”[8]

---

〔1〕〔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60“洪武四年正月癸卯”条，第1179－1180页。

〔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41《地理志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973－974页。

〔3〕伊志：《明代“弃套”始末》，载《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7期。

〔4〕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第49、67页。

〔5〕〔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60“洪武四年正月辛亥”条，第1182页。

〔6〕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边防制度的演变》，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34本，1963年。

〔7〕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31页。

〔8〕〔清〕高宗敕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30《舆地考·古冀州下·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395页。

但在《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中，在设五羁縻千户所之后、程暹充东胜卫指挥使之前，东胜仍为州之建制。“戊申，山西丰州、东胜州、太原府兴县以去年旱灾，诏免其田租。”[1]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朝再设东胜卫时，东胜州仍然存在。[2]

《明太祖实录》关于洪武初年北疆卫所设置之记载多有歧义，有一卫多次设置者，如关于绥德卫设置，便有3种不同说法。也有如同东胜卫，设置之后，便甚少，甚至不再出现者。相似例子是洪武五年（1372）甘肃都卫设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十一月，“壬子，置甘肃卫都指挥使司、庄浪卫指挥使司”[3]。但此后关于该卫之记载，仅见诸一次：“丙辰，升甘肃卫经历沈立本为户部侍郎。”[4]其他史料亦皆未载此事。郭红认为甘肃都卫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废除，改置“甘州左卫”，所依据的史料是《明太祖实录》。[5] 但该条史料原文为“置甘州左卫”，[6]并不及甘肃都卫废除之事。

但是否能因记载甚少而判定卫所不曾设置呢？这未免有些武断。明朝开国之初，攻城略地、建置机构，十分频繁，多有出于一时因素，士兵或随从征调，边民或内徙他处者，皆会导致卫所旋设旋废。对此普遍情况，《明太祖实录》限于笔法、囿于规模，不载其裁撤，合乎情理。不仅如此，《明太祖实录》凡经三修，原稿既多改篡，记录多有错讹实属正常。因此，对于东胜、甘肃此类记载甚少之卫所是否设置之判断，应结合其他线索，综合而论。先于东胜置卫之蔚州、朔州二卫，后者在《明太祖实录》中记载较多，并无疑义，但蔚州卫设置时间，在《明太祖实录》与其他史籍中，同样充满争议。邓庆平指出关于蔚州建卫时间，共有洪武三年（1370）、七年（1374）、十年（1377）3种不同说法，[7]洪武三

---

〔1〕〔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60“洪武四年正月戊申”条，第1181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24“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条，第3278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76“洪武五年十一月壬子”条，第1403页。

〔4〕〔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冬十月丙辰”条，第1820页。

〔5〕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83页。

〔6〕〔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06“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条，第3075页。

〔7〕邓庆平：《州县与卫所：政区演变与华北边地的社会变迁——以明清蔚州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3页。

年蔚州建卫在《明太祖实录》有记载之后，如东胜、甘肃卫之命运，直到洪武晚期才再次载录。明朝既如此重视太行山防御体系，而且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前明朝西北疆界实止于东胜，很难想象明朝会在山后、口外北元仍不时南下之地区仅设置州县。因此在洪武四年应设置了东胜卫。

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朝鉴于东部边疆大体已经营完成，遂开始加强西部边疆经略，具体措施便是在阴山南疆众建诸卫。“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迤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扰于民。”[1]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便是东胜卫的复置。但与洪武初年东胜是否建卫扑朔迷离相似的是，关于东胜卫位置与数目却有很大争议。三月后，明朝正式设立十七卫。“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2]关于东胜卫所在位置，洪武二十五诏书明确记载东胜处于大同以东。达力扎布据此认为东胜卫置于大同以东。[3] 但这与东胜地望恰好相反。薄音湖以大同以东未发现东胜卫遗址，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诏书称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等地之语，指出东胜卫应在大同以西东胜之地，《明太祖实录》所载东胜建于大同以东系误载。[4]

关于东胜卫数目，洪武二十五年诏明确宣称欲建东胜五卫，但洪武二十六年诏却称仅建东胜左、右二卫。关于从五卫至二卫之变化，伊志认为是二十六年二月罢中前后三卫，仅存左右二卫之缘故。[5] 周松则认为是合并之结果。[6] 但若仔细推敲，洪武二十五年诏只是称在东胜立五卫，并未称所有卫皆以东胜为名，若将东胜视作河套东北广大之地区，明人也确实往往将东胜视作河套东北广大地区之代名词，那么，将

〔1〕〔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20“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丁卯”条，第3225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25“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条，第3295页。

〔3〕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33－41页。

〔4〕薄音湖：《从明东胜卫到蒙古妥妥城》，载《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5〕伊志：《明代“弃套”始末》，载《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7期。

〔6〕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第103－104页。

周围玉林、云川、镇虏三卫包括进来，恰为五卫之数。《山西通志》（雍正）还认为定边卫亦在东胜之地，故当时实为“东胜六卫”。[1] 为何东胜设置六卫，洪武二十五年诏却仅称设置东胜五卫呢？这可能在于如《大清一统志》（乾隆）“洪武二十四年置定边卫”[2]或《山西通志》（雍正）“明洪武二十五年初，设定边卫”[3]所载的那样，定边卫已先行建立，故不在洪武二十五年诏所称“东胜五卫”之数。至于六卫所在地区，东胜左右二卫、定边卫皆位于东胜，《钦定续文献通考》则载玉林、云川、镇虏“在故云内、奉、靖三州及宣宁县相错之处”[4]，也在东胜地区。《读史方舆纪要》载丰州曾置戍。“明洪武七年，败寇于丰州，置戍于此，后废。”[5]

六卫之外，东胜还涵盖大同西南广大地区。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朝为充实东胜防御，增置二千户所。“置安东、沈阳二郡牧千户所。时韩府、沈府护卫官军先往东胜立卫，特置二所隶之。”[6]安东郡牧千户所后升级为安东中屯卫，长期驻扎朔州，后北迁至应州。[7]其地距东胜甚远，与最近之镇虏卫尚隔威远、平虏二卫。那么，是否洪武晚期东胜防御规划呈现插花格局呢？事实并非如此。威远卫、平虏

---

〔1〕〔清〕觉罗石麟修，〔清〕储大文纂：《山西通志》（雍正）卷4《沿革二·朔平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133页。

〔2〕〔清〕和珅等：《大清一统志》（乾隆）卷111《朔平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268页。

〔3〕〔清〕觉罗石麟修，〔清〕储大文纂：《山西通志》（雍正）卷8《城池·右玉县》，第289页。

〔4〕〔清〕高宗敕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30《舆地考·古冀州下·山西行都指挥使司》，第4667页。

〔5〕〔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1《陕西十·榆林镇·丰州城》，第2918页。

〔6〕〔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52“洪武三十一年夏四月丙申”条，第3644页。

〔7〕宣宗即位后，朔州卫军士白荣奏称：“建文中，诸卫皆以入内地，惟留安东中屯卫于朔州。”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洪熙元年闰七月戊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校勘本，第141页。鉴于白荣居于本地之缘故，其陈述应为可信，故而安东中屯卫最初位于朔州。不过后来迁于应州。“以山西应州充军死绝户官民地二百三十顷五十八亩有奇，给安东中屯卫军余耕种，从知州秦贵奏请也。”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47“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壬申”条，第2888－2889页。《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遂将安东中屯卫绘于应州地。

卫分别建于正统三年(1438)、成化时期。[1] 在此之前二卫所管辖地域,一直由镇虏卫、二千户所管理。由此可见,洪武晚期东胜防御体系西北起于黑河流域,东南止于山西三关,依托大青山、吕梁山脉之险要;黑河流域、黄河流域之丰沃,在河套东北外侧,构建起坚实的防御体系,充分弥补了大青山、吕梁山脉中间缺口之局限。东胜诸卫之后勤供应,除当地屯田外,还可能利用了河套地利。《山西通志》(雍正)载:"明洪武初,(东胜州)改建左右二卫,兵民皆耕牧河套中。"[2]

朱元璋鉴于东胜控遏黄河东西,因此对其非常重视。洪武三十年(1397)颁晋王圣旨称:"一件,东胜至黄河几里?在东南、正南、正西?画图本来。就丈量水面阔狭。一件,天桥子至保德州几里?在保德州何方?又至东胜几里?就画在图子上来,丈量阔狭。"[3]朱元璋不仅亲自指定卫城建筑规模,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指示晋王"东胜城子筑二十里",玉林卫亦修筑甚固,洪武三十年四月,"辛卯,上以书谕今上曰:'玉林、天城皆西北要地,非坚城深池,不可以守。今山西军已筑玉林城……'"[4],以都指挥同知管理云川卫。"辛卯,城云川卫,命山西都指挥同知王仙领兵置堡屯种"[5],而且鉴于"来东胜军马多",设置山西分都司。明代于各省、边地设置都司、行都司,以掌军卫、镇遏地方,是明史研究之常识。但除此之外,明初还曾在个别特殊地区临时设置分都司,以加强控制。"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十一日,于斋宫前南廊下,奏准升除房昭去东胜掌印。"掌印亦有掌东胜卫印之可能,但后日之圣旨,却显示并非如此。"同日(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十三

---

[1]"丙戌,设大同威远卫。先是,行在刑部尚书魏源、总兵官左都督陈怀等言:大同净水坪系鞑贼出没要地,宜设军卫。事下,行在兵部议行。适巡按监察御史陈谷奏:平定州、蒲州二守御千户所军有全伍,又增寄操军千四百六十余人。宜调补他处。兵部请以二所多余军调净水坪,立威远卫。从之。"参见《明英宗实录》卷40"正统三年三月丙戌"条,第769-770页。"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户部尚书余子俊奏大同西路新设平虏卫,缺骑操马,乞于顺天府寄养马给一千匹,以备战守。从之。"参见《明宪宗实录》卷252"成化二十年五月甲寅"条,第4272页。

[2][清]觉罗石麟修,[清]储大文纂:《山西通志》(雍正)卷34《水利·黄河》,第163页。

[3][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99页。

[4][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辛卯"条,第3641页。

[5][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38"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辛卯"条,第3472页。

日),奏山西都司并行都司有年深未升除的指挥,当升除。奉圣旨:升除他。当时奏东胜等处定卫分时,东胜必是总去处。奉圣旨:明日分都司去。当时就奏着房昭那里掌印,奉圣旨:是。一个也少,再得几个。钦此。"房昭既以年深指挥升除,当升都指挥官职,赋予其"分都司"之权责。洪武三十年,朱元璋颁晋王圣旨称:"如今别处马且不出去了,只着行都司的去东胜,会一会哨马,出的远着。"[1]可见,朱元璋实将东胜左、右二卫定位成东胜地方诸卫之中间枢纽与核心机构,是东胜六卫二所事实上之居中统率之地。可以佐证此观点的是,《革除逸史》记载"靖难之役"中,受建文朝廷委派,"大同守将都指挥房昭引兵由紫荆关趋西水寨"[2]。房昭不仅统领军务,而且可以荐举官员。"同日(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十四日),奏见起民丁东胜立卫屯种,正可将房昭等升除的官员,便去管定。奉圣旨:是。钦此。"[3]东胜遂成为与大宁、开平同等重要之漠南前沿军事核心。洪武三十年六月初七,朱元璋敕晋王称:"探马程途,以大同、开平、东胜三处为根本。"[4]故而朱元璋于此三地加强粮草储备。洪武三十一年,

> 上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大宁、开平二卫盐粮若储偫已多,则令商人输粟于东胜、西河,以备军饷。"新言:"大宁储粟六十二万余石,开平止二万五千八百石,甘肃亦不过一十五万二千石。其商人所入,未宜改输。"上曰:"大宁姑罢,若开平储至四十万亦宜止之,俱令转输东胜,其价与大宁同。西河之储姑俟甘肃积五十万石,然后再议。"[5]

洪武时期东胜诸卫之建设,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复现了中原王朝

---

[1][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99页。

[2][明]朱睦㮮:《革除逸史》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542页。

[3][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90页。

[4][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102页。

[5][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56"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条,第3695-3696页。

强盛时期沿河筑守之军事格局，但另一方面在地理方位与战略态势上却有很大的欠缺。秦汉修筑阴山长城，阻隔匈奴南下河套[1]；唐于阴山以南筑三受降城，由西至东，全面弥补覆盖河套北部，完全弥补阴山山脉缺口。与之相比，明朝鉴于北元余部仍居大漠东部，东胜诸卫位于东受降城及其以东，既控遏蒙古由东北而来，进入河套道路，又屏蔽大同、山西，阻其东进内地之路。辽、金、元时代，东胜一直与山西属同一行政区划，[2]明初东胜诸卫也一直隶属、依托山西行都司，而非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或宁夏五卫之设计，更使东胜诸卫在边防体系中，与山西防御体系属于一个区域，无论屯田、筑城或者防御，皆与山西在同一机制，而与河套、陕西、宁夏则在制度上并无关联，在地理上也处于不同区域甚至遥不可及。对此，明人亦颇知悉。尹耕称："弃东胜。……由是偏头邻于犬羊，而全晋以北单矣。岂惟全晋五原、云中，赵武灵所欲下甲咸阳者也，此而不守，则右臂断，全陕危矣。"[3]万历年间，"兵部复议国初守在东胜，其后退保偏关，已非盛时事。"[4]廖希颜称："三关以东胜、大同为屏蔽，其略之也，宜也。"[5]万历年间宣大山西等处总督杨时宁称："北虏据东胜而三关困矣，西虏据河套而偏老危矣，泽、潞、太原、忻、代相继而犯，而全省且骚动矣。"[6]天启年间张萱称：

黄河东北，旧有东胜城，与大同大边、兴和、开平相联通为一

---

[1]翦伯赞认为："汉王朝在阴山一带的战略部署，至少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阴山北麓的峪口和更远的地方，第二道防线是阴山南路的峪口，第三道防线是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一带。"参见翦伯赞：《内蒙访古》，刊于《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

[2]辽、金时期，东胜与大同诸地皆同属西京道或西京路，参见[元]脱脱等：《辽史》卷41《地理志五·西京道》，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14页；参见[元]脱脱等：《金史》卷24《地理志上·西京路》，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69页。元时，东胜与大同诸地皆属河东山西宣慰使司，参见[明]宋濂等：《元史》卷58《地理志一·河东山西宣慰使司》，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376页。

[3][明]尹耕：《两镇三关志》卷9，藏国家图书馆。

[4][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44"万历三年十一月庚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校勘本，第991页。

[5][明]廖希颜：《三关志·志引》，见《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74页。

[6][明]杨时宁等：《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山西镇图说》，见《玄览堂丛书》，影印明万历癸卯刻本，正中书局（台北）1981年版，第401－402页。

边，外狭内宽。复设偏头、宁武、雁门三关十八隘口于内，以为重险。往年，东胜、开平能守，三关未为要害。正统以来，东胜、开平俱失，三关独当其冲，特无住牧之虏，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后，虏住套中，地势平漫，偏头关逼近黄河，焦家坪、娘娘滩、羊圈子地方，皆套虏渡口，往来蹂践，岁无虚日，保障为难。今三关要害虽同，偏头尤急。[1]

可见，东胜卫之设置只是在客观上成为河套外层防线，与河套本土并无制度关联，并不能作为明初河套属于西北边疆典型差缓地带与弱点之地的反证。但无论如何，朱棣内徙东胜诸卫，仍然使河套失去了北部屏障。“命都督陈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移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蓟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其天城、阳和、宣府前三卫仍复原处。”[2]

此后明朝虽屡有建议复置东胜卫者，但一直皆未付诸实施。永乐四年(1406)，宁夏镇总兵官何福请求复置东胜卫，[3]朱棣并未同意。“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善。颁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4]但朱棣最终并未实行。宣宗即位后，在复兴文治时代背景下，亦不愿劳民，遂亦不复东胜诸卫。

朔州卫军士白荣言：“大同、蔚朔古云中之地，西北皆沙漠。国朝设行都司于大同，又设东胜、高山等十卫缘边守御。建文中，诸卫皆移入内地，惟留安东中屯卫于朔州。乞以高山等十卫仍旧守边，则虏寇不敢窥伺。”上谓行在兵部臣曰：“天下无事，边防正当严饬。况西北尤为切要，但军士安居既久，一旦遽迁，恐人情不

〔1〕〔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2《兵部一·边防前上·三关·前言》，民国排印本，收入《元明史料丛编》第2辑，文海出版社(台北)1984年版，第4145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校勘本，第223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4“永乐四年五月丙辰”条，第810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9“永乐四年九月癸未”条，第863页。

便。其会五府、六部官计议以闻。"[1]

英宗即位后,大同镇亦有复设东胜四卫的建议,同样仍未获允。

壬辰,益大同备御兵。先是,镇守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方政等奏:大同地临极边,东西相去千余里,见操官军数少。乞将山西行都司旧属东胜左右、镇朔、定边四卫官军调来分守。廷议以四卫自永乐间安插永平等处已定,难以调移。故止于偏头关见操官军内选一千员名益之。[2]

正统三年(1438),又有请立东胜卫者。

山西安东中屯卫百户周谅言:"故东胜州废城西濒黄河,东接大同,南抵偏头关,北连太山、榆阳等口,其中有赤儿山,东西坦平,二百余里,其外连亘官山等山,实胡虏出没、往来必经之地。臣愚以为若屯军此城,则大同右卫、净水坪、偏头关、水泉堡四处营堡皆在其内,可以不劳戍守。每遇冬月,就命将统领四处守备,官军于此驻扎备御,待春乃回。既不重劳军马,又不虚费粮储,非惟借以捍蔽太原、大同,而延安、绥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部请敕大同总兵等官陈怀等议以闻,从之。[3]

仍未获允。[4]《两镇三关志》载"土木之变"后东胜卫始内徙。"弃东胜。国初,置东胜诸卫,然多事草创,什伍虚耗。至是,虏寇拥逼,诏徙诸卫内地,遂弃东胜,此我朝不复四郡之实也。"[5]《延绥镇志》(万历)载正统年间放弃。"东胜州。黄河东北曲之外。正统间弃而不守。"[6]《明史》记载正统时期曾复置东胜卫。"正统三年九月复置,后仍废。"[7]这些记载皆不正确,若正统时期东胜卫复立,兀良哈亦不会轻

---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洪熙元年闰七月戊申"条,第141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7"宣德十年秋七月壬辰"条,第142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6"正统三年九月癸未"条,第887页。

〔4〕〔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大同府·东胜城》,第2000页。

〔5〕〔明〕尹耕:《两镇三关志》卷9。

〔6〕〔明〕郑汝璧等修,〔明〕刘余泽等纂,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延绥镇志》(万历)卷2《古迹·东胜州》,第123页。

〔7〕张延玉等:《明史》卷41《地理志二·山西》,第973页。

易屯居、越过此地，进入河套地区。[1] 事实上，正统时期明朝已视东胜为境外。正统三年十二月，“敕大同等处总兵官都督陈怀等曰：‘近得镇守延绥都指挥王祯奏：累次瞭见境外东胜缘山一带烟火，必是胡寇在彼出没。卿等其整军严备，务在殄灭，以肃边境。’”[2]

2.5 明前期宁夏河套内层防线与大同、山西协防河套机制

由于明初并未于河套设兵防守，北部东胜又以河东防御为重心所在，因此河套地区防御十分薄弱。为弥补这一空虚状况，明朝以宁夏军队由西南向东北方向，与陕北军队由南向北，一同负责河套内层防线，并以山西、大同、延绥由北、东、南三面一同拱卫、协防河套，即由内核心边疆防御体系向外支持外核心边疆防御体系。

明初宁夏构建河套内层防线之结论，从明前期成书之《宁夏志》的宁夏镇疆域记载便可看出。由朱元璋第十六子，分封宁夏之庆王朱栴最终在正统二年(1437)完成的《宁夏志》一书，是明代较早完成的地方志，也是详细记载明前期宁夏镇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该书记载了宁夏镇的疆域远远超过所谓的宁夏五卫，而是包括了比后世宁夏镇广阔得多的广大地区。“东至延安界倒塔儿，南至平凉界白崖子，西出贺兰山接沙漠之地，北亦地连沙漠。东南至庆阳界清平关，西南至凉州界大沙子，东北至东胜，西北至亦集乃。”[3] 由于《宁夏志》并未指明此处所载疆域属于宁夏镇哪一时期，但从明代北部疆域不断缩小，陕北亦逐渐独立成镇的历史趋势而言，宁夏镇疆域其实是呈现逐渐缩小的历史过程的。因此，这一其他史料皆未记载的广大疆域，应是

---

〔1〕相应地，当代学者据之以为正统时期东胜卫复置的结论也不正确。参见伊志：《明代“弃套”始末》，载《禹贡》(半月刊)1935 年第 2 卷第 7 期；胡凡：《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8 年，第 44 页。王天顺认为宣德元年复立东胜卫的观点也不正确，参见王天顺：《河套史》，第 339 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 49“正统三年十二月乙亥”条，第 952 页。

〔3〕〔明〕朱栴撰修，吴忠礼笺证，刘忠芳审校：《宁夏志笺证》卷上《疆域》，收入《宁夏史料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 页。

洪武时期便已奠定。朱橚从其至国之始记起，并采用竭力刻画宁夏盛世之角度，从而将洪武时期的这一最大疆域记载了下来。而正统时期宁夏镇所实际控制的地区，应较这一记载为小。

从《宁夏志》所载宁夏镇东北界至东胜、西北界至亦集乃来看，宁夏军队或宁夏镇一度成为大同之内，延绥、甘肃之外的中间防线，管辖地域包括了黄河以南与甘肃边外的广大地区。相应，整个河套皆在宁夏军队控制之下。不过由于明初甚至明前期，明朝、蒙古在河套战事较少，宁夏在河套境内的活动很少见诸记载，因此宁夏军队及后来的宁夏镇是以河套作为其防御的重要地区，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本土防御之外的附属地区，皆不得而知。若单从地理位置而言，宁夏不仅与河套相隔黄河，除了冬季结冰之时可以自由出入外，其他时期进入河套存在一定难度；在地理上也确实存在一定距离，实难将之作为一个与本土同等重要的地区重点防御。故而，宁夏军队虽然与陕北军队一同构建了河套内层防线，与大同、山西所负责的河套外层防线形成内外两层防御体系，但从实际之可能性与历史记载来看，皆非河套本土防御力量，也与河套关联较少。因此，将大同、宁夏甚至延绥、山西引入河套范围，容易导致以河套周边防御情形遮蔽河套本土防御，并不利于揭示明前期河套本土的防御缺失与明中期蒙古得以轻易进入河套的背景，是一种笼统甚至错位的做法，并不适当。

不过，周松将察罕脑儿作为河套内部的一处军事机构，值得进一步考察。达力扎布指出明初在河套以内今内蒙古乌审旗内古城处，为北元降众设立察罕脑儿卫。[1] 周松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认为明朝曾于洪武七年，在榆林、神木一线以西的无定河流域设置察罕脑儿卫，以加强河套防御，洪武九年(1376)废弃。[2] 但从《明实录》所载来看，察罕脑儿实处宁夏之地，并不在河套以内，也主要是为宁夏防御，而非河套防御所设。“洪武三年十二月，户部言陕西察罕脑儿之地有大小盐池，

[1]达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载《蒙古史研究》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周松：《明初察罕脑儿卫置废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设盐课提举司，捞盐夫百余人，蠲免杂役，专事煎办。行盐之地，东至庆阳，南至凤翔、汉中，西至平凉、北至灵州。募商人入粟中盐。”[1]察罕脑儿行盐之地既东起庆阳、西至平凉，北起灵州、南至凤翔，皆在宁夏、陕西境内，察罕脑儿亦应地处四地之间，位于宁夏、陕西境内，而非东北之套内。洪武七年，“诏立察罕脑儿卫指挥使司，以塔剌海等二人为指挥佥事，以来降副枢撒里答歹为卫镇抚”[2]，这一记载亦未交代察罕脑儿具体位置。察罕脑儿卫既很快废除，但洪武末年察罕脑儿盐池计有13处之多。“庚午，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冯溥言：甘州中纳潞盐，人稀少，盖是各处盐池常以私盐侵鬻，故官盐沮遏不行，请禁之。上命户部遣人封闭延安、绥德、庆阳三郡盐池，仍令军士巡逻察罕脑儿一十三池之地，有以私盐出境者罪之。”[3]如果察罕脑儿位于河套，且当地无军政机构管理，这是超乎常理、很难想象的事情。洪武三十年诏载“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4]，叙述顺序是从东胜，沿河套西北、西部至西南，察罕脑儿应在黄河宁夏段东部，庆阳之东、灵州以南，大体应在宁夏后卫之地。其他史料亦可印证此观点。成化二年(1466)延绥纪功兵部郎中杨琚奏请榆林“宁塞营移察罕脑儿等处，直与安边、定边相对”[5]。

从产盐重心、战略地位、地理条件与防御情况等因素综合来看，察罕脑儿应处花马池一带。花马池位于河套西南，属宁夏后卫，分布着大片盐场，至今仍是陕西产盐最多之地区。察罕脑儿既以行盐著称，其位置在花马池最为可能。元代设置察罕脑儿，以充驿站，自应选择地势重要、交通便利之所。花马池地处河套、榆林、宁夏交界地带，是四通八达之地，明中后期花马池之所以成为宁夏镇边防重心，便在于套部屡次由此突破榆林、宁夏长城之阻隔、进入内地。因此之故，防秋之时，陕西三

---

〔1〕〔明〕劳堪：《宪章类编》卷20《盐法》，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六年自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4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91“洪武七年秋七月丁亥”条，第1598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47“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庚午”条，第3586页。

〔4〕〔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49“洪武三十年十二月”条，第3613－3614页。

〔5〕〔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27“成化二年三月己未”条，第539页。

边总督便移驻于此。嘉靖年间，兵部奏称："宁夏花马池虏骑冲突之所，最要害也。近议每秋总督亲往调度，此诚扼吭先制之计。"[1]"按全陕以延、宁为藩篱，花马池为户门，固原为堂奥，故督府岁于花马池，秋防盖亦居中乘便之意。"[2]

此外，花马池因有湖水，故水草颇丰、宜于畜牧，非常符合永乐年间宁夏总兵官何福所述察罕脑儿之地理条件。"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按视陕西所属平凉等府堪牧马之地十有八处：宁夏之察罕脑儿、铁柱泉……"[3]铁柱泉正处花马池之西南。正因花马池水草丰茂，从而成为明朝畜养战马、加强供应之所。正统元年（1436），宁夏总兵官史昭奏："灵州千户所达军别黑的等家马多者千余匹，少者七八百匹，牛羊动经万计，俱在花马池等处山东一带草地牧放，看马达达军余就于各山居住。"[4]蒙古南下之时，若得花马池之补给，也有利于其在内地停留更长时间。

从明前期花马池防御薄弱之状况亦可看出察罕脑儿曾设于此处。正统元年，"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奏宁夏城池、屯堡、营墩俱在黄河之外，备御西北一带。其河道迤东至察罕脑儿，直抵绥德，沙漠旷远，并无守备。拟于来春相地于花马池筑立哨马营，增设烟墩，直接哈剌兀速马营。从之。"[5]花马池既有盐业，又富水草，于此要地，明前期竟未有驻军，最为可能之解释是察罕脑儿在洪武时期一度设废之后，明朝便未再经营。永乐十年（1412）宁夏总兵官柳升"奏请修筑察罕脑儿旧城，河冻之时，拨军巡逻"，不被采纳[6]之事正与花马池防御薄弱情况相吻合。总之，察罕脑儿之居于花马池一带，可以做出肯定之判断。所谓察罕脑儿位于乌审旗之判断，从正统年间明朝已划河套于境外，成化

---

〔1〕〔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244"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壬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校勘本，第4917页。

〔2〕〔明〕张雨：《边政考》卷3《固原卫》，收入《中华文史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华文书局（台北）1969年版，第206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61"永乐四年十一月壬午"条，第885－886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6"正统元年夏四月庚申"条，第320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乙巳"条，第436页。

〔6〕〔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30"永乐十年七月辛卯"条，第1608页。

年间明人不可能奏请将宁塞营移于孤立境外便可看出其误。

因此，虽然洪武时期察罕脑儿应具有防御河套之责，但由于很快罢废，其对于河套防御之作用甚小。不过可以想见的是，洪武时期宁夏其他地区军队具有防御河套之责。永乐时期，伴随东胜之内徙，宁夏镇对于河套之防御职责应呈现增重之势，管辖之地进一步由黄河以内延伸至黄河以外，即狼山、乌拉山以南，其证据便是永乐时期宁夏镇对东胜旧地的关注。永乐十年，宁夏镇总兵官何福请求重设东胜卫，但朱棣并未同意。"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善。颁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1]而另一项佐证，是宁夏镇军队进入乌拉山以南。永乐十年，朱棣尚命宁夏总兵官柳升防御驻于黄河东北断头山之地的"叛虏毛剌等"。[2] 虽然东胜未能恢复，但很可能在这一时期，何福于河套东北角至宁夏北部，也即宁夏原来所负责的内层防线区域，构建了防御体系。"者者口，在河套北，北敌入套之冲也。明初置墩四十于黄河南，列障者者口以为守御。又有加塔、剌马、安赤步等口，俱为守御处云。"[3]周松依据成化年间，兵部尚书王复奏称"洪武间，东胜迤西，路通宁夏，墩台基址尚存。永乐初，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4]认为这一墙垣是洪武时期所筑，以防御蒙古。[5] 明人魏焕《皇明九边考》更认为河套长城于洪武时期便已放弃。"今按河套边墙，自国初耿炳文守关中，因粮运艰远，已弃不守，城堡、兵马、烽堠全无。"[6]但洪武时期，明朝仅在山海关之地构建墙垣防御形式，并不见有其他地区尤其经略差缓之西北边疆筑墙之记载，而且洪武晚期明朝漠南经略中，以构建东胜诸卫攻防体系为核心，即在黄河以北重点防御，没必要于黄河以南修筑纯粹防御形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9"永乐四年九月癸未"条，第863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30"永乐十年七月丁未"条，第1612页。

〔3〕〔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1《陕西十·榆林镇·白城子》，第2938页。

〔4〕〔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40"成化三年三月丙寅朔"条，第799页。

〔5〕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第107－108页。

〔6〕〔明〕魏焕辑：《皇明九边考》卷1《镇戍通考·边墙》，第13页。

式之墙垣。不仅如此,且不论王复所论洪武时期修筑墙垣之说是否属实,其关于永乐初弃河不守之结论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可见,河套墙垣最早应修于永乐时期。而《明实录》中所载河套最早出现长城设施亦是在永乐时期。正统时期,宁夏参将王荣奏:"宁夏官马永乐中每年四月,俱于高台寺至陆墩沿河一带,地阔草蕃之处牧放。比至五月,移于高家闸、白烟墩、观音湖凉爽水冷之处。水草以时,马得蕃息。"[1]高台寺在今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高台寺村。陆墩、白烟墩之名反映出永乐时期河套西南亦建有墩台。这一事实大体也可作为墙垣亦创于永乐时期之侧证。何福之后,宁夏镇总兵、主将皆再未有积极经营河套之建议,因此河套长城应为何福于永乐初年修筑而成。清初查继佐也指出这一墙垣之修筑始于东胜内徙之后,即永乐时期。"国初,敌迤河外,延绥以宁。自东胜既失,北马南渡,始创边台墩垣于河之口。"[2]宣德以后,鞑靼进入阴山南疆,西北边疆逐渐多事,宁夏镇防御之地主要限于贺兰山西北地区,河套防御遂由陕北军队及天顺时期新建之延绥镇负责。

永乐时期,明朝虽然内徙东胜诸卫,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东胜之地,只是对这一地区控制减弱,仍由原来负责该地防务的大同军队派人巡逻而已。永乐元年,"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奏所辖之地,西北接东胜、黄河,盖胡虏出没之路。宜自下水海北直抵把撒站,皆分戍巡逻,择才干都指挥更番提督,有警则驰报,庶几斟酌行事,不致失机。从之。"[3]这一奏疏已明确表明山西行都司仍管辖东胜之地。至于下水海,又称奄遏下水海,即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岱海。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奄遏下水海,在[大同]府城西北二百里,水潮无常,纳大涧、小涧、大汇、小汇四河及银海水诸细流。"[4]永乐七年(1409),明朝又曾欲在东胜重置卫所,但最终并未实行。"戊午,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03"正统八年夏四月庚子"条,第2085页。

[2][清]查继佐:《罪惟录》卷12《九边志·延绥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0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丁卯"条,第347页。

[4][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21《大同府·山川》,第1362页。

抚夷之道,须要以信义。今北虏欲遣使修好,朕推诚抚纳,加以恩意。尔但严斥堠、固疆圉,巡逻不须远出,使之不疑耳。所奏欲徒前大同左右二护卫于定边、镇朔备御,可即行之。"[1]那么,为何山西行都司在西北的防线呈现如此形状呢?这在于甘肃镇、宁夏镇之间的巨大空间,即乌鞘岭、贺兰山之间是滕格里沙漠,明朝鉴于该地生态条件不适宜农耕,从而并未设置重兵防守。于是蒙古便利用这一空缺,沿贺兰山、祁连山、六盘山中间地区进入宁夏、甘肃、陕西接壤之陇中高原。由于大松山、小松山控制这一道路的咽喉,明后期该地也成为蒙古重点盘踞之地,可称之为"松山走廊"。[2] 松山走廊不仅地势平坦,正统三年(1438),凉州右副总兵都督同知赵安奏:"镇番、永昌抵庄浪,黄河千有余里,无高山险阻,贼人出没路多而哨备军少",[3]利于骑兵奔驰,[4]而且水草丰茂、农牧皆宜,是适合蒙古进入、盘踞之地。"洪武以来,虏出入河套,往来甘凉,皆自贺兰山后取道。自总兵杭雄败后,遂以山前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91"永乐七年闰四月戊午"条,第1196页。

[2]1985年,费孝通从民族学的角度,将青海与陕西交界的地带称作"陇西走廊"。"我这次从兰州去甘南是沿洮河,靠着陇西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南下的。到合作就跨入了青藏高原的东界。紧接青藏高原的这一线黄土地区出现了一条成分复杂、犬牙交错的民族地带,不妨称之为陇西走廊。在现有的分省地图上,这条走廊正是甘、青两省接壤地区,往南延伸便到云贵高原的六江流域。这里是对民族研究工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地区。"参见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甘南篇》,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1987年,又在考察撒拉族的途中,进一步说明了陇西走廊的性质。"我这几年多次去甘肃、青海,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处于青藏牧区和中原农区之间的那一条历来是农牧桥梁的陇西走廊。"参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撒拉餐单》,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当年,又在考察甘肃临夏途中,进一步界定了陇西走廊的范围。"这条走廊沿着甘青两省边界,北起祁连山,南下四川,接上横断山脉的六江流域。民族成分颇为复杂。"参见《费孝通文集》第11卷《临夏行》,第113页。本书所提出之"松山走廊",在部分地域与"陇西走廊"有所重合,不过显然二者前者尚包括甘肃、宁夏交界处,后者尚包括四川部分地区;前者系从军事角度着眼,后者系从民族角度着眼。因此,两种概念皆充分注意到了甘肃、陕西之间水道之重要性,但显然问题意识与地理范围有不小区别。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正统二年六月庚午"条,第614页。

[4]贺兰山最初森林茂密,成为阻止蒙古军队进入之障碍,但由于不断砍伐,森林大量消失。正统五年,"参赞宁夏军务右佥都御史金濂言:贺兰山所以障腹里要害,往者林木生翳,骑射碍不可通。比来官校多倚公谋私,深入斩伐,至五六十里无障蔽。有如樵采者,猝为虏所得,致知我虚实,豕突入寇,即无以阻遏之。请自今凡百材木需,用于雪山取之,不得于贺兰山纵伐,以规利目前,贻患无穷。上从之,敕宁夏总兵官都督史昭严加禁约。"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72"正统五年冬十月甲午"条,第1403页。

为通衢。”[1]而其底部，即陇中高原，分布湟水、洮水等水系，是西番、蒙古、回回遍布错居之地。因此之故，松山走廊虽然居于明朝北疆防线之内，但却与蒙古草原遥相呼应，是容易与大漠势力形成联系之异族地带。清修《明史》，在评价甘肃镇之建设时，认为“原夫太祖甫定关中，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2]明后期西海蒙古之形成，便是鞑靼通过河套地区与松山走廊，进入青藏高原东部西海之地，即今青海地区，利用当地水草丰沃条件，与土蕃相结合之结果，对晚明西部边疆形成严重威胁，延续至清前期，更成一巨大边疆祸患。由于松山走廊处于大同、甘肃、宁夏、陕西之间，是明朝军事经营薄弱地带，在永乐时期宁夏镇依河而守之内缩格局下，这一通道便成为蒙古军队进入陕西内地的主要通道。鉴于这种地缘政治形势，明朝遂以山西行都司形成这一流动防线，与宁夏镇共同防御河套东西之地。

大同镇之外，明前期山西军队亦曾管辖河套东北黄河岸边之地。永乐元年(1403)之后，为弥补绥德距离府谷遥远、难于应援之缺陷，山西军队遂兼辖黄河以西。

> 掌后军都督府云阳伯陈旭等奏陕西延安府府谷县灰沟村黄甫川，虽延安属地，然相离五百余里，猝有缓急，应援不及。比者虏入其地，杀掠人畜，山西巡边将士相去仅十五里，乃曰非吾境内，拥兵不救。请治其罪。上曰：“吾令吴高守大同，此高之过也。忠臣为国，知无不为。况边将以御寇为职乎？其移文切责之。”又曰：“姑宥之，复尔必诛不释。”[3]

这同样也是后来大同镇之西界。比如吴高所筑烟墩，便西到灰沟村。《皇舆考》载大同镇西至平虏城，《武备志》载西至井坪，《九边图说》载

[1]〔明〕许论：《九边图论·宁夏》，嘉靖十六年谢少南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30《西域传二·西番诸卫》，第8549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6“永乐元年十二月甲午”条，第485页。

西至丫角山,[1]只是标识不同,指代范围一致。

2.6 明前期陕北拱卫河套与其"差缓"地位

河套内层防线的另一来源是陕北军队,即延安卫、绥德卫,主要由后者由南向北,负责河套东侧沿循黄河的"锥形"地带。而似乎深入河套东南的府谷、神木军队在一定程度上,由宁夏镇总兵官节制,与宁夏镇一同构成河套内层防线。

河套以南是太行山、秦岭、祁连山包围之广大黄土高原,其最北部,即陕西北部,简称"陕北",[2]包括今延安、榆林二地,属内核心边疆。由于陕北属典型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地处气候半干旱向干旱、经济农业向牧业转变之过渡地带,因此历来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争夺、拉锯之地,宋代以前并未形成统一之政治、经济中心。北宋时期,因榆林部分地区为西夏所占,延安遂控遏西北。"宋以西夏凭陵,置重镇于延州,往往选将屯兵,与诸路相声援。王庶曰:延安,五路襟喉也。金人之窥关陕也,恒自山西渡河,亟犯延安。延安陷则南侵三辅,如建瓴而下矣。"[3]宋朝遂于延安设府,负责管理陕北地区政治、经济事务。榆林地区为北宋、西夏拉锯之地,双方皆于此设置军事机构。在北宋、西夏百年战争中,北宋基本占据了延安、绥德地区,分别设置定边军(今甘肃省庆阳市环县东北)、保安军(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与绥德军

---

[1][明]张天复:《皇舆考》革集《九边·大同三关内》,收入《中华文史丛书》,影印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嘉靖刻本,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143页;[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06《占度载·镇戍三·大同》,第273页;[明]霍冀:《九边图说·大同镇图说》,收入《玄览党丛书》,影印明隆庆三年刊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台北)1981年,第142页;《续文献通考》亦继承这一观点,参见[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32《舆地考·边关上·大同》,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一年曹时聘等刻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3807页;罗哲文认为,"大同镇总兵驻地在今山西大同,管辖的长城东起镇口台,西至鸦角山,全长六百四十七里",参见罗哲文:《长城》,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2]"陕北"一词起源于1914年。关于陕北所辖范围,参见陈国庆:《走出中世纪的黄土地——20世纪初期的陕北农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3][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57《陕西六·延安府》,第2720页。

(今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西夏则占据了榆林绝大部分地区,设左厢神勇军司(今榆林市东南)、祥祐军司(今榆林市横山县东北)与嘉宁军司(今榆林市靖边县西北)。元朝统一中国之后,榆林地区既无战事,当地军事机构遂被裁撤,设绥德州领清涧、米脂二县;葭州领神木、吴堡、府谷三县,即二州五县格局,[1]皆隶属延安路。

明初袭元之旧,设延安府以统辖陕北,北部榆林地区仅设葭州,领吴堡、神木、府谷三县。[2] 此外,又设延安、绥德二卫,以负责陕北地区防务。可见,明初陕北形成以延安为政治、军事中心格局。宋代以来,延安之所以能渐成陕北中心地带,既与宋夏战争有关,亦与延安经济条件颇有关系。虽然延安、榆林同处气候、经济过渡地带,但延安地处南边,气候、土壤、河流等条件相对于榆林,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大明一统志》载延安"人勤稼穑"。[3] 延安遂成宋、金、元屯田中心。[4] 与之相比,榆林地区则"塞地不毛,耕织鲜资。厥有恒术,俭以助之"。[5] 除神木、葭县、吴堡与米脂等部分地区外,[6]大部分地带缺乏大规模推广精耕农业的地理条件,主要发展畜牧业。[7] 经济条件之不

---

[1]〔明〕宋濂等:《元史》卷60《地理志三·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第1426页。

[2]洪武时期榆林地区行政机构屡有变化。最初设绥德、葭州二州,分领米脂、吴堡二县;洪武七年,葭州降为葭县,隶绥德。参见〔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94"洪武七年十一月戊寅"条,第1638页。洪武十三年,葭州复升为州,领吴堡、神木、府谷三县。参见〔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134"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庚戌"条,第2130页。洪武十五年五月,"乙未,革绥德州,以其地益延安府。"参见〔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112"洪武十年五月乙未"条,第1857页。

[3]〔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36《延安府·风俗》,影印明天顺五年内府刻本,三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5页。

[4]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235页,第273-274页;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1页。

[5]〔明〕郑汝璧等修,〔明〕刘余泽等纂,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延绥镇志》(万历)卷4《风俗》,第271页。

[6]宋朝曾在以上诸地的部分地区进行过屯田。参见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第234-235页。

[7]〔清〕孔繁朴修,高维岳纂:《绥德州志》(光绪)卷4《风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成文出版社(台北)1970年版,第325页;〔清〕高珣修,〔清〕龚玉麟纂:《葭州志》(嘉庆)卷1《天文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嘉庆十四年修,民国二十二年重刊石印本,成文出版社(台北)1969年版,第13-14页。

同，造成延安、榆林社会风气之差异。“榆林人尚勇，武以斩馘为生计。……延安府人勤稼穑，俗尚鬼神。不崇侈靡，颇习程法。”[1]明朝同样以延安为陕北经济中心。当地既多田地，洪武二十六年，“宁夏以粮饷未敷，命庆王且驻庆阳北古韦州城，以就延安、绥德租赋”，[2]而且还是产盐之所，[3]明朝遂于此实行开中法，从洪武四年开始，招募商人赴延安、庆阳纳米，中灵州盐，其规格与平凉、宁夏、临洮、巩昌等要地一致，皆为纳米七斗，给盐一引，[4]从而为陕北军队提供后勤保障，而延安、绥地二地亦成为明初陕北军事中心。

洪武二年，明军已占领陕北大部分地区。洪武二年五月，“指挥朱明克延安，遂以明守之”。[5]“绥德、葭州守将孙知院、孔荣、关二俱诣大将军徐达降。达调指挥章存道、朱明等收集各镇官军分守之。”[6]延安、绥德军队与北元残余不断展开作战，最初作战目标尚包括东北方向，即河东、河西残敌，如洪武二年五月，“先是，元主北走屯盖里泊，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欲图恢复。至是，脱列伯被擒，孔兴走绥德，其部将复斩之来降，元主知事不济，无复南向矣”。[7]但随着大同兵围的结束，北元在山西力量已不复存在，明朝陕北防务完全转向西北地区，主要与来自察罕脑儿地区北元残兵展开作战。洪武三年十一月，赏陕西、兰州等处守御将士诏称：“延安、绥德地接察罕脑儿等处，元之残兵不时出没、剽掠边民。指挥朱明、李恪累出兵剿捕，杀获甚多，完筑城壁、固守疆境。”[8]在此条中，《明太祖实录》嘉本已载延安、绥德二

---

〔1〕〔明〕郑汝璧等修，〔明〕刘余泽等纂，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延绥镇志》（万历）卷4《风俗》，第271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24“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条，第3276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47“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庚午”条，第3586页。金代于绥德便已开采盐业。“（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以东胜与陕西道路隔绝，贸易不通，寻令绥德州置一场，仍许就馆市易。”参见〔清〕刘于义等监修，沈青崖等编纂：《陕西通志》（雍正）卷35《兵制·边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75页。

〔4〕〔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65“洪武四年五月甲子”条，第1229页。

〔5〕〔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42“洪武二年五月丁酉”条，第828页。

〔6〕〔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42“洪武二年五月辛酉”条，第838页。

〔7〕〔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44“洪武二年八月丙寅”条，第860页。

〔8〕〔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58“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条，第1137页。

卫。次月,《明太祖实录》晒蓝本亦载延安卫、绥德卫。“延安卫指挥李恪、绥德卫指挥朱明等追败故元残兵于燕山只斤,禽获五百余人。又攻阿不剌思寨,获马三百余匹。”[1]不过《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六年绥德始置卫。“置绥德卫,以宁夏卫指挥佥事马监为指挥使。”[2]在明军进逼下,察罕脑儿元军渐次归降。洪武三年七月,“故元参政脱火赤等自忙忽滩来归,诏赐冠服,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以脱火赤为副千户”。[3]“故元宣慰司佥事范自野自察罕脑儿之地来降。”[4]明朝遂就地设置察罕脑儿卫,安置降部。“诏立察罕脑儿卫指挥使司,以塔剌海等二人为指挥佥事,以来降副枢撒里答歹为卫镇抚。”[5]“戊申,故元官赤老温定帖干自察罕脑儿来归,赐衣帽靴袜。”[6]

不过蒙古余部仍不断进攻陕北地区。洪武六年二月,“故元将脱脱木儿犯庆阳、保安、会宁等处,延安卫发兵击走之”。[7]鉴于明蒙双方于陕北西北拉锯作战,明朝遂如同北疆其他地区一样,内徙边民。洪武六年十一月,“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子兴、都督佥事叶昇等奏绥德、庆阳之境,胡寇出没无常,民多惊溃,请迁入内地,听其耕种,有胁从诖误者招抚之。诏可”。[8]洪武五年,西路军北征亦集乃,当地“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师”。[9]西路军撤退之后,卜颜帖木儿尾随至宁夏境内。为彻底解决卜颜帖木儿之威胁,洪武八年(1375)明朝“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佥都督蓝玉、王弼,中书右丞丁玉帅师往延安防边”。[10]卜颜帖木儿在明军压力之下,被迫再次归降,亦被安置于察罕脑儿。“壬戌,以故元国公卜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

---

[1][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丁卯”条,第1156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春正月”条,第1434-1435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54“洪武三年秋七月丙申”条,第1061页。
[4][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63“洪武四年闰三月乙丑”条,第1206页。
[5][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91“洪武七年秋七月丁亥”条,第1598页。
[6][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95“洪武七年十二月戊申”条,第1645页。
[7][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壬寅”条,第1444-1445页。
[8][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十一月庚戌”条,第1526页。
[9][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74“洪武五年六月戊寅”条,第1358页。
[10][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103“洪武九年春正月”条,第1739页。

抚、千户、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1]可见,洪武初年陕北防务主要面向西北宁夏地区。在洪武晚期明朝征讨西番时,陕北亦是军队来源之一。洪武二十七年(1394),"遣中使谕陕西都指挥使司训练将士,北自延安、绥德,西自兰州,从魏国公徐辉祖等节制,候来春征讨西番"。[2] 洪武二十八年(1395),"丁亥,敕曹国公李景隆整饬陕西属卫士马,惟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及肃州、山丹、永昌、西宁、凉州诸卫从肃王理之,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从庆王理之,其余卫所除屯种外马步军士,悉令训练,以俟征调。"[3]甚至直到宣德年间,陕北军队仍被调往甘肃防边。[4] 正因为陕北与西北边疆关联密切,因此与宁夏、甘肃等一同被西域势力作为开展互市之地。"二月戊午朔,西域哈梅里王兀纳失里遣使请于延安、绥德、平凉、宁夏以马互市。"[5]

由于明初陕北明军主要面向宁夏后卫地区,因此对榆林北部,尤其东北部广大地区相应经略甚少,从而造成黄河以西,即河西府谷、神木、榆林这一"锥形"地区的防务问题。这一区域由绥德卫负责防务。洪武十五年,镇西卫指挥使司言:"保德州所属府谷县在黄河之西,田野荒芜、人烟稀少,本卫既分兵戍保德,绥德卫复分兵戍府谷。"[6]蒙古较大规模进攻这一地区时,延安地区亦会增派军队。[7] 但延安、绥德距河西之地十分遥远,颇有鞭长莫及之感。大同军队虽距陕北东北部颇近,但碍于并非本地防区,最初并无制度上协防之机制。有鉴于这种状况,宁夏总兵官何福请求加强神木防御。

> 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陕西神木县在绥德卫之外七百余里,盖极边冲要之地,虏之所常窥伺者。洪武中,每岁河冻调绥德卫官军一千往戍。后设东胜卫,又在神木之外,遂罢神木兵。今东

[1][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壬戌"条,第1670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条,第3426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丁亥"条,第3477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0"宣德七年五月丁丑"条,第2061-2062页。
[5][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07"洪武二十四年二月戊午朔"条,第3087页。
[6][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癸丑"条,第2273页。
[7][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4"正统元年十一月丙午"条,第478页。

胜卫率调永平、遵化，神木虽如旧戍守，然兵少不足以制寇。且县治在平地，四山高峻，寇至凭高射城中，难为捍卫。县城东山有古城，颇险峻，且城隍坚完，请移县治于彼，益兵戍守为便。上从其言，命于绥德卫再调一千户所往戍守。[1]

后世之神木堡便在此基础上建立。由此可见，宁夏镇似乎至少可以节制河套内的陕北军队。但一千户所对于河西防御来讲，实杯水车薪。这便使陕北东北、河西之地成为明初陕北防御薄弱地带。

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奏："陕西府谷、神木二县有逋逃军民百余家，有十丁、二十丁者，聚于边境野人沟等处，俱挟兵器，依阻山林、潜出境外，恐诱虏寇犯边。"上谓行在户部曰："安土重迁，人情之常，此皆军卫有司虐之，故不得已至此。"遂遣官赍敕贷其罪，俾回原伍复旧业。若怙终不回，必发兵擒捕，仍命所司若回则善加抚恤。[2]

不仅如此，虽然永乐时期明朝仍命河套周边军队协防河套，但仍未在此设置机构，因此河套并非明朝固定控制的正式疆域，或者说河套实已被弃于境外，朱棣相应视陕北为极边。永乐十五年(1417)，

丙申，敕掌陕西都司都督佥事胡原曰："边境屯戍，所以防御寇暴，所务甚重。如绥德极边之地，尤宜加意防慎。尔乃尽撤守备官军、营干他事，倘虏乘虚而入，何以制之？宜善计度，毋蹈失机之祸。"[3]

但在明初蒙古尚未进入河套之时，陕北尚不临边，俨然内地，因此明朝对陕北地区之经营，便较西北边疆其他地区更为差缓，经常抽调陕北军队至甘肃、宁夏防边。[4]

榆林镇前身，最初仅设榆林寨。洪武年间，榆林人口稀少。肖瑞玲等指出：元代延绥一带人口不足10万，明初经历战乱，绥德军民应不超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4"永乐四年五月丙辰"条，第810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2"宣德八年五月庚申"条，第2280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93"永乐十五年冬十月丙申"条，第2036－2037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0"宣德七年五月丁丑"条，第2061－2062页。

过二三万，主要居住于绥德及其附近。[1] 周松认为洪武二十五年以后，延安、绥德、庆阳兵力总数在17000左右，最多不超过2万人。[2] 张萍亦认为陕北布防较为轻弱。[3] 虽然明初有民众自发从山西迁至榆林，但规模很小。[4] 榆林最初是河套南缘的一个村庄。《延绥镇志》(万历)认为"榆林"得名，大概与当地榆树甚多有关。[5] 史念海也指出："明时始在这里置榆林寨，称为榆林应与当地有产这种树木有关。"[6]榆林"国初为榆林庄，本绥德卫屯所"。[7] "国朝洪武初，底定陕西，分拨绥德卫千户刘宠屯治。"[8]因属官方基层军事机构，故又称"榆林塞"或"榆林寨"，[9]当地有惠普泉。[10] 明人姚镆认为洪武年间，明朝在榆林设置了十八寨。[11] 正统以前，榆林一直为寨。可见，明初陕北布防延续宋元格局，重内轻外，在榆林广大地区仅设置极少兵力。"延绥二卫，设自明初，故屯地极辽阔。延安卫则西界环庆，绥德卫则东距黄河，绵亘于六七州县之间，几半延郡。即榆林最后设，而其屯亦千里而遥也。"[12]

总之，洪武、永乐之时，陕北地区所面对威胁主要来自漠西。由于

---

〔1〕肖瑞玲、曹永年、赵之恒、于永：《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页。

〔2〕周松：《明洪武朝陕北边防及其特点》，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3〕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

〔4〕陈智亮：《榆林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2页；《可爱的榆林》编委会：《可爱的榆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可爱的横山》编委会：《可爱的横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5〕〔明〕郑汝璧等修，〔明〕刘余泽等纂，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延绥镇志》(万历)卷1《镇名》，第26页。

〔6〕史念海：《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期，第168－169页。

〔7〕〔明〕张雨：《边政考》卷2《榆林卫·形胜》，第43页。

〔8〕〔明〕郑汝璧等修，〔明〕刘余泽等纂，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延绥镇志》(万历)卷1《建置沿革》，第27页。

〔9〕〔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1《榆林镇·榆林城》，第2909页。

〔10〕《可爱的榆林》编委会：《可爱的榆林》，第1页。

〔11〕〔清〕谭吉璁：《延绥镇志》(康熙)卷6－3《艺文志·巡抚延绥都察院题名记》(姚镆)，第542页。

〔12〕〔清〕谭吉璁：《延绥镇志》(康熙)卷3－2《官师志·武职》，第348页。

鞑靼居于蒙古高原中东部，瓦剌遥在岭北，故而所受威胁较少，明朝对于此地之经营相应较弱，故而这一时期陕北一直处于明朝北疆防御薄弱地带，属于西北边疆典型“差缓地带”。

2.7 小结

阴山、太行山东西两大山系夹峙地带处于气候、生态、经济过渡地带，不仅为中原王朝、北方民族各自屏障与通道，而且在经济方式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从而成为南北双方长期争夺、反复拉锯的核心地带，关系中国历史整体进程，可称为“核心边疆”。核心边疆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扩张政权、统一全国之“地理阶梯”与“经济过渡区”，或者合称为“过渡阶梯”。在占据这一区域之后，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从而获得了地理优势与经济补充，从而极大地壮大了自身实力。在这其中，河套正处大漠中心之南，三面环以山河，内、外核心边疆并无明显分割，阴山辐射之河套北部高原与黄土高原辐射之河套南部沙地自然地连为一体。相对于核心边疆其他地区之“分割性”，河套呈现出“整体性”特征。在经济上，南北地区分层并不明显，相对于核心边疆其他地区的经济方式的“分层性”，河套呈现出更多的南北一体的“混合性”特征。这种“整体性”、“混合性”特征使河套成为核心边疆最为完整的过渡阶梯，河套相应成为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之间重要的过渡地带与通畅的军事道路。简单地说，在军事地理层面，河套具有更为明显的“过渡阶梯”特征。

从气候、山川、生态、经济等各项地理因素而言，既为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提供了皆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又埋下了南北双方皆无法长期、稳定控制的地理隐患；在相对保持自身的封闭性、独立性的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与沟通性，从而处于南北之间，呈现典型混合性、动态性的过渡阶梯特征。正是这种居于中间地带的特征，使河套成为中国古代南北双方反复争夺、不断拉锯的核心地区。但由于近世时期中国北部边疆重心由“西北边疆时代”至“东北边疆时代”的转移，河套

由中古以前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争夺之“首要地带”与“优先地区”，逐渐转变为“差缓地带”与“次后地区”。由于近世时期政治重心东移，蒙古屠杀党项，以及成吉思汗葬地的原因，蒙元时代河套地位愈加下降。

明朝亦处东北边疆时代，北疆经营重心在太行山以东之地，在河套地区遂呈现延续蒙元脉络之态，明前期在河套几乎“空置”其地，并无军事经营。洪武初年短暂设置的察罕脑儿卫，亦处宁夏后卫花马池一带，而非河套境内。虽然东胜构成河套外层防线，宁夏、陕北构成河套内层防线，宁夏且有节制河套内部陕北军队之实，大同、山西亦有协防河套之势，但皆为附近区域之兼顾，河套本土除黄河东线内侧之少量陕北军队外，几无固定军事力量之驻扎，从而显示出明前期河套防御处于整个核心边疆防线最为薄弱之地，即“弱点”之地，并为明中期蒙古进入西北地区提供了过渡阶梯，鲜明体现了近世时期西北边疆差缓特征，成为明中期西北边疆连番变动的“源地”与“原点”。明中期以后，榆林军队明确将之视为境外，审视河套的标准从而由黄河北段改为河套南缘，“河套”之名亦由此而来。

河套战略地位的变迁反映出长期而言，地理环境虽整体决定历史进程，但短期而言，时代、政权乃至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主动角色。也就是说，地理环境不是静止不变的静态空间，而是应时而变的动态空间。这既是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必要观念，也是历史学的基本准则。所谓“地利不如人和”“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对于地理与政治关系的阐述，早已得出了辩证而深刻的结论。

3 “内政优先边防”政治文化与明前期撤离“阴山边疆”

3.1 绪论

明前期河套几乎处于“空置”无人之境，为明中期蒙古进入河套提供了条件。但由于这一时期明朝大体控制了漠南地区，尤其北起开平、西至东胜的阴山对应地带，本书称之为“阴山边疆”，故而河套虽未置防，却仍然得以长期免遭蒙古进攻。这一格局在明中期即正统以后发生了改变，蒙古一部之兀良哈开始进入河套。[1] 兀良哈地处脑温江（今黑龙江省嫩江），与河套相距遥远，如何能够越过阴山边疆，进入河套呢？这在于建文至宣德时期，明朝不断撤离阴山边疆，从而为蒙古南下提供了通畅道路。明朝前期国力相对于蒙古势力，仍呈明显优势，那么明朝为何撤离阴山边疆呢？这虽然与阴山边疆地理、气候、经济具有直接关联，但深层因素却是明朝在内政、边防协调平衡的“大战略”布局中，在“内政优先边防”政治文化的影响之下，出于巩固政权、节约财政等内政因素之考虑，采取了边疆内缩政策。本书借助对明前期撤离阴山边疆的过程及其原因的讨论，不仅揭示明朝失去河套的外在政治原因，而且试图勾勒明代政治文化在边疆开拓中所扮演的角色。

3.2 明初“阴山边疆”军事攻防体系

核心边疆尤以外核心边疆中心地带、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民族最外

[1]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28 页。

层防线之阴山边疆地位为最重。阴山是中国北部著名山脉,西端以低山没入阿拉善高原,东端止于多伦以西的滦河上游谷地,长约1000公里,其支脉由西至东依次为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凉城山、桦山、大马群山,不仅是横亘内蒙古中部之天然屏障,而且是季风气候与非季风气候,半干旱与干旱地带,草原与荒漠草原,农业与牧业之分界线,因此是中国古代"内边疆"北界所在,历来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竭力争夺、弥补自身不足的经营重心。汉至宋北疆战略格局之变迁,便充分显示了阴山边疆在中国古代北部边疆之中心位置,乃至在历史变迁中之引领作用。

> [黄]河之外阴山横亘,中外大限,常以此分。《史记》:赵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又始皇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傍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或谓之阳山。《蒙恬传》:恬筑长城,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是也。汉元帝竟宁初,呼韩邪愿保塞,因议罢边备塞吏卒。郎中侯应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唐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颉利于阴山,军于碛口,遂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景龙二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阴山皆为塞内地。至德以后回鹘盛强,阴山为所侵据。宋初属于契丹,后属女真,不复为郡县也。"[1]

唐人王昌龄亦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诗,[2]亦以阴山作为军事成败的表征。明人著《九边考》,从整体上概括了阴山边疆之战略地位。"自阴山而北皆大碛,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中国得阴

---

[1][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1《陕西十·榆林镇》,收入《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26-2927页。

[2][清]曹寅等奉敕编:《全唐诗》卷18《横吹曲辞·出塞》,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4页。

山，则乘高一望，寇出没踪迹皆见，必逾大碛而居其北，去中国益远，故阴山为御边要地。阴山以南，即为漠南，彼若得阴山，则易以饱其力而内犯。此秦、汉、唐都关中，必逾河而北守阴山也。"[1]可见，阴山边疆不仅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民族之连绵屏障，而且由于其具有广阔纵深与众多缺口，也为北方民族提供了南下通道与潜藏之所。为弥补阴山地形缺陷，中原王朝通过修筑长城，以堵塞缺口，阴山边疆相应成为中国古代长城重点分布之处。而北方民族也屡以越过阴山长城，打通阴山边疆，将其改造为阴山走廊作为军事重点。

洪武时期，朱元璋为了控制核心边疆，在两大山系之间重点构建了立体攻防体系。在内核心边疆，由东至西依次设立辽东都司、北平都司、山西都司、陕西都司与陕西行都司，以保障内地。利用太行山、长白山雨水冲刷而成的众多山口，构建了关隘防御体系，成为明长城的最早源头。在山海关之地修建了短距离边墙，同样成为明长城的另一源头。[2] 而为了在对蒙古长期战争中占据主动，朱元璋同样重视外核心边疆之经营，由东至西依次设立了北平行都司（大宁都司）、开平卫、兴和卫、东胜卫、亦集乃等军事机构。无论是内核心边疆军事设置，还是外核心边疆军事设置，皆呈现了东北边疆在次序上优先、在兵力上重于西北边疆之格局，鲜明体现了明初"东北边疆时代"特征。具体至外核心边疆，大宁、开平、兴和、东胜诸卫处于经略重心。而在这其中，只有大宁处于阴山边疆以东，其他皆属阴山边疆。

洪武晚期，伴随明朝逐渐控制蒙古高原东部，鞑靼部落被迫西迁至和林附近。达力扎布指出，北元昭宗、脱古思帖木儿继承汗位后，游牧于西北起于克鲁伦河中下游沿岸，东至黑山（大兴安岭）、鱼海（贝加尔湖）之间，南到潢河（西拉木伦河）的区域。洪武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一役后，脱古思帖木儿向西逃至土拉河，为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

---

〔1〕〔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1《陕西十·榆林镇》，第2927页。

〔2〕参见拙著《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第66－79页、第81－95页。

瓦剌所立三汗也速迭儿、额勒伯克汗、坤帖木儿驻牧地区相应靠近瓦剌势力范围，游牧地区在漠北中心地区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一带。鬼力赤虽为阿鲁台所立，但其驻地也应在漠北的中心地区。本雅失里接替鬼力赤继任可汗后，游牧地复迁移至昭宗的驻牧地区。本雅失里被杀后，答里巴汗、斡亦剌岱汗游牧地区又转移至漠北中心地区。阿鲁台拥立之阿台汗，脱脱拥立之脱脱不花，以及也先自称可汗后，游牧地再次回归至昭宗的故地。小王子继位后，游牧中心地区仍在昭宗故地，不过开始向西南发展，出入河套。摩伦汗游牧地似与乌珂克图汗相同。满都古里汗游牧地在克鲁伦河下游的呼伦贝尔及河套之间。[1] 可见，明前中期蒙古核心游牧地基本在蒙古高原中东部游移，所对应明朝地区正为阴山边疆。为应对漠北蒙古，明朝开始进占阴山边疆，建构广阔的正面防御体系。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朱元璋命诸将在阴山南部众建卫所，具体便是“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迤东立六卫”，[2]三月后，明朝正式设立十七卫。“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3]从地理位置上看，十七卫东起大马群山，西至黄河东北，皆处阴山南疆。明朝之所以在阴山南疆，而非阴山北疆建立十七卫，与阴山南北地理条件的差异有关。

从气候上看，阴山高耸，阻隔太平洋暖湿气候进入蒙古高原，因此阴山南北便分别属季风气候与非季风气候，半干旱与干旱地带。从河流上看，阴山南疆处于黄河水系、海河水系外流地带，并有乌梁素海、岱海、黄旗海等天然湖泊，而阴山北疆皆为内流区，水量远不如阴山南疆充分。因此，阴山南疆不仅可以发展农业，而且山坡草原可以发展畜牧业。而阴山北疆，则由于气候干旱之缘故，主要属于荒漠草原景观。从

---

〔1〕达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载《蒙古史研究》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达力扎布：《北元汗斡耳朵游牧地考》，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20“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丁卯”条，第3225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25“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条，第3295页。

地形上看，阴山南疆沟谷深切、地面破碎，非常适于建立城池、据险以守。而阴山北疆则属于内流区，不仅河流稀少，而且水量较小，侵蚀作用并不显著，故而沟谷浅缓、地面平坦、风沙散布，这种地形显然并不适合构筑城池。总之，阴山南疆由于在气候、河流与地形上之优势，经济方式具有多样性，兼有农田、草原、林业，既是中原王朝屯田基地，又是培育骑兵、北上漠北之阶梯地带，还是北方民族顺逐水草、补给粮食、南下汉地之缓冲地带，相应是核心边疆之重心区域。

明初在武力强大之时，为掌握大漠战略之主动权，自然需要在此构建庞大的攻防体系。朱元璋对阴山南疆卫所之定位，便以之作为大漠作战基地。洪武二十五年，敕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称："尔等立屯既成，率数十万众飚驰雷击、搜猎虏庭、耀张威武，不亦壮哉！"[1] 为牢固阴山南疆，朱元璋又于这一区域众建城堡，开创了明长城之营堡形式，成为明长城又一渊源。[2] 可见，阴山南疆是阴山边疆之主体攻防区域，充当了阴山边疆之"大门"，一旦蒙古突破了这一中间地带，接下来便是进入太行山之"堂奥"，继而进入腹里之"卧室"了。

在阴山南疆卫所中，兴和是较为特殊的一个。兴和地处大青山、大马群山之间，是漠南地势之分水岭。"兴和在万全都司野狐岭之外，其地远望如高阜，至则又是平地，乃阴山之脊。其地甚寒，过一凤凰山，山之西南有沙城，又度数山冈便至兴和，号为中都，地宜牧马，亦可树稻麦，元氏居民甚盛。"[3] 兴和之所以便于农牧，在于其旁有内陆湖安固里淖。兴和既占据阴山之脊的制高点，又为元之中都，明朝经营此地，便兼具地理与政治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在兴和的军事建设，并未利用原来的中都旧址，而是另建新城。"初七日早，发兴和。行数里，过封王陀，今名凤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上（朱棣）又曰：

〔1〕〔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23"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戊申"条，第3259－3260页。

〔2〕参见拙著《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第102－107页。

〔3〕〔明〕陈全之著，顾静标校：《蓬窗日录》卷2《寰宇二》，收入《历代笔记丛刊》，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77页。

‘适所过沙城即元之中都，此处最宜牧马。’”[1]

开平属于阴山北疆之异数。阴山北疆地理既不适宜建制，明朝唯独于开平重点建设，在于这一地区实为阴山边疆之“起点”。开平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南北分别为阴山支脉之卧龙山、南屏山，即便农牧，又宜防守。“龙岗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东北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多材木，水饶鱼虾，盐货狼藉，畜牧蕃息，居民利之。”[2]该地既是北方民族顺逐水草、南下汉地之起点，又系忽必烈据之建立元朝，实现蒙元帝国由草原本位至汉地本位转移之政治枢纽。因此，明朝经营开平，不仅控制了蒙古南下之地理起点，而且对于消除北元残众南下故国之望，亦极具象征意义。蒙古南下多以开平为起点，或者向东南经大宁，进攻辽东、蓟州，或者向西南经兴和，进攻宣府、大同，或者更进一步向西经东胜进攻河套、山西。之所以采取这种迂回方式，而不是经由和林南下，在于漠北、漠南之间横亘荒凉之戈壁瀚海，人马接济皆存在困难。而蒙古高原东部河流众多，水草丰美，便于蒙古骑兵随时补充给养。事实上，明代蒙古基本皆沿这一路线南下。

正是在这一地缘背景下，明朝于开平重点经营。洪武二十九年，明朝于开平实行军屯，设立五个军屯卫。“置开平左、右、前、后四屯卫指挥使司。初，诏立开平中屯卫，至是，北平都指挥使司奏已立中屯卫于沙峪，今议立左屯卫于七合营、右屯卫于军台、前屯卫于偏岭、后屯卫于石塔。俱从之。”[3]在此基础上，设立军事攻防机构开平卫。[4] 开平卫利用上都旧基重筑而成。“初二日，发武平镇，晚次开平，营于斡耳朵，华言所谓宫殿也。盖元时宫殿故址犹存，荒台断础，零落于荒烟野

[1]〔明〕金幼孜：《北征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明〕杨守谦：《大宁考》，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46“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庚寅”条，第3578－3579页。

[4]〔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49“洪武三十年春正月辛未”条，第3608－3609页。

草之间，可谓一慨。”[1]开平遂独出阴山边疆北部，成为明朝漠南攻防体系最前沿。鉴于其独特地位，朱元璋重点于此地构建烽火通信体系。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敕晋、燕二王称：“每一堠用马二匹，而以三十堠为一路，计用马六十匹。其相去或二十里或三十里，则设一路，总十路，则用马六百匹。其布置之法，则由内而外，其近里则二十里为一堠，计十堠；外则十五里为一堠，又计十堠；又外则十里为一堠，又计十堠；以此撙节，一路可望五百里，少有烽警，则无不先知矣。”至此，明长城各种设施皆已出现，后世长城防御体系之构建，不过在以上源头基础上，加以综合与发展而已。朱元璋还命在开平分别组建专门骑兵队伍与火器队伍，以应对蒙古快速机动的战术特点。“选人领精骑，或五六千，或七八千，在百五十里至二百里外，一路潜伏，以侦望之，则可知彼之虚实矣。”骑兵队伍由于长期驻牧大漠之中，已与蒙古一样，习于游牧、深染胡化。“王之队伍，常在斥堠以里，不宜久驻一处，东西南北往来莫测，又须趁逐水草随营牧放，以就孳焉。”[2]同年，朱元璋颁晋王圣旨称：“著各卫出去的战车，都要依这个样子造。车上有窗棂处，都放神机箭，车轴上放铳，车栏上放火枪。”[3]虽然敕书中并未记载晋王此时身在何处，但《明太祖实录》明确记载此时晋王正在开平以北数百里。[4]因此，战术实行之地也应在开平以北。

阴山南疆中东胜左右二卫控制蒙古沿黑河（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进入黄河东西之地的咽喉，是明代阴山边疆之“终点”。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古以前中原王朝相比，明朝在阴山边疆的西部经略重心，呈现了东移趋势。由于建都关中，北方民族之威胁也主要来自西北的缘故，秦汉、隋唐于阴山西部重点布防，基本皆以河套为大本营，依托乌拉山、狼山地形，构建具有广阔纵深的军事攻防体系。秦于河套北部设九

---

〔1〕〔明〕金幼孜：《北征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52“洪武三十年夏四月乙酉”条，第3638－3639页。

〔3〕〔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99页。

〔4〕〔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53“洪武三十年六月庚寅”条，第3655页。

原郡，汉于河套北部设朔方郡，成为守御阴山西部之重地。西汉又在狼山外筑受降城。隋于河套置五原郡，仍沿上古中原王朝强盛时期之规模。唐更置辖区广大之关内道，北至瀚海，成为保障首都长安之坚实屏障，并在狼山－乌拉山与黄河之间地区，分置三受降城。伴随北部边疆由西北重心至东北重心的转移，明朝仅于阴山东端唐东受降城之地设置东胜诸卫，与中古以前相比，不仅规模大为不如，而且弃狼山于不顾，重心亦呈现东移趋向。

总之，阴山边疆地处外核心边疆中部，开平为其起点，兴和为中转站，东胜为其终点，而其重心则在阴山南疆。这种“三位一体”的地缘格局，共同构成了明朝外核心边疆之中心地带。明朝在这一地区构建了完整而严密的军事攻防体系，成为近边地区与漠北蒙古之间的军事屏障与缓冲地带。

阴山边疆在中原王朝强盛之时，成为拱卫汉地之前沿地带。而一旦中原王朝力有不逮时，阴山边疆便呈现汉民族逐渐撤离，北方民族逐渐侵蚀之局面。具体至明朝，亦是如此。不过相对于中古以前，明朝从阴山边疆的撤退，政治文化的内涵更多一些。即在拥有优势兵力的前提下，汉民族在近世以来北方民族长期压制的影响下，在北部边疆开拓上，不复上古时期汉民族初兴之蓬勃、中古时期汉民族涵化之大气，显得有些冷漠与缺乏信心，相应在边疆政策上，呈现出更多的保守与内敛特征。

这首先表现在明朝开国之初边疆体制上的“有限性”，使明朝错失了整合边疆族群的历史机遇，不仅促使明朝停留于“局限国家”，而未进一步发展为“统一王朝”，而且为阴山边疆的松动埋下了隐患，促使明朝逐渐向较为纯粹的“农业政权”演变。相对于北族局限国家，汉族局限国家之形成，与思想观念具有更多的关联。汉族政权及此之前的华夏政权，疆域观念以“华夷之辨”为核心主旨，肇始于“北狄”对东周天下秩序构成威胁之时代背景下，齐国管仲所倡导之“尊王攘夷”观念，经先秦诸子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演绎、阐发，而成华夏政权之正统基础，在秦汉帝制时代“大一统”疆域格局下，最终成为汉族政权国际关

系格局之基本准则。华夷之辨基本内涵是依据种族、文化等标准，将华夏与“四夷”相区别，形成以汉族（华夏）为中心，由内而外依次排列之九服疆域格局，并将之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如“荒服”、“蛮服”便直接反映了华夏对边疆之隔膜立场。东汉马融释“荒服”，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释“蛮服”，称“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1] 东汉郑玄则进一步解释了羁縻制度与蛮服之内在关联。“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2] 这一观念一直延续至清代。“故先王名之（榆林）为荒服，荒者，忽也，简略也，得之矣。”[3] 华夷之辨大体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区分华夏、“蛮夷”不同之处，强调二者之间的“异质性”，即中国古代所谓的“严夷夏之防”。当汉族政权与“四夷”主要是北方民族关系紧张之时，华夷之辨中种族立场所强调的华夏、“四夷”在族类上便具有异质性的观点，即所谓“华夷之辨种族论”便占据上风。

华夷之辨疆域观念之形成，根源于华夏或汉族政权所赖以立足的主要力量——中原农业经济拓展的地理条件局限与由此导致的在边疆地区遭遇的推广困境，从而在军事条件无法达到绝对优势，或者处于大体均衡，甚至相对劣势之地缘格局下，适宜于采取松散的政治联合形式，从而在文化上加以解释与辩护之结果。与华夏或汉族政权以农业经济立足不同，北方民族则以军事见长，突破地理环境限制，以农业财富弥补牧业不足是其维持庞大社会之必要条件，因此北方民族在疆域观念上相对更为进取与开放。而为了控制人口规模、经济水平、政治构成远较自身为优的农业人口，只能采取各种可以采取之方式，极力维持庞大军事帝国之存在，相应更为强调一体而非差序。可见，表面上的政治观念差异，其实根源于南北两个族群从自身地理环境、经济方式出发，所作出的现实合理化选择。而在进入汉地之后，北方民族政权时有

〔1〕〔汉〕司马迁：《史记》卷2《夏本纪二》，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76页。

〔2〕〔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6《禹贡第一》，《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3〕〔清〕谭吉璁：《延绥镇志》（康熙）卷1之3《附记》，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乾隆增补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88页。

呈现被汉族华夷之辨政治文化同化之现象，亦源于对自身政权根基的重新理解或在力量不足时的文化辩解。

当中国步入文明社会之时，已存在农耕与畜牧两种分工经济形态，相应在文化面貌上亦有一定区别，于是两大经济体与族群分别称称作“华夏”、“蛮夷”。只是当时两种经济方式尚有各自扩展的足够空间，两大族群关系相应并未产生大规模、长期的紧张关系，中国最早之史籍《尚书》载周武王伐纣，“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1]华夷尚可共存同一秩序之下。《周礼》载：“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2]华夏尚具有与“蛮夷”维持积极关系之制度形式。但东周以降，周天子统治秩序内部既逐渐瓦解，“北狄”遂趁机于外部施加巨大压力。有鉴于此，齐国卿管仲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整合诸夏、外御北狄，从而严格了华夷之别，“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3]“华夷之辨”观念于是兴起。孔子著《春秋》，以维护正在瓦解的东周正统秩序，在华夷之辨观念上，秉持严格立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否定了华夏、“四夷”在文化上的共通性。释《春秋》而成书之《左传》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观念，提出了著名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5] 战国以降，面临“四夷”进一步紧逼之华夏政权仍坚持华夷之别，“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6]

西汉时期，正是汉民族初兴、朝气蓬勃之时，在华夷之辨种族立场下，以禽兽目“蛮夷”。武帝时主父偃称上古先王“禽兽畜之，不比为人”。[7] 对于最初因国力不逮而导致的“和亲”模式深感耻辱，从而采取北征大漠、封狼居胥的军事战争，取得了军事层面的对此辉煌胜利。

---

〔1〕李民、王健：《尚书译注·周书·武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2〕杨天宇：《周礼译注·秋官·象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页。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闵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6页。

〔4〕金良年：《论语译注·八佾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四年》（修订本），第818页。

〔6〕〔汉〕戴德、戴圣编：《礼记》卷4《王制第五》，四部备要，中华书局、中国书店，第45页。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2801页。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华夷之辨种族论的影响之下，西汉将农耕文明推广于广袤西域地区，从而相对缺乏整合蒙古草原之政治尝试，只以驱逐匈奴为最终军事目的，相应在国力下降时，很快便丧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可见，在汉民族初兴，农耕经济方式尚有较大拓展空间的西汉时期，汉民族对于从政治上长期控制部分是适宜农耕文明的边疆地带，缺乏长期兴趣，相应便停留于局限国家。东汉、魏晋之时，汉民族由于内乱，逐渐从亚洲内陆撤退，在北方民族近边压力之下，激发出华夷之辨的种族立场，并进一步加以充实与发挥。班固著《汉书》，对西汉一代华夷关系及边疆立场进行了系统评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东汉和帝时侍御史鲁恭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汙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2]从而在华夷之辨种族论基础上附会以"气"之哲学理论，使之与华夏文明体系关联性愈加增强，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华夷治理方式上的区别，汉族政权对于边疆民族地带，只适合实行羁縻方式，维持松散统治，以避免乱夷夏之防。而献帝时期蔡邕则开始将长城纳入到华夷之辨的视野中去。"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分别内外，异殊俗也。"[3]较之东汉，魏晋汉族政权力量经内部多年创乱之后，愈加削弱，西晋太子洗马江统著《徙戎论》，进一步丰富了华夷之辨种族论的地理内涵，针对当时边疆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34页。

[2]〔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5《鲁恭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876页。

[3]〔晋〕袁宏撰，李兴和点校：《袁宏后汉纪集校》卷24《孝灵帝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页。

态势，倡导汉族政权只宜在边疆民族地带采取守势。“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1]唐武则天时期，鸾台侍郎狄忍杰认为华夷之分根植于地理环境。“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2]

近世时期，北方民族对汉民族所构成压力愈大，五代、两宋纳币、称臣成为惯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华夷之辨得到进一步加强。北宋苏轼创《王者不治夷狄论》，便持种族立场，认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3]以“四夷”比之“禽兽”。北宋末年安抚使安尧臣在江统观点的基础上，出于解释北宋文化发达与军事劣势之背离，进一步从文化层面否决了蛮夷归化之趋势。“臣闻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盖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圣人以一身寄乎巍巍之上，安而为泰山危而为累卵安危之机，每不在于夷狄之服叛去来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内诸侯而外夷狄。非谓中国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通，种类乖殊，法俗诡异。居于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山谷、险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4]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亦称“中国结昏夷狄，自取羞辱”。[5]《满江红·怒发冲冠》“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6]更体现

〔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56《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529页。

〔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6“神功元年闰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24页。

〔3〕〔宋〕苏轼：《苏东坡集后集》卷8《秘阁试论·王者不治夷狄论》，收入《国学基本丛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第1版，第28页。

〔4〕〔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政宣上帙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9-11页。

〔5〕〔宋〕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卷第二·乌孙公主歌第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6〕〔宋〕岳飞：《岳忠武王集·满江红》，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年版，第19页。

出当时种族大规模冲突的时代背景，所渲染之色彩尤是华夷之辨种族论之极致。但两宋舆论对于华夷之辨种族论之强调，主要源于两宋武力不振之时代背景，因此并未对两宋边疆开拓产生太大影响。而文化的延续性却使其成为明朝不可忽视的思想遗产。

明初一扫中唐以来汉民族积弱不振之局面，武力昂扬，宋濂在作北伐檄文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并认为"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明军北上灭元是"雪中国之耻"[1]的举动，显然延续了两宋华夷之辨种族论立场，反映了两宋以来汉民族被异民族长期压制的耻辱心理，洪武时期明军屡次北征，发动以"永清沙漠"为主旨的战役，[2]可视作中唐以来汉民族在边疆长期被动之后的深入反扑。但也正是在华夷之辨种族论的影响下，明朝在军事进攻之后，并未相应伴随从政治层面整合边疆之后续行动，从而并未突破局限国家。如果说西汉止步于局限国家，主要原因在于汉民族初兴之时，边疆地区尚有大量适宜农耕文明扩展地带亟待开拓，从而对不适宜农耕文明之草原地带缺乏兴趣的话，那么明朝对蒙古高原尤其漠北地区之缺乏兴趣，则并没有这一理由，而是更多地受到政治文化，即华夷之别的影响，缺乏改革草原、整合边疆的政治意识。

洪武时期明朝虽然在阴山边疆重点设防，但一方面受到中唐以来北方民族的长期边疆优势，甚至南下黄河流域、统一全国的震动余波之影响，北方民族仍心存余悸，对于固定统治边疆地区显得缺乏信心；另

---

〔1〕〔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冬十月丙寅"条，第402页。

〔2〕〔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春正月庚午"条，第132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记载北伐明军人数为15万，但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却记载为40万人。和田清依据《弇州史料》与《明史》的记载，认为15万人的说法可信。见〔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16页。但从《弇州史料》的记载来看，加上后勤部队的人数，至少要超过15万人。"［朱元璋问］'度兵几何？'［徐达］曰：'十万足矣。'上曰：'吾予尔十五万骑，大将军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将军出东路，胜以征西将军出西路，将各五万骑，转饷私役者不与焉。'"见〔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19《徐中山世家》，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很明显实录所载15万之数并未包括后勤部队。《纪事录》记载的西路军数字便达到10余万，便应包括了后勤部队。"五月，宋国公冯胜领河南陕西等各卫马步兵十余万征甘肃，克之。"见〔明〕俞本：《纪事录》卷下，载陈学霖《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45页。

一方面在两宋华夷之辨的影响之下，对华夷之别具有较多的强调，在文化上亦不愿深入边疆地区。相应，明朝初年虽然在北部边疆取得了辉煌的军事成就，但对于如何在政治上实现对蒙古草原的长期统治，并无明确的策略与制度，从而呈现了相当的“被动性”。而对待能够克服汉军缺乏对边疆了解的“胡将”、“番兵”，也长期采取不信任态度与防范措施。“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奉天殿早朝，钦奉圣旨：达军入伍一万，须要许多汉军入伍。”[1]“（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一件，达军入伍，换出汉军来，也立成队伍。”[2]“（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早朝于奉天殿，钦奉圣旨……一，各都司、卫所有安插达军，务要抚恤停当，关防镇（缜）密，不许与汉军一体差拨，生事挠扰。其汉军衣甲，须要常川齐整。”[3]“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承奉刘二哥、内使黄十三钦赍圣旨，记事二件……一件，队伍内胡人，用心堤备。外用牢笼，内必多机以备。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4]朱元璋对异族降人之防范，在明前中期一直被继承下来。

> “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掌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或入奉朝请，或于各镇住牧。惟有征行，则遴所部精骑以从，或别将，则副大帅耳。天顺初，以恭顺侯吴瑾掌右军都督府，瑾故恭顺伯允诚即把都帖木儿孙也。广义伯吴琮镇宁夏，琮亦把都帖木儿孙也。东宁伯焦寿镇蓟州及甘肃，故指挥八思台孙也。右都督芮成镇四川，指挥孛罗子也。史以为番将握兵之始。自是而后，不可胜纪矣。”[5]

---

〔1〕〔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88页。

〔2〕〔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88页。

〔3〕〔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88－89页。

〔4〕〔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91页。

〔5〕〔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9《皇明异典述四·番将握兵》，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7页。

伴随军事战争，蒙古部落产生极大分化，明朝并未因之采取汉唐“参用番汉”之都护府制度，实现对边疆“胡汉杂糅”之族群整合，而是实现“内汉外胡”之政策，简言之便是在阴山边疆驻扎汉军卫所，而阴山边疆周边地区则设置羁縻卫所。这一格局是华夷之辨在制度建设中的具体表现，反映了华夷有别、内外分层之政治观念。朱棣之言论可以鲜明地反映这一种族观念。建文四年十二月，宁夏镇总兵官何福奏：“边地降虏有叛去者，请举兵讨之”，朱棣称：“夷虏谲诈，不可凭恃，自古则然。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心待之。《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彼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1]

从正面而言，这一做法是“因俗而治”，易于与降部形成政治共识，二者亦在一定时期内，在广大的地理空间内，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一种“共生”性质关系。比如明朝在西部边疆与羁縻西番之关系便系如此。万历时期，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奏：“照得西宁地方，孤悬天末，近境皆蕃，蕃外即虏。我借蕃为藩篱，蕃仗我以为主宰，即辅车唇齿之譬，不是过矣。”[2]明朝借此发挥“以夷制夷“之效。但从反面而言，明朝错失了在当时军事优势下，实现“以汉制胡”、“胡汉涵化”，从而长期统治草原的历史机会，从而使阴山以外的地区控制较为随意而松弛。正是由于羁縻卫所在地理、政治上的松散性，赋予外族轻易叛逃机会，从而使明朝对于阴山边疆周边地区的蒙古部落的控制显得十分无力。比如捕鱼儿海战役之后，一直追随北元由大都撤出之丞相失烈门，鉴于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杀脱古思帖木儿，自立为汗，忽必烈系正统地位被篡，于年底和国公老撒、知院捏怯来、丞相于耦儿、千地等人南降明朝。“耻事之，遂率其众来降。”明朝遂置全宁卫以羁縻之。“诏置全宁卫，遣使赍印往命捏怯来为指挥使，失烈门以下俱授以武职有差。”[3]不过这一集团内部存在矛盾，明朝亦未设汉官、汉军加以牵制，从而无法控制局势，全宁卫众很快叛去，构成了东部蒙古即明称“鞑靼”的来源之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5“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酉”条，第278页。

〔2〕〔清〕苏铣纂修，王昱等校注：《西宁志》卷9，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3〕〔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夏四月己亥朔”条，第2941页。

一，明朝亦由此失去阴山边疆以北之羁縻力量。即使是一直留在羁縻框架之下的外族群体，亦由于明朝将华夷之辨贯彻至军队之中，除永乐时期之外，一直难受重用。边疆族群作为明朝政权内最为了解草原政治的政治集团，便未在明朝边疆开拓中发挥较大作用。由于明朝对边疆族群渗透较少，因此边疆族群借助其羁縻形式，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有明一代，维持了较强的独立性，在政治上实际游走于明朝与蒙古之间，成为一"中间势力"，政治立场随局势应时而变，而未成为明朝固定控制，并以之"以夷制夷"、控制边疆地区的"中介工具"。这不仅使明朝止步于"局限国家"，而未发展至"统一王朝"，而且使明朝北部边疆外层防御体系处于随时松动的状态，相应埋下了诸多隐患，逐渐向较为纯粹的"农业政权"演变。

这一历史现象反映出与上古时期汉民族初兴，锐意进取，故而在与北方民族战争中取得上风；中古时期汉民族仍能涵化北方民族，而保持边疆开拓之活力不同；近世以来，伴随北方民族在武力上彻底占据上风，汉民族已不复进取西北边疆之雄心壮志，对于北方民族既颇为畏惧，又心存芥蒂，从而放弃"以夷制夷"、固定统驭之政治愿望，不再重用北族降将，明朝军事领域华夷之别从而相对于秦汉、隋唐时期，大为突出。

以阴山边疆东北，明代最为著名的羁縻卫所兀良哈三卫为例，其在为明朝通报草原消息同时，在受到蒙古政权压力之时，或"潜通北方"，或"导虏南下"。而阴山边疆西部，所谓塔滩蒙古与关西七卫，前者在明初叛附不常，后者则在明中后期蒙古压力之下，逐渐脱离明朝控制。

李花子指出：明朝放弃图们江以南女真部落之招抚，将之视为朝鲜势力范围，并逐渐形成与朝鲜以图们江为界之格局，亦产生于永乐时期朱棣对东北女真羁縻管理之轻视与松散政策。[1] 对于明初以来边疆政策之有限性，明后期人亦有一定反思，这在"北虏"之患日益严重之明后期尤其如此。比如嘉靖时期山西巡抚赵时春便在概括中国古代武

[1]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4页。

功显著之王朝统合南北(即整合华夷)政策之同时,对明朝局限于华夏立场、缺乏变通之僵化立场大加批评。

> 天限华夷,气分南北,南人多智,北人多力,智、力兼备者胜,故南得北人则可以兼北,汉武宣、唐文皇、本朝太宗是也;北得南地则可以侵南,五胡、金元是也。本朝席太宗攘夷之威,有高皇恢拓之略,外薄戎夷,十分而兼其八,所未宾者,独鞑靼残孽耳。况鞑靼之中,其服役者又众于其未服役者也,诚使国家戢汉兵而不用,独遣一恢弘智勇之士,听其自拔晓习番夷之人,广出财货,明信赏罚,东告生熟女真、兀者野人曰:"吾为我除女患,女有功而受吾赏。"即北得精骑十万,求辽左之人共推服者莅之,则虏之东地空矣!北告兀良哈种类曰:"吾为女广地,求畜牧,女得利而受吾赏。"即北得锐士数万,求燕蓟之豪杰彼素谙者监之,则虏之南部瓦解矣!西护西番,南招亦不剌,以恩信结河西属国之众,曰:"吾为女遮北道,女击其疲,吾邀其来。"起西海而属之河,更屯伏百千所,夹击而互挠之,此为虏塚矣!吾何患于虏哉!今也不然,非唯不能以财役属夷,反利其有而使彼轻我;不以兵护其难,反掩其不我备而斩获以希赏。使我所备愈多,而兵力益分;饷费滋繁,而民用困敝。[1]

隆庆时期之"俺答封贡"、万历时期张居正之以喇嘛佛化蒙古、天启年间王在晋之赂蒙古攻女真,亦皆为明后期人在边疆压力之下,反思种族政策之政治潮流的反映。

不过,由于羁縻卫所处于边疆外围地区,只要明朝直接控制下的边疆军事体系保持完整,将蒙古南下近边地区的地理通道阻隔开来,羁縻卫所之叛附便不会对明朝近边地区构成直接威胁。洪武时期,明朝控制着阴山边疆,鞑靼在明军威逼之下,已局限于漠北中心地区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一带,甚少南下阴山。兀良哈、塔滩蒙古虽叛附不常,但却主要是对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侵扰,对明朝北部边疆整体格局并

[1]〔明〕赵时春撰,杜志强整理:《赵时春文集校笺》卷6《备边杂议考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未有较大触动。但建文帝即位之后，由于推出“削藩”政策造成的“靖难之役”，却从根本上瓦解了明朝在阴山边疆的军事防御体系，阴山边疆的大门由此逐渐开启。

3.3 “靖难之役”后阴山边疆两翼剪除与蒙古进攻阴山两侧

建文朝廷采取四面夹击之方式，征调北起开平，南下山东，西起山西，东至辽东的军队包围北平。在这其中，河北、山东成为靖难之役的主战场。辽东地处北平以东，建文元年（1369）九月，江阴侯吴高，都指挥耿瑊、杨文率辽东军队围攻北平东部藩篱永平，此后不断围困此地，成为由东面牵制燕王朱棣之势力。[1]

北平都司因原属朱棣节制，诸卫分散北平四周，建文帝在削除燕藩策略中，以更换、调整北平都司将领、军队部署为首要步骤，但由于原都指挥张信叛附燕王，北平周边军队很快被燕王击破与瓦解，北平都司唯一能对燕王构成威胁者仅存极边开平卫。洪武三十一年（1368）闰五月，朱元璋刚去世，建文朝廷酝酿削除燕藩之策时，兵部尚书齐泰便重点强调了开平卫的重要作用，“今边报北虏有声息，但以防边为名，发军戍开平，其护卫精锐悉调出塞，去其羽翼，无能为矣”。[2] 建文元年二月，朱棣护卫被调至开平，当地军队数量遂有三万之众。“（建文）元年三月，建文君命都督宋忠调缘边各卫马步官军三万屯开平，燕府护卫精壮官军悉选隶忠麾下。”[3]燕王公开造反之后，开平卫军队便挥师南下，到达北平北部咽喉居庸关，与燕军在怀来展开大战，结果宋忠率领的开平军队战败。“宋忠大败，奔入城。我师乘之而入，宋忠急匿于厕，搜获之。并擒都指挥俞瑱，斩都指挥彭聚、孙泰于阵。并首级数千，

---

〔1〕〔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卷 3《建文元年》，第 61 页；卷 4《建文二年》，第 83 页；卷 5《建文三年》，第 115－116 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 1“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第 9 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 1“建文元年三月”条，第 9 页。

获马八千余匹。都指挥庄得单骑遁走,余众悉降,即散遣归原卫。"[1]所谓"散遣归原卫",一方面是以燕王原三护卫复驻原地,而对于开平军队,朱棣在兵力缺乏情况之下,自然不会放之北归,应以之充实北平周边。由于开平卫骑兵甚多,相应使燕军中的骑兵比重大为增加。但伴随卫众南下,开平卫也自然应于建文元年时被撤。这才有了朱棣即位后,重设开平卫之事。永乐四年(1406),"复设开平卫,命兵部以有罪当戍边者实之"。[2] 开平卫内徙之后,在其南部、大马群山以北之驿站由于兵力甚少,且联络开平之作用也已不存,自然一并被放弃,即建文元年,明朝失去了对大马群山以北的控制。

建文元年,大宁军队亦归附朱棣,中央所派北伐军队在河北先后遭遇两次严重失利,导致整个河北、山东成为南北双方不断拉锯之战地,靖难之役遂陷入僵持局面。为援助河北、山东地区,建文朝廷抽调了阴山边疆另一军队系统——东胜诸卫。建文三年,山西行都司指挥使房昭率军东进。"大同守将都指挥房昭引兵由紫荆关趋西水寨。"[3]靖难史料经永乐一朝多方改篡,记载多已零落,目前所见史籍皆未载房昭职务,但从建文朝廷调动辽东、北平军队,皆以都司长官充任来看,房昭应为山西行都司指挥使。山西行都司哪些军队参与了东征,史无明文记载,不过从建文朝廷派遣军队征伐燕王,动辄数万甚者数十万之风格而言,房昭所率军队数目应该不少。房昭据守易州西水寨,对保定构成了严重威胁。[4] 安陆侯吴杰"遣都指挥韦谅以兵万余转饷房昭军",[5]可见房昭部下人数之多,竟需万人供粮,其中虽有数量可观之易州民众,但跟随房昭而来之边兵数量也应甚多。考虑到大同以南诸卫具有安民之责,不便调动,而蒙古此时并未大举南下,边境卫所可以调动,因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建文元年七月癸未"条,第23-24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1"永乐四年二月壬申"条,第763页。

[3][明]朱睦㮮:《革除逸史》卷2,第542页。

[4]"谍报大同敌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侵掠保定属县,悉驱人民登山结寨,民强有力者皆假以指挥、千百户之名,而逞威胁众,不从者辄杀之,人被惨毒。房昭据易州西水寨,寨在万山中,四面极险峻,惟一径扳缘可上。房昭欲守此,为持久计,以窥伺北平。上曰:'保定,北平股肱郡,岂可不援?'遂班师。"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8"建文三年七月壬寅"条,第101页。

[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0页。

此东征卫所可能主要来自山西行都司辖下边境卫所，即东胜诸卫。房昭在与燕王作战中失利，部下死伤甚众。[1] 东胜军队在西水寨一役中，死伤甚多，余众归降后相应被安置于北平周边。可见，经历靖难之役的冲击，东胜诸卫兵力至少应大为减少，甚至有举卫全徙之可能。若参照这一史事，朱棣即位初年内徙东胜八卫，便显得不再突兀，而是顺势将归附东胜余众大体就地安置的结果。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命都督陈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移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蓟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其天城、阳和、宣府前三卫仍复原处。”[2]

阴山边疆卷入靖难之役的军队尚有宣府系统。虽然相对于其他支系，宣府军队参与靖难之役的历史并不彰显，但确实存在，这才有了朱棣即位后，还宣府前卫“仍复原处”之事。朱棣即位之后，鉴于大宁、东胜基本已经内徙，遂就地安置于北平周边。鉴于开平地处北平正北，是抵御蒙古进攻首都之第一层防御体系，因此并未内徙。同理，宣府前卫，以及以西控扼蒙古由桑干河进入宣化盆地之天城、阳和二卫亦复归原地。[3]

东胜之内徙，除顺势安置降众之外，尚有朱棣从政治层面加强新都防御力量之考虑。朱棣即位后，首要任务是巩固利用武力取得的政权，为此将首都迁至藩邸所在之地北京。为加强新都北京之周边军事力量，朱棣从“内政优先边防”的传统政治观念出发，将大宁都司、东胜诸卫战时南迁之权宜进一步制度化。内徙大宁都司、东胜八卫，不仅增强了北京南部屏障保定地区军队的实力，而且消除了宁王、晋王旧部对新政权之威胁，实为朱棣新政权蓝图中迁都、削藩一箭双雕之策。伴随东

---

〔1〕“敌裨将都指挥花英、郑琦等以马步三万余，列阵峨眉山下。上纵兵击之，令勇士卷旆登山，潜出敌后，大张旗帜，寨中望见惊骇，遂乱，四散奔走。我军逐之，斩首万余级，坠崖死者尤众。获马千余匹，擒都指挥花英、郑琦、王恭，指挥詹忠等。惟房昭、韦谅脱走，复追杀千余人，遂破西水寨。”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8“建文三年十月丁巳”条，第102－103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条，第223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条，第223页。

胜八卫之内徙，明朝逐渐丧失对阴山边疆西端之控制。朱棣以内政之故削弱边防，反映了靖难之役后，朱棣最为关注者，是消除政敌、巩固政权，而边防则在其次。虽然这一做法是中原王朝“内政优先边防”政治文化的再次体现，不过参照永乐时期国力强盛、外拓边疆的时代背景，仍可看出这一观念在明代尤盛。经过这一防御体系的大幅度改造，大马群山以北防线从而呈现处于整体防线之外的孤立格局，并进一步导致兴和卫、开平卫的先后内徙，整个阴山边疆防御格局遂呈现瓦解趋势。

朱棣虽削弱阴山边疆防线，但靖难之役前后，蒙古高原内部陷入更加混乱之政权更迭局面。洪武后期脱古思帖木儿被杀之后，忽必烈后裔、阿里不哥后裔、窝阔台后裔为争夺汗位，展开了连番内讧，汗位更迭十分频繁。宝音德力根《15 世纪中叶前的北元可汗世系及政局》一文指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杀死脱古思帖木儿后，在瓦剌的拥立下，即位为可汗。洪武二十四年(1391)，也速迭儿去世，其子昂克即位。洪武二十七年(1394)，昂克在瓦剌内乱中被杀。在内乱中获得胜利的浩海·太尉重新拥立洪武时期被明朝放回草原的忽必烈系的买的里八剌，蒙文史籍所记名字为额勒伯克·尼古埒苏克齐为可汗。买的里八剌虽然将汗位重新收回至忽必烈系，但所借助力量却是之前的敌对势力瓦剌。瓦剌之所以愿意扶持忽必烈系，在于其内部存在两个分裂而敌对的势力，一为以浩海·太尉、马哈木、脱欢、也先祖孙四代为代表的绰罗斯氏家族，所拥立者多为忽必烈后裔；一为以忽哥赤·哈什哈、太平、捏列骨祖孙三代为代表的柯尔刻氏家族，所拥立者多为阿里不哥后裔，两个派别通过扶持不同的黄金家族，达到压制另一派、号令草原的政治目的。建文元年(1399)，忽哥赤·哈什哈杀死额勒伯克·尼古埒苏克齐，便立阿里不哥后裔坤帖木儿为可汗，而额勒伯克·尼古埒苏克齐之子本雅失里被流放到了帖木儿汗国。建文四年(1402)，坤帖木儿在瓦剌内乱中被杀。次年即永乐元年(1403)，原脱古思帖木儿属下阿鲁台拥立与瓦剌关系疏远的窝阔台后裔鬼力赤为

可汗，以与瓦剌相抗衡。[1]

在这一政治格局下，蒙古各部致力于内部争雄，不仅一时无力，也无计划南下攻明，而且尚需要与明朝维持一定的关系，以获得明朝在物资方面的支持。《建文朝野汇编》引《建文秘史》，载建文二年（1400），“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瓦剌王猛哥帖木儿款北平”；又引《异域辄咨录》，载“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刘哈利帖木儿等自沙漠率众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赏赉。继而谍报胡寇将侵边。王以书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晓以祸福”。[2] 后一史料来自于对《明太宗实录》两条史料的合并。建文二年二月，“丁未，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刘哈剌帖木儿自沙漠率众来归，赐赉有差。癸丑，谍报胡寇将侵边。上遣书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晓以祸福。”[3]《明太宗实录》所载蒙古可汗来输款时间不是建文二年，而是建文三年（1401）。建文三年十一月，“辛亥，鞑靼可汗遣使来输款。”[4]对此，和田清认为：“成祖在靖难之役中，为了求得北虏的输款，或许采取了相当屈辱的态度，也未可知。”[5]这一推测可能参照了唐高祖起兵称臣突厥之故事，但与隋末处于强盛期的突厥不同，洪武时期鞑靼屡经明朝北伐，势力已大为削弱，畏惧明军，多年不敢南下。瓦剌势力虽强，但游牧地在大漠西北，与明朝之间尚相隔鞑靼。故而建文时期，燕王与鞑靼之交往，应处于大体平等立场之下，不仅各自免除后顾之忧，而且各取所需，如上文明载鞑靼骑兵加入燕王军队。

虽然建文时期蒙古主体力量即鞑靼、瓦剌未南下阴山边疆，但处于草原－森林交界地带之兀良哈，与宁夏镇境外之塔滩蒙古，则因与明朝距离较近之缘故，应对明朝边境有所侵扰。虽然《明太宗实录》限于体

---

〔1〕宝音德力根：《15世纪中叶前的北元可汗世系及政局》，载《蒙古史研究》第6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4《建文二年庚辰》，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6“建文二年正月”条，第55－56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8“建文三年十一月辛亥”条，第104页。

〔5〕〔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版，第47页。

例，并未记载，但朱棣即位后，这两大势力已对辽东、甘肃即阴山边疆周边地区展开进攻，联想到此时明朝已完成政权更迭，边疆尚被侵扰，靖难之役中遭致寇掠应无可疑。最早遭受蒙古进攻的是辽东镇，时间是建文四年（1402）九月。“辽东都指挥司奏九月戊子，虏寇犯开原，至北，外门备御都指挥吴立遣指挥庄济率军拒之，贼退。癸巳，谍报贼营城外五里，济领军袭之，贼以众迎敌，指挥张恂、李冕弃军而走，贼乘势直前，济督军与战，杀伤相等。卫镇抚张能，千户陈良等九人死之，济被重创，督战益力，贼败去。”[1]此后，蒙古又不断进攻辽东镇，进攻目标皆在辽东镇东北部。[2]

至于来犯者属于蒙古哪一部落，并无明确记载。但在辽东镇遭侵两天后，明朝专门遣使至兀良哈。“遣使齎赍诏抚谕兀良哈大小头目。”[3]这应该并非单纯之巧合，大体可以作为进攻辽东镇者为兀良哈之侧证。明后期流行兀良哈从征朱棣，参加靖难之役，朱棣即位后，为酬功而捐弃大宁于兀良哈，从而导致北疆连番被动之说法。对此，和田清进行了细致考证，指出朱棣并未将大宁捐于兀良哈。[4] 这一结论也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不过更进一步之兀良哈是否从征燕王，则未见质疑。而从朱棣即位前后与兀良哈之关系来看，这一说法也应是子虚乌有。首先，燕王以其防御区域而言，正与兀良哈相接。和田清指出：兀良哈三卫于洪武晚期，不断侵边，明朝亦多征剿其地，而统兵长官便多为燕王，燕王与兀良哈遂积下颇深积怨。[5] 其次，《明太宗实录》对靖难之役中蒙古与燕王之交往，多有记载，却不见兀良哈援助之事。以情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3“洪武三十五年冬十月甲子”条，第236－237页。

〔2〕“辽东都指挥司奏近虏寇犯盘山驿，虏掠人畜，即督官军邀之于尖山，北贼骇散，追回男女百八十五人，牛二百一十七头。又追至柳河迤北，贼远遁而还。”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申”条，第251页。“镇守辽东左都督刘贞奏虏寇攻懿路寨三昼夜，破寨栅，官军与战颇不利，既而寇引去。”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己未”条，第307页。“辽东都指挥同知沈永有罪伏诛。先是，虏寇侵辽东三万卫，永不能追袭，又匿不以闻，及来朝复隐不奏。上以其欺蔽，诛之。”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8“永乐元年三月庚辰”条，第319－320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条，第216页。

〔4〕〔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第160－166页。

〔5〕〔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第34－38页。

理而言,“外夷”追随从征,在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往往被笼罩上向化归顺之文化色彩,更可佐证起事之合符华夷一致愿望,并无避讳之必要。故而兀良哈在靖难之役中应未与燕王往来。再次,朱棣即位后,也未对兀良哈有特殊示好之行为。直到永乐元年(1403),朱棣才一体向“兀良哈、鞑靼、野人诸部”遣使赍敕,谕示朝贡新朝之意。[1] 最后,永乐元年五月,朱棣再次敕谕兀良哈,证明了以往诸次犯边者确为兀良哈。“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儿、纳哈出来寇广宁,守臣禽送至京。朕矜其远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还,并谕尔知之。”[2] 朱棣即位之初,首先对明朝北疆发动频繁进攻者,正为兀良哈而非其他部落,尤能确证二者之前并无交好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被擒获之兀良哈首领所攻目标为广宁,位置在辽东镇西北部,与兀良哈主要进攻辽东镇方位不同。这应在于广宁相对于开原诸处,地理位置远为靠南,当兀良哈部众进入此地后,辽东镇东北军队可由辽河套截其后路,从而导致兀良哈失利被擒,正是借鉴了这一教训,兀良哈后来将进攻目标调整至东北部。但洪武时期明朝在辽东镇北部辽河套地区设置驿站,驻以兵力,何以兀良哈可以越过此地,径至辽东呢?这应在于与阴山边疆一样,在靖难之役中,明朝也已从辽河套撤离,兀良哈遂尾随进入辽河套,不过在最初尝试深入此地,进攻辽东镇西部失利之后,兀良哈认识到辽东镇东北部仍对辽河套具有极大威慑作用,从而不再长驱直入,而是改为进攻辽河套东部边缘地区,即辽东镇东北部。由此可见,尽管永乐时期明朝已大体由辽河套撤离,但辽东镇对这一地区仍具实时威慑力,该地遂成为明朝与兀良哈交战之中间地带。

为避免兀良哈向西南进入大宁旧地,进一步对北京构成威胁,朱棣命于大宁以南构建烟墩通信体系。而“东北胡虏”之称谓可以进一步佐证此前进攻辽东镇者为兀良哈。永乐元年底,兀良哈部众已至大宁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寅”条,第262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0下“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条,第369页。

旧地之南，明军遂相机进剿。永乐元年十月，“乙卯，敕镇守永平山海成安侯郭亮曰：‘北十八盘有贼出没，官军不能制，反为所劫，有比伤者。朕度来虹螺、毡帽等山潜伏，我军周防稍有不密，即堕其计。可于山海、永平、遵化、密云、蓟州调壮士三千，先选人哨探巢穴所在，然后统兵前进，却分轻兵出其后，两军夹攻，一举可灭。然亦须相机制胜，不可忽略。”[1]北十八盘在古北口之外，[2]龙泉关之北。“壬辰，度长城岭，又名十八盘岭，凡二十里，关山险隘，石磴崎岖，一松苍翠。”[3]虹螺山（又作红罗山、红萝山、红螺山），位于怀柔以北。毡帽山位于独石北，“在赤城县北，独石城西北十里。圆耸卓立，远望如帽，因名。一名簪缨山。”[4]以上诸地皆在大宁旧地以南。

朱棣即位之后，明朝鉴于在靖难之役中耗损甚多实力，对于蒙古威逼之势，除在局部地区采取小规模军事回应外，在国家政策层面，并未立即采取强硬立场，而是努力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关系，对于兀良哈也是如此。鉴于辽东镇防御多次失利，朱棣遂发展与兀良哈的关系。在送还入侵被擒之兀良哈首领同时，朱棣表达了与兀良哈开展互市之愿望。“但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5]当年十一月，明朝最终复立三卫、赏赐头目。“今仍旧制，设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俾尔等统属军民，镇守边境。旧尝授官者，列名以闻，咸复之。若头目人等前未授官，于今当授者，亦第其名来闻，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业。”[6]明朝还为其单独设置互市满足其经济需求，永乐十年（1412），“徙广宁卫铁山马市于团山，以水草便故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永乐元年冬十月乙卯”条，第437页。

〔2〕“于密云县古北口及十八盘岭、博和齐岭、森济图山地方，以至砂碛之地，见牲口皆瘦不能牵挽，疲乏者甚多。”参见〔清〕温达等奉敕撰《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217页。

〔3〕〔清〕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1156页。

〔4〕〔清〕和珅等：《大清一统志》（乾隆）卷24《宣化府·山川》，第492页。

〔5〕〔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0下“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条，第369页。

〔6〕〔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条，第454页。

也”。[1] 此“团山”为大团山，“在宁远卫西北三十里，中高四下，四守之可断北骑出没之途”。[2] 借助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兀良哈从而逐渐进入辽河套，不仅利用该地水草丰茂的特点，躲避蒙古高原政治势力之压力，奠定了自存之地理基础，而且利用互市，不断地从明朝获得大量的物资供应，成为各蒙古势力中经济最为富庶的一支，奠定了不断发展之经济基础，最终成为介于明朝、蒙古之间的具有半独立性的政治势力，在特殊形势下尚有越过大宁旧地，向西进入阴山边疆，进行扩张之趋势。

辽东镇以外，甘肃镇东部也在朱棣即位后开始遭到进攻。“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比虏袭凉州，掠近城三十里。”[3] 此时鞑靼、瓦剌尚纠缠于内部纷争，尚未南下，因此这一鞑靼部落应是洪武以来地处宁夏边外之塔滩蒙古。而在这次进攻以前，塔滩蒙古的另一支归附了明朝。“鞑靼头目伍丑驴自凉州来朝，命为锦衣卫指挥佥事。”[4] 蒙古对明朝核心边疆发动攻势从两翼，即阴山边疆周边开始，反映出永乐初年虽然大宁、东胜内徙，但明初阴山边疆重点经营成果在此严重动荡后，仍有很大效力。

3.4 永乐年间鞑靼威逼阴山边疆与兴和卫内徙

朱棣即位后，完成了从造反藩王至明朝君主的角色转换，不再需要向蒙古妥协。而蒙古高原亦完成了汗位的新一轮更迭，鬼力赤取代坤帖木儿成为新的可汗。由于坤帖木儿系瓦剌拥立，而鬼力赤代表了反瓦剌势力，因此这次汗位更迭相应反映了鞑靼、瓦剌之间的势力消长。朱棣此前既与瓦剌一派形成同盟关系，与鞑靼一派一时自然难于接洽。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7“永乐十年夏四月癸亥”条，第1584页。

[2]〔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25《辽东都指挥使司·山川》，三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8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庚子”条，第261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己丑”条，第256－257页。

永乐初年南北社会政治剧变皆使明朝、蒙古同盟关系宣告破裂，而代替以政权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此后蒙古高原政权亦不断更迭，且鉴于洪武以来即一直未臣服明朝，明军实力亦不断衰弱，遂持与明朝平等立场，无意被纳入朝贡体制之中。而鞑靼在失利后，又为躲避瓦剌，多有南下威逼漠南地区甚至阴山边疆之势，朱棣为建立"泽被天下"之中华亚洲秩序，以弥补得国不正之形象，从而在洪武末年用兵漠北零寇与平定交阯鼓舞之下，发动"五征三犁"之漠北战争。虽然朱棣取得了军事成功，但却仍延续洪武旧制，不以政治进占为目的，最终在鞑靼威逼下，甚至内徙兴和卫。

永乐元年(1403)底，蒙古高原发生鬼力赤可汗与瓦剌的内讧，朱棣曾担心胜利者瓦剌会借机南下漠南地区。"时鬼力赤、阿鲁台方率众与瓦剌马哈木战，马哈木大败之，尽掠其人马，居凡鲁班答迷之地，答哈帖木儿、锁飞皆为所留，锁飞夜窃其马，驰归备言虏中事。上曰：'鬼力赤既败瓦剌，或南行以逞，虽未敢深入，宜当有备。'遂敕兵将各严兵待之。"[1]并得到失利者鬼力赤向北迁移之消息。"辛酉，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近兀良哈有人来言虏酋也孙台、阿鲁台、马儿哈咱各怀异见，去年大败瓦剌，今春瓦剌亦败鬼力赤。又云鬼力赤部落比移向北行。"[2]但事实是当时蒙古势力仍以草原争雄为宗旨，南下掠明尚在其次，因此反而是失利者南下漠南地区。永乐元年十一月，"癸巳，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奏鞑靼察罕帖木儿来归，言虏党伯客帖木儿欲寇甘肃、宁夏。上即日封晟所奏，付宁夏总兵左都督何福，令严固守备。"[3]"丁巳，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报知鞑寇伦都儿灰等于不老山屯住，欲侵宁夏。尔其励士马、严斥堠以备之，毋或少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永乐元年冬十月戊午"条，第440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秋七月辛酉"条，第579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癸巳"条，第455页。

息。'"[1]在一度逡巡边外之后，鉴于实力有限，多归降明朝。[2]

永乐二年(1404)，明朝得到失利鞑靼部落南下之消息。"敕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直整饬所领将士，严固备御。时鞑靼民里不花等来归，言虏将入寇故也。"[3]朱棣遂命宣府镇、宁夏镇大规模修筑城堡，以作坚壁清野之用。

敕宣府副总兵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及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等曰："使臣自哈密还，言鬼力赤率众各赍三月粮，挤乳马二匹、骟马二匹，持斧锯为开山伐木之用。言与瓦剌战罢，即旋兵南来。朕意斧锯或为破寨之用，又赍粮颇多，南来之言或然。其严兵备之，来则击之。虏或先以数骑来诱，切勿穷追，恐堕其计。"既又敕福曰："宁夏多屯所，虏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内择一屯有水草者，四围浚濠，广丈五尺，深如广之半，筑土城约高二丈开八门，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辎重粮草皆集于此。无警则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则驱牛羊从八门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则寇无所掠，此特守屯一事。朕遥计如此，其攻取战守之策，在尔深筹之。"[4]

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修筑宣府诸处屯堡成。先是，敕谕亨等于宣府、万全、怀安诸处，简军马，坚垒壁，谨烽堠，慎防御之务。每数堡择一堡为高城深壕，城多置门其中，开井积水以聚数堡之人马、辎重、粮饷，昼夜瞭望。寇至，夜则举火，昼则举炮为信，以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丁巳"条，第463页。

[2]"鞑靼知院马剌沙率部落驻于哈敦不剌之地，遣其属民里不花等至京师纳款请朝。上许之，遂命民里不花等往导马剌沙入境，而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遣兵纳之。"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34"永乐二年九月壬寅"条，第597页。"鞑靼扫胡儿与其弟答剌赤八、速台迭儿、必失等来归。扫胡儿，阿鲁台部属也。言鬼力赤闻兀良哈、哈密内属朝廷，遂相猜防，数遣人南来窥伺。"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38"永乐三年春正月乙巳"条，第640页。敕甘肃镇总兵官宋晟云："比闻鞑官伯客帖木儿率众来归，可遣人慰抚，导之入境。"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45"永乐三年八月癸未"条，第705-706页。"鞑靼满束儿灰等率众来朝，命为都指挥、指挥等职，赐冠带、诰敕及袭衣、钞币有差，俾居凉州、庄浪、宁夏三卫。"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0"永乐四年春正月己酉"条，第754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秋七月癸卯"条，第576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秋七月丙申"条，第592-593页。

军士坚守之，附近屯堡军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经营规划，至是始备云。[1]

但鬼力赤在南下漠南之前，首先努力剪除内附明朝、充作羽翼之哈密，将忠顺王安克帖木儿毒死，[2]此后遂有南进阴山边疆之意图。永乐三年（1405）五月，“鞑靼头目察罕达鲁花遣人归附贡马。敕迤北巡哨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曰：‘察罕达鲁花使人来言，鬼力赤见在卜鲁屯之地，则前者山西报云内及天城小尖山有火，此必鬼力赤遣人觇我边也。尔等可遣精骑，密侦其动静。若来寇开平，即设伏出奇击之。’”[3]云内在东胜卫旧址东北、黑河东岸，天城在大同镇与宣府镇交界之处，雁水南岸。可见永乐初年，蒙古军队已对大青山区域阴山边疆构成了全面威胁态势，前哨士卒则已沿河流潜至东胜诸卫旧址。不过鬼力赤鉴于大同镇为明朝在核心边疆重点经营之处，并未南下大青山，而是将矛头转向迤西之“差缓地带”甘肃镇。有鉴于此，当时北部边疆地位最高之甘肃镇总兵官宋晟遂请与鬼力赤通问消息，以绥和其部。永乐三年十二月，“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奏欲遣人通问迤北鬼力赤及马儿哈咱等，以宣示朝廷送礼待遣人之意。从之”。[4] 得知甘肃镇有备，鬼力赤遂将目标转向以东之宁夏、大同。“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吕高、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近伯客帖木儿弟歹必都驴来言，虏寇议舍甘肃，来春径掠宁夏、大同。其言虽未可信，然宜严兵待之，所谓有备则无患也。’”[5]永乐四年（1406）二月，鬼力赤率部自漠北向东南转移。朱棣谕赵王朱高燧称：“小旗孙成自虏中逸归，见鬼力赤、阿鲁台、也孙台向东南行。其来寇掠边境，亦未可知。尔速遣人驰报武安侯郑亨等，令坚壁清野以待，自黑峪车坊至鱼台岭隘口，可塞者塞之，不可塞则凿深壕，以断其路。”[6]不过鞑靼内部关于是否南下犯明，并未达成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37“永乐二年十二月庚午”条，第631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41“永乐三年夏四月庚辰”条，第670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42“永乐三年五月庚辰”条，第676－677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49“永乐三年十二月乙亥”条，第740页。
[5]［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49“永乐三年十二月辛巳”条，第741页。
[6]［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1“永乐四年二月丙子”条，第764－765页。

一致，故而迟迟未进入阴山边疆。朱棣又敕甘肃镇总兵官宋晟云："比闻鬼力赤、阿鲁台、也孙台等率众东南行，折而北，既复南行。如此一进一退，或者欲来剽掠。"[1]后来得到消息，鞑靼可能在冬季始南下。朱棣敕宁夏镇总兵官何福称："漠北脱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2]

在鞑靼长期压力之下，朱棣多次遣使示好无果，最终以武力威胁。永乐四年（1406）三月，致书鬼力赤称："若果负倔强之性，天命人穷有所不顾，必欲以兵一较胜负，朕亦不得独已，中国士马精强，长驱迅扫之势，恐非可汗所能支也，可汗其审度而行之。"[3]但未等明朝出兵，鞑靼内部即发生动乱，对于明朝边境之威胁亦暂时解除。永乐四年十月，"百户赵贤等自兀良哈察罕达鲁花处还，言虏酋也孙台为部下所杀，马儿哈咱往归瓦剌，阿鲁台往居海剌儿河之地"。[4] 在内外压力之下，鬼力赤阴遣使臣至明，表达交好意愿。永乐五年（1407）三月，"甲戌，遣鞑靼僧耳亦赤、也儿吉、你儿灰等还，命赍彩币赐鞑靼太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及头目脱火赤等。……又密谕福及宋晟曰：'耳亦赤乃鬼力赤之师，或言此必鬼力赤所遣。盖鬼力赤欲西向与瓦剌战，将徙其家属近南，而畏备边官军袭之，故遣来以缓官军之出。或言鬼力赤欲归附而未决，故先遣来窥觇朝廷之意。又有言虏将后至剽掠边境者。卿等更当审计备之。'"[5]永乐五年（1407）五月，在了解到鬼力赤汗位不稳后，朱棣决定与瓦剌联合，趁机制服鞑靼。"丙寅，遣千户亦剌思、那速儿丁及舍黑撒答等使瓦剌。时虏中来降者言鬼力赤为部下所废，其众欲立本雅失里。遂遣亦剌思等赍敕往谕马哈木等以天命有归及福善祸淫之意。并赐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及其所部撒都剌等金织文绮有差。"[6]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1"永乐四年二月丙子"条，第765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5"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条，第815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2"永乐四年三月辛丑"条，第779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60"永乐四年冬十月乙卯"条，第879－880页。
〔5〕〔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65"永乐五年三月甲戌"条，第921页。
〔6〕〔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67"永乐五年五月丙寅"条，第937－938页。

但十一月，鬼力赤突然提出大举进攻甘肃周边之计划。当年，甘肃镇收到蒙古即将来犯之消息。“丙子，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近得降虏朵儿只，言北虏备挤马干粮，期冰冻时南寇东胜，亦欲寇甘肃、哈密。尔须坚壁清野以待，若来，慎毋轻出兵击之，虑有诈也。戒慎！戒慎！”[1]据《明太宗实录》载，朵儿只原属鞑靼。“鞑靼头目朵儿只来归，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遣送至京，命为正千户，赐冠带、钞币及金织纱罗衣。”[2]所通报来犯者也应是鞑靼部落。与永乐三年甘肃镇绥和鬼力赤事相比照，此鞑靼部落便应为鬼力赤。鬼力赤之所以突然将军事目标定位于甘肃周边，可能与遭到鞑靼内部至西域迎接本雅失里的威胁有关，从而借助于控制甘肃周边地区，阻止本雅失里东进。永乐六年（1408）正月，鞑靼前哨已至兴和境外，即阴山南疆。[3] 把都帖木儿、伦都儿灰原皆属鞑靼，朱棣此时对于二部之警惕，可反映出兴和境外之蒙古为鞑靼部众。不过鬼力赤南下尚未成行，便被阿鲁台杀死。

对于本雅失里，明朝在最初获知其将返回草原之初，便从政治上加以笼络，意图“以夷制夷”，在忠告蒙古高原多次内乱覆辙之后，劝其“如能幡然来归，加以封爵、厚以赐赉，俾于近塞择善地以居，惟尔所欲。若为下人所惑，图拥立之虚名，虽祸机在前，有不暇顾，亦惟尔所欲”。[4] 本雅失里鉴于鬼力赤余部尚在甘肃以北，从而绕道北行。次年即永乐六年本雅失里被迎回草原，明朝最初担心其借道甘肃边外，[5]但本雅失里最终选择越过阿尔泰山，直接进入漠北地区。“己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73“永乐五年十一月丙子”条，第1021－1022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40“永乐三年三月庚申”条，第668页。

〔3〕“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等曰：‘近兴和守将言瞭见胡骑五十余往来塞外。宜练士马、谨斥堠，昼夜堤防。仍密察把都帖木儿及伦都儿灰所部人心如何，若可用则选壮勇者五六十人或百人，往迤北觇虏声息如何，未亲附切不可遣。’”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75“永乐六年春正月丙辰”条，第1029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77“永乐六年春三月辛酉”条，第1044页。

〔5〕“甲子，遣太监王安等往别失八里。时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不花等使迤西，还言本雅失里初居撒马儿罕，后奔别失八里，今虏遣人迎立之。边将亦报谍闻本雅失里事，且云本雅失里若立，则诸虏拥之北行，必先掠边境，请选劲骑出塞，觇伺或要击之。上曰：‘此虏果立，亦未能大肆其志。姑遣人潜察所向如何。’”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75“永乐六年春正月丙辰”条，第1030－1031页。

亥，太监王安奏本雅失里自别失八里从他道北行，不经哈密。令其所部鞑靼十八人在哈密窥探边事，忠顺王羁之以俟命。"[1]

本雅失里继承汗位后，斩杀明使郭骥，永乐七年朱棣遂遣靖难第一武将丘福北征，结果全军覆没。永乐八年(1410)，朱棣首次亲征，击败鞑靼主力。本雅失里归附瓦剌被杀，阿鲁台则开始向明朝贡。"永乐九年六月庚寅朔，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国公忽鲁秃等随指挥岳山等来贡马，赐宴劳之。"[2]鞑靼势力虽仍与阴山相接，鞑靼势力虽仍与阴山相接，阿鲁台也有统属北方其他民族之政治野心，"虏酋阿鲁台来款，请并女直、吐蕃属其约束"，[3]但暂时不再构成实质性威胁。[4]

鞑靼衰落之后，瓦剌趁机扩张势力，但由于驻牧地在大漠西北，与明境相隔较远，故而并未南下漠南地区，朱棣之所以发动第二次漠北亲征，打击瓦剌，是为防范其势力进一步壮大，而非鉴于漠南防御之形势。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鞑靼卜颜不花奏："瓦剌马哈木自弑立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盖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寨下，邀遏贡使，致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5]十一月，明朝得到瓦剌将南下之消息。"癸巳，敕宁夏、大同守将及缘边诸将曰：'指挥孙观保还自瓦剌，言虏酋征兵，欲掠宁夏、大同，宜治城堡、屯障谨备之，马畜、刍粮可徙向南。'"[6]但最后证明不过虚惊一场。"戊辰，敕镇守宁夏都指挥使张霖麟、孙霖曰：'前虑胡寇侵边，敕尔移马畜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80"永乐六年六月己亥"条，第1073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16"永乐九年六月庚寅朔"条，第1475页。

[3][明]江盈科著，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皇明十六种小传》卷2《明类·黄淮言虏部宜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958页。

[4]永乐十年(1412)二月，"癸亥，敕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比闻黄羊、野马俱望西行，或是走失捏干、阿鲁台之众向西行，则宁夏、山西不可无备。尔等更须严兵勿怠。'"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5"永乐十年二月癸亥"条，第1567页。五月，"敕镇守兴和都指挥王唤等曰：'今指挥岳山自虏中还，言鞑贼有为阿鲁台划计者，欲缘边剽掠。宜谨守城池，或有以进马以归附来者，须详察其实，勿遽纳之。'"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8"永乐十年五月己丑"条，第1593页。

[5][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40"永乐十一年五月己酉"条，第1687页。

[6][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45"永乐十一年十一月癸巳"条，第1716页。

南向。今悉令还屯务农,但谨备之耳。'"[1]朱棣第二次北征,双方皆有较大伤亡,出于对瓦剌报复的警惕,明朝也时刻防范瓦剌南下。[2] 但此时蒙古高原内部又陷入仇杀之中,并无余力攻明。永乐十三年(1415)十月,"癸巳,敕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都指挥齐安等曰:'得辽东谍报,阿鲁台遣人征朵颜等卫兵,言瓦剌人马已到阿忽马吉之境,宜昼夜谨备,不可怠忽。'"[3]十二月,朱棣敕镇守宁夏宁阳侯陈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马哈木等虑阿鲁台与中国和好,将为己害,拟七月率众至斡难河北,侯冬袭阿鲁台。"[4]在这一过程中,马哈木被杀。永乐十五年,朱棣又敕陈懋称:"瓦剌归附人言马哈木已死,其众溃散。"[5]瓦剌势力亦渐趋下降,鞑靼势力又有抬升之势,蒙古高原政治力量对比再次发生了一定变化。

永乐十九年(1421),阿鲁台与明朝的矛盾逐渐明显。正月,"己巳,和宁王阿鲁台遣都督脱脱木儿等贡马。脱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行旅,边将以闻,请禁止之。上遣使赍敕,谕阿鲁台戒戢之。盖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6]由于鞑靼距明朝较近,因此在经过长期休整后,于永乐末年复有侵边之举。[7] 有鉴于此,朱棣发动第三次北征,不过阿鲁台听闻这一消息后,"举其众北徙",朱棣遂罢各处征兵。[8] 当年年底,鞑靼已南下阴山边疆,到达开平西南西凉亭处。"戊辰,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奏:瞭见野马、黄羊从者答古川往西凉亭西南,又见隰宁堡北八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48"永乐十二年二月戊辰"条,第1734页。

[2]"壬戌,敕宁夏总兵官宁阳侯陈懋曰:'近瓦剌人至,言马哈木欲掠甘肃。虏虽已穷蹙,然不可无备。'"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56"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戌"条,第1795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69"永乐十三年冬十月癸巳"条,第1884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71"永乐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条,第1903-1904页。

[5]〔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77"永乐十四年六月丁卯"条,第1931页。

[6]〔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33"永乐十九年春正月己巳"条,第2248页。

[7]"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彰等劾奏陕西行都司都指挥李文、刘广、陈贤、陈聚、吕均边备不严,致虏骑入塞,杀伤军士,请治其罪。上命姑之,宥令省过自效。"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33"永乐十九年春正月丙子"条,第2249页。六月,"丁巳,边将言谍者云阿鲁台欲寇边。敕居庸等关严兵备。"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38"永乐十九年夏六月丁巳"条,第2278页。

[8]〔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39"永乐十九年秋七月戊子"条,第2284页。

十里墩野马西走。敕缘边诸将严兵备虏。"[1]

兴和卫便在这一军事背景下内徙。明朝之所以内徙兴和，直接原因应在于永乐末年守军失利之事。"戊戌，迤北和宁王阿鲁台遣使臣多赤等贡马，且归清平伯吴成家属。初成等守兴和，日事田猎，而忽守备。虏伺其出，乘虚入城，掠其妻孥以去。"[2]这里仅载兴和卫内徙是在吴成驻守期间，并未具体指明时间。通过《明太宗实录》所载吴成事迹，内徙当发生在永乐二十年（1422）三月。永乐十七年（1419）正月，都督佥事吴成奉命与兵部尚书赵翌"往视口北宜牧之地"。[3] 口北自然包括兴和。永乐十八年（1420）七月，"丁亥，命兴安伯徐亨、后军都督佥事吴成领马军三百人往开平备御"。[4] 此后未见吴成改守他地之记载，直到永乐二十年朱棣北征，吴成充当先锋。可见吴成在开平任上一直至永乐二十年。而开平、兴和地既相连，永乐时期多以将领兼守二地，吴成也应有守御兴和之任。永乐十九年十一月，阿鲁台率众绕过开平，进至西南之西凉亭处。永乐二十八年三月，即朱棣第四次北征之前，阿鲁台进一步进攻兴和。"乙亥，边将奏虏寇阿鲁台犯兴和。"[5]兴和被破，将领亦有死者。"命故都指挥使王唤子祥为燕山左卫指挥使。唤初为燕山左护百户，从上靖难，攻城败敌，屡效劳勋，累升至都指挥使，命守兴和。永乐二十年三月，胡寇围城，唤奋死战殁云。"[6]也正是兴和事件坚定了朱棣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发动第四次北征的决心。"至是，（阿鲁台）大寇兴和，亲征之议遂决，在廷文武之臣群谋佥同，命

---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3"永乐十九年冬十一月戊辰"条，第2295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47"宣德三年冬十月戊戌"条，第1160页。《殊域周咨录》载谭广放弃兴和之说法。"或问兴和之所以弃。曰：余闻之土人云，国初有新兴伯谭某者，镇守兴和。尝出猎，守备王涣候之郊，中酒，为伏虏所缚。因胁其从人乘昏呼门。守者不察，纳之，城遂陷。今考成祖北征，每驻兴和，而所卒不复，岂以其孤绝难守，鉴涣事邪？然自是遂失兴和矣。"参见〔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7《鞑靼》，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0页。明代并无新兴伯，这里所指"谭某"应为谭广，但显然又与谭广事迹不符。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08"永乐十七年春正月壬申"条，第2121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27"永乐十八年秋七月丁亥"条，第2221页。

〔5〕〔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7"永乐二十年春三月乙亥"条，第2313页。

〔6〕〔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7"永乐二十年春三月辛巳"条，第2314页。

五府整兵，户部理馈饷，诹日启行，遂誓将士。”[1]

兴和虽一时攻破，但毕竟明朝很快便收复此地，而且阿鲁台在明朝、瓦剌夹击之下，已遁至漠北甚远之地。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棣得到阿鲁台仍将犯边之消息，遂发动第四次北征。但在宣府镇便得知阿鲁台被瓦剌杀败。“虏中伪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其妻子来降，备言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掠其人口、马驼、牛羊殆尽，部落溃散，无所属。又曰彼若闻天兵复出，疾走远避之不暇，岂复敢萌南向之意？”[2]不过朱棣仍继续北行，不见敌而还。而由于受到朱棣北征之威逼，阿鲁台在北徙过程中，损失巨大。“阿鲁台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北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度答兰纳木儿河，趣荒漠以避。”[3]可见兴和卫完全具有复建之条件。

朱棣最终之所以将之内徙，不仅与东胜八卫内徙带来的阴山西部防御空虚，兴和独当大青山空阔草原地带，显得有些孤立难支有关；也与长城防御体系之构建，而兴和处于墙垣之外有直接关系。永乐时期，朱棣为加强北京以北之防御，从而延续并扩展洪武时期关隘防御体系、烽墩攻防体系，逐步构建了立体、纵深的长城防御体系。朱棣鉴于靖难之后明军野战能力下降，强调利用燕山险要地形，直接堵塞关口，即通过堵塞山体之间的缺口，使其尽可能狭窄，在此基础上设戍卒数人或数十人，便可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效果。永乐四年，朱棣便已确立了在北京以北堵塞关口的边防策略。书谕赵王称：“武安侯郑亨等令坚壁清野以待，自黑峪车坊至鱼台岭隘口，可塞者塞之，不可塞则凿深壕，以断其路。”[4]首次北征之时，朱棣进一步细致考察了北京以北地理形势，明确了构建长城防御体系的边防观念。北征回还之后，便堵塞燕山关口。永乐十二年（1414），“塞保安卫董家庄等十一处山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7“永乐二十年春三月乙亥”条，第2313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63“永乐二十一年九月癸巳”条，第2402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70“永乐二十二年夏四月庚午”条，第2448－2449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51“永乐四年二月丙子”条，第764－765页。

口”。[1] 永乐十三年(1415),“塞居庸关以北潭峪、小峪、黑折涧、水峪台、鳌鱼岭、千石涧、南石阳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2] “塞关外晏磨峪、大水峪、小水峪、大峪、长水峪、小姑将峪、大姑将峪、胜先峪、石涧、跳梢峪、水峪、白瀑、董家、小陵峪、常峪、西石阳、白石阳隘口一十六处,以军士十人守之。”[3]从而利用燕山地形,构建了燕山山墙防御体系。

而在燕山以北、大马群山南部地势平坦之地,即“独石迤西至野岭,地势坦夷,无险可据”的宣化盆地北缘,[4]因地处大青山、燕山之间,无山体可以借助,明朝遂采取修筑墙垣、挖掘壕沟方式,以阻隔蒙骑。这一边防策略亦由朱棣亲自制定。永乐八年首次北征途中,“二十六日,仆从稍稍至。驻跸兴和。上祭所过名山大川。上驻马于营前,召幼孜等谓曰:‘汝观地势,远见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阴山脊,故寒。过此又暖。尔等昨日过关,始见山险。若因山为堑,因壑为池,守此,谁能轻度?’”[5]首次北征之后,宣府镇便按照朱棣所示,在大马群山南部构建长城防御体系。永乐十年(1412),“己未,敕边将于长安岭、野狐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濠堑,以防虏寇。”[6]在燕山东北,大宁西南之地,永乐十九年,“命边将置逻骑营于古北口之北神树之地,作深沟高堑以自固”,[7]即明朝在燕山以北构建了人工墙垣、壕沟相结合之线性防御体系。墙垣属于长城防御体系自无异议,不过以往学界有不将边壕视作长城者,其实明人已明确地将墙、堑、窖皆视为长城。[8] 总之,永乐时期北京以北形成了由关隘、屯堡、烟墩、山墙、墙壕相互结合的完整长城防御体系,是明代长城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57“永乐十二年冬十月丙戌”条,第1798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60“永乐十三年春正月丙午”条,第1816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69“永乐十三年冬十月乙亥”条,第1882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丁巳”条,第445页。

[5][明]金幼孜:《北征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6][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31“永乐十年八月己未”条,第1616页。

[7][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3“永乐十九年冬十一月己巳”条,第2295页。

[8][明]陈全之著,顾静标校:《蓬窗日录》卷2《寰宇二·垣堑窖三险议》,第79-80页。

防御体系最早形成之地。

而从上引朱棣北征时，对于兴和地理之评价，便可知在朱棣首次北征途中酝酿墙垣防御体系时，兴和便已被划于体系之外。明朝在实力具备的条件下，内徙兴和卫，反映出朱棣对阴山边疆战略地位的评估有所下降。洪武晚期在捕鱼儿海战役后，明朝已对北元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朱元璋遂将残存武将集团清洗殆尽，而将地方军权尤其北疆军权交予诸王手中，以达成诸王在地方上拱卫中央皇室之政治目的。洪武末年，燕王遂与晋王率领其他七卫，成为北部边疆最高军事长官。朱棣也在这一过程之中，多次出入漠南地区，并取得了一些小型胜利。正是在这些战功鼓舞之下，朱棣将洪武末年对待藩王之经验延续至永乐时期，以驱逐蒙古为军事目的。经过"五征三犁"，朱棣在大漠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军事胜利，但除前两次分别击败鞑靼、瓦剌之外，后三次多为不见敌而还，在巨大的财政消耗之后，并未彻底消灭蒙古势力。不仅如此，朱棣在军事征战之后，并未随之实行政治进占，相对于洪武时期，北疆防线反而呈现了内移趋势。之所以如此，在于朱棣认为蒙古大部既已肃清，阴山边疆攻防枢纽地位便相应下降，其移民屯垦、政治进占也只有纯粹疆土上的意义，对于提高明朝财政收入，并无明显作用。不如以军队集中守御近边农耕地带，将阴山边疆空置起来，坚壁清野，更好地保障内地农业生产与国库收入。具体方案便是构建长城防御体系。而伴随这一方案的实施，边墙以外的许多地区不仅兴和地区被放弃，而且开平卫，以及阴山边疆其他地区在宣德以后陆续被放弃。

而在鞑靼开始进攻明朝之前，兀良哈以地理之便，不断进入辽东镇境内。[1] 朱棣第三次北征虽未找到阿鲁台主力，但在回程途中，给兀良哈以沉重打击。"戊戌，车驾次玻璃谷。诸将先受命征兀良哈者，奏

---

〔1〕永乐十五年(1417)，"辛未，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曰：'近指挥朵儿只还自兀良哈，言虏寇至边，昼则潜伏，夜则出入烟墩下，守者皆不觉。果如此言，为将不严之过。然虏多诈，此言未可信。今宜密遣三五百人匿道旁，俟寇入擒之，然后治守者之罪，庶其有警。'"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94"永乐十五年十一月辛未"条，第2040－2041页。永乐十八年(1420)，"谪辽东都指挥李信等巡边，以其守备不严，致寇入境也。"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31"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壬申"条，第2236页。

云已入寇穴，寇悉众来敌，大败之，斩首数千级，余众溃而西走，尽收其人口孳畜，先道大宁入喜峰口俟驾。”[1]

可见，靖难之役后，明朝出于内政原因，在蒙古未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剪除阴山边疆左右两翼，并在蒙古威胁下，内徙兴和卫，并使开平处于孤立地位，从而在边防建设中体现了很强的“内政优先边防”观念，为蒙古进入阴山边疆埋下了隐患。但由于这一时期明朝军事力量强大，蒙古高原内部也正处于汗位争夺激烈时期，蒙古各部基本将主要精力用于草原争雄，而非南下明边。因此阴山边疆隐患尚未暴露出来。而这在实行边疆内缩政策的仁宣以后，便开始充分放大起来。

3.5 仁宣时期边疆收缩政策与开平卫内徙

仁宣时期，明朝鉴于永乐时期边疆开拓造成的财政困境，遂将外拓之边疆策略改为内缩，此后历朝亦皆以防御而非进攻作为明朝边疆政策的基本立场与基调。但对于财政节约与边疆防御的偏重，导致明朝丧失了边疆开拓精神与主动解决方案，相应在“四夷”压力之下，边疆呈现逐渐收缩的趋势。而这其中，尤以南部边疆交阯之放弃与北部边疆开平之内徙对后世影响巨大。

朱棣虽轻易内徙大宁、东胜，却并未内徙开平。这在于开平处于北京正北，是抵御蒙古南下北京之第一道防线，经营开平，便是经营防御蒙古进入北京之纵深防御体系的入口。永乐元年，朱棣重设开平卫，但与洪武时期相比，开平地位亦呈现下降趋势。永乐元年，朱棣尚延续洪武旧制，以诸子中以善战著称之次子高煦北上开平。

> 甲戌，命郡王高煦率兵往开平操备。谕之曰：“边报虏欲寇边，方春，兵民不得耕种，朕所深虑。命尔将兵驻开平，虏至即相机剿除，否则按兵待之，庶边境之人得以尽力屯田。然虏狡猾，不可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六月戊戌”条，第2340页。

易视，万一蹉失，则损威招衅，不可不谨。”王既行，复赐书谕曰：“尔军起行，惟声言往大宁，既出关，然后北行，未至开平四十里，即下营，先遣精骑往侦动静，勿令虏觉。如虏不知我军出塞，领众深入，则多用火器。遇夜，令壮士劫其营，亦可获功。若与战，则令武安侯郑亨居中，安平侯李远居左，武城侯王聪居右，尔将精骑一二千往，来策应。寇败，获其人勿轻杀，寇遁，毋利其牛马而穷追之。若虏有实意来降，误以为寇边而击之，则沮后来者之心。此须详审。然受降之时，尤须防其变诈。古云受降如受敌。制敌之策，大概如此。”[1]

高煦部下充任总兵官者为靖难勋贵郑亨。“命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武城侯王聪充左副总兵，安平侯李远充右副总兵，率师驻宣府备御。”[2]朱棣派遣朱高煦前往开平，实以其兼具攻守、谨慎进攻，从而呈现了继承洪武旧制之特点。但朱高煦出京之后，朱棣便以天象为由，令其返回。“闻尔兵行初至清河，从者为雷震死，过居庸，汝幕中釜鸣，皆不祥之征，不可不谨，即率骑兵三百人还北京，余令武安侯郑亨、武城侯王聪、安平侯李远总之，就驻宣府。”[3]朱高煦北镇开平不果，虽有天象之因，背后因素更可能是朱棣在立储问题上的全盘考虑。但无论如何，永乐元年朱棣已将北京以北军事重心由阴山北麓之开平卫南移至大马群山南部之宣府镇。

永乐后期至正统初年，蒙古高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两汗并立局面。宝音德力根指出：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发动第二次北征，目标转向瓦剌。马哈木兵败被杀，两年后即永乐十五年，答里巴可能被阿鲁台所杀。当年瓦剌继续拥立阿里不哥后裔斡亦剌歹为可汗，蒙古草原仍然维持两汗并立的格局。阿台、斡亦剌歹在位时间较长，斡亦剌歹于洪熙元年(1425)被杀，阿台则于正统三年(1438)被杀。而在阿台被杀之前，瓦剌绰罗斯氏家族脱欢于宣德八年(1433)拥立忽必烈系脱脱不花

[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甲戌”条，第313－314页。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六月戊辰”条，第391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六月己巳”条，第391页。

为可汗，蒙古草原再次延续两汗并立格局。正统三年之后，蒙古草原才再次进入短暂的政治统一阶段。[1] 两汗并立局面加剧了蒙古高原的政治斗争，而明朝业已放弃对漠北地区进攻之策略，失利之鞑靼遂开始通过大宁、东胜之缺口，并利用开平孤处阴山北界之劣势，对其施加了强大压力，明朝、蒙古在阴山边疆的力量对此遂逐渐发生变化。

仁宗即位后，明朝、蒙古双方都因经历长期战争，皆处于休整时期，双方皆有修复关系之愿望。阿鲁台势力已被严重削弱，遂再次请求进入朝贡体制。"敕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曰：'近阿鲁台遣使来朝进马，今差指挥赵回来的等，同来使赉敕宥其前过，令通好如故……'"[2] 瓦剌除三王之外，猛哥帖木儿也开始朝贡。[3] 而兀良哈也请求重开互市。[4] 但另一方面，仁宗既已放弃北征大漠，阴山边疆防御空缺遂展示于蒙古势力之前。为弥补这一漏洞，仁宗将内徙东胜八卫中的四卫调回大同。"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边城孤旷，守兵不足，乞仍以前所调高山、玉林、镇虏、云川四卫兵之在保定定州、涿州、雄县者，相兼屯守。从之。命所司俟春暖遣行。"[5] 高山、云川可能复归原处，镇虏卫则出于加强大同东北防御的考虑，并未复归大同西北，而是移于大同东北。"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李仪奏：大同东西二路不可无人巡哨，乞遣副总兵罗文巡哨东路，阳和、高山、天城、镇虏四卫听其调度。参将陈斌巡哨西路，大同左右、云川、玉林、朔州五卫听其调度。其大同迤北关头、猫儿庄等处责之总兵官方政提督，都指挥孙智专一巡哨。如此则兵将相得，地方有守。事下，兵部移文政等计议，政奏请如仪言。从之。"[6] 玉林卫也未移回原处。正统七年（1442），大同参将石亨奏：

---

[1]宝音德力根：《15世纪中叶前的北元可汗世系及政局》，载《蒙古史研究》第6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4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甲戌"条，第133页。

[3]［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5下"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子"条，第189页。

[4]"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兀良哈三卫、鞑靼欲来卖马。遣敕谕荣曰：'虏谲诈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可固拒，如实卖马，宜依永乐中例，于马市内交易，勿容入城……'"参见［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7下"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朔"条，第230页。

[5]［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4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条，第139－140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壬戌"条，第451页。

“看得忙牛岭外有玉林故城，相去右卫五十里，与东胜单于城相接。其地有险可据，又水草便利，乞拨官军筑立烽墩哨瞭，仍于故城择取一隅，修为营垒，以驻往来哨马。既得以保障边方，亦可以防护屯种。”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1]

在此基础上，仁宗进一步于阴山边疆专门设置总兵官，沿阴山流动巡逻，以弥补阴山边疆防御空缺。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一月，薛禄充任“口外备御”，[2]洪熙元年（1425）又佩新制“镇朔大将军印”，[3]称其为“口外总兵官”。“制谕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佩镇朔大将军印，充总兵官，率军自开平至大同缘边往来巡哨，遇有虏寇，相机剿捕。”[4]薛禄既以“口外”为使职名称，其管辖之地便包含整个口外之地。因此除开平以至大同，宣府、大同镇守总兵官管辖不及或边远之地外，尚负责京后关外之地。“敕口外备御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今钦天监言天象有兵，卿宜仔细审察备御。自三河抵宝坻、直沽一带，闻有强贼出没劫掠，宜差的当官军巡察，遇无名目可疑之人，即擒拿解来……”[5]

由于大宁、兴和皆已内徙，开平东西两侧遂暴露于蒙古势力之下，蒙古势力从而绕过重兵设防的开平，从旁侧进入开平、宣府镇之间防御薄弱的驿站地带。洪熙元年二月，仁宗敕称：“今长安岭守关指挥奏鞑贼人马约五十余人，直抵隰宁驿劫掠，不审是何部落。”[6]隰宁（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小河子乡石头城子）远在开平以南，地在大马群山北侧，明初于此设置驿站，作为联结开平枢纽之一。当月，鞑靼进一步南下至赤城驿。“阳武侯薛禄奏军至赤城等处追赶鞑贼，杀死百余人，生擒千余人，余贼奔溃。”[7]由于鞑靼进入开平卫与宣府镇中间地带，从而给开平卫的粮饷供应带来了很大困难，最终导致开平卫的内徙。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89“正统七年二月庚戌”条，第1795－1796页。
〔2〕〔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4下“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条，第156页。
〔3〕〔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7下“洪熙元年二月甲子”条，第241页。
〔4〕〔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8下“洪熙元年三月庚寅”条，第260－261页。
〔5〕〔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4下“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条，第156页。
〔6〕〔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7上“洪熙元年二月壬寅”条，第230页。
〔7〕〔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7下“洪熙元年二月癸亥”条，第240－241页。

明朝内徙开平卫与气候、地理两项因素皆有关系。明代处于气候上之“小冰河期”，是中国古代较为寒冷之时期。[1] 比如建文二年(1400)，李景隆率军解燕王军队对大同之包围，由于缺乏对边疆气候之了解，冻伤甚众。“我师攻大同，李景隆果来援引军出紫荆关。上率师由居庸关回，景隆军冻馁死者甚众，堕指者什二三，弃铠伏于道，不可胜计。”[2]再如正统八年(1443)，“大同官军巡警至沙沟，风雪骤至，裂肤断指者二百余人。上闻之，命人给毛袄一件。”[3]宣宗也指出开平地寒。“戊寅，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开平极边，天气早寒，商旅不通，布帛难得。其军官俸钞未支者，即以内库所贮颜色布运给之，不可稽缓。’”[4]由于气候变冷，阴山北麓的开平农耕条件明显不如阴山南疆。至迟在洪熙时期，开平军屯重心已南移至大马群山以南，形成卫城在外、军屯在内的兵、屯分离格局。但伴随大宁、兴和之内徙，鞑靼得以绕过开平卫，从东西两面直接进入兵力薄弱的军屯地区，导致开平卫粮饷供应出现困难。宣宗即位之初，“阳武侯薛禄奏雕鹗、赤城、云州、独石诸站皆在边野，开平老幼余丁亦于此种田。猝有虏寇，无城可守。况开平与独石相距五站，城垣不坚，且使命往来，道路荒远。若移开平卫于独石，令镇守宣府都督谭广所领官军筑城守备，实为便益。上曰：‘开平极边，废置非易事，当徐议。’”[5]薛禄这一方案正是鉴于开平兵屯分离弊端在阴山边疆瓦解趋势下的巨大漏洞，从经济因素出发提出的。

对于薛禄的内徙方案，宣宗从军事角度出发，一时不愿内徙开平卫。当时也有因兵于屯的意见，即在开平卫南部、大马群山北部进行修堡屯田。但薛禄对这一方案表达了反对态度。“环州[6]、威虏诸堡正

---

[1]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6“建文二年二月癸丑”条，第56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06“正统八年秋七月辛未”条，第2156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22“宣德元年冬十月戊寅”条，第585页。

[5]〔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4“洪熙元年七月庚寅”条，第110页。

[6]环州即桓州(今内蒙古多伦西)，在开平卫西南、鞍子山北侧。——作者注

当冲要，而地远势孤，若仍修筑，工费浩繁，开平官军家属众多，月给为难。”[1]他仍主张于大马群山南侧修筑城堡。“宜于独石筑城，毡帽山塞关，移置开平卫于此，俾其人自种自食，精选本卫及原调守备官军二千人分为两番，每番千人，自带粮料，往开平戍守。既免馈送之劳，亦得备御之固。”[2]户部作为明朝管理国家财政的机构，鉴于开平粮饷供应日益困难，也认可这一方案。“丙戌，行在户部奏：总兵官阳武侯薛禄领军巡边，计开卫所储豆不足支用，今农作方兴，未可役民，宜于附近卫所发军及余丁万人，于长安岭仓人支豆一石，运赴开平。上是其言，仍命阳武侯以兵护送。”[3]“行在户部主事王良言：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给之，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足以赡其家。乞简精锐者更番守城，令其妻子入赤城、云州立堡居之。上览其奏：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更番之说亦是良策，亦尝有言宜云州立堡者，宜熟图之。’”[4]

关于兀良哈三卫南迁时间，达力扎布挑战了传统的“土木之变”之后的说法，认为宣德时期明朝在边疆采取守势，为兀良哈三卫进入漠南地区创造了条件。[5] 其实洪熙元年兀良哈已再次越过大宁旧地，南下蓟州镇境外。洪熙元年三月，“监察御史严继先等劾奏：山海永平等处总兵官遂安伯陈英、镇守官都指挥陈景先等守边无备，致虏入苏川北山寇掠，又匿不以闻，请置于法。命都察院封继先奏章示之，俾图自效，以赎前过。”[6]四月，“蓟州山海等处镇都指挥陈景先奏：率领官军追袭虏寇，寇毙于神铳，遂溃走。获其器甲及马百余匹，并追回所虏人口。”[7]

---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8“宣德元年六月庚午”条，第477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8“宣德元年六月庚午”条，第477页。
[3]〔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6“宣德元年夏四月丙戌”条，第440－441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7“宣德元年五月丙午”条，第459页。
[5]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12－14页。
[6]〔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8“洪熙元年三月乙未”条，第268页。
[7]〔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卷“洪熙元年夏四月丁未”条，第287页。

宣宗即位后，兀良哈与明朝关系愈加紧张。[1]

兀良哈三卫除越过大宁旧地南下蓟州、辽东之外，尚利用大宁内徙带来的大宁、开平之间的防御空缺，自东而西，向阴山边疆进发。宣德二年，蒙古开始不断出没境外。“命阳武侯薛禄佩镇朔大将军印，充总兵官，清平伯吴成充副总兵，率师防护粮饷赴开平。仍敕在途整肃队伍，毋致疏虞。或遇虏寇，即相机剿捕，慎勿穷追。时开平备御都指挥唐铭等屡奏虏寇出没近境故也。”[2]“甲申，敕总兵官阳武侯薛禄等曰：‘比开平屡报有寇，宜仍整兵巡逻，遇寇相机剪除，尤宜慎重。”[3]开平这两次奏报皆未指明来犯者属蒙古哪一部落，但宣德二年七月的战争却暴露了来犯者的身份。“是日，总兵官阳武侯薛禄、副总兵清平伯吴成率师至开平，虏寇先已逼城下，无所得而退。禄至，获寇三人，询之，云虏众在朵儿班你儿兀之地，去东南三百余里。禄等遂率精兵往袭之。昼伏夜行，逾三夕至其地，望见虏营，纵轻骑径薄之。虏仓惶上马迎敌，官军杀虏数十人，生擒贼首镇抚晃合帖木儿、百户忙哥撒儿等十二人，虏败走，获其男妇六十四人，马八百一十七匹，牛羊四千余头。既还，虏众蹑其后，禄复纵兵奋击，又大败之。虏遂远遁。”[4]“宣德二年八月丙辰朔，总兵官阳武侯薛禄等奏七月二十一日，率兵于开平东南三百里外，剿杀鞑寇，上其俘获人口、辎重、马驼、牛羊之数。上遣使齎敕嘉劳之。”[5]达力扎布认为朵儿班你儿兀当在老哈河上游一带，从奔袭距离与被擒者尚有明朝官职来看，这一部落当为兀良哈三卫。[6]

宣德三年(1428)，“兀良哈之人往往于滦河牧马”，[7]宣宗遂掩袭

---

[1]“征虏前将军镇守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近虏寇入境，调都指挥唐琦率兵追击至骆驼岭，斩虏首七级，获其羊马六十五。荣又言朵颜卫达官指挥哈剌哈孙等不来朝贡，或有贰心。”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4“洪熙元年七月辛卯”条，第112页。“镇守蓟州山海等处都督佥事陈景先奏：比巡边官军至鲇鱼石关，遇虏寇四十余人，与战败之，追杀殆尽，获其所乘马以归。”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9“宣德元年七月丁未”条，第506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28“宣德二年五月癸巳”条，第725页。

[3][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28“宣德二年六月甲申”条，第754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29“宣德二年秋七月丁未”条，第768－769页。

[5][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30“宣德二年八月丙辰朔”条，第775页。

[6]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15页。

[7][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35“宣德三年春正月丁未”条，第885页。

兀良哈三卫于潢河、老哈河一带，招致后者不断报复。[1] 兀良哈三卫遂驻牧开平东南。宣宗称："山海卫关口至广宁前屯卫高岭驿六十余里，山木深密，正当冲要。其西北接刘家等口，并大宁路道，正虏寇出没之所。"[2]进攻目标之一便是开平周边。宣德四年六月，"虏寇入自西冲山，至赤城，掠人口而去。开平卫指挥方敏在赤城管屯，率兵追之，尽得所掠，且获贼马而还。"[3]西冲山在开平东南。宣宗敕称："近者鞑寇百五十余人犯古北口东砖垛子口，守关百户以铳击之，杀贼五人，贼即遁去。而探之开平浩岭驿无备，径由西冲山口突入，射伤官军。"[4]两天后又进攻独石。"是日，虏寇入开平境，杀掠独石等处官军人畜，镇抚张信、百户卢让死之。"[5]"总兵官阳武侯薛禄等奏二月二十日，兵至凤凰岭，遇虏寇，击之，杀寇百余人，被伤遁者无几，献所俘男妇四十六人及驼马、牛羊千余。"[6]凤凰岭在原大宁都司会州卫、富峪卫之间，今属河北平泉县七沟镇。[7]

由于明朝对漠北不再征伐，因此鞑靼在逐渐恢复之后，再次南下明边。由于东胜、兴和已内徙，鞑靼绕过开平卫，进入其西南地带。开平遂处鞑靼、兀良哈东西夹击之下。宣德四年（1429）正月，"甲子，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及开平备御都指挥唐铭等奏：守烽堠者报，大同境外西北有烟火，开平西南有鞑寇，十五为群，往来出没。敕山西、大同、宣府、开平诸将严加守备。"[8]七月，"虏寇杀宣府守神铳内官王冠。时冠率官军送内官海寿至龙门，醉止田舍。虏谍知袭杀之，并杀千户陈谅等，掠牛马而去。"[9]十月，"总兵官都督谭广奏：虏寇入境，抄掠人畜、

---

〔1〕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15－18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6"宣德四年秋七月癸酉"条，第1346页。

〔3〕〔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5"宣德四年六月丁酉"条，第1318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四年十一月戊辰"条，第1421页。

〔5〕〔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5"宣德四年六月己亥"条，第1320页。

〔6〕〔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丙辰"条，第1511页。

〔7〕"平泉州之凤凰岭"，参见〔清〕和珅、梁国治等奉敕撰《钦定热河志》卷93《物产二·果之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451页。

〔8〕〔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0"宣德四年春正月甲子"条，第1202页。

〔9〕〔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6"宣德四年秋七月丁卯"条，第1340－1341页。

杀死军士。"[1]十一月,"乙丑,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奏:是月十九日夜,虏寇百余人入雕鹗,杀伤浩岭驿官军,掠孳畜。怀来卫已发军剿捕,开平卫指挥方敏王俊不出兵策应,请治其罪。"[2]鉴于此,明朝遂不再命薛禄赴开平以北,而令其在宣府镇边外巡视。宣德四年十一月,"敕阳武侯薛禄充总兵官,恭顺侯吴克忠充副总兵,率领官军,往宣府等处境外巡哨。别敕总兵官都督谭广及武安侯郑亨,各选骑士一千、步卒一千,有马神铳手二百五十,俱带神铳,委官率领,于宣府听禄调遣。"[3]并命大马群山南侧军队改归宣府镇节制。"敕赤城管屯备御开平卫指挥方敏、王俊等,以所领官军,听总兵官都督谭广节制。"[4]即大马群山南侧从由开平卫管辖,逐渐改归宣府镇管辖。

在明朝放弃边疆开拓方针之后,开平伸出整体防线之外的进攻作用不仅随之丧失,其远离整体防线之防御弊端却由此产生。在这一边疆态势之下,将开平卫内徙于整体防线之中,既可保障近边,又能免其孤立,从而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鉴于开平屡遭进攻,宣宗于宣德二年(1427)便确立了开平卫内徙方案。宣德二年六月,"开平备御都指挥唐铭等奏:孤城荒远,薪刍并难,猝遇寇至,别无应援,请添拨官军神铳守备。下其事,太师英国公张辅及文武大臣议,皆以为欲添官军,愈难馈给。宜准阳武侯薛禄初奏,于独石筑城立开平卫,以开平备御家属移于新城,且耕且守。而以开平卫及所调他卫备御官军,选其精壮,分作二班,每班一千余人,更代于开平旧城哨备。新城守御官军不足者,暂于宣府及附近卫分酌量添拨,候发罪囚充军代还原伍。仍敕阳武侯薛禄防护粮饷之余,就彼相宜区画,筑城安恤,毕事而归奏。上命俟秋成后为。"[5]由于气候、地理方面存在的困难,宣德三年开平粮饷供应一度中断。"停开平运粮。先是,命阳武侯薛禄率军运宣府粮赴开平。至是,上以积雨泥泞,车行甚艰,命止之。仍命武安侯郑亨等散遣

---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四年冬十月壬午"条,第1402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四年十一月乙丑"条,第1420页。
[3]〔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四年十一月癸卯朔"条,第1409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四年十一月癸丑"条,第1417页。
[5]〔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28"宣德二年六月丁卯"条,第744页。

军士，粮已支出者，仍入仓，召禄还京。”[1]由此导致次年开平处于粮饷危机状态。“行在户部尚书郭敦奏：守开平都指挥使唐铭言所储粮少，仅足两月之用，请命大同、宣府总兵官，令整饬军士郎中王良发仓储令运赴开平，以二月初启行。仍请命北京军民运京仓粮赴宣府。上皆从之，命阳武侯薛禄充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为参将，率军护送。”[2]

宣府镇鉴于大马群山南侧军屯屡遭进攻，甚至主张将军屯进一步内移至长安岭以南。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乙亥，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等奏：长安岭以北独石、雕鹗等处屯种军余，宜徙入长安岭以南为便。遂敕广曰：‘此虽便于堤备，然未知开平差使往来，及人情动静若何。须公私两便，然后可行。其再计议以闻。’”[3]宣德五年（1430）正月，“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奏：赤城屯堡垣墉卑狭，比贼屡入劫掠。今屯守官军虑其复至，欲暂徙长安岭南，候春暖，择利便地，修筑城堡，增兵守备，半年一更为便。时开平卫余丁唐子英等亦告欲移入长安岭南耕种，每岁候大军运粮之时，随往开平，供送正军，为守御之计。遂敕广等曰：‘朕以边务付尔，事有便宜，从尔斟酌。但宜审度，务保十全。’”[4]谭广遂移屯军至长安岭南。三月，“赤城备御都指挥佥事汪贵奏：独石诸驿军士二百余人，旧皆驿餐马递送。比虏寇掠去马驴，遂移置诸军于长安岭。”[5]而大马群山、长安岭中间原军屯地带，仅临时给予兵器，以资防御。“直隶怀来卫指挥同知许信奏：长安岭迤北，直抵开平，别无城堡，数有虏寇，而粮储充积，宜戒不虞，请给军器为备。从之。”[6]

宣德五年四月，气候温暖，军屯闲暇之时，明朝开始于长安岭南大规模修筑城堡。“阳武侯薛禄奏：永宁卫团山及雕鹗、赤城、云州、独石四站，最为紧要，应筑城堡。当用夫匠五万人，人赍两月粮，防护官军用

---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45“宣德三年秋七月辛未”条，第1109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0“宣德四年春正月癸亥”条，第1201－1202页。
[3]［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0“宣德四年十二月乙亥”条，第1425－1426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1“宣德五年正月庚戌”条，第1445页。
[5]［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条，第1523页。
[6]［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壬寅”条，第1500页。

万人，医者二十人。上命所司悉如数给之。”[1]“戊寅，命阳武侯薛禄、丰城侯李贤等率师筑赤城等处城堡。敕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发军一万人，大同府发民夫五千人，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发兵一万一千二百人，保安、隆庆、蔚州共发民夫八百人赴役，仍令以精骑一千五百防护，皆听禄节制。”[2]在开平卫尚未内徙时，长安岭诸堡成为开平粮饷供应基地。“丁酉，阳武侯薛禄奏：开平岁运粮四万石，人力不齐，请令行在兵部、五府议其用力多寡，立为定例。上命尚书张本与五府议。本等议自京师至独石立十一堡，每堡屯军士千人，各具运车，计日半可毕一运，三日则运粮二千石，六十日可运四万石。其包席就所发仓给之，布囊则官给之，别用军五百人，专于京仓发运之际应杂役。如运车猝难办集，量给官驴运去其粮，运至独石新城内，置仓收贮。令开平备御官军分番于独石搬运，副总兵都督冯兴专领军防护。上从之，仍命武进伯朱冕总督。”[3]六月，明朝最终内徙开平卫于独石，而分班轮戍开平，每班二千人。“初筑独石、云州、赤城、雕鹗城堡完。上命兵部尚书张本往独石与阳武侯薛禄议守备之方。敕禄曰：‘一切边事，卿与本共熟筹之，必有益于国，有便于人，可以经久。’至是，本还上所议。请以兵护送开平卫所印信及军士家属置于独石等城堡，且屯且守。专以马步精兵二千，分为二班，令都督冯兴总之，都指挥唐铭、卞福各领一班，自带粮料，更番往来开平故城哨备。其各城堡守备军数，则独石二千，云州、赤城各五百，雕鹗三百，俱于隆庆左右二卫调发。如不足，则以保安卫足之。其山海、怀来各卫留守开平官军，悉令还卫。本复奏自今犯罪充军者，悉遣往实新立城堡。皆从之。”[4]明朝最终在长安岭以南实行兵、屯合一。明朝此后再次修筑城堡，便系为供应独石而非开平粮饷。[5]

---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5“宣德五年夏四月丙子”条，第1531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5“宣德五年夏四月戊寅”条，第1532页。

[3]〔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5“宣德五年夏四月丁酉”条，第1542－1543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7“宣德五年六月癸酉”条，第1574－1575页。

[5]“庚申，武进伯朱冕奏：‘奉命总督官军运粮往独石等处。臣思去年拟运四万石，兵部发五军诸卫官军，列堡转运。往还路远，止得二万石上仓。今欲运十五万石，若仍旧法，恐难集事。请于宣府操备官军及万全都司再摘五千人，各从近增立五堡，庶无稽误。’从之。”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二月庚申”条，第1775页。

明朝内徙开平卫，虽有气候寒冷之客观因素，亦有大宁、兴和、东胜内徙，开平孤立阴山北麓之地理因素，但永乐时期这些因素皆已存在，故而开平卫内徙之直接原因，仍为宣德时期边疆收缩之政策的表现，进一步而言，是宣德时期文治复兴背景下，内政优于边防、财政优于军事政治观念作用之结果。随朱棣最后一次北征的杨荣在《北征记》中，记载了朱棣在第五次千里北征，又不见敌的失望心情下，对张辅等武将表达了对北征失策之忏悔。“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且今孽虏所有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沧海，可必得耶？吾宁失有罪，不欲重劳将士。朕志定矣，其旋师。”[1]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朱棣对于军事进攻之反思，而且宣德时期所修《明太宗实录》照本全录，也有为边疆收缩政策张目之用意。宣德二年，宣宗借鉴北宋灭亡之教训，明确表达了谨守边备、不事远征之边防立场。宣宗称：“御狄之道，守备为先。彼得其险，已非我利。况当时契丹强盛，无可乘之机乎？然使宋之子孙，谨守宪章，练兵以备之，恒如开宝、淳化之时，亦足以保其成业。何熙宁至宣和，小人用事，国多弊政，遂至金虏之祸、高宗南渡，并中原而弃之，国势陵夷，有其渐矣。”[2]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仁宣时期明朝在边疆的主流政策是收缩边疆，但北疆之人却有洞察永乐以来阴山边疆在这一政策下的巨大防御漏洞，从而主张复归“洪武旧制”者。洪熙元年闰七月，朔州卫军士白荣言：“大同、蔚朔，古云中之地，西北皆沙漠。国朝设行都司于大同，又设东胜、高山等十卫缘边守御。建文中诸卫皆入内地，惟留安东中卫于朔州。乞以高山等十卫仍旧守边，则虏寇不敢窥伺。”对于这一建议，宣宗以安土重迁为由，加以拒绝。“天下无事，边防正当严饬，况西北尤为切要。但军士安居既久，一旦遽迁，恐人情不便。其会五府六部官计议以闻。”[3]宣宗拒绝恢复东胜四卫，一方面是为了继承维护北京重

---

〔1〕〔明〕杨荣：《北征记》，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明〕姚广孝等：《明太宗实录》卷272“永乐二十二年六月甲子”条，第2464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31“宣德二年九月辛丑”条，第807页。

〔3〕〔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洪熙元年闰七月戊申”条，第141页。

心的“永乐新制”，另一方面也是边疆收缩政策的反映。故而宣德七年（1432），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请于“聚鸾、高山口外要冲之地，请筑土城，设二卫”，宣宗同样加以否决。[1]

与白荣、郑亨请求恢复或部分恢复阴山边疆洪武旧制不同，洪熙元年闰七月，范济在其关于北疆防御的著名奏疏中，却在承认“永乐新制”的基础上，主张加强既存北疆要地的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屯兵要地。夫要地者，若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诸处，皆关岭之外，实中国之藩篱、边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耨，宜令将率兵，广屯种、修城堡、治器械、谨烽火、勤训练，以备胡虏。万一入寇，毋贪其小利、毋利其远来，必以饱待饥、以逸待劳，俟其惫而击之，必有所获。”[2]这一方案的实质是以永乐以来盛行之长城防御体系替代洪武时期阴山攻防体系，既承认了永乐以来阴山政策的“正统性”，又符合仁宣时期边疆收缩政策的基本立场，从而赢得了宣宗的认可。“朕观其言皆有理，皆合朕意，学识可取。尔更询察其实。”[3]宣宗从而在大同亦构建长城防御体系，这便是大同镇“大边长城”，位置较嘉靖时期修筑之“二边”远为靠外，将猫儿庄等重要地带皆包括在内。“镇守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近多雨，缘边三山等处，及猫儿庄、鸦儿崖烽堠、隘口颓圮，欲亲率官军巡视，并力修筑。从之。”[4]“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修完大同缘边三山等处烟墩一十四座，浚濠堑九十四里有余。”[5]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通事哈铭被瓦剌留于大漠，“土木之变”后，因缘际会，得以陪伴被俘之明英宗，充作翻译。此间曾返回明朝，通报消息。据其成化末年所撰《正统临戎录》之记述，可知大边在猫儿庄以北。“次日往北行，猫儿庄里边歇一夜。出大边墙，次日即往即（原文如此，当为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0“宣德七年五月丙戌”条，第2068－2069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闰七月甲寅”条，第153－154页。
〔3〕〔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闰七月甲寅”条，第162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洪熙元年闰七月丙午”条，第139页。
〔5〕〔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洪熙元年九月丁巳”条，第248页。

“集”)宁海子东岸行,二日至达子营。”[1]在大边长城,明朝还仿照关外形式,专设武将提督关隘。宣德九年,“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奏:缘边诸卫隘口守备宜有总督之者,今大同右、云川、玉林、朔州四卫所属,请遣都指挥佥事刘俨总督;天城、镇虏、阳和、高山四卫所辖,请遣都指挥佥事邓英总督。从之。”[2]鉴于大同东北地势平坦,“大同天城、阳和一带漫无险,惟随处有深坑天成,亦能警虏耳”,[3]发展骑兵有颇多困难,正统元年,大同总兵官方政言:“切惟大同境外沟多山少,三面受敌,设立马营难为经久”,[4]遂重点构建防御工事,宣德九年九月挖掘壕沟。宣德末年大同北部遂形成沟堑连绵局面。“镇守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奏:大同分地,东自烂柴沟,西至崖头墩,迂直险易,几逾千里。垣墙沟堑,日益坍塌。万一虏骑冲突,无以蔽拒,乞加修筑。从之。”[5]

开平卫内徙之后,宣府镇虽仍轮戍开平旧地,但兵力既少,防御重心也已南移,势必难以真正控制此地。宣德五年底,负责轮戍开平的宣府镇副总兵方政奏报“虏寇有在答古川、撅黎山者,去开平不远,恐为所袭,请发附近军夫一万人运粮料,而以骑兵护送”时,主管财政的户部荒唐地以春夏无警为由,认为此次警报属方政捏造。“今年春夏以来,自开平来者,并言无寇盗。此盖边将设词,欲变更番之例,以动民耳。”曾随朱棣北征,对蒙古南下习惯颇为知悉的宣宗也只是选择了含糊的态度,称:“今天气寒冱,寇虏南向之时,不可执一。令方政会郎中王良再议。果,当防护即拨军与之。”[6]户部之所以敢于直接否认边报,宣宗也莫衷一是,皆在于开平卫内徙之后,开平旧地战略地位已严重下降,户部从国家财政角度出发,可对开平荒远之地的合理性轻易提出质疑,宣宗对开平的重视也已严重下降。宣德末年,开平将领有奏请

---

[1][明]杨铭:《正统临戎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15“宣德九年十二月丁未”条,第2581页。

[3][明]陈全之著,顾静标校:《蓬窗日录》卷2《寰宇二》,第75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戊午”条,第440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宣德十年二月庚申”条,第56-57页。

[6][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72“宣德五年十一月戊戌朔”条,第1676页。

恢复大马群山以北城堡者，但宣宗并未同意。宣德八年（1433）十一月，“乙未，开平哨备都指挥佥事汪贵奏请如旧设隰宁、闵安、威虏、环州四堡，拨军瞭守。上语行在兵部臣曰：‘开平官军已移入独石、赤城屯戍，留守开平者不过千人。若设四堡，又当增兵，兵多地远，供给良难。其令陈浚熟计何者为便，具实以闻。’”[1]

故而，伴随开平卫的内徙，明朝逐渐失去了对阴山边疆北口的控制。相对于大宁、兴和、东胜内徙，开平内徙对阴山边疆的整体防御影响更大，这在于开平处于漠北蒙古进入漠南之枢纽地区，是草原势力进入阴山边疆的主通道。开平内徙后，明朝在阴山边疆固定控制地区仅限于作为北京最后屏障之宣府镇，但对于广大阴山边疆，已失去控制的主动权。这便是宣德六年阿鲁台在对瓦剌的战争失败后，得以轻易进入阴山边疆的前提与根源。

3.6 小结

外核心边疆中阴山辐射地带之阴山边疆不仅处于核心边疆中心位置，而且正对历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政治中心，相应是核心边疆的重点经营地区，可称之为“阴山边疆”。与阴山北疆相比，阴山南疆生态条件更为优越，成为中国古代南北双方争夺的焦点。明朝建国伊始，利用阴山南疆较为适宜之生态条件，在东起大马群山，西至黄河东北的广阔地带建立十七卫，其中东胜左右二卫不仅是控制蒙古由和林沿黑河南下阴山边疆的地理枢纽，也是蒙古由大漠东部进入阴山边疆之重点。明朝在大青山、大马群山之间，号称“阴山之脊”的元中都旧地兴和建立兴和卫。开平为明代阴山边疆起点，地处阴山北麓、滦河上游，不仅控制了蒙古南下之地理起点，而且对于消除北元残众南下故国之望，亦极具象征意义，为此明朝在这里设置开平卫与五屯卫。可见，洪武时期阴山边疆攻防格局中，开平为其起点，兴和为中转站，东胜为其终点，而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7“宣德八年十一月乙未”条，第2388－2389页。

其重心则在阴山南疆。明初通过借助这种“三位一体”的地缘格局，构建了阴山边疆立体攻防体系。

尽管洪武时期明朝阴山边疆攻防体系的构建，使明朝在阴山边疆保持了对蒙古势力的战略优势，但明朝并未借此建立对这一地区蒙古部落的固定控制，而是实行较为松散的羁縻制度，从而错失涵化汉蒙、整合边疆的历史机遇，不仅止步于局限国家，而未发展至统一王朝，甚至为阴山边疆的松动埋下了隐患，反映出明初边疆开拓的“有限性”。这一历史现象反映出与上古时期汉民族初兴，锐意进取，故而在与北方民族战争中取得上风，中古时期汉民族仍能涵化北方民族，而保持边疆开拓之活力不同，近世以来，伴随北方民族在武力上彻底占据上风，汉民族已不复有进取西北边疆之雄心壮志，对于北方民族既颇为畏惧，又心存芥蒂，从而放弃“以夷制夷”、固定统驭之政治愿望，不再重用北族降将，明朝军事领域华夷之别从而相对于秦汉、隋唐时期，大为突出。这种在边疆方面具有保守、内敛特征的“有限性”，在建文以后“内政”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进一步明确体现为“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文化，边防建设从而逐渐让位于内政治理。靖难之役中，出于内政与边防的协调平衡之考虑，在“内政优先边防”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建文朝廷抽调开平卫、东胜诸卫与宣化盆地宣府前卫等阴山边疆军队南下作战，从而导致除宣府大部分军队外，阴山边疆军队几乎倾巢南下，实已撤离阴山边疆。但由于燕王与鞑靼形成协议，鞑靼又由于与瓦剌之内战，并未趁机南下阴山边疆。

朱棣即位后，继续出于“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文化，为加强北京防御体系、削除晋王势力之考虑，就地安置东胜诸卫中之六卫于北京周边；出于加强北京外层防线考虑，仅将天城、阳和、宣府前卫、开平卫复归旧地。明朝在阴山边疆的防御体系遂从沿阴山边疆全面防御转变为在大马群山南北纵深防御。永乐二十一年，在鞑靼全面威逼之下，明朝最终内徙兴和卫。仁宣时期，鞑靼、兀良哈从而自东西两侧，截断开平与内地之联络，促使开平产生粮饷危机，明朝最终在地理孤远、气候寒冷、屯田不利等多重因素的直接作用下，最终出于“内政优先边防”政

治文化，为节约财政，于宣德五年内徙大马群山以南。

“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汉族王朝一贯之政治观念与边防原则，但明朝在国力强盛之时，仍在这一观念之下，主动放弃大量战略重要地区，反映出明朝相对于前代国力强盛之中原王朝，如秦汉、隋唐，呈现出汉民族开拓精神衰退之后的保守与内敛，这也是明朝在具备充分的国际环境与自身实力的前提下，止步于局限国家，而未发展至统一王朝的根本原因。

4　宣德中期以后蒙古打通“阴山走廊”与出入河套

4.1　绪论

明朝前期撤离阴山边疆后，蒙古草原内乱的失败者不再北上，而是选择南下这一军事空虚地带，最先进入这一地区的是宣德后期在与瓦剌战争中失败的鞑靼阿鲁台。对于阿鲁台的南下，明宣宗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默认鞑靼占据阴山南疆的政治事实，从而促使明朝、蒙古之间的政治边界由此明确起来。在瓦剌、兀良哈压力之下，鞑靼残部沿大青山、乌拉山、狼山，西走至甘肃境外，从而彻底打通了阴山边疆，将之转变为蒙古各部来往通畅的“阴山走廊”。兀良哈以追击鞑靼名义南下，借机穿过阴山南疆，并开始进入河套地区。“土木之变”后，瓦剌完全动摇了明朝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并也开始进入河套地区。在瓦剌内乱之后，鞑靼受到蒙古高原的战争压力，由专权太师孛来率领，开始南下阴山南疆，在景泰、天顺时期不断出入河套，充分利用了当地“过渡阶梯”的战略地位，四处进攻河套周边地区。本书通过考察鞑靼打通“阴山走廊”的过程与明朝边界意识的兴起，兀良哈南下阴山南疆的地理线路及其特点，瓦剌在阴山南疆的游牧地与进入河套，以及鞑靼孛来部落进入河套之历史过程，从而揭示明朝失去河套的历史前奏，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明代北部边疆历史变动的主线索与主推动力在于北方民族，这也是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历史变迁的基本事实。

4.2 宣德、正统之际鞑靼打通阴山走廊与明朝边界意识的兴起

伴随中原王朝在阴山边疆势力的逐渐衰退，北方民族趁机进入这一地区，此消彼长之态势一旦形成，北方民族便利用骑兵优势，逐渐打通阴山边疆，使这一汉族阵地成为北族驰骋南下之通道，即“阴山走廊”。因此，阴山边疆、阴山走廊所指代的区域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是站在“汉族本位”之上，而后者站在“北族本位”之上。

明前期撤离阴山边疆之后，蒙古势力很快便进入这一地区。宣德六年(1431)，蒙古草原再次发生鞑靼阿鲁台与瓦剌脱欢的战争，结果阿鲁台战败。“敕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虏中有归附者，言阿鲁台与瓦剌脱欢战，阿鲁台败北，部曲离散，多于近边假息，其中亦有欲归附者。宜督缘边，严为之备。虏果来归，或中国人自虏中脱还者，皆与口粮，遣人送京师。然虏多诈，古云：“受降如受敌”。慎之慎之。’”[1]与之前草原争雄战败者仍居于漠北不同，此次鞑靼直接南下漠南。这在于明朝捐弃了除宣府镇以外的所有阴山边疆，为蒙古进入漠南地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成为宣德以后草原政治失败者遁逃的栖息地与南下攻明的前哨地。“镇守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阿鲁台所部人马二千驻集宁海子西北岸。遂敕亨等曰：‘尔但宜慎边备、固城池。彼不犯边，毋擅以兵逼之。果来降，亦察其实，俾之入境，或近边居止。或打围，或往北行，听其所之。勿遣人出境觇伺，致其惊惧，或激变也。’”[2]从宣宗敕语来看，明朝所持北疆界限已止于墙垣地带。集宁海子(又称圪儿海，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黄旗海)位于大同镇境外，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内陆湖，周边水草丰茂，是明中后期蒙古进入黄河地带的主要前沿据点。

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明确边界意识不同，

---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二月丙申朔”条，第1751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79“宣德六年五月庚寅”条，第1845页。

古代国家由于军事、财政、行政能力有限，强调对边疆人口、资源即关键地区的“差序控制”，而非边疆所有地区的“均质统治”，边疆主要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疆域而非固定不变的疆界。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理想中的天下秩序只有“无界”的疆域，没有“有界”的疆界，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华夏文化边疆理想主义的典型体现。但毕竟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军事、财政、行政方面亦存在同样的有限性，因此边疆统治方式便呈现华夏控制边疆要地，通过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式，与周边民族形成一定的共存格局，从而维持“大一统”的理想政治秩序。在这一边疆观念、模式之下，中国古代政权相应较少有明确的边界意识。但这一理想秩序只有在中原王朝武力强大之时才可以实现，一旦周边民族足以抗衡中原王朝甚至呈现内压之势，中原王朝便从牧业地带逐渐退缩至农牧地带，甚至纯粹的农业地带。伴随“内华夏、外夷狄”均势对峙局面的长期形成，中原王朝边疆观念便在一定程度上从文化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边界意识便由此形成并逐渐凸显。

洪武时期，明朝在蒙古帝国世界秩序瓦解的时代背景下，并未借助汉地率先完成内部整合的历史机遇，利用蒙古帝国所创造的世界秩序空间，首次实现汉民族对亚欧社会的疆域拓展与一体整合，而仍然局限于汉民族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不仅未能继承蒙古帝国规模，甚至相对于传统汉族政权的中华亚洲秩序，也呈现出从西北边疆撤退的历史趋势。但另一方面，当时明朝势力十分强大，控制了瀚海以南的所有地区，声势直达漠北，并及于东北森林地带，因此在北部边疆并无明确固定的边界，而只有流动、纵深的边疆。朱棣出于赋予武力夺取政权合法性的需要，虽有征服异域之军事宏图，却无固定统治之政治意识，明朝北疆防线甚至相对于洪武时期，呈现了内缩趋势。不过朱棣既经“五征三犁”，大体控制了蒙古高原的主导权，因此也无明确的边界意识。这一局面在仁宣以后逐渐被打破与改变。明朝在财政压力之下，逐渐实行收缩边疆政策，这其中尤以北部边疆最为明显，原先处于明朝、蒙古中间地带，并无明确统属关系，却实际由明朝控制的地区，开始由于

明朝北疆防线的内徙，蒙古相应的南下，而逐渐转而由蒙古控制，从而与明朝固定统治地区接壤而邻。在这一地缘格局变化之下，原先处于中间地带缓冲、屏障之下的近边地区，便作为明朝固定统治地区的边界地区，逐渐凸显出来。

宣德四年(1429)七月“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奏：指挥王林擅役守烟墩官军，出境捕鹿，致虏寇逐踪犯边，杀掠人畜。”[1]八月，“己丑，宣府前卫指挥章容私役军二人出境，采木营私居，为寇所杀，而掠其所乘官马。”[2]虽然“出境”之词屡现，但“边境”何在，却未明确记载。而这条史料却明确反映出明朝至少以集宁海子为境外，故而对阿鲁台部众驻牧于此听之任之。伴随鞑靼进入广大阴山边疆，与明朝形成边疆对峙态势，宣德时期边界意识逐渐凸显，宣府、大同原来并非居于最外层之墙垣，亦由于防线内徙，而在事实上成为明朝、鞑靼之间的政治边界，即从“边防之墙”转变为“边界之墙”，“边墙”一词便由此产生。英宗年幼即位，明朝在“三杨”文官内阁主政之下，更是坚定了收缩边疆政策，放弃交阯便是明显例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边界意识明确凸显出来，长城遂被视作明朝边界的标志，相应被称作“边墙”。[3]《明英宗实录》已明确记载这一词汇。宣德十年(1435)七月，“庚寅，万全左卫百户孟礼奏：本卫指挥刘鹏擅拆边墙，放水灌田。指挥贾熊因而令军人出境采柴，以致贼人抢杀，请治其罪。”[4]也就是说，虽然此时明朝尚派军轮戍开平，但已将之视为与蒙古之间的中间地带，不再划入明朝正式疆域之内。

虽然英宗以后明朝边界意识已然兴起，但“大一统”政治观念与明初事实上控制的广袤边疆格局，皆使“王者无疆”的文化边疆观念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尤其在朝贡贸易体制之下，深受华夷之辨文化传统影响的明朝仍然将不断在战、和之间投机选择的蒙古各部，纳入到明朝广

---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6“宣德四年秋七月庚午”条，第1342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57“宣德四年八月己丑”条，第1361页。

[3]关于明前期宣府、大同二镇边墙修筑，参见拙著《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第302－336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7“宣德十年秋七月庚寅”条，第141页。

义的天下秩序之中，从而拒绝在明朝、蒙古之间划出明确的边界。正统三年(1438)，“行在兵部右侍郎邝野等奏：‘镇守大同参将石亨欲于官山设立界牌，令北虏往来使臣并来降者停止于此，赴墩报知，验其虚实，以凭抚捕。臣等窃惟圣朝土宇之广际天无外，立界牌未当。请立关于往来处为便。’上以为哨备谨严，何用牌与关邪？命亨皆勿立，但使臣来降者，密加防卫，若其为盗，即剿灭之。”[1]但在蒙古不断南下，甚至威胁近边地带的背景之下，理想的文化观念最终让位于现实的军事、政治建设，界碑至迟在正统三年之后被建立。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敕各边总兵等官：‘曩时各处边境多有界碑，凡外夷不得擅入，入则即同犯边，擒杀毋赦。其后边将怠慢不修，致夷人往往辄入近边，以围猎为名，肆行寇盗。自今其即于境外要害之处，约量道里远近，可置界碑者，并具地名奏来建立。使外夷不得擅入为非，而我官军亦不得私出启衅，庶内外各安其所。’”[2]

值得注意的是，从敕文可以看出，明朝设置界碑之处，并非正式边境——边墙，而是在边墙之外的“境外”之地，界碑以内之地也非正式疆域，而是类似于正式疆域，“入则即同犯边”便可证明此点。至于设置界碑的原因，敕文也已明确指出，是在正式边境之外设立缓冲地带，阻止蒙古直接进入边境地区。可见界碑并非政治边界，而是军事标志。与现代民族国家“均质化”或“单一均质”领土意识不同，明朝中期在收缩边疆政策的立场下，为解决边疆收缩引起的近边安全问题，发展出“差序化”或“双层差序”边疆意识，即将边疆地区分为政治统治、军事控制两个内外相连，定位却有所不同的地带，可分别称之为“政治边界”与“军事边疆”。政治边界即正式边境，往往以边墙为标志，以内为明朝正式统治的“境内”，“境内”地区建立了固定统治的军政机构与相配套的一系列建筑、设施等等，呈现了固定不变的疆界特征。而在边墙以外的“境外”地区，明朝将与边墙相邻的一定纵深地带，以界碑为标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2“正统三年五月庚子”条，第820－821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85“正统六年十一月己酉”条，第1707页。

志单独划出，作为借助流动的军事巡逻，实现军事控制、屏障正式疆界的“缓冲地区”或“中间地带”。虽然明朝并不将之视为正式疆域，但却将之视为军事控制范围，蒙古进入这一地带，被视作与进入边境同等的行为。由于这一地带经常处于明朝、蒙古拉锯之中，未被任一方固定控制，故而可称之为“军事边疆”。从敕文所载明朝于官山等处设置界碑来看，明朝其实是在内徙阴山边疆防线之后，将原先设置固定军事机构之政治边界转换为单纯的军事边疆，从而在减少财政成本的同时，利用流动防御的方式，仍然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由此可见，与现代国际关系中“非此即彼”的领土单一划分方式不同，明朝边疆观念呈现了彼、此之间尚有一中间地带的复合理念。这一“复合式”、“差序化”边疆观念不仅通过减少固定机构的方式减少了财政支出，而且通过军事巡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边境地区的安全，相应是以最小成本形成最大边疆控制效力的典型方式，适应了明朝边疆收缩政策下的边疆防御需要。与政治边界固定不变不同，军事边疆虽亦有固定界碑，以约束双方活动范围，但在实际军事形势中，因成为明朝、蒙古不断战争拉锯之地，故而其定位更多地是一种纵深疆域，而非线性疆界，从而体现出浓厚的“前近代”特征。

宣宗不仅默认阿鲁台部众居于边外，而且主动向仍居漠北的阿鲁台示好，以达到牵制瓦剌的效果。宣德六年八月，“迤北来归鞑靼言和宁王阿鲁台为瓦剌脱欢迫逐，又闻中国将发兵征之，仓惶无措。”宣宗遂敕阿鲁台称：“特遣都指挥昌英等再往谕意，王其宁心静志，安居边塞，无听间言，自生疑贰。朕之此心，皎如天日，王其亮之。”[1]在明朝允许之下，阿鲁台开始大规模南下，与已经居于蓟辽边外的兀良哈产生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82“宣德六年八月乙未”条，第1892－1893页。

冲突，从而导致东部边疆连番变动[1]，并且控制了蓟辽边外。[2] 并威逼女真部落。[3] 兀良哈则已被挤压至明朝、女真、朝鲜三方交界之处。“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奏：署都指挥佥事楚勇等专督守备，不严约束，致虏寇入义州，杀守墩军士。”[4]而在鞑靼、兀良哈挤压之下，女真部落进一步越过鸭绿江，进攻朝鲜。[5] 从而影响了整个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

明朝最初对阿鲁台内附持接纳态度，但鞑靼占据集宁海子之后，尚有进攻大同镇行为。宣德八年（1433）七月，“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虏寇入鸦儿崖，杀千户朱铭等五人，掠官马九十余匹，参将都指挥曹俭率兵追之，寇始遁走。”[6]除集宁海子之外，一些鞑靼部落尚居于东胜旧地。宣德六年十二月，山西镇守官李谦奏：“今西缘黄河，累有警报残虏多来归附，而守备不足。”[7]为了获得生存物资，甚至向西进攻

---

[1]宣德七年九月，“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等奏亦马忽山等卫指挥木答兀等来报，福余等三卫鞑军往掠阿鲁台，为阿鲁台所败，尽收其家口、辎重、牛马、田稼，三卫之人奔往海西，或在辽东境外，招之不来，间有来者，语言诗张，已整饬军马备之。”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5“宣德七年九月己未”条，第2145页。十月，“辛巳，边报阿鲁台部众东行攻兀良哈。上曰：‘夷狄相攻常事，然虏谲诈，或者乘间为边患。’遂敕缘边诸将谨守备。”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6“宣德七年冬十月辛巳”条，第2181－2182页。

[2]宣德八年二月，“庚寅，迤北和宁王阿鲁台遣使自辽东入贡。报至，上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等曰：‘往年虏使皆自大同、宣府入境，今迂路从辽东入，或欲窥觇作过，不可不虑，宜谨备之。’”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9“宣德八年二月庚寅”条，第2220页。

[3]“辛亥，兀者、肥河等卫奏和宁王阿鲁台部众数经其地，恐其侵扰，欲以兵拒之。上曰：‘虏逐水草求活耳，拒之非是。’遣敕谕之曰：‘朕尝敕和宁王，令戒饬部属，毋扰邻境。尔亦宜约束部下，谨守地方，彼来扰则御之，不扰亦勿侮之。’”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9“宣德八年二月辛亥”条，第2232页。“嘉河卫指挥乃剌秃等差指挥卜颜秃来，奏和宁王阿鲁台部属徙于忽剌温之地，迫近本境，恐其为患。今以所部人民移居近边，乞赐优容。”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0“宣德八年三月戊寅”条，第2251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9“宣德八年二月辛卯”条，第2221页。

[5]“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奏朝鲜国擅政建州卫，请诘问之。先是，朝鲜国王奏毛怜、建州之人诈为忽剌温野人装束，凡四百余骑，犯朝鲜边境，劫杀军民。建州、毛怜二卫亦奏忽剌温野人头目木答兀等掠朝鲜人口，遇朝廷所差内官，已追还之。朝鲜谓实建州所为，故加以兵。”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3“宣德八年六月癸未”条，第2293－2294页。

[6]〔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3“宣德八年秋七月壬申”条，第2313页。

[7]〔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85“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条，第1961页。

防御薄弱之甘肃镇,[1]在这一军事变化下,明朝甚至将黄河以北视为异域,在这一地区实行生态战争方式的"烧荒"。[2]

不过明朝对近边鞑靼部落的总体政策并未变化,仍以招抚为主。[3] 在明朝这一政策下,鞑靼部落有归附者。[4] 不过盘踞在东胜旧地的鞑靼部落仍以此为据点,拒不归附。"辛丑,宁夏总兵官都督佥事史昭送降虏也先帖木儿等至京师,言鞑贼孛的、打耳麻、脱欢、沙火的、朵罗秃等千余人驻黄河边摆力谎忽儿之地。又言昝卜所部余党欲寇凉州,遂敕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等严谨兵备。"[5]鞑靼部落不断进攻大同镇。[6]

宣德末年,鞑靼在阴山边疆的驻牧重心呈现了西移趋势,即由阴山

---

[1]"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奏近虏寇入兰州卫境掠马,又入永昌卫劫掠水泉儿、水磨川二驿人畜。"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5"宣德七年九月辛未"条,第2154页。

[2]"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言:偏头关外,地临黄河,皆边境冲要之处,草木茂盛,或有寇盗往来,难于瞭望。请如大同、宣府例,至冬初发兵烧荒。"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95"宣德七年九月丁巳"条,第2143页。宣德八年九月,"己亥,敕缘边诸将严守备。先是,有降虏言和宁王阿鲁台部属昝卜欲犯边,已敕诸将备之。至是,果入寇,凉州、永昌皆警。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遣指挥使李荣等率兵追及之,与战,杀昝卜父子及其党八十余人生,禽三十余人,余众皆遁,尽收其驼马而归。"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6"宣德八年九月己亥"条,第2364页。"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奏近胡寇犯凉州、永昌,遣凉州卫指挥使李荣等追击至亦卜剌山,力战败之,斩首寇昝卜父子及其党八十余人,生禽三十余人,谨以献京师。"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7"宣德八年十二月壬子"条,第2393页。

[3]"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近闻虏寇百余人,携家口至官山近地牧放就食,马困力穷,众不一心,请出兵掩捕。不然,请给榜招之。上曰:'彼不为寇,而加以兵不仁。惟当抚谕招怀之耳。'""丙戌,上谕行在兵部侍郎王驥曰:'昨日边报,虏有携家来依塞下者。此必不安于沙漠,若久无所归,将为寇窃。宜出榜招谕,若来即处以善地,授官职、给粮赏,使之得所。不来不必强之,惟慎防之耳。'"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德九年春正月丙戌"条,第2409页。

[4]"宁夏总兵官都督佥事史昭等奏鞑靼也先帖木儿等归附。"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德九年春正月丁酉"条,第2413页。

[5][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德九年春正月辛丑"条,第2414页。

[6]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镇守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奏虏寇四人,突入黄土山,射伤军士。百户周鉴等追捕,悉擒之,斩其首。又虏寇五人至沙岭北沟,持弓矢掠马驴,百户焦谦等追之,杀其三人,悉归所掠,余寇遁。命升赏如例。"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15"宣德九年十二月丁巳"条,第2585页。"大同参将都指挥曹俭奏虏寇至响水河及沙岭,射伤人,掠牛马而去。大同右卫副千户梁智等追之,杀虏三人,余寇奔遁,尽还所掠牛马。上命行在兵部赏智等功。"参见[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15"宣德九年十二月庚申"条,第2586-2587页。宣德十年(1435)六月,"虏骑千余人大同境肆掠,官军死者十五人,伤者百余人。"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6"宣德十年六月癸卯"条,第118页。

边疆之大同镇境外西移至阴山边疆西端贺兰山后以及更远之亦集乃，而进攻明朝之重心则集中于阴山边疆西端，即利用乌拉山的军事防御空缺，重点进攻甘肃、宁夏交界之松山走廊，实已逼近河套西界。鞑靼之所以西迁，与其进一步受到瓦剌打击有关。宣德九年四月，“迤北和宁王阿鲁台遣头目土鲁台薛别孙来奏，言为瓦剌所败，今脱身走，父子兄弟不复相顾。上闻之恻然，遣锦衣卫百户马亮赍敕驰往抚慰，并赐阿鲁台及部属失捏干等彩币表里。”[1]十月，明朝接到了阿鲁台被瓦剌袭杀的消息。

> 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奏：“获到虏寇，言今年二月，瓦剌、脱脱不花王子率众至哈海兀良之地，袭杀阿鲁台妻子部属，及掠其孳畜。阿鲁台与失捏干止余人马万三千徙居母纳山、察罕脑剌等处。七月脱欢复率众袭杀阿鲁台、失捏干，其部属溃散。阿鲁台所立阿台王子止余百人遁往阿察秃之地，完者帖木儿遂南行至哈剌脱欢山为寇。已遣千户王敬等领兵追之，斩首十一级，生擒完者帖木儿及男妇二十人，械送京师。”[2]

和田清认为母纳山即包头西边的穆尼乌拉岭，察罕脑剌不是杜勒泊或活育儿大泊的别名，便是插汉泉。[3]《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标注这两个地点分别为乌拉山、内蒙古包头西至乌拉山一带，即皆在黄河以北。阿察秃、哈剌脱欢山所在地不明，但瓦剌既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追杀阿鲁台部落，其众相应向西遁逃，揆诸地理，二者便应在甘肃镇北境。

伴随阿鲁台的死去，永乐以来驰骋大漠，横亘瓦剌、明朝之间的阿鲁台势力不复存在，鞑靼残部遂西遁于甘肃镇境外。“初，朵儿只伯从阿鲁台归款，已命为都督。阿鲁台既为瓦剌所败，朵儿只伯奔走无所依，尝寇掠凉州。边将获其甥，上怜而不杀留之。至是，惧朝廷追剿，故遣脱火赤等来，以款我师，且观朝廷所以处之如何。”[4]与朵儿只伯相

---

[1]〔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10“宣德九年夏四月壬戌”条，第2467页。
[2]〔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13“宣德九年冬十月乙卯”条，第2545页。
[3]〔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第204－205页。
[4]〔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115“宣德九年十二月己未”条，第2586页。

似的是，其他鞑靼残部亦鉴于明朝、瓦剌内外相逼，一度近边归附。兵部尚书王驥奏“虏阿鲁台为瓦剌所破，其部落溃散，外惧瓦剌，内畏官军，不得已内附”，[1]但鞑靼残部逐渐收聚、恢复，又借助归附明朝之名义，蔚然而成近边一大部落，对阴山边疆西端形成了直接威胁。其中为首者系阿鲁台原来支持的大汗阿台与朵儿只伯。“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不顺天道，罔感国恩，屡寇边境。”[2]其进攻目标集中于甘肃镇东北、宁夏镇西北。“时复突入凉州、镇番境内为患。”[3]“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等奏：‘来降达子脱罕沙言：达贼卜剌赤等千余人，欲来宁夏虏掠。臣与左少监来福率官军出口哨捕，领军指挥使熊震等于伯力、沙子、赤山儿、双山等处遇贼对敌，杀败贼众，斩获首级，生擒男妇五十余口，获到驼马骡牛等物，人口解送京师。’”[4]之所以有此选择，在于明朝在甘肃镇、宁夏镇境外滕格里沙漠的防御薄弱，鞑靼利用这一军事防御空缺，可轻易沿松山走廊南下，并在明军反击之时，迅速退回沙漠或以西之亦集乃。“甘肃左副总兵都督同知刘广奏：‘比闻来降胡妇脱欢等言，贼首阿台并朵儿只伯等向被大军杀散，各遁于亦集乃并亦不剌山潜住……’”[5]

针对这一地缘形势，明朝加强对甘肃镇东部的经营，于凉州设置副总兵，形成东西并重之势。“起为事官李安为行在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往甘肃同总兵官都督同知刘广提督操备。先是凉州等卫，屡有警。”[6]明朝还抽调陇中高原底部军队北上。“右佥都御史罗亨信言：洮岷等八卫官军分守凉州、永昌、镇番三卫，凉州尤为冲要，城门当裹以铁，请给熟铁二万五千斤应用。从之。”[7]同时，明朝主动出境作战。正统二年（1437），“宁夏等处累奏：达贼犯边，由迭烈孙雪山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3“正统元年冬十月辛未”条，第459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0“宣德十年冬十月庚子”条，第185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0“宣德十年冬十月壬寅”条，第187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6“正统元年夏四月乙巳”条，第308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4“正统元年二月丁巳”条，第267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宣德十年夏四月辛酉”条，第88页。
〔7〕〔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4“正统二年九月戊戌”条，第661页。

入境剽掠，又欲纠集贼众，往掠楚府孳畜。迹其所在，多于庄浪、兰县及宁夏山后潜藏出没。”更甚者，明军驻于贺兰山后、[1]狼山之前，[2]实已逼近河套西界。明朝遂命大同、宁夏、甘肃三镇联合出兵，“分道追袭虏酋阿台、朵儿只伯等”。[3] 鞑靼残部向东北逃遁，明军追至鱼海子，无功而返。“镇守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奏：都督蒋贵等奉敕征虏，兵至鱼海子，逗遛弥月而还。”[4]“都督蒋贵、佥都御史曹翼统兵剿胡寇，驻鱼海子，以（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安敬言前途无水草，不可进，引还。”[5]鱼海子，又名鱼儿海，蒙古名札哈苏台，在镇番卫东北二百八十里处。[6] 正统二年八月，明朝派遣兵部尚书王骥至甘肃，以谋防御之策。王骥奏请兵分四路，分地防守、互相应援。“自庄浪西抵古浪城，南抵黄河东北，抵宁夏界，以属都督李安。自凉州北抵镇番，南抵古浪，东北至板井，以属都督赵安。自甘州东过山丹，直抵永昌，北至胭脂堡，西至深沟垒，以属都督任礼。自肃州东接深沟，东北抵镇夷，西抵嘉峪，北抵天仓，以属都督蒋贵。”[7]九月，明朝决定由王骥指挥甘肃、宁

---

〔1〕“乙卯，右都督蒋贵等奏：‘先因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在宁夏山后潜住，上命臣等探其情实，与宁夏会兵剿杀。臣等累遣夜不收分途出境，直至宁夏贺兰山后，探知贼营移往东北。”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正统二年三月乙卯”条，第568页。“丙寅，敕宁夏总兵官右都督史昭等曰：‘去冬达贼匿宁夏山后，草枯马瘠，正殄灭之时也。朕屡敕尔等及都督蒋贵、赵安合兵剿之，尔等不遵朝廷之命，欲自为功。适贵进兵，而尔报云贼往亦集乃去，致贵趑趄不进。及瞭贼起营驰报，则缓不及事矣。尔等虽云领兵追剿，去贼仅一二程，乃畏缩不前，使贼得遁，失此事机。今贼又犯唐来渠，纵横劫掠，实尔等之咎，欲诿之于下可乎？廷臣论尔等罪不可宥，其洗心涤虑，图以自赎，否则以军法处之无赦。’”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正统二年六月丙寅”条，第612页。

〔2〕兵部尚书王骥奏：“朵儿只伯潜往狼山等处，先调左副总兵都督蒋贵率轻骑杀败，过黄河遁去。”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9“正统三年二月辛巳”条，第764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6“正统二年春正月己亥”条，第517－518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0“正统二年五月丙午”条，第600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正统二年六月甲子”条，第611页。

〔6〕〔清〕许容等监修，李廸等编纂《甘肃通志》（雍正）卷4《疆域·镇番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146页。

〔7〕〔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4“正统二年九月戊子朔”条，第656页。

夏二镇军队，出境进攻鞑靼残部，[1]明军取得重要胜利。[2] 而阿台、朵儿只伯最终被瓦剌杀死。正统三年九月，阁臣杨士奇奏："比者，差去瓦剌使臣都指挥康能等回，备言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已被脱脱卜花王杀死，西北之境可以无虞。"[3]由此，西北边疆威胁得以最终解除。

4.3 正统时期兀良哈进入河套线路及其地理特点

正统初年，稍后于鞑靼盘踞松山走廊，黄河东段即河套东南的榆林东北、山西西北一带也开始受到蒙古的进攻。正统元年十一月，"丙午，敕大同、宣府等处总兵等官都督方政等曰：'近得延安、绥德守备官奏，达贼二千余人入寇神木县，我师奋勇追剿出境。朕以此贼迫于饥寒，虑必复来侵优（扰），卿等其皆饬兵严备，相机行事，朕不中制。'"[4]从"此贼迫于饥寒"之词汇来看，明朝将入侵部众认定是此时不断进攻明境的鞑靼残部。但该部实来自兀良哈。英宗即位之初，兀良哈继鞑靼之后，以追击鞑靼缘故，亦开始进入阴山边疆。英宗敕宣府镇总兵官谭广等称："近者，来降达子言说瓦剌脱欢并兀良哈三卫人马，欲来寻阿台王子。"[5]瓦剌最终并未进军阴山南疆，而是采取朝贡形式，改善与明朝关系。[6] 而兀良哈却成为阴山南疆的新势力。和田清指出，瓦剌为压制阿台、朵儿只伯等残余势力，从而促使兀良哈向西

---

〔1〕"命中军左都督任礼佩平羌将军印，充总兵官，左军右都督蒋贵充左副总兵，左军都督同知赵安充右副总兵，兵部左侍郎柴车右佥都御史曹翼、罗亨信俱参赞军务，率领军马剿捕虏寇阿台、朵儿只伯等。仍命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太监王贵监督之。而以都督李安、侍郎徐晞等居守甘肃。并敕宁夏总兵官都督史昭、监察御史郭智选军，付参将丁信统领，以俟调遣。且敕骥曰：'命卿监督诸军，剪除残寇。凡百机务，悉听便宜处置。有功者赏，不用命者诛。事得专制，然后奏闻。'"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5"正统二年冬十月甲子"条，第678－679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5"正统二年冬十月甲子"条，第678－679页；卷41"正统三年夏四月乙卯"条，第790－791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6"正统三年九月丁未"条，第899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4"正统元年十一月丙午"条第478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7"宣德十年秋七月庚辰"条，第136页。

〔6〕正统三年三月，陕西巡抚罗汝敬奏："瓦剌胡虏近以寻杀阿台为由，屡遣人分道入贡，其奸谋难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0"正统三年三月己酉"条，第785页。

走。“当盘踞东方蒙古的阿鲁台势力已被粉碎，西北蒙古新兴的瓦剌势力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时期，山西、陕西边外的内蒙古地方自然成了兀良哈三卫的活动舞台，并不奇怪。”[1]而其中攻击目标之一是延安等处。达力扎布指出：“在剿杀阿台汗的过程中，兀良哈三卫奉北元新汗之命频频出入河套，在河套不断侵扰明朝延绥边境，明军在宣府边外多次截获其往来人员。”[2]可以证实这一结论的是明朝将领杨洪的奏疏。正统二年(1437)七月，“丙辰，敕大同总兵官陈怀及迤西沿边诸将曰：‘近得独石守备都指挥佥事杨洪奏，已败兀良哈贼众，生擒贼首朵栾帖木儿。具言兀良哈往往寇大同、延安等处，今在四岭山，又欲多领部属，往迤西沿边抢掠。尔等宜悉心哨备，不可少怠。贼若突入，务相机剿灭之。’”[3]九月，英宗敕朵颜卫指挥完者帖木儿、朵罗干头目伯台等曰：“尔部属入境剽掠，为我军擒获，朵栾帖木儿械送来京，讯之始知往岁延安、绥德扰边者，亦皆尔众。因之得计，复将入寇西陲。”[4]进入河套之兀良哈部众，尤以福余卫为多。正统三年(1438)正月，英宗敕兀良哈福余等卫都指挥安出歹都等曰：“正统二年延安、绥德等处，累获贼徒朵罗歹、猛哥不花等十余人。比者，赤城又获贼首指挥也陵台及阿台、答剌花等，来京穷治之，则知脱脱、白朵、罗歹也陵台等皆尔福余等卫部下。”[5]兀良哈当是在追击鞑靼残部的过程中，进入了防御空虚的河套地区。而此时河套地区长城防御体系也应已经废弃，整个河套成为明朝与蒙古中间之军事边疆、过渡地带。《明宪宗实录》载：“河套在陕西黄河之南，自宁夏至山西偏头关，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其中。后以阔远难守，内徙而弃之。自是草木深茂、人迹罕到。”[6]鞑靼残部曾有进攻河套之意图，但最终并未实施。正统二年十一月，“辛丑，敕镇守延安、绥德都指挥同知王祯等曰：‘大同总兵官都

[1][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第222－223页。

[2]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20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2“正统二年秋七月丙辰”条，第637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4“正统二年九月丁未”条，第665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8“正统三年春正月庚戌”条，第744页。

[6][明]刘吉：《明宪宗实录》卷121“成化九年冬十月壬申”条，第2338页。

督陈怀奏瞭见鞑贼约三千骑，自东而西。意者兀良哈三卫贼徒欲往延绥一路劫掠。又指挥岳谦使残虏阿台、朵儿只伯处，还言此贼探知甘肃有备，亦欲来延绥、宁夏一路侵扰。卿等其整饬军马，昼夜戒严，贼至多方剿杀，毋或怠误。'"[1]

那么，兀良哈是如何进入阴山边疆的呢？这在于开平、兴和、东胜等卫内徙为其提供了通畅道路。兀良哈最初的根据地在脑温江（今黑龙江省嫩江），明朝内徙大宁后，兀良哈将根据地南迁至潢河流域，[2]不仅为了躲避蒙古高原的内乱冲击，而且便于进攻明朝。从潢河流域进入阴山边疆有两条路线，一为南下大宁旧地，经大马群山以南进入。这一道路不仅较为迂远，而且需突破大马群山南部宣府镇，难度很大。另一路线是向西南进发，越过大马群山防线，直接进入大青山以南地区。这一线路大体在开平、兴和、东胜一线之上，不仅在地理上属于捷径，而且由于诸卫已经内徙，相对容易通过。因此，兀良哈南下便选择了西南道路，经开平向西南进发，沿滦河逆流而下，首先路过西凉亭。正统二年十二月，"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杨洪率兵巡边，遇兀良哈达贼于西凉亭，击败之，生擒三人，斩首六级，并得其马骡、牛羊、器械。"[3]正统三年正月，"福余等卫酋长阿鲁歹等纠集五百余骑，从葭州渡河肆掠，为官军所破。归至西凉亭，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杨洪遣将邀之，斩六人，生擒百户乞里麻等三人，夺所掠女子、马驴骡、衣服、器械。"[4]

兀良哈之所以选择通过西凉亭，不仅在于地理上距离较近，而且在于当地生态条件较好。西凉亭在开平西南（今河北沽源县闪电河乡下甸子西北五里小红城子），即元代上都、中都之间的白海行宫，白海子又称察罕脑儿，即今库伦淖尔。西凉亭东部又有东凉亭（今内蒙古多伦北白城子古城），是忽必烈居上都之时的打猎驻跸所在。北部又有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6"正统二年十一月辛丑"条，第703－704页。

〔2〕达力扎布认为："三卫的南下始于明宣德年间，正统初年已住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潢河、老哈河一带，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参见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22页。其实兀良哈三卫在永乐前期已经南下，参见上文。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7"正统二年十二月辛巳"条，第724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8"正统三年春正月丁酉"条，第736页。

北凉亭，也是元人打猎之处。[1] 西凉亭是忽必烈修筑的联结上都与大都的重要行宫殿——察罕脑儿行宫（即白海行宫）遗址。“修建了夏宫上都·开平·库儿都城、冬宫大都城、按台山山阴阿喇勒［地方］的察罕城、额儿出吉［地方］的凉亭城等四座宏伟的都城，治理着泱泱大国、四大政统。”[2] 凉亭城即察罕脑儿行宫。洪武时期所设大宁联结古北口四驿最北者便为凉亭。[3] 永乐年间，朱棣北征曾路过西凉亭。“辛未，车驾发隰宁，次西凉亭。西凉亭者，故元往来巡游之所。上望其（倾）颓垣遗址、树木郁然。谓侍臣曰：‘元氏创此，将遗子孙为不朽之图。岂计有今日？《书》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享乎？”可以为殷鉴矣。’因下令禁军士斩伐树木。”[4]“初七日，发宁安驿，经元西凉亭故址。四面石墙未废，殿基树木已成抱，殿前柏两行仍在，但萧条寂寞，不能无感也。观望良久，怅然而出。”[5] 可见西凉亭不仅处于连接汉地与漠北的交通要道上，而且生态颇好、树木茂密，从而成为兀良哈西进的重要通道。

为阻止兀良哈通过西凉亭，正统六年（1441）杨洪于察罕脑尔东南偏岭山上设置墩台，以作瞭望之用。“设宣府偏岭儿及栅子门墩台五座，从右参将都督佥事杨洪奏请也。”[6] 偏岭儿又称偏岭，即已废开平前屯卫所在地。“置开平左、右、前、后四屯卫指挥使司。初，诏立开平中屯卫，至是，北平都指挥使司奏已立中屯卫于沙峪，今议立左屯卫于七合营，右屯卫于军台，前屯卫于偏岭，后屯卫于石塔。俱从之。”[7]

---

〔1〕〔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18《北直九·万全都指挥使司·凉亭》，第825页。

〔2〕参见叶新民：《元上都的凉亭》，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3〕〔明〕杨守谦：《大宁考》，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9“永乐二十年五月辛未”条，第2323－2324页。

〔5〕〔明〕金幼孜：《北征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79“正统六年五月戊午”条，第1576页。

〔7〕〔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246“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庚寅”条，第3577－3578页。

"开平前屯卫,洪武二十九年八月置于偏岭。"[1]墩台应设于偏岭山之上。"偏岭山。赤城县独石城北四十五里,或曰即天岭。胡峤记云:自归化州行三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盖讹天为偏也。"[2]当地生态条件较好,朱棣北征时,曾于此打猎。永乐二十年(1422),"乙丑,车驾度偏岭。令将士猎于道傍山下。上顾从臣曰:'朕非好猎,顾士卒随朕征讨,道中惟田猎可以驰马挥戈,振扬武事,作其骁勇之气耳。'"[3]因此,永乐时期偏岭便筑有一墩。永乐十三年(1415),"筑开平城西旧庄、环州东北山柳林小站、沙堆西南小山曲河小站、旧庄小站、回回墓、西南山、偏岭、东山八烟墩。"[4]此外,杨洪还于关外边墙之外修筑墩台以为瞭望,而在边墙以内发展军屯,以增加开平轮戍军队的马料供应。"戊戌,总督独石等处守备左参将左都督杨洪奏:'臣于附近独石虎山墩诸处旧壕外,增筑墩台瞭望。旧壕内地可耕者,令官军耕种荞麦、糜黍,贴饲战马,甚为便利。内臣韩正插定牌橛,不容耕种。即今农事方兴,设或过时,又难效力。乞如旧,令其耕种为便。'上令户部议速行之。"[5]

兀良哈通过西凉亭之后,接下来便是跨越阴山之脊兴和,进入阴山南疆。正统三年正月,"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杨洪奏:'比因达贼犯边,臣率兵剿捕。至伯颜山遇贼,奋击,生擒贼首指挥也陵台等四人,余贼悉溃。既而追至宝昌州,贼复迎敌,我军贾勇而进,又擒贼首何台、答剌花等五人,遂大败遁去。斩获首级并器械、孳畜以千计,全师而还。'"[6]伯颜山分大、小伯颜山,地处兴和(今河北张北)西北,当地地势较为平坦,利于兀良哈骑兵奔驰。永乐八年,阁臣金幼孜跟随朱棣北征,记载伯颜山周边地形称:"初十日,早发鸣銮戍。上登山麓,渐行径

---

[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40《地理志一·北平行都指挥使司》,第909页。洪武时期,开平卫隶属北平都司,但《明史》却将之列于北平行都司之下,不知何故。

[2][清]唐执玉、李卫等监修,田易等编纂:《畿辅通志》(雍正)卷20《山·宣化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398页。

[3][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49"永乐二十年夏五月乙丑"条,第2322页。

[4][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64"永乐十三年夏五月己酉"条,第1850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52"正统十二年夏四月戊戌"条,第2975-2976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8"正统三年春正月丙申"条,第735页。

山谷。山平旷不甚高，见鹿蜕角于地，长数尺许，槎牙如树枝。行数里，平山渐尽。东北有山颇高如诸山，上曰：'此即小伯颜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则又卑矣。由是地平旷，沙中多穴。"[1]且当地以南有昂兀脑儿[2]这一内陆湖，生态条件较好，非常适合兀良哈休整兵马。

> 初七日早，发兴和。行数里，过封王陀，今名凤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驾鹅鸿燕之类满其中，远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謦咳者。白者如雪，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驰骑逐之，至即飞起，人去旋下，翩跹回翔于水次。过此海子，又度数山冈，午次鸣銮戍。上指示山谓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颜山，其西北有小伯颜山。"指其东北曰："由此去开平。"复曰："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读书者但纸上见，未若尔等今日亲见之。"上又曰："适所过沙城即元之中都，此处最宜牧马。"[3]

越过阴山之后，兀良哈便进入广阔的阴山南疆，其具体路线是沿大青山南麓西行，而非直接南下大同。这在于正统时期明朝加强了大同镇以北的防御。宣德时期，鞑靼虽然打通了阴山边疆，明朝亦默认在阴山南疆与鞑靼呈对峙之势，以牵制瓦剌，但伴随着宣德末年、正统初年二者关系的恶化，明朝遂在玉林四卫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大同镇境外修筑工事、派军巡逻。正统元年，"大同总兵官都督方政言：'臣等比奉敕计议边事，切惟大同境外沟多山少，三面受敌，设立马营，难为经久。惟半岭及红寺儿之地旧有废营，可以修筑。就遣原选官军都指挥孙智等分领马队，往来巡备，哨探贼情，振耀兵威。有警并力追剿，无事闭营耕种。如此则士马休息，而能以逸待劳矣。'从之。"[4]正统三年，刑部尚书魏源等奏："已将大同沿边地方分作六马营，令都指挥孙智等各照地方修筑城堡，领兵巡哨。又增设长胜、关头二堡堤备。中间看得红寺儿

---

[1]［明］金幼孜：《北征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2]辽金称"鸳鸯泊"或"鸳鸯泺"，元称"昂兀脑儿"，明沿元称，今河北张北县安固里淖。

[3]［明］金幼孜：《北征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戊午"条，第448页。

等处城堡多有未完，宜敕总兵、镇守等官严督各营官军，于年终修理坚完，设立教场训练。从之。”[1]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可见明朝再次加强了对阴山南疆的控制。这也是鞑靼向西遁逃至松山走廊甚至亦集乃的原因之一。

由正统三年周谅的奏疏来看，兀良哈由兴和至东胜，在沿大青山南侧向西南挺进时，路过另两处重要地区，一为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旧城），一为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县北灰腾梁）。“山西安东中屯卫百户周谅言：‘故东胜州废城，西濒黄河，东接大同，南抵偏头关，北连太山、榆阳等口，其中有赤儿山，东西坦平，二百余里。其外连亘官山等山，实胡虏出没、往来必经之地。’”[2]兀良哈进入阴山南疆后，首先进入官山。官山位于今内蒙古卓资县灰腾梁北麓，当地有大量史前火山喷发遗留的火山坑，山泉、雨水存积而成大小不等的内陆湖，故当地有“九十九泉”之名。蒙古帝国窝阔台汗发兵征金，于此筑议事台。官山西部为蒙古草原流入黄河之黑河。可见，兀良哈首先利用官山废城周边之建筑与湖泊，获得休整之后，沿黑河顺势南下，进入丰州滩。丰州滩是黑河、灰河等诸多河流交汇之处，当地水草丰美，颇宜农牧，成为明后期蒙古政治中心与叛逃汉人“板升”集中地区。

由于大同镇东北已加强防御，兀良哈驻牧地带便在黄河东北地区，其选择的固定据点在东胜。之所以如此，在于东胜有以下军事地理便利之处。首先，明朝内徙东胜四卫，使其周边地区处于并不设防之状态，兀良哈可以随意驻牧。而与之不同，明朝在大同、宁夏、甘肃等地皆驻有重兵，兀良哈若驻于这3处边外，容易遭到明军出境进攻。其次，明朝既在大同、宁夏、甘肃皆设置军镇，构建了坚固的防御体系，非常不便于兀良哈进入；而与之不同，东胜以南之黄河东西的山西与榆林东北，防御非常薄弱，便于兀良哈抢掠物资。再次，河套西北尚有狼山、乌拉山，若兀良哈驻于此处，当宁夏、甘肃军队追击之时，兀良哈回归空间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0“正统三年三月己酉”条，第786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6“正统三年九月癸未”条，第887页。

较为狭窄，而与之不同，东胜以北是广阔的阴山南疆，更有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这一水草丰美之地作为其最安全的后方地带。而大同以北不仅有玉林四卫，且有新筑堡墩固定防御与出境巡逻之大同军队，东面更有宣府镇军队之夹击，亦不安全。复次，甘肃、宁夏境外为滕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生态条件并不适宜，而东胜位于黑河东岸，水草丰茂，便于兀良哈补充给养，且有东胜废城可资利用。最后，东胜处于开平—西凉亭—兴和一线最近之地，相对于阴山边疆其他地区，不仅是兀良哈首先到达之地，而且便于其沿原路回归漠北。可见，从各方面而言，东胜皆是最适宜兀良哈的近边驻牧之所。

正统二年十二月，榆林军队擒获兀良哈部众之供词，便明确记载了兀良哈近边驻地在东胜。英宗敕大同镇总兵官陈怀称："镇守延绥都指挥同知王祯械所俘贼徒朵罗歹等三人至京，言兀良哈朵颜、福余等卫部落约四五百骑，先屯东胜地方，恐大同军马截杀，欲引还。及获我边军，询知总兵官皆畏懦无为，乃敢长驱而西。既而，祯又报贼复寇榆林庄及桃园墩，被官军追杀遁去。"[1]同时，兀良哈有越过东胜沿河套西进之行为。当月，英宗敕宣府镇总兵官谭广称："顷者，都指挥佥事杨洪击败鞑贼于西凉亭，俘其人畜、器械。盖此贼即前日寇延绥一路者，屡为都指挥王祯所败，遁还，而洪复败之。然此贼尝越东胜而西去。"[2]当明军追击之时，兀良哈首先逃至丰州地区。正统三年正月，"大同总兵官都督陈怀奏：'近者达贼三百余人饮马黄河，调都指挥佥事石亨、戴旺，率兵追捕至丰山，得其踪迹。我军陈官山下，贼众迎敌，亨等奋勇进击败之，俘获而还。'"[3]从明军、兀良哈作战线路来看，明军自大同镇向西北追剿兀良哈，兀良哈遁至丰州，相应原来饮马黄河处便在东胜一带，始才有此作战轨迹。正统元年四月，"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等奏：'来降达子脱罕沙言，达贼卜剌赤等千余人，欲来宁夏虏掠。臣与左少监来福率官军出口哨捕，领军指挥使熊震等于伯力、沙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7"正统二年十二月乙亥"条，第718－719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7"正统二年十二月壬午"条，第724－725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8"正统三年春正月辛卯"条，第733页。

子、赤山儿、双山等处遇贼对敌，杀败贼众，斩获首级、生擒男妇五十余口，获到驼马、骡牛等物、人口解送京师。'"[1]赤山儿又称赤儿山，在东胜东南、镇虏卫西北，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县西北浑河西北。

总之，如果对兀良哈南下线路加以概括，便是潢河—开平—西凉亭—兴和—官山—丰州—东胜—河套，而其线路轨迹大体呈现了沿循河流、湖泊，以就水草的地理特点。"土木之变"后成为俘虏的英宗跟随瓦剌营盘游徙的区域也在这一地带，[2]亦可证明这一地区生态条件之优越。

兀良哈自阴山南疆回归潢河流域的路径亦大体按照原路，于是兀良哈进攻陕北地区时，明朝便命山西军队预先邀截归路。[3] 河套以北有警时，明朝亦命宣府、大同二镇出境，于蒙古南下途中联合截杀。正统七年(1442)，"敕宣府、大同等处总兵官永宁伯谭广等曰：'近得都督佥事王祯奏，今冬累次瞭见延安西北直抵宁夏境外，烟火昼夜不绝，此必兀良哈三卫达贼纠合远出，谋为劫掠。贼情谲诈难测，尔等其各整搠军马，谨慎瞭备。遇贼近边，相机截杀。仍飞报邻近守将，互相策应，务在同心协力，以图成功。'"[4]从而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正统九年(1444)，"甲戌，敕守备独石、永宁左参将都督同知杨洪：'去冬兀良哈往延安一带抢劫，春暖必回。尔洪其选所部精锐，往大同境外黑山迤北等处截杀，务与参将朱谦等同心协力，以图成功。'"[5]"先是，达贼寇延安。亨等率兵追至金山，与贼交战，败之，生擒六人，斩首七级，获马二十五匹，弓矢、铠甲等物称是。"[6]"守备独石、永宁左参将都督同知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6"正统元年夏四月乙巳"条，第308页。

[2][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第254－267页。

[3]"丁卯，敕宣府等处总兵等官都督谭广等曰：'近得镇守山西都督李谦奏，瞭见达贼于延安、绥德一路剽掠。此必兀良哈三卫贼徒所为。尔等各率精骑，取道截杀，使彼进无所得，退有所长。则鼠窃之心，自然消沮。朝廷选将练兵，惟边备为重。今贼徒出没，正尔等立功之时，不可失也。其各勉副朕怀。'"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61"正统四年十一月丁卯"条，第1167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99"正统七年十二月甲辰"条，第1997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12"正统九年春正月甲戌"条，第2258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12"正统九年春正月丁丑"条，第2261页。

杨洪奏:'同内官韩政等率领官军,于迤西地名以克列苏等处,俘斩兀良哈安出等部下贼,夺回虏去人畜、器械等物。'"[1]

兀良哈回归途中,亦同样路过西凉亭,不过有时为避开明朝开平巡逻军队,选择从开平以南穿插过去,经由东凉亭,进入潢河根据地。正统四年(1439),"右参将都指挥使杨洪领军追捕叛虏,至白塔儿、三岔口,遇兀良哈五百余骑,与之战,射死十二人,生擒三人,并获其马匹、军器。事闻,特赐敕奖劳之。"[2]白塔儿在凉亭以北。"凉亭驿。[开平]卫东北百里。明初所置八驿之一也。太宗北征,尝驻跸于此。宣德中朵颜入犯独石,守将杨洪遮击之于凉亭驿,又追败之于白塔儿、三岔口。其地俱在今边外。"[3]此处尚不明确白塔儿的具体位置。"白塔川,在古北口外二百余里,正统四年宣府帅杨洪破三卫叛众五百骑于白塔儿,即此。"[4]可见白塔儿在东凉亭附近。

阿台汗被瓦剌杀死后,鞑靼残部向东遁归大青山以南、官山以西。正统三年十月,"丙子,上闻瓦剌脱欢使臣言阿台、朵儿只伯为脱脱不花王杀死,又闻降虏言残虏官音保亦死,其部下人马有潜伏官山迤西者,恐其乘我官军懈怠,或来寇边特,敕缘边诸将严兵守备。"[5]十一月,这一地区再次出现边警。"敕西北缘边总兵等官都督谭广等曰:'得奏,瞭见境外东北烟火数处,未审何贼。前此大同屡报阿坦赤等欲来犯边,岂即此贼耶?卿等宜昼夜戒严,贼虽未至,恒若临敌,庶几有备无患。'"[6]鞑靼残部之所以不向其他地区流徙,在于漠北为瓦剌控制,草原-森林交界地带为兀良哈控制,鞑靼残部所能喘息之处,只有阴山南疆这一明朝、瓦剌、兀良哈皆未固定控制的"中间地带"或"飞地"。不过由于力量弱小,鞑靼残部未敢进入明朝边境,以避免其生存空间进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13"正统九年二月戊子"条,第2270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59"正统四年九月丁巳"条,第1132页。

[3][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18《北直九·万全都指挥使司·开平卫·凉亭驿》,第811页。

[4][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18《北直九·万全都指挥使司·大宁卫·以逊川》,第845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7"正统三年冬十月丙子"条,第918-919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48"正统三年十一月壬辰"条,第929页。

一步遭到明朝挤压，而只是在明境外缘游走。这从下条史料中可以看出。正统五年(1440)三月，英宗敕大同镇总兵官朱冕、宣府镇总兵官谭广等人称："遣都指挥康能、陈友同瓦剌使臣往脱脱不花王及脱欢处，至黄河边，遇达寇对敌，射死寇二人方散。闻达寇今连结兀良哈之众，出外劫掠。"[1]此时兀良哈是否与鞑靼相结，姑且不论，但兀良哈此时尚不至与瓦剌对敌，故而这一部落应属鞑靼残部。

正统初年在与瓦剌的战争失败后，鞑靼部分势力随阿台南下阴山南疆，而其他部落则归附瓦剌，仍居漠北地区，但正统六年之后，似乎亦有追随瓦剌南下之势。正统四年，瓦剌主力虽仍在漠北，[2]但也已有继鞑靼、兀良哈之后南下之倾向。七月，敕宣府、大同等处总兵官谭广等曰："即今瓦剌胡寇谲诈多端，常遣人来兀良哈处，纠合贼徒，窥伺边境。延安、绥德、宁夏自六月以来，累瞭见境外烟火，此必鞑贼哨探路径，欲为鼠窃之计。"[3]十月，瓦剌自西北南下，进至阴山北疆西部。"甲申，敕沿边诸将：'近有自虏中来者，言瓦剌脱欢人马猎于近塞沙净州，此贼谲诈叵测，其意不专在猎。尔沿边诸将，当豫为方略，振作士气以御之，毋视为泛常。'"[4]沙净州即元代中书省西北砂井总管府、净(静)州路，[5]明初攻取此地后，并不置防，长期淡漠忘怀，逐渐讹为沙净州，仿佛一地。

伴随瓦剌南下，归附瓦剌之鞑靼部落似乎也开始由东北南下，其所沿路线与兀良哈一致。正统六年，"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奏：'达贼声息切近边境，臣今与太监郭敬等领马队，并神铳官军四千八百余名，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65"正统五年三月庚申"条，第1252页。

〔2〕"敕山西等处镇守、总兵等官都督李谦等曰：'得奏瞭见境外烟火，必有达贼在彼出没。比又闻兀良哈朵颜卫使臣言瓦剌脱脱不花及脱欢人马，屯聚哈剌忙来等处。既近边境，必怀祸心。卿等其各整肃军马，严督哨备，庶不为贼所乘。'"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61"正统四年十一月辛酉"条，第1164页。"哈剌忙来"即"哈剌莽来"，处于漠北东部胪朐河(饮马河)南部，永乐北征时改名"广武镇"。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57"正统四年秋七月癸酉"条，第1100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60"正统四年冬十月甲申"条，第1145页。

〔5〕砂井总管府位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西北大庙古城，净州路位于今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村东，皆在狼山以北。

马六千匹，于本月二十二日出境往龙门、伯颜山等处哨探截杀。'"[1]开平－兴和一线既成兀良哈南下固定道途，明朝亦将之视为蒙古南下必经之地，故而大同镇军队出境即赶赴拦截这一道路，并由于预判之准确，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宣府总兵官左都督谭广等奏：十月二十四日，左参将都督佥事黄真等率兵巡哨至伯颜山，遇虏骑百余，击走之，获其马八匹。明日，至闵安山，复与兀良哈三百余骑遇，都指挥朱谦、文弘广等率众又败之，生擒二人，获马四匹。贼溃，官军从之，至莽来泉，贼遂越山沟遁去。"[2]闵安山在察罕脑儿西北。"福余卫达子脱火赤完哈等从达贼不花帖木儿等三百余人，假以打围，劫掠人马。至闵安山被擒。上以其累犯边境，命磔之于市。"[3]

正统八年(1443)，兀良哈再至开平，杨洪长途奔袭至兀良哈老巢落马河支流亦把秃河。"丁卯，守备独石、永宁左参将都督佥事杨洪奏：'三月朔，得边报，臣率官军哨滦河，谍知胡寇所在，追之三日，至亦把秃河。杀贼众败，生擒一人那歹，斩首十级，尽获其械器、牛马。'上命兵部稽升赏之例以闻。"[4]亦把秃河即蒙语驿马吐河，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驿马吐村。经此次沉重打击，加之明朝重点供应杨洪军队所需武器装备，[5]明朝对开平的控制相应得以加强，[6]兀良哈遂大为减少南下次数，除正统八年冬季再次进入河套之外，直到三年之后，始再次活动于开平地区。"总督守备独石等处左参将都督杨洪奏：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84"正统六年冬十月己丑"条，第1680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85"正统六年十一月乙未"条，第1697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85"正统六年十一月丙午"条，第1706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02"正统八年三月丁卯"条，第2060页。

〔5〕"敕宣府、大同、蓟州、永平、辽东各边总兵等官永宁伯谭广等曰：'朝廷特命内官提督神机铳炮，遇有贼寇，相机取用。近闻往往分散于各墩堡，此乃机密军器，守城破敌，用无不克，分散各处，则势寡力弱。自今惟要害屯兵之处，量拨操习备用，他所不得仍前分拨。惟在杨洪处者仍旧。'"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11"正统八年十二月戊戌"条，第2238－2239页。

〔6〕杨洪甚至开始修缮开平宗教场所。"守备独石都督同知杨洪言：'云州堡之西冲有金阁山崇真宫者，其神往往能出光怪、致灵验。去秋，臣巡徼至东凉亭，猝遇虏寇五百余骑，彼此相持，虏势张甚。臣默祷于神，虏随遁去，竟全师而还。遂以私钱修饰祠宇，今已毕事。乞赐敕额及道流住持。'上赐名为灵真观，命度道士往主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06"正统八年秋七月辛巳"条，第2162页。

闵安迤西鞍子山等处，俱有千余人马踪迹西行，此必兀良哈达贼往来，窥我边境。上敕沿边诸将严兵备之。"[1] 正统十四年（1449），"辛未，大同左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备御署都督佥事卜马麟率兵出境巡哨。至箭豁山，亨分巡山北，麟巡山前，各遇达贼数百人，俱击败之，擒四十六人，斩首四级，获马七十余匹，牛四头，及弓刀、衣甲。贼盖兀良哈部属也。"[2]

4.4 "土木之变"后瓦剌、鞑靼进入河套与明朝"搜套"行动的展开

正统时期，兀良哈追击鞑靼进入阴山南疆后，瓦剌以胜利者的姿态，盘踞于老根据地漠北西北部，一直未南下阴山边疆。即使瓦剌挥师南下，亦是进入核心边疆西端之甘肃镇西北。[3] 正统十年（1445）冬季，蒙古草原发生灾荒，瓦剌在此冲击之下，有南下漠南西部之意图，[4]但瓦剌最终并未南下阴山边疆。

虽然瓦剌并未进攻阴山，但正统十年底，瓦剌使臣不走大同贡道，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45"正统十一年九月丁卯"条，第2850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77"正统十四年夏四月辛未"条，第3422页。

〔3〕"敕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右副都御史陈镒曰：'比闻瓦剌也先屡遣兵侵扰哈密及赤斤、沙州等处，已敕各边总兵等官严为备御。复得尔奏，甘肃传报亦集乃等处贼寇出没。寻敕任礼等谨慎防备，遇警急飞报。尔等调兵策应，或在他处亦然，毋得推避延缓。'"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10"正统八年十一月丁卯"条，第2221页。

〔4〕"提督辽东军务左副都御史王翱奏：比者，益实等卫野人传言瓦剌也先以岁饥故，欲遣人马于红崖子山围猎，恐其因而入寇。上命沿边总兵镇守官严兵备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34"正统十年冬十月己未"条，第2671页。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敕甘肃镇总兵官任礼等："得奏，夜不收三人哨探出境，为达贼所执。此必瓦剌欲得我边境之人，审探事情虚实、山川险易、道路通塞、将士勇怯，为犯边计，且使彼为乡道。"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40"正统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条，第2776页。

由开平进入朝贡，遂为杨洪军队所执。[1] 正统十三年（1448），蒙古部众南下开平，明朝猜测其为瓦剌、兀良哈联合之众。敕缘边诸将曰："近得守备独石都指挥佥事杨俊报，境外贼众千余，恐是瓦剌潜遣贼徒，与先次所胁兀良哈之人来窥边境。"[2] 但这一猜测并未得到证实。

正统十四年（1449），由于朝贡贸易存在纠纷，已统一蒙古之瓦剌趁机全面进攻明朝边境。"是日，虏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脱脱卜花王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拒守。报至，遂议亲征。"[3] 瓦剌阿剌知院对明朝所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4] 亦可证明此一记载。可见，以往学界所持瓦剌南下并无大举之图的观点值得商榷，瓦剌确曾在统一蒙古，朝贡贸易得不到明朝满足后，有全面进攻明朝之意图。相应，英宗实行亲征，不仅有王振鼓舞之因素，亦符合明朝开国以来，面临蒙古大敌时，主动攻伐，甚至皇帝亲自为帅之军事传统。但明朝由于准备不足，遭遇"土木之变"，出征之京营军队全军覆没。

借助"土木之变"的历史契机，瓦剌全面进入明朝境内，南下阴山南疆。但由于明朝北部边疆防御体系仍完整存在，瓦剌军队遭到明军的顽强抵抗，损失亦大。景泰元年（1450）三月，"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逻得虏谍者，械至京。其一太监郭敬家人把伯，其一义州卫军王文，皆也先所亲信。锦衣官鞫之，云……也先在大同厮杀，折了把八平章，在北京折了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罗，合人马计有九万战死，及疫死已不

---

[1]"守备独石左参将都督杨洪奏：出哨官军获瓦剌部属三十人，并马匹、弓箭等物。上敕洪曰：'此三十人者未见其有寇边之迹，宜宽待之，遣人送京。'"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46"正统十一年冬十月辛丑"条，第2871页。英宗敕也先称："初，把秃不花等不由大同朝贡使臣往来大路，而来乃从迤北境外山路险窄之处行走。及遇巡边官军，又不明白说系太师差来进贡之人，及不将所赍文书看验，几为官军剿杀。朕令人审其实情，及得所赍奏文，方知果系太师差来进贡之人，特宥不问，仍给赐衣服，加恩宴赏，馆待尤厚。"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46"正统十一年冬十月己未"条，第2880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69"正统十三年八月丙寅"条，第3261－3262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秋七月己丑"条，第3485－3486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第3533页。

下万余。其老营在九龙口,精锐俱在断头山。"[1]也就是说,瓦剌在"土木之变"后,亦损失了10万人左右,这对于人口并不甚多的蒙古部落而言,打击并不小。《明英宗实录》所载"是日,虏众奉上皇车驾至瓦剌老营,得知院妻宰羊出迎捧杯跪进。虏初轻视中国,及犯京师,见城池之固、人心之愤,始大丧气。自是见上皇者,皆行君臣之礼"[2]虽可能有实录馆臣自矜之嫌,但瓦剌军队多次攻城不利却为事实。九龙口位于母纳山(今乌拉山)以北的元德宁路治所,地处内流河黑水(今艾不盖里河)下游,当地百灵庙城周凡九隘口,故称"九龙口",即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附近。关于断头山的位置,学界虽有乌拉山、大青山之分歧,[3]但显然皆在河套东北。可见,"土木之变"后,瓦剌鉴于自身力量亦有所削弱,故而并未全力进攻明朝,而是如同之前的兀良哈一样,盘踞在军事空虚的河套东北,其老营与近边精锐所在位置大致皆在东胜西北。

由于瓦剌精锐盘踞于河套东北,河套周边从而成为瓦剌重点进攻的地区。在河东地区,大同沿边屡遭瓦剌进攻,负责巡视大同边地的镇朔大将军石亨目睹了这一情形。"臣与太监裴当领军到大同,胡虏人马或千百,或数万,出入络绎。或临城攻围,随即退散;或四路剽掠,驰骤难追。"[4]可见瓦剌充分利用了东胜诸卫内徙后,大同西北境外空旷的地理条件,得以随意进出大同边境,其中黄河东缘威远卫、河曲县屡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8"景泰元年闰正月甲戌"条,第3858-3859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5"正统十四年冬十一月壬辰"条,第3692页。

[3][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第16-17页;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第67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乙丑"条,第4015页。

遭进攻。[1] 正是由于大同西北之广阔军事空虚地带，导致明朝虽有意将瓦剌驱出断头山，但一时难以成功。景泰元年三月，石亨奏："闻虏贼将犯大同，其巢穴在断头山，去宁夏不远。请调延绥官军及洮岷等卫土军，往宁夏堤备。仍敕宁夏总兵等官遣人觇探虚实，率骑直捣巢穴，则贼自遁。"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2] 当地遂聚集起强大的瓦剌势力。景泰二年，景泰帝敕镇守延绥等处右都督王祯等曰："尔等奏境外榆树林、黑河等处瞭见鞑贼营大约长五十余里，连夜不绝，及有鞑贼骑马逐鹿往来。此必虏寇意图入寇。"[3]

"土木之变"前，兀良哈曾由河套南下陕西内地固原一带。正统八年(1443)，"宁夏参将都督佥事丁信等奏：'十一月，达贼千骑入境剽掠。随率官军追及于打狼山，击败之，获马匹、器械并被掠人畜'"[4]。"打狼山，在所东南，套寇由韦州而南犯镇原、平凉之道也。"[5]打狼山位于自北而南的洛浦河下游韦州千户所(今宁夏吴忠市同心县韦州镇)。兀良哈也是顺此河流南下。"土木之变"后，瓦剌军队也穿越河套，进入榆林、宁夏。景泰元年闰正月，"镇守延绥等处都督同知王春奏：'达贼入寇，臣等预令极边人民移入腹里。镇守陕西都御史王文、宁夏参赞军务佥都御史韩福等乃移文禁止，以致达贼将山城、清平二

---

[1]"镇守大同左少监陈公奏：威远卫达贼三百余骑，临城四散剽掠，砍伤军人。探知也先见在断头山驻扎。奏下，兵部同石亨等议，请令署都指挥佥事石彪领军往雁门关巡哨，探贼势多寡，相机出奇剿灭。从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7"景泰元年春正月己亥"条，第3797页。"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鉴奏：达贼数千，分道入境，犯河曲县，杀虏人畜殆尽。越四日始退。又犯义井屯堡，尽杀其守卒，及指挥佥事刘受安，邻近关隘守将坐视不援。请以地方分委策应，庶责有所归。河曲、保德、岢岚、兴岚，宜令偏头关策应。宁化、静乐、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应。五台、繁峙、崞县，宜令雁门关策应。其石州、宁乡，宜行汾州及守御千户所调军协守。从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乙巳"条，第3984页。"游击将军都指挥石彪守备威远卫，达贼攻围土城，彪以铳炮击败之，死者百人，斩首四级，获马十余匹。"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癸丑"条，第4003－4004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0"景泰元年三月戊辰"条，第3923－3924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12"景泰三年春正月辛丑"条，第4558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11"正统八年十二月丁酉"条，第2237－2238页。

[5]〔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十一·宁夏镇·韦州所》，第2953页。

驿，巴门摆铺百户所人畜抢杀。宜治文等失机误事之罪'"[1]。瓦剌军降低也由打狼山进入陕西内地。[2] 瓦剌依仗军事力量，甚至开始改变以往抢罢即走的流动方式，越季居于河套。有鉴于此，明朝开始改变以往在河套周边抵御蒙古的方式，或在战役胜利之后，尾随进入河套；或直接前往河套搜剿。虽然"搜套"一词出现于成化时期，"搜套"行动亦盛于这一时期，但无疑"土木之变"后，明朝已在开展这类军事行动，只是战略观念尚不如成化时期之明确，军队规模亦不如成化时期之庞大。也就是说，"搜套"军事行动开始于景泰时期。五月，"壬戌，敕宁夏总兵官都督张泰等：'有延绥来者，言今春达贼过河犯宁夏，因冻解，有数千人不能还，尚在黄河套里，时来抢掠。其地去宁夏七百余里，延绥三百余里，未审虚实。敕至，尔其速遣人分哨，前贼果然，即行延绥镇守等官，各出精骑，夹攻截杀，务在尽绝，以除边患。'"[3]不过伴随瓦剌在明朝边境攻城屡次受挫，将精力再次收回至蒙古草原，不再进攻河套。

在瓦剌进入河套的过程中，兀良哈可能充当了向导角色。景泰五年(1454)，"朵颜卫都指挥阿儿乞蛮遣哈剌等来朝，言：'为瓦剌也先所逼，徙其部落于黄河母纳之地。昨者复召三卫头目，令尽发丁壮，随营攻战。臣等以祖父以来，世臣中国，不愿从之，遂亡归白城。'"[4]即兀良哈受瓦剌所逼，已将游牧地迁至河套东北。景泰五年时，明朝、瓦剌的力量对比明显已向明朝倾斜，故而才有朵颜重新投靠明朝之事。与之立场相同的还有泰宁。"先是，泰宁等卫都督佥事革干帖木等遣人上书，言：'往者也先令我三卫来扰边，方近又召我三卫听彼驱役。切思我三卫人民世受天朝大恩，不敢背逆，愿附塞居住，为中国藩篱。且乞大宁废城及甲遁见赐。如有外侮，愿备前驱。'"[5]虽然此时兀良哈表达了向化明朝之心，但在瓦剌势强时，居于河套之外的兀良哈势难不充作瓦剌进入河套之向导，况且福余尤为正统时期兀良哈进攻河套之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8"景泰元年闰正月庚申"条，第3838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01"景泰二年二月庚午朔"条，第4271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壬戌"条，第4011－4012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42"景泰五年六月丙申"条，第5268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42"景泰五年六月辛丑"条，第5270－5271页。

主体，此时又未向明朝输诚，更可证明其应随瓦剌一同进入河套。

宣德时期，归附瓦剌的鞑靼部落仍于传统的势力范围即草原东部游牧。“土木之变”爆发后，鞑靼南下至开平地区。兵部尚书于谦等奏：“近闻脱脱不花王、阿剌知院人马俱在开平迤南环州、威虏、敏安、赤八都、西凉亭等处屯驻，去边不远。恐其因以入寇，欲精选夜不收二百人潜往彼处，各持短兵火器，乘夜劫营剿杀，使贼知我边境有备，自然望风奔遁。从之。仍命人赐银一两及毛袄、狐帽。”[1]“土木之变”中，杨俊放弃独石等堡，大马群山以南相应一度空虚。于谦奏：“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等处之声势。”[2]鞑靼从而尾随瓦剌步伐深入宣府镇南部，景泰元年闰正月，“敕都督同知范广、纪广都指挥杨信：‘得尔等奏，有达贼三百余人在怀来、长安岭等处出没剽掠。敕至，尔等亟领军马，或分或合，剿灭尽绝，以除边患。’”[3]在明军的不断反击之下，鞑靼仍一度盘踞在大马群山南部。“宣府总兵官左都督朱谦等奏：隆门关等处及大王川一带胡寇，俱在彼屯营探伺，意图南侵。已整搠士马堤备，乞京师内外预防。”[4]隆门关即唐时锁阳关，位于龙门防御千户所治所，今为赤城县龙门所镇关底村。西侧有龙门川自北而南流过。大王川位于宣府镇治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6“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条，第3746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5“正统十四年冬十一月辛卯”条，第3687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88“景泰元年闰正月丙午朔”条，第3807页。“达贼自隆门关入寇。宣府总兵官左都督朱谦等率兵追剿，次关子口，贼数千骑突至，为鹿角所拒，不能近。我军发铳炮击之，贼少却。既而，复围如是者四。明日，谦抬营还军，贼复来追，力战却之，官军阵亡者百四十人。都督江福等率兵应援，又为贼所败杀伤百余人。”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辛亥”条，第3995－3996页。“宣府总兵官左都督朱谦等奏：‘达贼二千余，南行至贾家营屯驻。臣遣指挥牛玺率哨马三百往御之，复遣都指挥聂胜帅精骑五百策应。遇贼于南坡，胜等与战。臣瞭见泥河儿两路尘埃障天，恐为贼夹攻。臣同右参将纪广等帅官军四千往援之，出南门外，与贼遇，官军齐进，贼稍退。臣等列阵于教场以待之，贼复来，冲与战。自己至午，铳炮矢石齐发，贼遂败北，获马四匹。’”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3“景泰元年六月戊子”条，第4048－4049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3“景泰元年六月庚寅”条，第4050－4051页。

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东大王川盆地，西侧有宣府镇最大河流西洋河由北至南流过。大王川盆地有数百平方公里，是大马群山南部山岭包围着的一块平原，由于颇多泉水灌溉，因此水草较为丰美。由隆门关至大王川，由西至东，是大马群山南部一条较为平坦的走廊地带，东西两面又有河流通过，相应成为鞑靼南下驻牧之所。

鉴于鞑靼南下大马群山，明朝遂将赤城堡以北一度视为“境外”。景泰元年十二月，景泰帝敕提督独石、马营等处都督佥事董斌曰：“得奏，瞭见境外东猫儿峪等处烟火，引兵还宣府操备。”[1]东猫儿峪在赤城东北边墙之外。“东猫儿峪。赤城县龙门峡北十里。”[2]龙门峡位于赤城堡（今张家口赤城县）以北15公里处龙门川（今白河）上游，又名“黑风口”，独石水上游伸出边墙之外，蜿蜒南下，接于龙门川。相应，东猫儿峪成为控扼大马群山南部防线之交通要道。鞑靼不仅南进大马群山以南，而且向西即大青山南疆，也即大同镇境外扩张势力。景泰二年（1451）七月，大同镇派出夜不收，侦探消息，遭遇鞑靼。“七月十三日辰时，到菱角海子、人头山，见有达靼一百人马在于北山往来行走。回至搭儿左窝，遇达五人，将六十射伤。其范丑丑等三名赶散，不知存亡下落。”“本月十七日，潜至菱角海子南山，瞭见北山达靼人马约有一百，往来行走。六十等伏至戌时，回至中途山凹，忽遇达靼五人，各役回避不及，被将敢勇军人范丑丑、张营、王喜林射，重身死，六十被伤走回。”[3]人头山位于大同镇镇虏卫南。“人头山。在县南三十里，蔚州北百二十里，以形似名。”[4]镇虏卫位于源出塞外之雁水下游。菱角海子所在具体准确位置并不清楚，不过大致应该在大同西北之大青山南疆。大同镇鉴于鞑靼南下，奏请派兵北出。“菱角海子离边一程，系是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99“景泰元年十二月丙申”条，第4237页。

〔2〕〔清〕唐执玉、李卫等监修，田易等编纂：《畿辅通志》（雍正）卷20《山·宣化府·东猫儿峪》，第407页。

〔3〕〔明〕于谦：《忠肃集》卷5《兵部为声息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171页。

〔4〕〔清〕觉罗石麟修，〔清〕储大文纂：《山西通志》（雍正）卷21《山川·大同府·天镇县》，第689页。

左卫哨守地方，今被达鞑将哨探军人杀死，恐彼窥伺入境。”[1]大同左卫位于大同西北部，离边一程，显然距离不远。菱角海子为大同左卫所在十里河之发源地。“十里河。在县西三十里，源发塞外之菱角海，由古云内城入杀虎口，经右玉城西红土堡、祁河堡，又经左云云阳堡、三屯堡、云西堡，高山城云冈堡流入县境。”[2]可见鞑靼利用大青山南疆之河流，再次进入河套东北之空虚地带。

不过景泰二年，明朝即着手收复独石。“宣府左参将纪广等奏：请将独石等处官军暂于龙门卫驻扎，往来长安岭巡哨。修复独石等处，方令官军家属前去。从之。”[3]景泰四年（1453），明朝逐渐收复大马群山南部，比如在西洋河修筑城堡。“筑白庙儿堡于隆门关西二十里，徙堡外居人于堡内，编立旗甲，耕种附近田地，委能干官一员守之。从宣府副总兵后府都督同知孙安奏请也。”[4]景泰五年开始整体修复独石长城防御体系。“命修独石等处城堡、墩台。”[5]明朝遂再次控制了大马群山南部。不过此时鞑靼仍控制了大马群山西侧，并由此沿大同镇近边不断西进，甚至进入河套地区与松山走廊。这一线路也取代兀良哈南下路径，成为明中后期鞑靼南下阴山边疆之主体线路。

伴随瓦剌内部也先、阿剌知院反目，鞑靼、兀良哈亦牵涉进来。兵部奏：“近得朵颜卫使臣，言北虏脱脱卜花王子、麻马儿可儿吉思，并毛那孩、孛罗等领四万骑，欲攻阿剌知院。阿剌屯坎坎地面，亦聚众三万待之。夷虏相攻，势不可两立。败亡者必来假息近边，胜捷者必至乘势入寇。”[6]蒙古高原再次陷入内乱之中。在战争与灾荒的双重打击之下，[7]蒙古部众遂再次大批南下明朝边境。景泰五年（1454）十二月，“都督佥事昌英等奏：近闻也先、阿剌至相仇杀，部落逃散，多潜匿我边

---

〔1〕〔明〕于谦：《忠肃集》卷5《兵部为声息事》，第172页。

〔2〕〔清〕觉罗石麟修，〔清〕储大文纂：《山西通志》（雍正）卷21《山川·大同府·大同县》，第660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01“景泰二年二月壬申”条，第4272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26“景泰四年二月甲午”条，第4930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43“景泰五年秋七月癸丑”条，第5283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59“景泰六年冬十月乙卯”条，第5556页。

〔7〕蒙古部落南下有灾荒之背景，参见下文鞑靼孛来部落乞粮于明之论述。

境宜。给榜以招来之。诏曰:'豺狼反复无常,纵得之无所用,不允。'"[1]瓦剌部众有南下亦集乃者。景泰六年二月,景泰帝敕甘肃镇称:"虏寇自去年九月以来,互相仇杀,多有漫散逃至亦集乃地方潜住。"[2]不过这只是瓦剌少部分部众,而且此后便陆续向西北迁移。明中后期瓦剌除个别部落外,作为整体基本与明朝不再具有直接关系。

鞑靼南下的重点地带仍为阴山边疆,景泰六年正月,鞑靼已威逼边墙之外。"宣府总兵官右都督过兴等奏:迤北走回人言阿剌知院杀败也先,而孛罗平章又与阿剌知院仇杀。只今瞭见烟火密迩边墙。诏兵部移文各处总兵等官,遣人出境哨探,相机剿捕,勿遗边患。"[3]不过率先突破边墙者仍为兀良哈。"守备独石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佥事周贤等奏:同总兵官右副都督过兴、左参将都指挥使夏忠,及协赞军务右参政叶盛等,会合官军于龙王堂、西顺路,杀败兀良哈贼众,生擒朵的等十二人,斩首五级,获贼马三十二匹。赐敕奖论,命礼部颁赏。"[4]龙王堂可能即今赤城县西南龙关镇大、小龙王堂村所在地。可见尽管明朝逐渐收复独石失地,但"土木之变"仍对宣府镇防务产生了较长时间的影响。鞑靼继兀良哈之后,开始大规模进入阴山南疆,并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长达近200年的控制。天顺元年(1457),"大同各边报境外达贼千余骑近边牧放,宣府又报达贼五百骑犯猫儿庄墩,坏边墙,入屯海子。"[5]

在这次鞑靼南下过程中,河套再次成为进攻重点。景泰六年(1455)十一月,"延安、绥德、庆阳、辽东边将俱奏瞭见境外烟火,及达贼近边围猎。诏各边镇守总兵等官严饬兵备。"[6]景泰七年(1456)十一月,"朵颜卫都指挥朵罗干等奏迤北虏酋孛来等率众渡黑河,欲寇宁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48"景泰五年十二月戊戌"条,第5376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50"景泰六年二月戊戌"条,第5420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49"景泰六年春正月辛亥"条,第5387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49"景泰六年春正月丙寅"条,第5394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7"天顺元年夏四月庚申"条,第5929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60"景泰六年十一月辛卯"条,第5574页。

夏。敕各边关总兵、镇守等官戒严兵备。"[1]天顺元年(1457)二月,鞑靼开始进入榆林地区。"镇守延绥等处右都督王祯等奏:'榆林庄、神木等处达贼入境,都指挥李懋等轻进,与对敌阵亡。臣等率领官军往策应,达贼闻知遁去。'"英宗批评王祯"掩败称功,归罪阵亡头目"。[2]下面这一史料可进一步证实进入榆林者为鞑靼部落。三月,"壬申,镇守延安等处都督王祯、参赞军务少卿曹琏械送鞑靼男女五人,称其犯边。下锦衣卫鞫,奏其一人犯边,其四人来降。而祯等俱以为生擒邀功,请治其罪。"[3]

为解决鞑靼对河套的威胁,明朝派遣当时第一武将石亨,整合大同、山西、榆林、宁夏军队,开展较大规模的"搜套"军事行动。"命忠国公石亨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调大同、偏头关及宁夏官军于延绥等处搜剿达贼。敕都督王祯曰:'初以尔处失机,已遣都督佥事杨信、张钦代尔还京。今闻此贼尚在黄河套里潜住,故命忠国公石亨往调官军搜捕……'"在明军反攻之下,鞑靼暂时退出河套。"敕总兵官忠国公石亨班师,以亨奏达贼远遁,追蹑无踪故也。"[4]

4.5 天顺年间蒙古草原灾荒与鞑靼孛来、阿罗出出入河套周边

宝音德力根指出,景泰五年(1454),也先死于瓦剌内乱,鞑靼遂拥立脱脱不花幼子马可古儿吉思即明称"小王子"为可汗,权力被太师孛来掌握。黄金家族系毛里孩与异姓孛来争权夺利,小王子亦站在毛里孩一边。成化元年(1465),小王子被孛来所杀,毛里孩又杀孛来,立小王子从兄摩伦为可汗。[5] 孛来掌握了汗廷权力,统合了大部分部众,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2"景泰七年十一月甲午"条,第5759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5"天顺元年二月辛亥"条,第5851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6"天顺元年三月壬申"条,第5872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戊辰"条,第5940页。

[5]宝音德力根:《15世纪中叶前的北元可汗世系及政局》,载《蒙古史研究》第6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鞑靼势力遂再次蔚然兴起。孛来最初与明朝发展朝贡贸易，但天顺元年，大同军队与孛来使臣发生摩擦，后者率先破坏了朝贡贸易体制，使明朝、鞑靼关系转入紧张状态。“大同总兵官右都督李文奏：孛来使臣五百余人还至高山站，杀伤护送官军百人，执都督马政、子鉴捶之，尽掠其马匹、兵甲而去，鉴同指挥哈铭等逃还。盖以大同西路参将李显等供馈不满所欲，又闻忠国公石亨巡边致生衅端，已令参将张鹏率轻骑追剿，并调西路官军相机策应。”[1]不过景泰、天顺之际蒙古草原发生了灾荒。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依据《明英宗实录》所载天顺元年“虏中饥窘之甚”的记载，指出蒙古草原发生了饥荒。[2] 蒙文史籍亦可印证这一结论。《黄金史纲》记载，景泰皇帝（应为明英宗）被配嫁了一个称作摩罗丫头的妻子，而本人则被命名为摩和尔小厮，发付永谢布的额森萨玛依差使。一向没有疾疫与荒旱的草原，自从景泰皇帝做了奴仆以后，公正、良善也消失了。[3]《蒙古源流》也记载：“却说，阿速人阿里蛮丞相，送给也先合罕所捉到的大明景泰皇帝［一个］名叫莫鲁的妇人，把他唤作察罕小厮，在家里使唤。那期间，那部分人当中灾害瘟疫丛生。”[4]由于体例的关系，以上蒙古三书不免存在具体事件错讹或神话色彩浓厚的弊端，但对生态环境的描述，仍可作为对草原历史的一般反映，加以采用。《黄金史纲》与《蒙古源流》为渲染明英宗的神迹，将蒙古草原发生的灾荒、瘟疫附会其上，虽相应沾染了神话色彩，但仍反映了这一时期蒙古高原发生了灾荒与瘟疫的事实。

正是在灾荒在这一生存困境之下，孛来遂仍致力于通过朝贡贸易，从明朝获取生存物资。“丙寅，迤北太师孛来并阿哈剌忽知院以上复位，复遣皮儿马黑麻来奏，欲将宝玺来献”，并执送杀害明朝护卫军队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7“天顺元年夏四月甲寅”条，第5920页。

〔2〕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3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3〕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2页。

〔4〕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279页。

部众三人。针对孛来的修好行为，明朝坚持了强硬立场。[1] 由于无法再从朝贡贸易中获得较多的物资赏赐，孛来遂在生存危机驱使之下，转而开始对明朝实行武力掠夺的行为，全面进入阴山南疆。[2] 由于明朝在宣府、大同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长城防御体系，鞑靼攻围无果。[3] 鞑靼遂将进攻目标转向防御薄弱的山西地区，具体线路便是沿黄河南下。五月，“鞑贼犯威远卫，守备都指挥李英击却之。”[4] 六月，“鞑子犯偏头关，守备都督同知杜忠率官军击败之，斩首三级，生擒一人。”[5]

面对鞑靼避实击虚的进攻方案，明朝命大同镇军队自外向内，与山西军队在黄河东岸夹击来犯鞑靼，并连续取得胜利。六月，“游击将军右都督石彪奏：率领官军参将张鹏等出哨，回至磨儿山驻扎。侦报贼至，随布阵五处，设伏据险以待之。少顷，贼有千余人马列阵而来，随督官军奋勇冲入贼阵，斩贼首把秃王，搴其旗帜、衣甲，大败贼众，斩首一百二级，生擒二十人，获马二百匹，甲胄六十副。余贼奔散，追至三山墩，连战又败之，斩首七十二级。”[6] 磨儿山、三山墩皆位于威远卫西南，孛来部落之所以循此路线，在于黄河支流清水河由西北向东南流入山西镇，而以上二地便处于清水河流域。七月，“大同总兵官都督李文奏：六月五日，官军于威远卫地方，遇达贼二千余骑，与交战，生擒达贼

---

[1]“已敕沿边总兵等官按兵不动，各守信地。今后尔等部落宜各自管束，于境外荒远水草去处，自在牧放存活。其来进贡者，毋滥率人众。愿投降者，循例抚安之。无故入境，虏掠为害者，即加剿杀。特敕令尔知之。向为多遣使臣生事，今不再遣，就令原来使臣齎领彩段表里赐尔。故敕！”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丙寅”条，第5938－5940页。

[2]“兵部臣言：比者各边总兵李文等奏称孛来等各率所部鞑子，于近边驻扎，恐有侵犯之谋。宜于京营总管操练太平侯张軏、安远侯柳溥、会昌侯孙继宗三人内，令一人充总兵官，量率在京官军，前赴宣府、大同等处驻札。有警与各边将互相应援，以防侵轶。上命柳溥往。”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辛未”条，第5942－5943页。

[3]“大同总兵官右都督李文奏：鞑贼屡来攻围各墩台，欲即出兵剿杀，则使臣尚未回，恐启衅端，以此坚壁清野待之。然军马俱在城中，乞令总督边储郎中杨益暂支与口粮、刍豆，候声息稍宁停止。上命户部移文，令益即给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癸酉”条，第5947页。“大同总兵官右都督李文等奏：鞑贼在沿边出没无时，而西路参将张鹏、守备右卫都指挥朱谅等堤备不严，致架炮军士及侦卒往往被其杀掠，乞将鹏等治罪。诏宥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辛巳”条，第5957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己丑”条，第5963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元年六月丁酉”条，第5972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元年六月戊申”条，第5982页。

五人，斩首十六级，获马匹十余匹。”[1]在大同镇军队南下之势逼迫之下，鞑靼从河东地区撤出，将进攻目标转向防御更为空虚的河西地区，即河套与松山走廊。

天顺元年五月，在鞑靼主力进攻山西时，已有小部鞑靼进攻松山走廊。“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张泰奏：鞑子犯洛阳川，营于羚羊角屯，欲过河，官军拒之，不能渡，乃循旧路而回。伏兵于墩空，或前或却，以诱我。西路参将种兴即率官军千余人追袭之，至洛阳川，贼挥众回击，伏兵亦起。官军腹背受敌，遂溃，兴被杀。缘本处城池极悬河外，乞选智勇都指挥二员守备。”[2]洛阳川在宁夏中卫西，地处松山走廊。“洛阳川。在卫城西二十五里。”[3]从明军千人追击鞑靼来看，当时鞑靼进入松山走廊的部众数量应该不多。不过八月以后，伴随鞑靼进攻重点转向河套，战争规模开始扩大。八月，鞑靼从甘肃镇东北部，即松山走廊西北方向进入松山走廊，[4]并沿大、小松山进入庄浪河流域。[5] 不过与正德以后鞑靼深入松山走廊底部不同，此时明朝在北部边疆仍维持较为强大的兵力，孛来以抢掠物资为战略目的，因此并不深入松山走廊，而是沿外围地带游走作战。天顺二年（1458）正月，“镇守凉州右监丞福保奏：镇守庄浪奉御进保、都指挥使魏荣，及提调烟墩指挥李瑄、庄泰等失误烽火，以致达贼入境抢掠，宜敕巡按御史执问。从之。”[6]七月，阁臣李贤称：“贼见在陕西凉州等处，纵横抢掠，势甚猖獗”，[7]并由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0“天顺元年秋七月庚辰”条，第6013－6014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壬午”条，第5959－5960页。

〔3〕〔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37《宁夏中卫·山川》，第2627页。

〔4〕“镇守甘肃太监蒙泰奏：七月五日，达贼二千余骑入镇番境内，官军杀败贼众，生擒三人，斩首四十九级，获战马一百余匹，驼十八只。”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1“天顺元年八月乙巳”条，第6037页。

〔5〕“镇守庄浪奉御进保、都指挥使魏荣奏：达贼四千余骑入境，径趣速罕秃营剽掠，兵部请敕镇守陕西保定侯梁瑤往兰县，征调秦州、巩昌、临洮等处兵，分屯要害，以遏贼冲。从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4“天顺元年十一月乙亥”条，第6091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6“天顺二年春正月辛酉”条，第6120页。

〔7〕〔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3“天顺二年秋七月庚戌”条，第6266－6267页。

松山走廊向河西走廊西进，突破了整个甘肃镇防线。[1]

黄金家族鉴于孛来权大，不断与之争战，但也同样面临灾荒冲击。天顺二年（1458）八月，阿罗出也开始南下松山走廊。“右少监龚荣等奏虏酋孛来、阿罗出等率众二万，寇钞镇番、凉州等处。臣会总兵等官安远侯柳溥等，号令三军，前后于南乐堡、黑山等处交锋，擒虏三十五人，斩首八十一级，并获驼马、军器等物。”[2]“甘肃总兵官宣城伯卫颖等奏报；北虏拥众复入昌宁、镇番等处。”[3]昌宁即昌宁堡，位于镇番卫西南。为了应对孛来、阿罗出对松山走廊之进攻，明朝在石亨等人的推荐下，[4]以大同镇游击将军石彪出任总兵官，出征宁夏。七月，“命定远伯石彪充总兵官，佩征夷将军印，左都督刘深充副总兵，往宁夏等处剿杀贼寇。仍敕沿边诸将互相应援”[5]，并征调松山走廊底部军事力量北上。十月，“又敕提督岷洮等处右都督王祯亦以兵往会。”[6]

孛来、阿罗出进攻榆林较晚，这可能与当时镇守此地者为明中期第一武将家族——杨氏家族的杨信有关。天顺元年十一月，明朝获得孛来将南下榆林的消息。“庚午，敕宁夏、延安绥德镇守、总兵等官曰：‘近者来降鞑子言孛来等欲领人马往高桥儿及延绥一带地方剽掠，尔等其各整搠军马，严谨堤备。如贼果来侵犯，务在相机剿杀，不可轻忽，以堕贼计。’”[7]天顺二年二月，鞑靼部众进入榆林。“镇守延绥等处

---

[1]八月，甘肃镇总兵官卫颖奏：“虏酋孛来等自今岁五月以来，从镇番抹山儿入境，至凉州、永昌，延及山丹、黑城子等处，往来剽掠，官私畜产俱已罄尽。自兰县抵于甘州，道路梗塞，转输不继。”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4“天顺二年八月丁丑”条，第6280页。“甘肃总兵官宣城伯卫颖等奏：达贼自五月及今，屡寇凉州、永昌、古浪、庄浪、山丹、甘州诸处，杀官军、男妇一千四百有奇，掠男妇五百余，马骡、牛羊八万二千，仓粮七百余石，焚毁草二万束，及驿站、屯堡、墩台数处。”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6“天顺二年冬十月丁丑”条，第6308－6309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4“天顺二年八月戊辰”条，第6276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4“天顺二年八月癸未”条，第6284页。

[4]“兵部奏：陕西甘肃等处屡奏北虏孛来等四散犯边，朝廷虽已命安远侯柳溥等统兵征进，而此虏在边日久，知我虚实，虽已败衄，去而复来，苟非先事而备缓急，何以支吾？乞敕在京总兵等官忠国公石亨等计议区画，设何方略，用何将领，凡可以安边御侮保境安民者，一一条陈，以俟上之裁择。从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3“天顺二年秋七月己亥”条，第6260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3“天顺二年秋七月癸卯”条，第6262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6“天顺二年冬十月丁巳”条，第6300页。

[7]［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4“天顺元年十一月庚午”条，第6087页。

右监丞王春奏:青阳沟等处鞑贼拥众入境抢掠,当同都督杨信率领官军截杀,斩获衣红贼首一人,生擒贼徒,获其驼马、盔甲、器械等物,及夺回牛羊、驴骡等畜。"[1]青阳沟位于今榆林郊区青阳沟流域。

与兀良哈、瓦剌仍以漠北为根据地,多以少量部众南下河套,抢罢即走的流动方式不同,孛来、阿罗出在灾荒冲击之下,已将主力南迁至阴山南疆,并开始居留河套至更长时间。明朝也鉴于鞑靼控制了阴山南疆,从而将会战地点从外核心边疆之黄河东北的东胜至大同一带,内移至榆林至宁夏一带。在这一地缘格局的转变趋势中,榆林也首次成为明朝应对河套蒙古的会战地点。天顺二年二月,"命大同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游击将军定远伯石彪,调领彼处精兵,往延绥等处,会彰武伯杨信等御贼,以陕西守臣奏鞑贼入境故也。"[2]次月,杨信军队与鞑靼部众展开了规模较大的战争。"达贼七千余骑犯高家堡,延绥总兵官杨信率兵击败之,擒贼五人,斩首七十二级,获驼马、器械无算。遣人献俘馘至京师"[3],从而取得了高家堡之捷。明军获胜之后,进一步反攻河套,在黄河东北与援兵大同镇军队会合。"延绥总兵官彰武伯杨信、游击将军定远伯石彪会兵黄河,搜剿达贼,擒四人,斩首三级,获马二十匹。"[4]

榆林军队获胜之后,并未阻止鞑靼再次南下。天顺二年十二月,鞑靼再次进攻榆林东北。"辛未,升延安绥德等处官军二百九十八人俱一级,赏有差,三千八百三十五人赏有差,以西黄梁等处斩获鞑贼有功也。"[5]西黄梁可能即麻黄梁,位于今榆林东北郊区麻黄梁镇。"吏科给事中戚贤勘奏陕西延宁麻黄梁、沙湖有功官军二千二十八人,升赏有差。"[6]当月,鞑靼又进攻河套西南缘。"镇守延安绥德左参将都督同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7"天顺二年二月己亥"条,第6146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7"天顺二年二月辛亥"条,第6158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88"天顺二年闰二月丁丑"条,第6171-6172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0"天顺二年夏四月戊辰"条,第6196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8"天顺二年十二月辛未"条,第6338页。
[6][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187"嘉靖十五年五月甲子"条,第3956页。

知张钦奏虏骑二万余，从安边营入境剽掠。上命兵部区画以闻。”[1]安边营位于今榆林定边县安边镇治所在地，是河套南缘地势平坦之地，相应容易成为明朝、鞑靼大规模战争开展地带。天顺三年（1459）正月，杨信遂与此时出征宁夏的总兵官石彪东西夹击，双方虽互有杀伤，但明军仍取得了对鞑靼部众的重要胜利。“总兵官定远伯石彪奏：‘比者达贼二万余入安边营抢掠，臣与彰武伯杨信、右佥都御史徐瑄、都督佥事周贤、都指挥李鉴等统领军马往剿之。遇贼连战，掣夺旗号、喇叭，斩获贼酋鬼力赤平章首级，余贼奔溃。追至昌平墩出境，贼仍聚众复回对敌，转战六十余里，交锋数十余合。至野马涧半坡墩，贼众大败，生擒四十七人，斩首五百一十三级，夺驼六十七只，马五百一十匹，被掠男妇一十八人，驴骡、牛羊二万余。都督佥事周贤被贼射死，又有达贼入南地名把都河，把总指挥柏贤等与战败之，斩贼首一人。收兵间，贼复众四面攻围，官军奋勇杀出，都指挥李鉴亦陷没。”[2]明军从而取得了野马涧大捷，暂时将孛来部众驱逐出河套，取得了“搜套”军事行动的重大成功。“戊辰，镇守延绥等处太监王春奏：达贼杳无踪迹，边境宁靖。上曰：‘延绥既无声息，令独石、马营官军回原处操守。’”[3]从这一记载来看，援助榆林的军队尚有来自宣府镇者。伴随鞑靼暂时出套，宣府镇、大同镇军队也皆各回原地。“总兵官定远伯石彪奏：达贼人马已俱往东北去。上曰：‘贼既去，彪领军且回大同。’”[4]

天顺二年底，孛来鉴于明朝加强了松山走廊与河套地区的防御，已向明朝表达了恢复朝贡贸易的积极意愿，明朝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愿意接触的态度。[5] 孛来之所以转变态度，与鞑靼在灾荒、明军的双重打击之下，内部存在较为严重的危机有关，虽然双方朝贡贸易一时并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8“天顺二年十二月癸未”条，第6344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9“天顺三年春正月甲辰”条，第6353－6354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00“天顺三年二月戊辰”条，第6371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00“天顺三年二月己巳”条，第6373页。

〔5〕“敕镇守宁夏太监王清等曰：‘得奏，虏酋孛来屡遣通事近墩，言欲贡马来降，因虑虏情谲诈，不可令从宁夏入境。诚如所虑，若其复来，其为言宁夏道途险阻，仍令从大同旧路入，尤须严饬兵备，不可怠忽。’”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7“天顺二年十一月戊申”条，第6325页。

未开展，但孛来部众确有投降明朝者。[1] 在明军屡次取得重要战役之胜利的有利条件下，阁臣建议明朝主动向孛来表达更为积极的重回和平的政治态度。天顺三年四月，“辛酉，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言：胡虏为中国患，不过苟图衣食而已。往者每岁进贡，赖此赏赐，衣食充足，不来侵犯。今虏酋孛来自为悖逆，心怀疑惧，不敢进贡，衣食无所仰赖，遂至穷困，所以数来犯边。朝廷宜体天地之量，出榜招谕，或给与米粮，助其衣食，使之改过自新，照旧进贡。如彼听信，不惟免兴师之费，边境人民俱得安生。如或冥顽不悛，然后出兵剿杀，庶恩威兼尽。上从其言。”[2] 不过孛对此来并未接受，双方局势很快再次紧张起来。[3]

十二月，孛来再次穿过河套进攻榆林。“丁丑，敕镇守延绥太监王春、总兵官彰武伯杨信、巡抚右佥都御史徐瑄曰：‘得奏，虏中脱归之人言虏酋孛来率众二万，剽掠榆林城等处，次于沙山。此虏既近边境，必乘间入寇。其严督各城军马，昼夜防慎，贼至相机战守。’”[4] 沙山位于宁夏中卫西部，地处松山走廊。“沙山。在卫城西五十里，因沙所积，故名。”[5] 且孛来首次从松山走廊突破山岭丛布的榆林防线，进入白于山以南地势平坦的地区。天顺四年（1460）正月，“庚辰，敕镇守陕西保定侯梁瑶：‘得延绥奏报，达贼孛来犯井儿坪，四散抢掠，尔等严加堤备，遇警相机战守毋忽。’”[6] 井儿坪位于今延安志丹县杏河镇井坪村，处于杏子河（明称西川水）流域。可见孛来绕过榆林河套南缘防线，自松山走廊直接向东进发，直接进入榆林以南防御薄弱地区。同样在掠夺物资后，孛来并未继续深入，而是折回河套，在榆林东北遭遇明军。

---

〔1〕十二月，英宗敕宁夏镇总兵官陈友曰：“得奏，欲将来降鞑子奄克台及谎阿罗歹等留用。”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98“天顺二年十二月甲戌”条，第6339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02“天顺三年夏四月辛酉”条，第6397－6398页。

〔3〕“戊戌，敕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武强伯杨能：‘近闻鞑贼拥众住近我边，民不得耕作牧放。尔等各领士马在彼，粮草有限，恐不可持久。有何长策，可以退贼，敕至其会议以闻。’”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03“天顺三年五月戊戌”条，第6415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0“天顺三年十二月丁丑”条，第6522页。

〔5〕〔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37《宁夏中卫·山川》，第2626页。

〔6〕〔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1“天顺四年春正月庚辰”条，第6525页。

“达贼二万骑寇榆林城，总兵官彰武伯杨信率官军敌却之。贼复入劫掠，信选轻骑，分五路，追至金鸡峪遇贼，擒十二人，斩首二十三级，获马百匹，军器三百余事。复所虏人口及牛羊、骡驴万余。”[1]金鸡峪位于榆林东北，即今榆林榆阳区金鸡滩镇。孛来部众在府谷遭到当地明军堵截。“升延绥官军正千户等二十八人俱一级，军旗等三十七人赏有差，以柴家沟等处杀贼功也。”[2]柴家沟即今陕西榆林府谷县府谷镇柴家墕村。

天顺四年，继孛来、阿罗出之后，其他鞑靼部落如毛里孩、肯者伯颜亦加入南下行列。其最初进攻目标定于大同，但鉴于明朝在此重点布防，遂仍将目标西移于河西地区。“达子苦出等来归，奏报虏酋孛来及毛里孩与众议欲来大同劫掠，众言大同军马强壮，不可去，乃率众西行。兵部言虏情难测，宜移文大同以西缘边诸将严加哨备。从之。”[3]其首先进攻之地亦是松山走廊。[4]

天顺五年(1461)，孛来也在短暂撤出之后，再次进入松山走廊。[5]

> 凉州守将奏：“虏酋孛来拥众万余，于庄浪驻扎，攻围城堡，阻截道路。”事下，兵部请命将出师，相机进剿。上命于宁夏及洮岷等卫，调官军土兵一万一千人，各委骁勇头目统领，听副总兵仇廉调度剿贼。镇守兰县右少监秦刚奏：“侦报达贼四百余骑，屯黄河北岸，数十骑过河剽掠。都指挥彭智率轻骑千人追之，至苇子湾遇

---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1“天顺四年春正月戊子”条，第6528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2“天顺四年二月甲子”条，第6549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7“天顺四年秋七月辛卯”条，第6616页。

[4]七月，“敕镇守甘肃太监蒙泰等曰：‘今得宁夏总兵等官奏报，虏酋孛来、毛里孩、阿罗出、肯者伯颜领一万五千人，在谎泥山驻扎，要往宁夏迤西虏掠。虽有定向，而变诈难测。尔等宜严为之备，相机行事，毋或怠忽，以致疏虞。’”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7“天顺四年秋七月己丑”条，第6614页。八月，“兵部奏达贼入凉州，虏掠官马，射伤军人。副总兵刘杰、右监丞福保等始既不能哨备，后又不能追袭，请治其罪。上曰：‘姑不，问令其尽心剿贼，以赎前罪。’”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8“天顺四年八月乙丑”条，第6633－6634页。“甘肃总兵等官宣城伯卫颖等奏胡虏于凉州、庄浪一带劫掠。上敕颖等御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19“天顺四年九月己卯”条，第6644－6645页。十一月，“延绥总兵官彰武伯杨信等奏：达贼三百余骑入花马池剽掠，率众追之，获马二十七匹而还。”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21“天顺四年十一月甲戌”条，第6667页。

[5][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25“天顺五年二月甲午”条，第6718－6719页。

贼，擒四人，斩首一级，余贼奔走渡河，尽溺死。河北贼亦望风遁去，获所掠牛羊马骡凡三千。”

鞑靼各部遂对明朝在松山走廊的防御形成巨大压力。为应对这一军事形势变化，明朝进一步将会战地点向西南移至黄河底部的兰县（今兰州）。五月，“敕右都督冯宗曰：‘先因达贼侵犯凉州等处，已命宁夏副总兵都指挥仇廉统官军、土兵，往兰县会剿。今虑廉独力不能成功，特命尔亟往代统其军，与兵部右侍郎白圭计议，会保定侯梁珤、宣城伯卫颖刻期进兵，并力杀贼，及督庄浪镇守等官林宏等听调策应，仇廉仍协同尔行事。朝廷以尔历练老成，特兹简任，尔须感激奋志，以图成功。’”[1]次月，明朝命兵部尚书马昂充任总督，调遣京军、班军赴松山走廊。“壬午，命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佩印，充总兵官，右都督冯宗充副总兵，都督佥事鲍政充左参将，赵胜充右参将，统京师精锐骑兵一万五千，往陕西击虏寇。又先遣官发河南、山东、北直隶京操下班官军二万，先赴陕西屯驻以待。”[2]同时，明朝以通政司官员统一调配粮饷。“敕通政司左参议尹旻曰：‘今虏寇侵犯陕西边境，遣将调兵，往彼征剿。特命尔前去陕西，督都布按三司及户部委官，先查军行附近府州县卫所实在刍粟，会计起运军前供给。或有不敷，必须设法措置，仍委三司官分投督运。或近贼出没之处，合用官军民壮防护者，须与总督、总兵计议酌量，接济护送，毋致疏虞。’”[3]外来军队到达松山走廊之前，鞑靼已开始进攻庄浪，明朝从而以当地将领率先组建作战部队。“镇守庄浪奉御进保奏：达贼入寇甚急，乞兵为援。上敕守备兰县右都督冯宗佩平虏副将军印，充副总兵，都督佥事赵胜充左参将，李杲充右参将，统原选官军往击之。命兵部右侍郎白圭，及起王竑为左副都御史，俱参赞军务。”[4]不过孛来在进攻松山走廊再次受挫后，开始向明朝求贡。因此七月再次进攻庄浪的军队应非孛来部落，而是黄金

〔1〕〔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28“天顺五年五月乙卯”条，第6757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29“天顺五年六月壬午”条，第6768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29“天顺五年六月壬午”条，第6768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30“天顺五年秋七月戊午”条，第6795页。

家族部落。[1]

孛来之所以突然转变态度，除在与明朝作战过程中屡屡受挫外，也与黄金家族对其的战争有关。九月，“兵部奏：‘镇守大同太监王春奏报近获降虏言，脱脱卜花王子领兵万余，将往石头城袭杀孛来，乞敕沿边总兵等官严兵为备。’从之。”[2]脱脱卜花王子即马可古儿吉思汗，因是脱脱不（卜）花幼子，故明朝称之为“小王子”。为避免遭到明朝、黄金家族的南北夹击，孛来采取了与明朝讲和的策略。十月，明朝同意孛来改由兰县入贡之请求。十二月，孛来使臣到达北京。“丁亥，迤北孛来遣使臣那哈赤等贡马，赐宴于礼部，并赐彩币等物。”[3]虽然孛来部众仍有进攻明朝之举动，但双方关系已有所缓和。孛来也接受了明朝规定的朝贡贸易仍自大同旧路进入的命令，从而双方再次进入和平时期。[4]

天顺六年（1464），明朝鉴于黄河开冻，鞑靼难以大规模越过黄河进攻阴山走廊，遂将外地军队调回。[5] 可见，明朝遣散兰县大军，除士兵疲惫外，另一因素是财政负担。而兵部与其他部门在是否维持兰县会战常态化问题上呈现的立场差异，反映出兵部从本部门战功利益出发，与其他部门从财政节约出发的政治立场差异。而这种差异在明中后期北部边疆战与和、内政与边防孰先孰后等问题上，不断地体现出

---

[1]“辛酉，兵部奏：奉旨会文武群臣，议得虏酋孛来三上书，求遣使讲和。宜顺夷情，选谙晓夷语、素有名望者，往彼开谕。如其诚意请和，即令退兵远牧，而我兵亦得暂息以待。如其谲诈邀求无厌，候通事还，即与拒绝，往来堤备剿杀。上允所请，命指挥佥事詹昇假与都指挥使，充正使；都指挥同知窦显充副使以行。”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30“天顺五年秋七月辛酉”条，第6797页。

[2]〔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32“天顺五年九月乙巳”条，第6814－6815页。

[3]〔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35“天顺五年十二月丁亥”条，第6851页。

[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37“天顺六年二月癸酉”条，第6880页；〔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42“天顺六年秋七月壬子”条，第6940－6941页。

[5]陕西总兵官保定侯梁瑶奏：“黄河冰开，鞑贼远遁，请令原调策应官军、舍余、民壮各回原处屯守。”事下，兵部奏欲行镇守、参赞等官会议施行。内阁臣李贤等言：“兵出在外，可暂不可久。暂则壮，久则老。且不退兵，则陕西民无休息之时。再欲征运粮草，必皆逃窜。”上从贤等言，命副总兵右都督冯宗等放回官军，其马匹命参赞军务右侍郎白圭同宗等点过带回一万，其余斟酌各边缺马多少，量分各总兵等官给军骑操。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38“天顺六年三月甲辰”条，第6890页。

来，反映出明朝废除宰相之后，政治决策的部门对立与利益分化。这一因素相应也是成化时期“搜套”与修筑长城之争的政治根源。

孛来恢复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后，将主要精力用于蒙古草原争雄之事，不仅与黄金家族势力争夺权力，而且与兀良哈、瓦剌部落战争不断。天顺六年十月，孛来开始东进兀良哈。[1] 朵颜卫在孛来的逼迫之下，遂有内附之请。[2] 由于明朝拒绝了朵颜卫这一请求，兀良哈三卫遂归附孛来。[3] 明宪宗即位后，天顺八年九月，朵颜卫向明朝通报称：“瓦剌扯只八拥众七万，欲与孛来仇杀。”[4] 同月，宣府镇报称：“近据谍报，孛来领众六万，往征瓦剌，回则欲寇我边。”[5]

4.6 小结

宣德中期以后，鞑靼阿鲁台在蒙古高原内战之中败于瓦剌，鉴于阴山边疆处于明朝防御空虚地带，从而不再选择北上，而是选择南下。明宣宗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默认并支持鞑靼部落固定游牧于阴山边疆，从而促使明朝、蒙古之间的政治边界逐渐产生而明确。宣府、大同墙垣从而由“边防之墙”转变为“边界之墙”。明英宗即位后，“边墙”一词遂正式产生。可见，明朝、蒙古间政治边界之明确是明朝边疆收缩政策与蒙古高原内乱内外双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

不过与现代民族国家“均质化”或“单一均质”领土意识不同，边墙

---

〔1〕天顺六年十月，孛来开始东进兀良哈。“戊寅，兵部奏有自虏中逃归者，言孛来于今年九月初二日，领胡骑万余东行，侵兀良哈地方。虏情叵测，乞敕沿边诸将，严为备御。”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45“天顺六年冬十月戊寅”条，第6977页。

〔2〕“朵颜卫指挥兀孙帖木儿奏：孛来营所逼近本卫，乞依边城牧放。兵部言夷情谲诈难信，宜令沿边守将为备。并令通事都督季铎等省谕兀孙帖木儿回还，遍谕其部落，毋得近边。从之。”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58“天顺七年冬十月乙巳”条，第7134页。

〔3〕天顺七年，兀良哈随孛来一同由大同朝贡明朝，参见〔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360“天顺七年十二月丁亥”条，第7153页。成化元年，又与孛来一同进攻辽东镇，“迤北虏酋孛来构朵颜三卫苦惟等九万骑，入辽河。总兵官武安侯郑宏等率兵御之，生擒虏贼男妇十一人，斩首五级”，参见〔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15“成化元年三月戊申朔”条，第331页。

〔4〕〔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9“天顺八年九月壬子”条，第193页。

〔5〕〔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9“天顺八年九月壬戌”条，第196页。

虽为明朝、蒙古之间的政治边界，而在此外一定幅度的地域之内，明朝尚通过设置界碑的方式，划定明朝、蒙古之间的“军事边疆”，作为借助流动的军事巡逻，实现军事控制、屏障正式疆界的“缓冲地区”或“中间地带”。虽然明朝并不将之视为正式疆域，但却将之视为军事控制范围。由此可见，与现代国际关系中“非此即彼”的领土单一划分方式不同，明朝边疆观念呈现了彼、此之间尚有一中间地带的复合理念。这一“复合式”、“差序化”边疆观念不仅通过减少固定机构的方式减少了财政支出，而且通过军事巡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边境地区的安全，相应是以最小成本形成最大边疆控制效力的典型方式，适应了明朝边疆收缩政策下的边疆防御需要，从而体现出浓厚的“前近代”特征。

鞑靼在瓦剌、兀良哈追击之下，并由于进攻明朝边境，导致后者后来的出境驱逐，从而由东至西，先后沿大青山、乌拉山、狼山，西至亦集乃，即打通了阴山边疆，将其转变为蒙古各部往来之军事走廊——“阴山走廊”。正统时期，兀良哈借助鞑靼打通的阴山走廊，自东北向东南，沿潢河—开平—西凉亭—兴和—官山—丰州—东胜—河套一线，不断往来于阴山走廊，并进入河套地区。“土木之变”后，瓦剌从整体上打乱了明朝北部边疆的战略部署，并驻牧于河套东北的断头山，以兀良哈三卫尤其福余卫为向导，大规模进入河套地区，并依仗与明军作战中的优势，有越季驻牧之举。有鉴于此，明朝开始改变以往在河套周边抵御蒙古的方式，在河套与之展开战争，以期将之驱逐至黄河以北。虽然“搜套”一词在《明实录》中出现于宪宗时期，但无疑“土木之变”后，明朝已开始开展这类军事行动，只是在战略观念、军队规模上有一定差别。也就是说，“搜套”军事行动开始于天顺时期。石彪取得之安边营大捷，便是在防御基础之上，进一步北上河套，取得的巨大战功，时人亦将之称作“搜套”。

鞑靼在这一历史剧变中，亦顺势南下大马群山南部，并由此沿宣府、大同边境，进入阴山南疆。景泰五年之后的瓦剌内乱中，鞑靼亦卷入进来，在蒙古高原政争与草原灾荒压力之下，鞑靼部落由专权太师孛来率领，南下河套周边地区。在进攻河东遭到明军痛击后，开始更长时

间地居留河套地区，并利用河套“过渡阶梯”的战略地位，不断进攻河套周边地区。不过与成化时期鞑靼部落游牧河套不同，此时孛来、阿罗出与其他鞑靼部落尚主要利用河套的地理阶梯跳板地位，仍基本停留于不断出入河套的流动阶段，尚未较为固定地游牧于此。可见，明朝失去河套的外在因素是蒙古高原的政治局势及由此形成的蒙古各部南下趋势，这也是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历史变迁的主线索与主推动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明长城时代的开启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上
作者=赵现海著；余太山主编
丛书名=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页数=266
SS号=13640316
出版日期=2014.06
出版社=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ISBN号=7-311-04371-1
中图法分类号=K928.77
原书定价=122.00（上、下册）
主题词=长城-修建-研究-榆林市-明代
参考文献格式=赵现海著；余太山主编．明长城时代的开启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上．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06．